

文革回憶錄叢書

不再沉默

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

武彩霞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回憶錄叢書

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

不再沉默

武彩霞 著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回憶錄叢書

不再沉默

——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繁體版）

武彩霞 著

責任編輯：林 濤

封面設計：胡 冬

ISBN 978-988-18428-2-4

2010年8月第1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0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10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8 5333

發行：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德士古道 220-248 荃灣工業中心 16 樓 1609-1616 室

Tel : 00852-23818251

Fax: 00852-23971519

定價：HK\$ 80 元



河南省大專院校紅
衛兵國慶二十周年留影
(1969.10. 於北京)

左起：王海潮、黨
言川、黃宗萬、王善玉、
陳紅兵、范念民、于作龍、
閻幫印、楊國雄

河南省革委會會
議主席臺上 (1968.5)

前排左起：王新、
劉建勳、丁素琴、張
樹芝、范念民



省委書記劉建勳（右一）
在十六條週年紀念會上和
紅衛兵親切交談

范念民在紀念毛主席
接見紅衛兵一周年大
會上 (1968.8.18)



左起：劉建勳、郜國榮、
紀登奎、周泉、唐岐山於
三門峽 (1969)

陳紅兵在文革中 (1968.10)



左起：李樹德、張國勞、楊榮全
、李廣貞於鄭州機務南段 (1973)



左起：黨言川、范念民、王
傳禹、于作龍、張文召、李
尚謙（1969.10.於北京）

前排左起：任延慶、黨
言川、王新（1968）



河南農學院革委會成
員在寫大字報（1967
年）



武汉长江大桥留影 1967
元里

徒步“长征”留影：（後排中
牛瑞蓮、右為筆者）



筆者“二七公社”工作證（1967）



河南農學院紅衛兵廣播站合影（1968.7）



河南“二七公社”倒旗撤銷留影（1968年8月8日）



前排左4起：耿其昌、王廷棟、張欽禮



左圖：筆者《潤之書屋》留影

潤之書屋
魏巍
九九年秋

上圖：1999年秋，著名作家魏巍為
《潤之書屋》題字



筆者和聶元梓於北京
2004.11



筆者夫婦與蒯大富
(河南滎陽2005.8)



藏品一瞥：文革歌曲本



藏品一瞥：文革资料



國慶觀禮代表證（1969）



大串聯免費乘車證1966



毛主席語錄一瞥



開封八·二四袖章



河南二七公社袖章



藏品一瞥：毛澤東瓷像

藏品一瞥：毛澤東像



“文攻武衛”臂章



“河南二七公社”社徽



文革中的中小學課本



“河南二七公社”宣傳畫

序 言

十餘年來，我分別用“霜葉”、“路石”、“草民·匹夫”、“一丁”、“魯石”等名字，寫了一些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字，有的曾貼在網上，有的從未露面。在文革四十週年之際，重讀這些文字，不禁思緒萬千。文革是我們這代人“激情燃燒的歲月”。當年的紅衛兵如今已兩鬢染霜，額頭上的條條皺紋記述了歷經的種種坎坷和磨難。然而，沒有後悔，沒有哀怨，血是熱的，心是紅的。十餘年來，我嘔心瀝血，鏗而不捨地收集文革文物和資料，這些文字就是我在整理資料過程中，觸景生情時心靈深處迸發出的火花。火花彙集，便是火種。我想把這些文字整理成集，以便留存。然而，這些只能叫“文字”而不是“文章”的東西，大都是有感而發，語句生澀，認識膚淺，特別是一些資料的重複使用，彙集成冊後給人以繁瑣、累贅之嫌。比如反映文革結束後河南省“揭批查”運動的一些資料，就先後在兩篇文字中出現。刪除一篇，有點不捨；去掉一篇中的有關文字，又破壞了該文的完整性。斟酌再三，還是決定保留原樣。集子定名為《霜葉集》，是因為我最早的幾篇文字署名“霜葉”，取古詩“霜葉紅於二月花”之意。

其實，作為文革的親歷者和衝鋒陷陣者，真正對毛澤

東發動文革的重大意義有較深刻的理解，還是失去領袖後中國的社會現狀給予的啓示和教育。文革被徹底否定後，造反派被批鬥、關押、戴上“三種人”的帽子，在取消“階級鬥爭”的幌子下，對他們進行著殘酷的階級專政。特別是在取消“四大”和“不爭論”後，他們被剝奪了話語權。那些歪曲、醜化、謾罵文革的聲音充斥在宣傳輿論陣地的各個角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1996年文革30週年之際，從北京來了個學者叫徐友漁，想採訪河南省文革學生“領袖”黨言川，因故未見到，就被引見到我的家裏。當時，我沒有讀過他的任何文章，對他一無所知。只是覺得有人能找我們談文革，就是天大的好事。我親手做了紅燒肉招待他。徐友漁給我的最初印象是溫文爾雅、侃侃而談。後來，我寫了一篇《軍營生活的回憶》登在他主編的《1966我們那代人的回憶》一書中。當時由於對文革這個話題心有餘悸，只好寫離開學校後到解放軍農場勞動鍛煉時發生的事情。這本書出版發行後，我和老伴到北京辦事，順便拿到作為稿費的幾十本書，並參加了徐友漁在清華大學召開的部分作者和文革研究者座談會。記得有唐少杰（清華大學副教授，著有《一葉知秋——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印紅標（北京大學副教授，著有《紅衛兵運動中的兩大潮流》）、碧峽（徐海亮，著有《東湖風雲錄》）等。後來，老友徐海亮給我買了香港中文大學199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主編）一書，讀到徐友漁等人的文章後，才知道我和他們對文化革命的認識存在著根本分歧。儘管政治觀點不同，但他們平易近人的態度和對我收集資料的鼓勵、肯定，還是令我稱道的。如清華大學唐少杰教授，雖然見面不多，但每次給我的印象都是謙遜有加、不擺架子。

2004年冬，聽說他寫的《一葉知秋》在香港出版了，我就打電話索要，他回答“以後再說”。沒過幾天，我竟收到他郵寄來的親筆簽名蓋章的《一葉知秋》一書，當我打電話表示謝意時，他反而向我表示歉意說：那天接電話時正在睡覺，由於幾年沒有聯繫，竟沒有反應過來。後來想到是您，就趕快寄去。當然，在原則問題上我還是不讓步的。比如，有位旅美學者，曾想向我要河南《二七公社報》的複印件，我回絕了。“河南二七公社”是文革中全國有名的造反派組織之一，我的確收藏有從創刊到終刊全套的《二七公社報》，不願意給的原因是：我對文革發生在中國，而大量的文革資料流失到國外這一現象始終耿耿於懷。

1998年，我以霜葉為筆名寫出《不再沉默》和《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兩篇初稿。當時的心境是：說是不再沉默，却不敢越雷池半步；說是拋磚引玉，却不敢輕易給別人看；說是一吐為快，却仍吞吞吐吐、猶抱琵琶。後來這兩篇文章被朋友貼在網上，其中一篇署名改為“一丁”。現選入《霜葉集》，誠望得到志同道合者的鼓勵和幫助，也希望和不同看法的人探討。

2000年，在同志們的鼓勵下，我整理出十餘萬字的《八年日記》。這是丈夫和我八年監獄內外生活的真實記錄。它不僅記述了我艱難歲月的心路歷程，同時也是“揭批查”這段歷史的見證。由於種種原因，至今未公開露面。我暫把《自序》和《後記》部分收集在《霜葉集》裏。

1998年5月，我參加了《中流》雜誌河南發行站的發行工作。《中流》雜誌是林默涵、魏巍主編的中宣部正式批准發行的刊物。它是1989年蘇聯解體後，中央一些老同志（如王震、鄧力群等）在對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

教訓反思中，倡導興辦起來的。當時的說法是“給老同志留一個說話的地方”。《中流》雜誌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辦刊方針，很快受到許多老同志的擁戴。然而，《中流》雜誌沒有像其它刊物那樣進行廣告宣傳和疏通發行渠道，發行量很小。後來，在老同志的建議下，河南省率先成立了《中流》雜誌發行站。接著，全國一些省市也相繼成立。1999年12月，我有幸參加了《中流》雜誌十週年座談會，聆聽了鄧力群、馬賓、鄭天翔、吳冷西、魏巍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講話。他們對黨和國家命運的關心和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分析、擔憂、疾呼，令我由衷地感動和敬佩。這次座談會的意外收穫是認識並訪問了陽早寒春夫婦。作為外國人，他們對毛澤東的深厚感情和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解，深深地打動了我。從《中流》雜誌的文章和老同志言談話語中總是會流露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甚理解。令人欣喜的是，這些在文革中受過衝擊的老同志已經開始拋棄個人恩怨，對“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進行理性思考，並主動聽取不同意見。2001年3月，河南幾位同志根據北京一位老同志的建議，敞開心扉地分別談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霜葉集》中《關於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看法》一文，就是我綜合幾位老同志的看法寫出的。

2001年春，“毛澤東論壇”網站設立“三年自然災害館”，徵集有關我國59年—61年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事件真相，這使我想到了河南省在1960年前後發生的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和老伴到北京找到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妻子李瑞英同志，她給我們詳細談了親身經歷的“信陽事件”，並把張樹藩的遺作《信陽事件：一個

沉痛的歷史教訓》給了我們。我以“路石”為名寫了《按語》，並查閱資料摘出毛澤東對當時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批評，一並貼在“毛澤東論壇”網站上。後來，張樹藩同志的這篇文章和我寫的按語被西安社科院的張宏志研究員作為附錄登在他所著的《還清白於毛澤東》一書中。也許張宏志同志至今還不知道“路石”是誰，但是，能為還毛澤東清白做點事，我十分欣慰。這次整理時，我把吳芝圃關於信陽事件的檢查摘錄，一並收入《霜葉集》中，供關注這段歷史者參考。

學會應用電腦，使我的文革資料整理工作更上一層樓。早在1993年初夏，我和老伴就給上高二的兒子買了一臺聯想286電腦。當時，家庭買電腦的比較少，我們何以如此超前呢？這得從兒子小時候說起。兒子從兩歲起，就經歷了父親坐牢、被母親背著、扯著探監八年的艱辛日子。有一次，在探監回來路上，兒子用迷茫的眼神問我：“爸爸是好人，還是壞人？”我說：“你爸爸是好人。”“那為什麼解放軍（應是武警）管著他？”我無言以對。兒子怎麼會理解“文革犯”的含義呢？然而，幼小心靈遭到的創傷，使他逐漸變得性格內向，不願和別人交流。那時候沒錢買玩具，假期裏兒子跟我到朋友家串門，就把人家的舊玩具拿回家擺弄、拼湊，養成了愛動腦筋的習慣。為了培養兒子的興趣愛好，彌補對兒子的愧疚，所以我家較早擁有了電腦。1995年，兒子考上了大學後，自己組裝了一臺586電腦——我家的第二代電腦，這臺電腦在兒子大學畢業後歸我所用。於是，1999年，我正式開始學習電腦。由於小時候學的漢語拼音不是用英文字母，高中到大學又都是學俄語，所以，我只能像幼兒園小孩一樣，從英文字母和漢語拼音學起。

我在電腦上打出的第一行字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我一定要學會電腦。”神奇的電腦常常使我感慨不已。在我的宣傳鼓動下，幾個好友也相繼買了電腦。

網絡使我的眼界驟然開闊起來。2000年，一些左派網站十分活躍。如：“毛澤東論壇”、“中國與世界”、“上海紅旗”等。這些網站上有許多討論毛澤東和文革的文章，令我激動和興奮。當然，也有一些令人氣憤的文章。2000年10月，我在網上讀到于光遠老先生的一篇文章《讀了余秋雨兩篇自白之後》，文中關於中央清理“三種人”工作開展得不徹底、致使不少“三種人”漏了網的論調，令我不能苟同。於是，我和老伴以草民、匹夫為網名，斗膽寫了一篇《讀了于光遠一篇文章以後》貼在天涯網上。衆所周知，于光遠是很有名氣的大人物，草民所以敢和他理論，正是由於網絡這塊神奇而廣闊的陣地。這篇文章也收錄《霜葉集》中。

2003年10月，我根據資料，整理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活動簡記（1965.11—1969.10）》一文，曾被朋友貼在網上。這次收錄到《霜葉集》中，試圖為讀者開啓一扇瞭解毛澤東文革活動的視窗，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較系統的資料。

2004年春，我和打工詩人梁彥選合編了一本《打工詩選》。小梁找來打工詩作，我負責選編並輸入電腦，還自不量力地寫了序——《讓更多的人瞭解打工詩作》。自費印刷500本，贈送給朋友們。很快，軍旅作家魏巍給我來了信，信中說：“你寄來的《打工詩選》已收到。也看了一部分，感到你的工作很有意義。這些詩集中表現了當前千百萬打工仔真實生活和真情實感，使人心痛、心酸、淚下。……”後來，在魏老的推薦下，《詩刊》推出了“《打工詩選》作

品選輯”，發表了 21 首打工詩作。

《往事漫憶》是我對親身經歷的幾件事情的回憶。有《文革中我是怎樣當上造反派的？》、《我所經歷的一次武鬥》、《紀登奎被“搶”記》等。其中《父親寫春聯的故事》是 1984 年春節前夕，為紀念去世的父親而作的。我的父親於 1982 年 10 月 7 日去世。當時正是丈夫因“文革罪”含冤坐牢，我隻身帶著三個孩子又工作又奔波的極其艱難困苦的歲月。在父親得了腦血栓住院期間，家裏一直沒有讓我知道，直到父親停止了呼吸，才電話通知了我。當回到老家，看到僵直在床上再也不能和我說話的父親時，我的心碎了！作為父親唯一的女兒，我沒有在他病重期間侍奉過一天，反而讓他為我擔憂、操心。當聽到父親臨終前還在喊著囹圄中女婿的名字時，我禁不住痛哭失聲。自古以來，忠孝不能兩全。為了工作，為了孩子，為了獄中受難的丈夫，我沒有盡到做女兒的孝心，父親會理解的。這篇文章是我對父親的永久紀念。

2004 年後，我和老伴開始收集“活資料”，即對文革當事人進行錄像採訪。例如，對聶元梓的採訪，著重談“全國第一張大字報”貼出前後的經過；採訪曾被毛澤東稱為“學生領袖”的原西安交大學生李世英，談了“六·六”事件的經過以及自殺（未遂）時的思想狀態；採訪西安地區工人領袖張培信，對文革中工人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另外，還請山東、河南等十幾位同志談了個人的文革經歷。這項工作，可以說是在“搶救”資料。因為文革親歷者大都年逾花甲，有的體弱多病，有的接受採訪後不久就離開人世。比如，黃河水利委員會的關金生同志，因“文革罪”含冤坐牢十年，身體受損嚴重，2004 年底已

是肝癌晚期，爲了接受錄像採訪，他注射超量的“杜冷丁”來抑制肝部的疼痛，雖然不久他就去世，而寶貴的音像資料却留給了歷史。

2004年底，由於奔波勞累，我得了一場大病，致使錄像採訪工作暫時擱淺。在家休息的兩年中，我和老伴根據收藏的“文物”資料，以魯石爲筆名，寫出了《歷史的見證——文革文物展示》初稿。企圖通過“文物”展示、圖片說明、講述故事，使後人對文革得到比較直觀、系統的印象，感受紅色魅力。同時也是對妖魔化文革者的回應。2006年8月，我帶著拙作到北京請著名作家魏巍指教。86歲的魏老讀後寫出了簡短、深刻、凝重的文字——寫給《歷史的見證》：“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至今已經40年了。隨著歷史風雲的變化，這場大革命越發顯出重大深遠的意義和耀眼的光芒。儘管對它的評價依然存在著種種爭議，甚至巨大爭議，而且還會持續下去，但那種盲目的否定和輕率的否定，顯然越來越難以立足了。我以爲，只有從人民長遠的利益出發，廣泛收集歷史資料，嚴肅地研究它，加深的理解它，找出什麼是成功的地方，什麼是不成功的地方，並總結出有益的經驗教訓，以利於未來的實踐，才是正確的路子。魯石是我的故鄉人。她是那場革命的親歷者，又是有心人。近二十年來，她以並不寬裕的經濟條件，懷著滿腔摯誠，走南闖北，歷盡辛苦，在各地舊書攤上收集文革文物，終於蔚爲大觀，簡直成了文革文物的收藏家了。如《毛主席語錄》她就收集了數十種大小不同的版本，國內外用五十多種語言文字發行的語錄版本也有不少被收入囊中。此外還有多種《大字報選編》和數千種《紅衛兵》小報、傳單，文革中的照片、歌曲，文革

中的中小學課本，各種紀念品和票證等等，真是五光十色，使人大開眼界。現在她把這一切材料，歸納整理，編成《歷史的見證》一書。我想，這對推動文革歷史的研究，無疑是一大貢獻。書成之日，特書此數語，對她多年來的辛勞和摯誠表示敬意。”魏老對拙作的評價是對我的鞭策和鼓勵。《霜葉集》中的《收藏文革文物，見證真實歷史》就是該書的序言部分。

《霜葉集》中的詩《人民懷念毛澤東》，是為紀念毛澤東主席逝世 29 週年而作。雖然粗淺、直白，但感情真摯，表達了我對領袖無比懷念的心情。

2006 年 5 月，適逢文革四十週年，我突然有一種想寫一點紀念文字的衝動。於是，就臨時將初稿《歷史的見證——文革文物展示》中的前幾部分整理出來，取名為《四十週年話文革》，被朋友貼在網上（後來還被素不相識的玉嶺網友製成了電子書）。雖然《歷史的見證》已經基本完稿，但出版還遙遙無期。一來對文革這個話題，出版界仍如履薄冰；二來書中有大量彩色插圖，昂貴的印刷費非個人財力所能及。所以，將《四十週年話文革》先置於《霜葉集》之中。

《鄭州大學文革概述》、《文革事件鉤沉（選登）》是根據筆者收藏資料整理而成的。其片面性和不足之處希望當事者批評、指正。

回顧十幾年來走過的路，最大的收穫是頗豐的“紅色收藏”和結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朋友，最大的遺憾是由於身體欠佳、家務繁重、經濟拮据等原因，收藏工作基本停頓。如今，我和老伴都已年逾花甲，還要伺候和贍養兩位九十多歲高齡的老人。令我欣慰的是，孩子們都已長大工作，又十分孝順。我不羨慕萬貫家產的榮耀，不羨

慕麻將桌前的消遣，不羨慕歌廳酒店的沉醉，不羨慕國外觀光、國內旅遊的雅興。做我想做的事——收集整理文革文物，就是我最大的樂趣。文革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將為研究文革奉獻餘生。

《霜葉集：關於文革的回顧與思考》一書是筆者首次把文字變為“作品”的嘗試。由於理論水平、認識高度、寫作能力所限，謬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到這些文字的同志、朋友，不吝賜教。筆者將不勝感激！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在出版繁體版時，將書名改為《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內容基本未變。

武彩霞

寫於 2006 年 12 月

改於 2008 年 12 月

目 錄

序 言	1
不再沉默	1
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	15
鄭州大學文革概述	46
《八年日記》自序	76
《八年日記》後記	82
收藏文革文物 見證真實歷史	84
往事漫憶	92
文革中我是怎樣當上造反派的	92
我所經歷的一次武鬥	95
紀登奎被“搶”記	104
父親寫春聯的故事	114
讀了于光遠一篇文章之後	117
讓更多的人瞭解打工詩作	126
人民懷念毛澤東	135
四十週年話文革	139
談談文革中的《毛主席語錄》	139
談談文革中的大字報	145
關於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148
試談毛澤東的一張大字報	153
五十多天“白色恐怖”典型事件選登	157

介紹毛遠新的一張大字報	162
介紹一組對聯形式的大字報	170
介紹四位美籍專家一張大字報	172
談談文革中的傳單	179
淺談文革中的改名故事	184
淺談文革小報	187
從傳單的署名看文革時代的詞彙特徵	194
軍營生活的回憶	201
關於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看法	212
毛澤東爲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213
對毛澤東在文革中選擇用人的看法	221
怎麼看文化大革命是勝利還是失敗?	231
文革中經濟是發展了，還是瀕臨崩潰的邊緣?	233
應當怎樣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236
如何評價文革的“三分錯誤”	240
如何理解“對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243
文革事件鉤沉（選登）	248
上海“安亭事件”	248
南開大學的“抓叛徒”事件	251
青海省西寧“二·二三”事件	256
黑龍江省的“炮轟”省革委事件	258
《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按語	269
關於《文敏生回憶錄》中一段文字的復信	272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動簡記	280
後 記	355

不再沉默

1966年初夏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史無前例的、震撼五洲四海的、由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億萬群眾踴躍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過去32年了。這場被毛澤東稱爲“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後又評價爲“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歷經十載，到了1976年10月6日，在毛澤東去世28天後，以華國鋒爲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並宣佈結束。接著，文革中曾信誓旦旦向毛澤東保證永不翻案者復出，文化革命被認定爲“由領導者錯誤發動、3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於是，血淚控訴、平反昭雪、撥亂反正、“揭批查”、清理“三種人”、傷痕文學……種種形式，把文革徹底妖魔化。到了1996年，文化革命發動30週年之際，國外有關文革的議論沸沸揚揚，甚至有“試圖賦予文革某些合理性、先進性”的論述，而國內——文革的發源地——“文革這個主題却顯得出人意料的沉默”（海外學者語）。雖然也有幾篇有關文革的學術文章問世，其內容也是蒼白無力的；雖然也有“蠢蠢欲動”者，企圖出版關於文革的回憶文集，徵稿、組稿很是忙乎了一

陣子，也終於流產。這是爲什麼？是人們在對文革的詛咒聲、謾罵聲、徹底否定聲中不敢再提往事，還是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疲倦了、麻木了、忘却了……？終於有一天，我在《鐘山文學》第 103 期上讀到了馮驥才的文章——《終結文革》及其兩篇附錄：一是非文革經歷者的文革概念，即對 20 名 1976 年以後出生的人對文革印象和看法的採訪實錄；二是關於馮驥才談《一百個人的十年》文革工程採訪錄——介紹馮驥才爲普通老百姓記載他們文革經歷的紀實文學。我不知道馮驥才所寫的一百個人（據說採訪了 4000 人）能否代表億萬文革親歷者，也不知道這部作品是否起到“喚起民衆自我反省，推動民衆自我拯救”的作用，然而有一句話，引起了我的共鳴，觸動了塵封於心底的“文革情結”。那就是：“終結文革的方式，唯有徹底真實的記住文革”。

我的文革情結，使我有一種時時想鳴的不平感。作爲一個 60 年代的老五屆大學生（1966 年—1970 年），一個文化革命的衝鋒陷陣者，我深知這場席捲全國、觸及人們靈魂的群衆運動，其廣泛性、深入性、複雜性、多面性、殘酷性使得任何簡單肯定或草率否定的說法都不免失於膚淺。對於文革的評價，是“糟得很”，還是“好得很”，是全盤否定，還是“三七”開，歷史會做出公正的判斷。

20 多年來，在對文革的思考中，部分老三屆中學生（1966—1968 年），以他們上山下鄉的“苦難經歷”爲資本，出書，聚會，舉行種種活動；一些具有高貴血統的老紅衛兵，隨著他們父輩的重新掌權而出人頭地，不斷炫耀自己的一貫正確。而同樣爲文革付出了青春的老五屆大學生，特別是其中的造反派紅衛兵却始終沉默著。雖然沉默是金，却是以心靈的傷痛爲代價的。文革乃至文革結束後相當長時

間裏，這場革命給我們打的烙印太深、太深了。直到文革已成為歷史的今天，仍有一些人因為“文革罪”背著沉重的包袱，生活無著落，子女受牽連。右派 20 年後平了反，而擔著“文革罪”名的大量學生，什麼時候才能得到一紙公正呢？所以，儘管這些人對文革這個話題保持沉默，但決不會忘掉文革。

文革被否定 20 多年後的今天，那些文革後出生的年青人——非文革經歷者，對文革的認識和瞭解的程度又如何呢？馮驥才先生對 20 餘名青年的採訪實錄頗能說明些問題。從實錄中我們可以看到青年一代的文革概念是那樣膚淺、幼稚、支離破碎、面目各異甚至荒唐可笑，當然也有疑問和迷惘。“每個人對文革的說法都不一樣，給我的印象很亂。有人說文革生活很苦，大學畢業才 50 多塊錢，但又有人說那時物價很低，一斤肉不到一塊錢；有人說文革隨便打人，社會很亂，也有人說那時幹部清廉，治安很好；有人說毛主席犯了錯誤，可有人說毛主席很偉大，一聲令下，全國聞風而動；我也不知道誰說的對，形不成一個完整的印象。我曾經把這些話對一個經歷過文革的人說過，他說這話全對，我聽了就更糊塗了”——一個 19 歲的男性青年如是說。另一個 17 歲的高二學生說：“為什麼對文革好像有點迴避呢？考歷史時老師說，不考這塊，甯準備了。‘這塊’就是指課本上有關文革的內容。家裏的爺爺奶奶也常囑咐我們對文革‘千萬少說’。”兩位青年的話道出了他們文革概念的模糊及其困惑。

青年一代對文革的印象大都來自長輩之口以及文學、電影、電視等官方媒體的宣傳。20 多年來，宣傳媒體千篇一律的把造反派描寫成打砸搶分子或不學無術只會背語錄、

跳忠字舞的狂熱者。久而久之，在人們的印象中，文革就是打砸搶，億萬文革參加者，似乎也成了不可理喻的、愚昧無知的、瘋狂的精神病患者。我不禁想問：如果真是這樣，1967年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68年萬噸級遠洋巨輪高陽號成功下水、南京長江大橋提前通車，1969年，我國建成最大的水泥廠、氮肥廠、大型軋鋼廠，1970年我國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河南林縣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長1100多公里的紅旗渠、雜交水稻研究成功等等，都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那些把文革說的一無是處的人也許會說，這些成就都是工農群眾創造的，你們這些青年學生只會造反、批鬥。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億萬工農群眾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即使是充當先鋒的青年學生起來造反，也決不是無緣無故的。

如今，經歷過文革的我們這代人都已年過半百，染霜的鬢髮是歷經滄桑、飽嘗辛酸的象徵；額頭上條條皺紋裏記述了走過的坎坷的歷程。當我們讀著那些把時間、地點、人物、活動都搞得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讓人啼笑皆非的所謂“文革史”、“文革紀實”、“文革研究”等等文革作品的時候；當我看到文革中的像章、語錄、傳單、宣傳畫等載體的碎片散落在各地的舊物市場，和古玩字畫一起被收藏者或研究者討價還價的時候，我不禁感慨萬端！最大的文革載體莫過於我們這一代文革經歷者，當我們還健在的時候，“文革品”就成了“文物”，倘若後人就憑那些一鱗半爪的文物和莫衷一是的文革作品去研究文革、評價文革，豈不是最大的悲哀！“終結文革的方式，唯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要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只有衆多文革親歷者不再保持沉默。

許多年來，“文革罪”給我造成的心靈上的傷口時時隱隱作痛，使我常常有一吐為快的衝動。回憶往事，歷歷在目，刻骨銘心。十年文革，驚濤駭浪，我付出了青春、熱情和真誠；二十年來沉靜思考，更加成熟和自信。改革大潮，為名忙、為利忙，為權忙，損公肥私者有之；利用職權，大貪大撈、大富大貴、大紅大紫吃喝嫖賭無惡不作者有之；勞心苦，勞力苦，養家糊口苦苦掙扎者有之。然而更多的——也是我們這代人的大多數，却是無怨無悔、坦坦蕩蕩，不為金錢所誘惑，不為權利所動心，辛勤為立足之本，克己為國家分憂，鞠躬盡瘁、默默奉獻。我們這代人不愧為中華民族的脊梁。真想為這代人謳歌一曲！然而當我拿起筆來的時候，總有好心者勸阻：文革是禁區，小心闖禍！今天，雖然文革已成為歷史，對於闖這個禁區仍是心有餘悸，如履薄冰。我所以不再沉默，把多年來的心路歷程公佈於眾，實為拋磚引玉。希望這代人在有生之年，對文革進行回顧與思考，把歷史材料留下來，如：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什麼是“四大”，什麼是“革命串聯”，什麼是“走資派”，什麼是“革命派”，什麼是“大聯合、三結合”，什麼是“三支兩軍”、“鬥私批修”、“吐故納新”……，讓後人記住真實的文革。

我幾乎是踏著慶祝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鼓點進入學校大門的。我學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從小學到大學，我無時無刻不接受到愛共產黨、愛祖國、愛人民、愛領袖、愛集體的社會主義思想和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國際主義思想的教育。共產黨好，毛主席偉大，社會主義優越的信念在我的心中生根發芽、根深蒂固。初中時代，

我正趕上大躍進，踴躍地參加了大辦鋼鐵運動，見證了國營企業從無到有、拔地而起的過程。1960年8月，我初中畢業考到地區高中。當我第一次坐上汽車走出山村，驚嘆“白（柏）油路怎麼這樣黑”的時候，第一次到許昌，看到城市風采的時候，興高采烈的我，兜兜裏裝的只有用白布裹了一層又一層的6元人民幣和幾個用野菜摻和玉米麵烙的餅子——全年的學費和第一次出門的乾糧。高中的三年，正是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我是嚼著樹葉、吃著紅薯麵做成的“什錦點心”、喝著能照見五官的稀粥過來的。暑假回到家裏，門上貼的“食堂巧煮千家飯，公社飽暖衆人心”的對聯依稀可見，然而看到的却是由於自然災害和河南省當政者“高估產、高徵購”造成群衆生活困難和民不聊生景象，聽到的是群衆對社隊幹部多吃多佔、浮誇虛報、弄虛作假、大放“衛星”的怨聲。面對此情此景，老百姓却說：上面的經是好的，都叫下邊的歪嘴和尚念歪了。學校裏，政治課老師大講蘇修如何撤走專家卡我們的脖子，相信困難是暫時的，“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所以，儘管我們一個個面黃肌瘦，仍是認認真真學習文化知識，樂呵呵地高唱反修歌曲，對共產黨、毛主席忠心不二。直到八十年代毛澤東的衛士長在回憶文章中寫到毛主席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曾七個月不吃肉，其愛女李訥也忍饑挨餓的情況時，已經歷經坎坷步入中年的我，仍禁不住爲領袖與人民同甘共苦的革命風操感動得熱淚盈眶。一位老友戲稱我是“歷盡艱辛終不悔，一代忠骨紅衛兵”。是愚忠嗎？我至今還不這樣認爲。

1963年夏，我進入大學校門，成了我家祖祖輩輩第一代大學生。和其他農民子女一樣享受國家全額助學金。學

校發給每月 13 元 5 角的伙食費，食堂裏白饅、包子、鹵麵，不斷變換花樣，生活上和高中三年相比真是天壤之別。然而城鄉同學之間，三大差別（城鄉、工農、腦體）體現十分充分。僅從衣著來看，城市同學的時髦華麗（當然不能和當今相比）把農民子弟的粗布褂子、自製西服褲子襯托得“土得掉渣”。少數農村同學中出現“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現象，屢屢成爲政治活動的批評對象。對此，我克服了曾一度產生的自卑感，下定決心努力學習專業知識，積極參加政治運動和社會實踐，力圖使自己成爲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材。

1964 至 1965 年，大學裏開展了學習雷鋒、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政治活動。社會上開展的文化戰綫對資產階級的批判更是如火如荼，如：文學界批判“中間人物論”，電影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戲劇界的京劇革命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極大的激發了青年學生的政治熱情。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篇後來被稱爲“文化革命前奏”的文章當時對我們青年學生沒有產生過大的影響，只覺得那是學術討論。1966 年 5 月 10 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又一篇題爲《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第二天又在全國各報刊轉載。文章說鄧拓、吳晗、廖沫沙以“三家村”爲名寫文章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是販賣資產階級思想的“黑店”，從此，報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連篇疊牘，火藥味越來越濃烈，全國各省市揪出了大大小小的“三家村”黑店“老闆”，這些“黑幫分子”大都是才高八斗、有名氣、有名望

兼有黨政權力的人物。這無疑在大學生中引起巨大的反響。我們多年來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所積累的階級鬥爭覺悟，一下子被調動起來：鬥爭果然太複雜、太尖銳了，竟然有人含沙射影反黨、反社會主義！於是，我們毫不猶豫地口誅筆伐，參加戰鬥。然而，作為一個從農村出來的省級院校的大學生，許多人沒有北京那些高幹子弟特有的政治嗅覺、通天本領，不可能知道中央正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更不可能知道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有“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重要指示。那時候，即使對領導有意見我們也不敢貿然去提，在不少人心目中，校黨委就代表光榮偉大正確的黨。我們大多數青年學生是隨著院系黨委的指揮棒，高呼著“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口號被捲入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一張大字報，首次把矛頭公開指向北大校黨委和北京市委，吹響了向當權派開火的號角。這號角使青年學生意識到他們也有向當權者挑戰的權力。於是，少數政治覺悟敏銳者對本單位的鬥爭大方向產生了懷疑，並效法聶元梓等向法院黨委寫大字報，這使一貫以黨的化身自居的當權者暴跳如雷，連夜召開黨委會組織反擊，企圖把少數造反學生打成“右派”、“反黨分子”、小“三家村”，校園呈一片白色恐怖，甚至出現學生被逼自殺事件。這種壓制民主的做法更加激化了學生與當權者的矛盾，也無形中壯大了少數派的隊伍。6月3日，開始停課鬧革命。自此，反對和保衛院黨委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有的學校還出現揪鬥校黨委書記的現象。在各級領導看來，學校出

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省市工作組進校以替代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工作組對少數造反學生仍採取壓制態度，一方面派人暗地整理這些學生的黑材料，一方面實行“反干擾”的政策組織反擊：聲討會、批判會、集中交待問題使許多學生遭受過重打擊。在這段時間裏，工作組究竟整了多少學生，打了多少“右派”、“反革命”，我不得而知。從今天官方出版的一些資料中摘錄幾例可見一斑：“清華大學工作組進行的反蒯鬥爭中有數百人被當作反革命和右派受到鬥爭，被鬥者有一人自殺身亡”（《共和國史記》第三卷第104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西安交通大學發生“六·六”事件，7、8、9日三天，交大各系對“尖子”開了大小鬥爭會，並把學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遊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殺未遂，後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同上第99頁）；“據北京24所高校的統計數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佈的‘反革命’、‘右派’的學生10111個，支持他們被同樣宣佈為‘反革命’的教師達2591人（《紅衛兵秘錄》第340頁，于輝編，團結出版社1993年出版）。是毛澤東的一張大字報扭轉了少數派受壓的局面。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高度讚揚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尖銳地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綫性錯誤。毛澤東說：“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毛澤東的支持使遭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壓制、

迫害的造反派歡騰跳躍，激動萬分，他們流著淚千遍萬遍的高呼：“毛主席萬歲！”他們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毛主席指向哪裏，我們就打向哪裏！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和誰拚到底！”接著，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公佈，各地先後撤銷了工作組。1966年10月，劉少奇、鄧小平就派工作組問題在中央會議上作了檢討，各省市有關領導也相繼進行了檢查。自此，造反派揚眉吐氣，一面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一面向省市黨委當權派開炮。從1966年9月至年底，我們把“四大”這一文鬥武器應用得淋漓盡致。至今我還清晰的記得當時我身掛小喇叭在校園裏徹夜不眠大辯論的情景。那時候，每個人都有參加辯論的權力和退出辯論的自由，只是一些出身不好的學生對“血統論”心有餘悸而充當旁觀者。爲了避免雙方以遭圍攻爲藉口互相攻擊，我們在圍成圓圈辯論時留個缺口，以示隨時都可以退出辯論。歷史的經驗證明，只有允許平等的辯論，真理才會越辯越明，群眾也會從中受到教育。不少造反派的隊伍就是在大辯論中成長壯大成爲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這也不難說明，文革被否定後有人斷然取消“四大”，蠻橫地宣佈“不爭論”的原因之所在。

紅衛兵，這個曾使億萬青少年狂熱並引爲自豪的稱號，在我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永不磨滅的印迹。至今我還放著當年的紅袖章、證件和受到毛主席檢閱後寫下的滾燙日記……。對於當紅衛兵，我至今無怨無悔。文革中曾有一首《滿江紅·讚紅衛兵》，生動形象地概括了震驚世界的紅衛兵運動的奇功偉業。詩中寫道：“時行八萬，駕飛船巡遊太空。放眼界，鼓擊高天，旗捲東風。環球遍燃革命火，

東方興起紅衛兵。閱古今中外千秋史，皆震驚。// 破四舊，立四新；縛蒼龍，斬長鯨。鬥劉賊少奇，疊建奇功。疆場生就千里馬，險峰育出萬年松。問豐功偉業歸於誰？毛澤東。”（見吉林工業大學《工大新生》報第8期，1968年11月8日）然而，早期紅衛兵的興衰却留下許多苦澀的思考和感慨。

1966年5月29日，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在圓明園的廢墟上，由清華附中幾個高年級學生憑著他們得天獨厚的環境所特有的政治敏銳感建立起來。他們寫出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首次披露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一振聾發聵的毛主席語錄。這張極富煽動性、鼓舞性、戰鬥性的大字報被駐校工作組視為“反革命宣言書”，後來却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讚揚和支持。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的百萬師生，並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連同以後共八次接見紅衛兵1300萬人，把紅衛兵運動推向了全國。紅衛兵像無數橫空出世的孫悟空，揮舞著金箍棒，“攪得周天寒徹”。毛澤東以極大的信任支持紅衛兵這個新生事物，紅衛兵以極大的熱情充當了文化革命的急先鋒。他們高唱造反歌，走向街頭，張貼標語、散發傳單；他們串聯、集會、講演、大喊大叫；他們大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勇敢向舊世界宣戰。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火迅速在全國蔓延燃燒起來，摧枯拉朽，勢不可擋。

1966年8月，當毛澤東極力把鬥爭的矛頭引向黨內走資派的時候，一些堅持“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血統論的老紅衛兵，開始對文革的目的迷惑不解。他

們一方面希望自己能成爲全國紅衛兵的榜樣去衝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便在風浪中成長接班；另一方面又無法接受父輩被接二連三地打倒，自己成爲“走資派”子女的現實。他們由困惑而惱怒，而反擊，把鬥爭矛頭對準“學術權威”、“黑五類”、“牛鬼蛇神”，在號稱紅八月裏，製造出駭人聽聞的打殺事件，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就死在這種情況之下。1966年12月5日，以高幹子弟爲核心的“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即“聯動”）宣告成立。他們試圖把全國幹部子弟自上而下組織起來，形成一種自我保護的力量，與矛頭指向走資派的造反派紅衛兵相抗衡。他們懷著對父輩遭受“批鬥”的仇恨，反對中央文革，喊出：“打倒三司”（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油炸江青”等口號，發泄對文化革命的不滿，最終遭到中央文革的取締。當歷史的車輪轉到八十年代，隨著文化革命的徹底被否定，中央對“聯動”平了反。當年的聯動成員在歷經坎坷後，有的發憤圖強，憑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成了作家、科學家；有的則利用特殊地位成了經濟大潮的弄潮兒，呼風喚雨，損公肥私，成了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以十倍的瘋狂向社會討索青春失落的利息”（安文江先生語）。他們利用各種媒體宣揚自己“受苦受難”的經歷，却巧妙地掩蓋文革中被推薦上大學、參軍、入黨的事實。其實，他們所受的痛苦折磨，比起普通老百姓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只不過是失去了部分特權而已。所以，對於那些文革初期揮舞“血統論”的大棒，迫害知識分子、迫害“黑五類”而今又以特殊身份招搖過市者，實在令人嗤之以鼻。

然而，在否定文革的官方媒體宣傳中，往往把文革初期迫害老知識分子的罪惡行徑強加於造反派紅衛兵身上。

從 1966 年 6 月至 8 月，造反派為反抗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而抗爭，即使在工作組撤走後，工作組一手炮製的“文革會”、“主席團”、“籌委會”等組織以及以後改頭換面成立的各種紅衛兵組織，仍把批判“學術權威”、“牛鬼蛇神”作為大方向。大部分造反派紅衛兵是在“八·一八”以後組織起來的。這些組織的主體是出身好根子正的工農子弟。他們不唯成分論，根據毛主席“重在表現”的政策，歡迎出身不好、願意革命的學生參加，也因此而遭到保守派的攻擊。當年河南流傳甚廣的“二七公社大雜燴、牛鬼蛇神排成隊”就是一個例證。實事求是的說，造反派也有犯錯誤的，甚至犯罪者，但大多數都是好的，是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始終堅持批鬥“走資派”的大方向的。在否定文革的“揭批查”中，不少地方把造反派與“打砸搶”等同起來，甚至連“提漿糊桶的也不放過”，使這些文革初期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軍隊介入後又遭到圍攻、逮捕、鎮壓的造反派，最終戴上“打砸搶分子”、“幫派骨幹”、“三種人”等帽子，壓得抬不起頭來。許多人被判入獄，刑滿後不給出路，連做技術工作的權利也不給。十年文革中造反派跟著黨跟著毛主席無私奉獻，忠心耿耿，却付出終生挨整的代價。文革中曾是上海復旦大學學生，現為深圳大學教授的安文江先生 1995 年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第一批國民黨戰犯大赦是在他們關押十年之後……。紅衛兵造反至今已有 29 年，對他們 20 多歲左右的過失何以不能給予更多的理解和寬容？！我們黨有魄力對沈醉先生等實行統戰，我想更該對紅衛兵統一統的。”（見《1966 我們那代人的回憶》第 112 頁，徐友漁編，中國文聯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以上粗淺的文字坦露了一個老五屆大學生、文革中造反派紅衛兵的心路歷程。放下筆來，心兒一下子輕鬆、清亮起來，終於體驗了一吐為快的愜意！然而，靜下心時，沉重感又涌向心頭。作為毛澤東思想教育成長起來，又經過文化革命風風雨雨的一代人，僅僅為不平而鳴，實在顯得無奈。我常常這樣想，當年全國億萬人民（小官、學生、工、農、兵、革命知識分子），滿懷激情響應毛主席號召投身文化大革命運動，如果當時對文革不夠理解，有些盲從的話，那麼，在歷經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當今社會上出現的私有化、兩極分化以及各個領域的腐敗現象後，對於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及時性，應當有所思考，有所認識。我的這點文字，如果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激發出更多更有分量的文章，讓後人瞭解文革，徹底真實的記住文革，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1998年10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原文署名“霜葉”，收入時文字作了修改）

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

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個地區、每個單位乃至每個人的歷史都有相似之處，却又特點各異，即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筆者作為“文革文物”的收藏愛好者和文革親歷者，近幾年來，翻閱不少資料，訪問了一些同志，對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了回顧與思考。認為，和其它省份相比，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幾個顯著的、鮮明的特點。現將這些也許不太確切、不太成熟的看法做一簡述，供文革研究者和對文革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參考。

（一）

1966年8月，在毛澤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3天後，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也寫出《我的一張大字報》，帶頭支持鄭州大學少數造反學生。此舉帶動了河南一大批領導幹部表態支持造反派。這批老幹部後來參加了各級“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掌握河南省的黨政領導大權達十年之久。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點之一。

1966年8月14日下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剛閉幕，劉建勛讓省委警衛處盛世杰查一下有沒有河南來京串聯的學生。盛世杰在交通部招待所找到了鄭州大學黨言川、方復山、劉松盛三位同學。劉建勛在前門飯店接見了他們，知道他們是來北京向黨中央反映河南文革情況的，就勸說他們一塊坐火車回去。8月15日，劉建勛和黨言川等三位同學一起離京返鄭。在火車上，劉建勛圍繞“敢於革命，善於革命，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十六個字，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鼓勵青年學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到河南後，劉建勛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提出“炮打司令部”，表明要炮打“我這個司令官”。8月19日，劉建勛在鄭州大學宣讀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表態支持因給校黨委、工作組提意見被壓制、圍攻的學生黨言川及河南省第一個大學造反派組織——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簡稱“鄭大聯委”）。劉建勛的這張大字報，很快成爲河南兩派辯論的焦點。後來，還受到毛澤東的表揚。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彙報會上說：“全國只有劉建勛寫了一張大字報，支持少數派，這是好的。”事實證明，劉建勛的這張大字報，對河南省的文化革命運動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符合毛澤東的意圖的。

1966年8、9月份，北京學生到全國各地串聯，煽風點火，不少省份出現大抓“南下一小撮”，圍攻、毆打北京串聯學生的事件，而河南省委却在9月2日發出了《關於歡迎北京學生進行革命串聯的通知》。劉建勛的這些舉動，帶動了全省地市縣大批領導幹部表態支持少數派，並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運動沿著《十六條》的方向發展。從66年8月到67年1月，河南省的學校、工廠、機關造反派組織相繼成立，

並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炮打司令部”中由少數成爲多數。然而，省軍區的介入使這個局面被打破。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奪權風暴席卷全國。1月23日，中央發佈《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衆的決定》，要求人民解放軍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衆的奪權鬥爭。當時，河南省大中學校造反派組織在奪權中發生了分歧，鄭州工學院“革命造反隊”等少數造反派主張先揭發鬥爭文、紀、戴、王（即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書記處候補書記戴蘇理、鄭州市委第一書記王黎之），並把他們看管起來。而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等多數造反派則主張先聯合起來奪省委文革小組的領導權，再揭發批判。1月12日，河南省委領導紀登奎、戴蘇理、王維群召開省委文革各辦公室主任會議，動員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大奪權的風暴。紀登奎說：要迎接大高潮，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邊倒。1月18日晚，文敏生在鄭州糧食學院召開省委常委會。會議決定：①如果文、紀、戴被看管起來，由王維群（書記處候補書記、副省長）、李慶偉（省委常委、副省長）、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負責主持省委工作；②如果鄭大聯委等要奪省委文革小組的權，堅決支持；③革命造反派奪權，堅決支持。保守派奪權，堅持頂住。這兩次會議，實際上是文敏生、紀登奎等省委領導堅決支持革命造反派奪權的表態會。然而河南省軍區介入河南文革後，相信清華大學來鄭州串聯的唐偉等人，把“鄭大聯委”等造反派組織視爲“保守”、“非法”組織，把劉建勛、紀登奎定爲走資派並上報武漢軍區黨委。

1月30日，軍區武裝遊行到鄭大東門時，呼喊：“堅決

鎮壓反革命組織、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明顯針對鄭大聯委。1967年2月7日，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糧院聯委、豫農紅總、鄭大附中紅旗、六廠工人赤衛隊、鄭印八一、新鄉八·一八、洛陽八·一六等74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二七公社”十分希望能得到河南省軍區的支持，可是，軍區不僅不支持，還實行種種鎮壓、摧垮政策。軍區公開支持鄭州工學院等少數造反派組織成立“河南省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簡稱“河南造總”），還支持文革初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中已經解散或瀕臨垮臺的保守組織重新扯旗聯合成立“十大總部”。開封地區的文革形勢也因駐軍的介入變得十分嚴峻。早已成爲多數派的開封“八·二四”被開封駐軍定爲“反革命”組織，遭到鎮壓。2月5日，開封駐軍武裝遊行，喊出“打倒八·二四，堅決鎮壓反革命”等口號。2月7日，由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等40多個大專院校赴汴串聯同學組成的“赴汴反到底兵團”，開著宣傳車前往駐軍8172部隊門口宣傳《解放軍報》社論及有關文章，駐軍對其拍照，彼此發生矛盾。學生宣佈靜坐絕食，以示抗議。2月8日，開封師院“八·二四”100餘人前往駐軍門口聲援“反到底兵團”，並派3名代表與駐軍談判。代表被駐軍扣留後，雙方發生衝突，駐軍包圍學生，抓走40餘人，其中包括主要負責人陳紅兵。2月10日，河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給中央文革小組寫信客觀地反映了河南省這一現狀。信中說：“河南鄭州市各大專院校，無產階級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絕對優勢，但自元月中旬起即開始分裂爲兩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軍區和人民解放軍駐鄭部隊舉行了遊行之後，鬥爭即轉移爲以軍區爲中心展開了，一派支持軍區，軍區和另一派則處於對立，鬥爭十分尖銳。工

人、農民、機關幹部也參加了。不僅鄭州市如此，據說開封等地也有類似情形。我認為鬥爭鋒芒應該是對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這樣的。”（見《鄭州晚報》1967.2.24）

1967年2月，周總理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河南兩派鬧的很厲害，要他們雙方到北京談判，包括軍隊認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來談話，談一談就清楚了，實際上被認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顛倒了。”省軍區和開封駐軍得到這一指示後，陽奉陰違，企圖壓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參加彙報。2月23日，開封市保守組織召開“無產階級革命派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又一新反撲誓師大會”，會上控訴了“八·二四”的“滔天罪行”。開封駐軍參加了大會，軍長作了長篇講話，會後武裝遊行，並用飛機散發傳單。3月5日，開封市公檢法聯合召開大會，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將陳紅兵逮捕，會後用刑車押著遊街。3月6日，河南省軍區、“河南造總”在鄭州市體育場召開“省會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新反撲誓師大會”。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在大會上講話，並宣佈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之後，軍區開始逮捕“二七公社”頭頭，把“四大”變成了“大鎮壓，大逮捕，大登記，大請罪”。在河南二七公社“越壓越硬”的情況下，軍區就利用“十大總部”不斷對“二七公社”挑起武鬥，造成二七公社嚴重傷亡。由於劉建勛已調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著劉建勛支持造反派的大多數領導幹部面對軍隊的強大壓力，採取觀望等待的態度。文敏生曾到軍區找何運洪替造反派學生說話，被拒絕。4月20日，中央廣播電臺傳來劉建勛參加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三結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歡欣鼓舞，而“河南造總”和“十大總部”却在軍區支持下，

一方面由“省委造總”出面主持，連續組織省委部長以上的幹部召開批鬥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大會，運動初期已經靠邊站的趙文甫、楊蔚屏也應邀參加大會，另一方面派人到北京揪劉建勛，給中央施加壓力。

1967年5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河南造總、十大總部）到北京談判。5月11日，河南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戴蘇理公開表態支持河南造總，堅決和河南造總“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並代表河南造總一方去北京參加談判。而支持二七公社的領導幹部，由於軍區高壓控制不敢表明態度。爲了爭取領導幹部儘早站出來對二七公社的公開支持，5月15日，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簡稱豫農紅總）一些學生把正在省委門口看大字報的省委副秘書長張耀東強行架到汽車上，“搶”到農學院，通過擺事實、講形勢，張耀東發表了“對目前形勢的看法”，表態支持二七公社。5月17日，豫農紅總和鄭州大學附中紅旗一些學生又把剛剛被保守派批鬥後送回住處的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搶”到農學院保護起來。5月19日夜，紀登奎在農學院“紅衛兵總部”學生的護送下，化妝成鐵路工人乘拉煤的火車到北京參加三方談判。接著，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其昌也被新鄉師院八·一八的學生護送到北京。在這種情況下，鄭州市委第一書記王黎之、省委副秘書長苗化銘、省公安廳副廳長高大同，分別於5月25日、29日、31日發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亮相”聲明。接著，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王維群、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以及李劍波、董連池等廳局長以上的幹部相繼表態支持二七公社。從5月到7月，河南省有近400名地、市、縣以上領導幹部來到被稱爲二七公社“解放區”的河南農學院，

探聽北京消息，享受一條毯子、一條席、一個饅頭、一碗菜的待遇。這些待遇曾一度作為他們較早支持造反派的“資本”被炫耀過。否定文革時，又成了他們的“罪證”。據一份“省委機關幹部亮相情況”資料表明，原省委機關廳局級以上幹部共 47 人，“7·25”中央表態以前公開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有 23 人，佔此級別幹部的 49%；同情二七公社的 2 人，佔 4.25%；中間狀態 1 人，佔 2.12%；支持河南造總的 15 人，佔 32%；支持十大總部的 6 人，佔 12.7%；“7·25”中央表態後，又有部分領導改變態度支持二七公社。

1967 年 7 月 5 日，在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中央其他領導參加下，河南省三方赴京彙報團達成了停止武鬥的六項協議，7 月 10 日，中央發出了解決河南問題的 [1967]216 號文件。文件中指出：①河南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②河南省黨內走資派是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書記處書記趙文甫；③劉建勛是革命領導幹部，並回河南籌備河南省革委會。

1967 年 7 月 25 日凌晨 1 點 30 分到 2 點 40 分，周總理在京西賓館接見河南省軍區、軍分區和省駐軍師以上領導幹部時說：“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對二七公社、鄭大聯委、新鄉八·一八、洛陽八·一六、開封八·二四左派，你們每一個部隊首長同志有權力支持它、保護它，要派部隊去。”根據周總理的這個講話精神，7 月 25 日上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新華社提供的關於全國各地對武漢“7·20”事件反映的綜合報道。在這篇報道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稱謂。當天的《人民日報》也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登了這條消息。這就是在河南被稱爲的中央“7·25”表態。8 月 2 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

委員會籌備小組，劉建勛任組長，王新（河南省軍區政委）、紀登奎任副組長。8月4日，劉建勛從北京調回河南（劉建勛於1966年9月1日調到北京任華北局書記、北京市委常務書記）。在省革籌的領導下，按照毛主席“幫助、批評、聯合”的指示，實現了“河南二七公社”、“開封八·二四”、“河南造總”的大聯合。到1968年初，全省70%左右的領導幹部被解放出來，相當一部分參加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據一份資料顯示，省直機關66個單位，共有廳局長以上幹部393人，已解放284人，佔72%，其中第一把手31人。

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劉建勛任主任，王新、紀登奎、耿其昌、楊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眾代表1—2名副主任暫缺。由副主任暫缺群眾代表這一做法，可以看出劉建勛並沒有把“浴血奮戰”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戰友”扶到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去。（據資料：省級革委會群眾組織代表擔任副主任職務的：湖北省3人，其中學生1人；陝西省7人其中學生3人；四川省9人，其中學生2人；湖南省2人，其中學生1人）。據河南省地（市）縣77個革委會統計，其中有48個革委會副主任群眾代表空缺。學生頭頭擔任縣革委副主任職務的只有4個縣。

河南省革委會成立後，一直到1978年，除了軍隊幹部變動較大和紀登奎調到中央工作外，河南省的核心領導，包括地市委書記在內，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動。也就是說河南省的黨政領導權掌握在以劉建勛為首的老幹部手中達十年之久。實事求是地說，以劉建勛為首的這批老幹部基本上能堅持黨性，堅持“老中青”三結合的組織原則，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使河南省的工農業生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據資料，文革期間，全國23個省，其六項主要經濟指標增

長速度前八名排列結果：第一名中河南佔三個；第二名河南佔三個，六項指標河南均在前兩名，高於全國平均增長水平。1970年7月，焦枝鐵路建成通車，其中河南區段以投資小、見效快受到國務院的表揚；1970年11月，河南省開始籌建年產七十萬噸特種鋼的舞陽鋼鐵廠，1978年一次試產成功，結束了中國不能生產特種軋鋼的歷史；聞名世界的河南林縣紅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間竣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個特點是造反派不僅參加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後來還入了黨，被提拔充實到各級領導班子，即所謂“河南省造反派掌了權。”

河南省的造反派是否真的掌了權呢？僅以參加省革委常委領導班子的學生頭頭們為例來看一看。1968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的40名常委中，有群眾組織代表（包括工人、幹部、學生）20人（其中二七公社14人，開封八·二四3人，河南造總3人）。在群眾組織代表中有大中學校造反派組織頭頭8人，分別是：黨言川（鄭州大學聯委）、陳紅兵（開封師範學院八·二四）、周啓忠（鄭州糧食學院聯委）、楊國雄（河南醫學院東方紅）、范念民（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黃宗萬（新鄉師範學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醫學院八·三一）、王傳禹（鄭州大學附中紅旗）。這八個學生常委最“紅”的時間就是省革委剛剛成立之時。他們除了堅持本單位的工作外，就是跟隨劉建勛、紀登奎等老幹部到造反派分裂或武鬥嚴重的地、市去解決

派性和大聯合問題。1968年以後，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和大中學校學生畢業分配工作的開展，他們也先後離開學校到工廠、農村、解放軍農場或其它基層單位去接受再教育。之後，他們的“常委”頭銜，除了偶爾去省革委參加會議外，只是掛個虛名而已。在後來的清查“五·一六”中他們還不同程度地受到審查。1971年再教育結束後，他們重新分配到工廠、學校搞技術工作或擔任教師。1973年，在各級黨組織和政府職能部門的恢復健全中，根據中央“吐故納新”和“老中青”三結合的指示，又分別被任命為縣委副書記兼公社黨委書記或其它相應職務。當時，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幹部，多數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一定數量的河南造總和十大總部的頭頭。其它各個行業的頭頭也被提拔到所在的工廠、企業、機關、學校領導班子中，任副書記、副廠長、副主任、副部長、副校長等職。上行下效，農村到大隊、工廠到車間班組都不例外。這就是“河南的造反派掌了權”說法的來歷。應該說明的是，大量提拔青年幹部的做法，決非河南獨創，完全是全國大勢所趨。在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上海工人造反派頭頭王洪文被提拔到黨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個例證。那麼，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幹部數量上是否高於其它省份呢？答案是：否。據一份資料表明，河南省從1967年到1976年共發展黨員10萬零6千人，這個數量在全國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幹部是如何“掌權”的呢？事實是，他們“掌權”後，大多數都是在基層和工人一起學大慶，和農民一起學大寨，兢兢業業、以身作則。就拿河南省幾個學生頭頭來說，他們在擔任縣委副書記、公社書

記期間，大體做了這樣幾件事：一是積極參加和領導本單位的批林批孔運動；二是為本公社辦企業奔波；三是帶領群眾學大寨平整土地，學林縣興修水利；四是積極推廣農業新技術，如間作套種、玉米製種等。他們清正廉潔，大公無私，深得群眾好評。1978年，當陳紅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二十年後，他的愛人從原陽縣搬家時，當了4年縣委副書記的全部家當是幾個紙烟箱和一個老掉牙的櫃子，就是一個例證。

還有一點應當指出，河南省所提拔的青年幹部的職務絕大多數都是副職（當時就有“新幹部都姓副”的說法），正職大都由老幹部擔任。由於這些老幹部在文革中支持過造反派，參加過“三結合”，所以，對於新幹部，他們不僅有提拔重用的權力，也有批評幫助的資格。在“形勢需要”時，還可以“收拾”一下。1975年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工作後，提出“全面整頓”。紀登奎來到河南同劉建勛一起在地市委書記會議上罵一些造反派新幹部“不是好東西”、“四大金剛”、“八大賴”等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在次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一些被點名批評的造反派又狠狠反擊了劉建勛及個別地市委書記。後來，隨著毛主席的去世，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河南省作為“四人幫”的“重災區”，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派的老幹部幾乎“全軍覆沒”，新老幹部之間的那點恩恩怨怨，自然也烟消雲散了。

（三）

1966年9月，以黨言川為首的“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

絡委員會”（簡稱鄭大聯委）首次批鬥“走資派”，是從揭批原河南省委 1958—1961 年間“左”傾蠻幹、大颯浮誇風，實行高指標、高徵購、高估產的錯誤政策，造成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入手的。這是河南文革的第三個特點。

文化革命一開始，鄭州大學就成了河南省鬥爭的焦點。1966 年 6 月 1 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全文播送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2 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露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全文，同時發表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當天晚上，鄭州大學中文系李學生、王相海等 14 位學生貼出了全校第一張批評校黨委的大字報。6 月 3 日，全校性的反擊開始了。寫大字報的學生被戴上“小鄧拓”、“小吳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等帽子，受到圍攻、批判。6 月 6 日凌晨，共產黨員、團支部書記王相海跳樓自殺身亡。當天下午，省委工作組進駐鄭州大學。工作組進校後，繼續壓制運動，鬥爭學生。6 月 7 日晚，黨言川因聲援王相海被鬥爭。8 月 6 日，黨言川去北京告狀。接著，中文系方復山、劉松盛二同學也到北京。他們走訪了國務院接待站，聯名寫出《致北京革命學生的公開信》，後受到正在北京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的接見。8 月 15 日，黨言川、方復山、劉松盛和劉建勛一同離京返回鄭州。同日，他們串聯部分同學籌備成立了“鄭大聯委”，並在當天晚上組織召開了“赴京情況彙報大會”。鄭州市其它大中學校的師生和各界群眾幾百人前來參加大會。劉建勛和省委其它領導也來到會場。會上方復山、黨言川等把北京的“紅衛兵”、“革命大串聯”、“炮打司令部”等新鮮事物介紹給與會群眾，宣傳了《十六條》精神。由於會議開

始前，“校文革”要求主持會議，與“聯委”發生爭執，被“聯委”同學趕下臺去。所以，會議尚未結束，物理系教工即貼出巨幅標語：“我們決不承認非法的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物理、化學、外文三個系的教工自辦了廣播站，聲討黨言川一夥毆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16日上午，工作組包辦成立的“校文革”主持召開“鄭州大學革命師生辯論會”，會上稱黨言川的彙報會是“黑會”，“打了校文革的人”，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高呼“控訴黨言川一夥毆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黨言川”、“把黨言川揪出來”的口號。接著，連續三天對黨言川及聯委同學進行圍攻鬥爭。8月18日，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戴蘇理來到鄭州大學與兩派代表見面，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8月19日，劉建勛再次到鄭大，召開了鄭州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宣讀了《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共十條，肯定了黨言川和鄭大聯委的革命行動，而且按照十六條精神號召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大字報使少數派歡欣鼓舞，隊伍迅速壯大。9月3日，聯委發出《火急呼籲書》吹響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進軍號。《呼籲書》寫到：“多少年來，河南省搞得很不像樣子，五千萬河南人民被窮白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9月4日，鄭大聯委成立了“專揪吳芝圃戰鬥隊”，派人專程去廣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9月5日，由鄭大聯委牽頭在鄭州市體育場召開了河南省首次“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綫煽風點火”大會，來自鄭州、開封、新鄉、洛陽、許昌等地100多個單位的工人、農民、幹部學生及

外地來鄭大聯聯的師生 5 萬多人參加了大會。大會發言中再次提到河南省 1959—1960 年“左”傾蠻幹及“信陽事件”問題。9 月 11 日，鄭大聯委第二次主持召開“省會各方革命群眾炮打河南省委黑綫煽風點火大會”，會上給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趙文甫掛上“歷史反革命”的牌子（“挂牌”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屬首次），引起了在場的省委領導紀登奎、張耀東的不滿。紀登奎當場質問大會主席，你們說趙文甫是歷史反革命有什麼根據？其實，這裏指的正是 1959 年前後，河南大搞浮誇風，高估產，高徵購，造成數十萬人餓死的這段悲慘歷史。黨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應，數萬人起來批鬥省委領導趙文甫（當時吳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於這個歷史背景。

1966 年 8 月，在新鄉師範學院擔任工作組組長的省監委書記丁石得到了黨言川在 1962 年給師院同學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談對農村 58—59 年情況的看法時說道：“追根求源是我們黨中央在那幾年犯了不小的‘左’傾錯誤”、“三面紅旗中的兩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號召力，不用說工人、農民，就是參加 58—59 年實際生產不多的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中間，提起大躍進，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種極度混亂的情況。從理論上講，大躍進、人民公社在中國是完全應該有的，誰不想中國早日富強，誰不想中國早日進入社會主義。然而如果像前幾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最好還是不實行的好，我認為三面紅旗已大體失去人心，要舉起來，是有困難的了。”

鄭大聯委的《火急呼籲書》和黨言川 1962 年的“私人信件”成了黨言川“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三面紅旗”的“鐵證”。和劉建勛一起支持過黨言川的河南省委代理第

一書記文敏生以及其他省委領導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文敏生在9月5日鄭大聯委主持召開的“河南省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風點火大會”上曾說“你們的大會，風煽得好，火點得好，我堅持支持你們”，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會上，當有人提出鄭大聯委《火急呼籲書》有攻擊三面紅旗問題時，他說，對鄭大聯委要採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則，“表面上應付它，暗地裏慢慢壓垮它，我看黨言川不是個好東西”。鄭州大學“校文革”和官辦“紅衛兵戰鬥師”更是抓住這些“鐵證”大造聲勢，向鄭大聯委和黨言川發動了總攻擊，聲討黨言川的傳單散發全省乃至全國。9月7日，“鄭大校文革”和“鄭大紅衛兵”針鋒相對地發出了《全省人民緊急動員起來，炮打河南省“司令部”裏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呼籲書。《呼籲書》中說：“我省五千萬勤勞、勇敢的革命人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確的領導下，尤其是從1958年以來，在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們把持了一些部門。”“把省委內部所有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統統地鬥倒鬥垮！犁庭掃穴、斬草除根，使之斷子絕孫、萬劫不復！”……9月25日，鄭大聯委發出了《關於9月3日〈火急呼籲書〉的聲明》。聲明中說：“《呼籲書》中出現某些言詞偏激，對河南存在問題的某些提法不當，‘我們虛心接受批評。’我們發出呼籲書的目的，是爲了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是爲了炮轟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資派。因此，我們認爲，起草的這個《火急呼籲書》大方向是正確的。不徹底改變河南一窮二白的面貌我們死不瞑目。”接著，鄭大聯委抓住運動初

期省委和校黨委工作組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狠批猛攻，取得了節節勝利。9月19日，鄭大聯委再次召開河南省“揭發批判趙文甫大會”，公佈了《把趙文甫的反動嘴臉拿出來示衆》的系統材料。此後，趙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邊站了。

1967年元月，鄭大聯委串聯省會各大專院校造反派再次組織了“專揪吳芝圃聯絡站”，一方面深入信陽等地調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廣州揪吳芝圃。鄭大聯委始終堅持清算以吳芝圃爲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傾蠻幹、餓死數十萬人罪行這一大方向，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隊伍也不斷壯大，由少數派成了多數派。然而，河南省軍區介入文化革命後，風雲突變，調查材料被抄走，揪鬥吳芝圃一事擱淺。

1967年1月22日，清華大學學生唐偉以“清華井岡山駐鄭聯絡站”的名義寫出了《二十七個爲什麼——劉建勛是什麼人》的文章，在鄭州大量印發、張貼。文中說：爲什麼省委揪出來的全是吳芝圃的老班底，而劉建勛帶來的班子却紋絲未動？爲什麼不去批判反動路綫却先翻1959、1960年老帳？1月23日，河南省軍區介入文化大革命後，極力推崇《二十七個爲什麼》，兩次刊登在《鄭州晚報》上，還把“是否打倒劉建勛，是否支持清華井岡山駐鄭聯絡站”作爲衡量是否左派的標準。3月6日，在鄭州市體育場召開的由河南省駐軍和“河南造總”、“十大總部”數萬人參加的“省會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新反撲誓師大會”上，省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宣佈鄭大聯委爲“非法組織”。會後，用飛機在全省散發《告全省人民書》（這就是衆所周知的“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的由來）。軍區的介入，使已

經被造反派批判靠邊站的“走資派”趙文甫興高采烈，多次給軍區寫信，說何運洪的講話是“極其重要的文獻”、“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保皇派威風”、“真正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你們幹得好！你們要幹到底！”此後，鄭大聯委為首的造反派遭到殘酷的鎮壓，這就是被河南省造反派稱之為的“二月黑風”。

1967年3月9日，黨言川在商丘被捕。接著，鄭棉六廠工人赤衛隊申茂功相繼被捕。為了摧垮以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糧院聯委、豫農紅總、鄭大附中紅旗、新鄉師院八·一八、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等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軍區支持“十大總部”和“河南造總”製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〇”、“七·一六”等駭人聽聞的攻打、圍剿二七派的武鬥流血事件，致使二七公社派群眾傷殘數百人，死亡數十人。當時鄭州大學文科樓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員的墓地（50多座墳墓文革後被毀）。

1967年7月，中央對河南問題表態後，二七公社作為群眾組織參加了省革委三結合，黨言川擔任了省革委常委、鄭大革委會主任職務。

毛澤東說過，文化革命中兩派中的群眾都是革命的。鄭州大學兩派圍繞河南省委1959年前後“左”傾蠻幹這段歷史所進行的辯論和鬥爭，就是例證。1959年前後，發生在河南省的“信陽事件”，駭人聽聞、震驚全國。雖然歷史已有定論，吳芝圃曾在檢查中承認“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飽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對此仍記憶猶新，耿耿於懷。黨言川等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號召下舊事重提，清算這段罪行，也是合情合理的。1962年18

歲的黨言川，受河南省 1959 年現狀的影響，在私人信件中對三面紅旗發表了一些糊塗認識也是可以諒解的。事實上，河南省委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中也確實犯有“左”傾錯誤。黨言川和同學在私人信件中談論這些問題說明他們能夠關心國家大事，是政治覺悟高的表現。文革中藉此給黨言川扣上“反對三面紅旗”、“反動學生”的帽子，企圖打成“反革命”，是違背“十六條”精神的。另一方面，保守派群眾對黨言川信中所說“三面紅旗倒了兩個”堅決反對，也不無道理。1966 年 10 月 6 日，鄭大“送瘟神”戰鬥隊在一份傳單中說：《火急呼籲書》中說河南省多年來搞得不像樣子，公然攻擊三面紅旗，“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河南，一個三面紅旗光輝照耀下的河南，一個居住五千萬革命群眾的河南，竟被他們罵成這個樣子！……他們還公然煽動要大鬧河南省委，要鬧個天翻地覆，鬧得越亂越好，請同志們用毛澤東思想來鑒別一下，這到底是哪家的聲音？”另一份批判黨言川“反動信件”的傳單中這樣寫道：“我們認為這封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毒箭。黨言川在這封信裏不但惡毒的攻擊了總路綫、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否定了 1958 年以來我國人民在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有人說，這封信是黨言川在 1962 年寫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諒。我們說，正因為是 1962 年寫的，18 歲的黨言川就有著如此系統，如此反動的觀點，更應當引起我們的深思。”從這些批判黨言川的言辭中，不難看出他們對黨對毛主席的一腔赤誠。

(四)

文革結束後，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揭批查”運動（即揭發批判林彪、“四人幫”的罪行，清查與林彪、“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眾組織中的“三種人”）。河南省的“揭批查”運動，先是以劉建勛為首的河南省委整了一些人。接著，曾經搞浮誇造成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文革中受到群眾批判，被中央定為“走資派”者重新掌握“揭批查”大權，把矛頭對準劉建勛和文革中的“二七公社”造反派，打擊面之寬，手段之惡劣，觸目驚心。這在時間上雖然是文革之後，但歷史地看問題，仍不失為河南省文革特點之一^[1]。

河南省的“揭批查”運動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即劉建勛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期間（1976年10月至1978年8月）和段君毅接任劉建勛後，由省委書記戴蘇理、趙文甫主抓期間（1978年10月至1983年）。

1976年11月，以劉建勛為首的河南省委清查了與“四人幫有牽連”的唐岐山、董萬里、楊止仁、周民英四人。唐岐山文革前是鄭州鐵路局火車司機，文革中作為工人造反派代表參加了三結合，後來擔任了省委常委、鄭州鐵路

[1] 本文有關“揭批查”的部分資料來自《關於河南揭批查嚴重擴大化的歷史遺留問題向省委、黨中央的申訴報告》（原河南軍區司令員張樹芝、原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王維群、原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張耀東、原省委常委秘書長王大海，1996年9月16日）

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委員等職務。1976年3月中央召開12省（市）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青找唐岐山談話，說過“省委爲什麼不叫你們這些年青人到省裏工作？你們要好好幹。建勛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將來你們幹好了有希望到省裏主持工作”的話，這就成了“江青當面封官許願”的證據。董萬里（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楊止仁（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周民英（新華社河南分社社長）都是老同志。他們曾於1976年7月向新華社寫了一份內參，反映了河南省委組織部一位副部長在京治病期間所聽到的有關江青問題的謠言，新華社將此件轉到姚文元處，後被抄了出來，成了他們三人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事件。

1977年，全省著重清查了1975年“整頓”時，被點名批評處理過的所謂“壞頭頭”、“胡鬧派”。1975年，劉建勛爲了執行鄧小平“要整頓”的指示，在紀登奎的幫助下，支持鄭州市委辦了“萬人學習班”，會上大批派性，集中批了三個“壞頭頭”（指鄭州市工人造反派頭頭張永和、李福山、馬志昌，時稱“張、李、馬”），還逮捕了“攻擊鄧小平的壞頭頭”張永和。接著，全省各地也都採取相應的措施，批派性、整頓領導班子，下放了一批“新幹部”。劉建勛還陪同紀登奎到其它地、市（如洛陽、開封等），點名批評了一批“派頭頭”。1976年3月，毛澤東批評鄧小平“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接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這時，河南省75年“整頓”中被批判、處理的造反派就率先把矛頭對準劉建勛和部分地、市委書記，認定劉建勛在河南“積極推行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綫”，是“河南颯右傾翻案風的風源”。鄭州張永和被逮捕時罪名是“反鄧”，所以，“批鄧”運動一開始，要求釋放張永和成了鄭州市“反擊右

傾翻案風”的焦點。1976年3月21日，鄭州市組織百輛汽車大遊行，市委書記張俊卿被戴上高帽遊街。遊行隊伍高呼“打倒張俊卿，釋放張永和”、“劉建勛不轉彎，進不了八寶山”等口號。唐岐山被認定是這一事件的後臺。所以，“揭批查”開始後，這些人就成了“四人幫”在河南的“幫派骨幹”受到批鬥、隔離審查，甚至刑事拘留。但他們被判刑處理，大都在劉建勛離開河南之後。例如，唐岐山判刑時間是1979年12月14日。

1977年8至10月，以劉建勛為首的河南省委為了貫徹黨中央“十一大”精神，狠抓揭批“四人幫”這個綱（當時稱為“抓綱治國”），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揭發批判了省委書記耿其昌和省委常委、秘書長趙俊峰的“錯誤與罪行”。耿其昌被定為河南省“推行‘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極右路綫”的掛帥人物，趙俊峰定為急先鋒。劉建勛在1977年10月24日大會講話中說：“要以當年打日本、打蔣介石那樣的革命氣勢，以當年控訴黃世仁、南霸天那樣的階級仇恨，以當年打仗、土改那樣的革命精神，把揭批‘四人幫’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決不能心慈手軟，決不可半途而廢，決不辜負華主席、黨中央對我們的關懷和期望。”同日，在省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的講話中也說過同樣的話。可見此講法並非河南創造，很可能是來自北京的聲音。

儘管劉建勛們對“揭批查”表示了這樣大的決心，然而，隨著華國峰“短暫春秋”的即將結束，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呼聲愈來愈高，文革中唯一寫大字報支持造反派並受到毛澤東表揚的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很快被免去職務，並淪為“揭批查”的對象。

1978年10月，段君毅擔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後，依靠

戴蘇理和文革中被中央紅頭文件定為“走資派”重新復出擔任省委書記的趙文甫主抓“揭批查”運動，很快就加大了對劉建勛以及文革中“二七公社”派的清查力度。

1978年11月，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擁護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免去劉建勛在河南的一切職務、調離河南的決定。會上揭發批判了劉建勛的“嚴重錯誤和罪行”。特別是揭出1976年3月，劉建勛在一次有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參加的政治局會議上“對鄧小平進行面對面的攻擊”一事，成為劉建勛“惡毒攻擊鄧副主席”的證據。有一份資料披露了劉建勛“當面批鄧”的實情：3月27日晚10點，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河南問題。華國鋒、紀登奎會前見了劉建勛。華對劉說：晚上鄧參加，要按照主席批的口徑批一下。（即毛主席打招呼會議上的三句話：翻“文革”的案，算“文革”的賬，颯右傾翻案風）會上，由於“四人幫”在場，“氣氛十分緊張，壓力很大，劉建勛自己也記不清講了些什麼。會後，劉建勛已經站不起來，是用小車推出大會堂的”。劉建勛的這次“當面批鄧”，雖然“迫於無奈”，事後也向中央做了誠懇地檢討，最終還是成為河南省被定為“揭批查”的“重災區”，劉建勛以及數萬幹部和群眾挨整的主要緣由之一。

徹底打擊文革中的二七造反派，是河南省“揭批查”第二階段的突出特點。在清查中，按時間劃綫，把“7·25”中央表態說成是“劉建勛等人製造的大假案”（1978年12月5日，河南省委、省革委、省軍區召開了“7·25”大假案平反大會）。二七公社和支持二七公社參加“三結合”的新老幹部列為清查對象，而“7·25”以前在軍區支持下搞武鬥者却被提拔重用，有的還掌握了清查工作的大權。全

省範圍內採取人人檢查、層層過關，農村搞到生產隊，工廠搞到車間班組，機關搞到普通工作人員，街道辦事處也要揪出“幫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對於二七公社派，連“提漿糊桶的也不能放過”。爲了搞派性清查，對於已經按中央指示搞過處理的黨員宣佈無效，規定 69—71、73—76 年發展的黨員和提拔的幹部算作“雙突”，予以清理，保留人數不需超過 5%。目的是保 1972 年發展和提拔的一些保守派黨員。據官方公佈的數據：從 1978 年到 1983 年，處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過二七公社派的幹部 5 萬多人，取消黨員資格 10 萬 6 千人（據瞭解，1978 年 12 月中央組織部向全黨發出《關於妥善處理突擊發展黨員的意見》，作了統一的政策規定，全國共清除黨員 13 萬人，河南文革期間突擊發展黨員在全國佔第 10 位，而清除數却佔全國總數的 81.54%）；逮捕判刑 1700 人，“突擊判刑” 2400 人。僅漯河地區（包括鄆城、舞陽、臨潁）有 1805 人被審查。其中說清解脫 59 人：取消黨員資格 1348 人；免職 296 人；刑事處分 44 人；黨紀處分 115 人（其中：開除黨籍 61 人；留黨察看 20 人；撤銷職務 18 人：嚴重警告 10 人；警告 6 人）；政紀處分的 58 人中，開除公職 4 人、開除留用 19 人、撤銷職務 22 人、記大過 10 人、記過 3 人。一個洛陽拖拉機製造廠以反革命等罪名被抓的各級領導成員達 41 人之多。全省如果加上親屬子女因受株連而被審查處理、不提工資、不評技術職稱等，被打擊者達 100 萬人（此數據來自鄭州市委書記張俊卿 1997 年 8 月 1 日《致李長春並省委的信》，信中說明這是省委有關部門負責人向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正式彙報的。）

在河南“揭批查”中，老幹部被批判、審查、處理的也很多。甚至包括紅軍時代和抗日戰爭早期參加革命的老

同志。文革初期，由於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來支持造反派並參加三結合的老幹部比較多、比較早。“揭批查”中，把文革前追隨吳芝圃大搞浮誇風、文革中被二七公社派群眾批鬥，並被中央文件定為“走資派”的趙文甫視為一貫正確，並領導全省的“揭批查”運動。把文革中支持二七公社的幹部統統打下去。1983年11月，省委副書記XX在省委常委擴大會議的“書面發言”中說：“隨著揭批查運動的開展，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較徹底的整頓和清理。……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多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名。截止目前（9月份）已處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的2025人（包括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刑事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由此可見，河南省“揭批查”中立案審查和處理數量之大、之重是相當驚人的。而實際處分的數量遠不止此數。所謂“免於處分”的2000多人，是審查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省委宣傳部的李海英同志，1948年參加革命，1954年就調到省委宣傳部工作，因文革中參加了“河南二七公社”被審查，1983年審查結束後，被告知她沒有什麼問題，免於處分，被下放到商丘縣工作。當時，她身患重病，讓兒子替她去報了到。後來，商丘縣以“級別高、無法安排”為理由將她的檔案關係退回了省委，省委組織部却說沒有收到。就這樣，一個建國前就參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沒有了單位，工資沒人發，看病無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至今沒有解決。這就是一個“免於處分”的老同志真真實實的遭遇。

還有一組數字更令人觸目驚心。河南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 14 人，清查、批判、處理 10 人，佔 67%，其中，判刑 3 人，留黨察看 1 人，撤職 1 人，嚴重警告 2 人，在審查批判“監護”期間死亡 1 人，上報處分、未獲批准、強令離休 1 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長級幹部 33 人，清查、批判、處理 22 人，佔 2 / 3。其中判刑 4 人，開除黨籍 3 人，留黨察看 2 人，撤職 6 人，嚴重警告 1 人，批判後離休 4 人，降職安排 2 人；全省 18 個地市委第一書記全部受到批判處分。地市委正副書記 118 人（缺焦作），批判處分 97 人，佔 82.3%。其中，審查批判期間死亡 7 人，判刑 17 人，開除黨籍 4 人，留黨察看 9 人，撤職 18 人，嚴重警告 4 人，批判後令其休息 28 人，降職下放 10 人；省直各廳、局委第一把手，除 5 人外，其餘全部受到批判處理，分別給予撤職、警告、免職不用等處理；120 多個縣委書記和大部分公社書記，都被審查批判處理，未受審查，保留原職的寥寥無幾。

原蘭考縣縣委書記張欽禮，曾是焦裕祿生前戰友，在蘭考工作幾十年，兢兢業業，廉潔奉公，為改變蘭考縣面貌做過重大貢獻，群眾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動”蘭考縣文化大革命、“編造”焦裕祿先進事迹、“扒黃河大堤”而判刑十三年。明眼人一看都會明白，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一，張欽禮縱有天大本事。也策劃不了蘭考縣的文化大革命；其二，焦裕祿的事跡在文革前由於新華社記者穆青、馮健、周原寫的一篇《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報道，早已國人皆知，怎能是張欽禮編造的呢？（張欽禮被捕後，蘭考縣“焦裕祿紀念館”被關閉了八年）其三，關於“扒”黃河大堤的“罪行”更是無稽之談。那

些由地方自行修建的、影響黃河汛期行洪的大堤內的生產堤是本應該扒掉的。

原洛陽地委書記孫騰芳，在洛陽地、市聯合召開的 10 萬人宣判大會上，以所謂“組織反革命政變，準備上山打遊擊”罪名判十年徒刑。以這樣“莫須有”的罪名被處理的，僅洛陽地委領導就有 6 人，還有一批縣委和基層幹部。孫騰芳刑滿釋放後沒有工資，沒有任何待遇。老伴所在單位也破產了，孩子們因受牽連沒有安排工作，生活極度困難。1998 年初，老伴病重無錢住院醫治，孫騰芳眼睜睜看著她死在家裏。這就是一位曾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幹部的悲慘下場。

被洛陽市中法、省高法一、二審裁定的“河南省最大反革命集團案”，實際是經上級批准、部署的正常公務活動。但兩級法院把參觀彙報清華大學大字報，指控為“製造散佈反革命謠言罪”；把開展正常民兵訓練，指控為“搞反革命武裝應變罪”，致使上千人受株連，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達百人以上。此案逮捕拘留 50 人，自殺身亡 2 人，自殺未遂致殘 1 人。在一份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79] 刑判字第 82 號）上，19 名被判刑的名單中有縣處級 15 人。其中：洛陽市委副書記蘭偉權被判 15 年；洛陽市二輕局局長沈明理被判 10 年；洛陽市公安局副局長郝治新被判刑 10 年；洛陽拖拉機廠銷售處黨總支副書記海國旗被判刑 10 年。其他被判 8 年、7 年、5 年，這裏不再列舉。

河南省“揭批查”還有一個視法律為兒戲的典型——“突擊判刑”。1979 年底，河南省委為避免《刑法》、《刑事訴訟法》於 1980 年 1 月 1 日生效後，其行動被束縛，就趕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緊急佈置各級政法部門對“揭批查”中

關押起來的人，不管有沒有罪行，均以清理積案為名“突擊判刑”。為了防止關押人員向最高法院上訴，他們掌握終審權，就把本應由高法審理的案子，強行壓給地、市法院判決；把地、市法院審理的案子，強行壓給縣、區法院判決。“突擊判刑”秘密進行，不准開庭。有的判3年，實際上已經關押了3年多了。

河南“二七公社”的頭頭，“揭批查”中幾乎都被判刑甚至重刑。1968年2月省革委成立時（以中央紅頭文件為依據）常委中，工人代表10人，被判刑7人。他們是：唐岐山（鄭州鐵路局）判無期徒刑、申茂功（鄭州國棉六廠）判刑15年、楊錫渺（鄭州13所）判刑10年、李福山（鄭州印染廠）判刑10年、申紅玉（開封電廠）判刑10年（後改判為5年）、唐振芳（洛陽拖拉機廠）被判刑10年、張國勞（洛陽拖拉機廠）被判刑6年。未判刑的3人中，1人68年底亡故，1人受黨紀政紀處分，1人為“河南造總”代表；省革委常委中一般幹部代表2人，其中郟國榮（鄭州黃委會）被判刑13年，另一“河南造總”代表未判刑；省委常委中紅衛兵代表8人，被判刑6人（未判刑的2人中1人是“河南造總”代表）。他們是：黨言川（鄭州大學）判3年緩3年、周啓忠（鄭州糧食學院）判刑10年、范念民（河南農學院）判刑10年、黃宗萬（新鄉師院）判刑10年；王傳禹（鄭大附中）判刑7年。特別是開封師範學院學生陳紅兵，1967年2月曾被抓進監獄，甚至欲判死刑，中央解決河南問題時，周總理指示要河南把陳紅兵送到北京參加彙報，文革結束後的“揭批查”中，被判刑20年。

大量事實說明，河南省的“揭批查”運動後果是嚴重的。它會像當年的“信陽事件”一樣，永遠被釘在歷史的耻辱

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為歷史。對於以上河南省文革特點的分析是否準確，有待於討論研究。

1998年12月初稿

2009年5月修改

附件一：劉建勛《我的一張大字報》

鄭州大學全體革命師生員工同志們：

昨天，我和紀登奎、戴蘇理等同志和鄭大文化革命委員會的六位主席和同文化革命委員會意見有分歧的同學，談了當前的運動情況，並看了一些大字報。現在談一談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一、黨言川等三位同學到北京找黨中央、毛主席要求彙報鄭大文化革命的情況，這不僅不是什麼非法行爲，而是一種革命行動。

二、他們從北京回校後，召開大會向同學們彙報北京文化革命運動的情況和經驗，這不僅不是什麼“黑會”，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會。

三、鄭大有一部分同學，認為本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因此，有的同學自動醞釀串聯，建立了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他們起來鬧革命，我認為不能說成是非法的。

四、黨言川等三位同學從北京回來後，和贊成他們意見的同學，自動到校內校外進行宣傳，互相學習，交流革命經驗，是一種革命行動。當然，各校革命師生員工的主

要任務，是把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五、我在北京同黨言川等幾位同學談過話，完全支持他們的革命精神，並說我回去後，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放手發動群眾，大鬧文化革命。要動員省直機關群眾，對省委和各單位的負責幹部，展開徹底地揭發批判。我說過“炮打司令部”這句話。就是要充分發揚民主，動員廣大群眾起來，把領導機關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分子統統揪出來。

六、黨言川同學就我知道的情況，他沒有欺騙過我。他說我批准改選鄭大文化革命委員會。當時我在場，黨言川的話，同我說的雖略有出入，但不能說是欺騙。十五日大會上，我作了一點說明，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選舉和改選，完全由革命師生員工自己討論決定，我沒有批准之權。

七、運動初期，省委曾經堅決反對和制止了王培育挑動學生鬥學生的嚴重錯誤。現在，我再次鄭重提出，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群眾，挑動學生鬥學生，不准轉移鬥爭目標。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革命同學之間的爭論，隨意就給持不同意見的人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等一類的帽子，我是不贊成的。

八、前一段，一部分同學貼大學報，批評省委工作組和省委的缺點、錯誤，這是完全應該的，我代表省委歡迎你們批評，支持你們批評。

九、我建議，在當前的爭論告一段落後，仍然回到辯論工作組和省委對鄭大文化革命的領導問題上來。以十六條為最高指示，分清是非，總結經驗教訓，檢查缺點、錯誤，團結一致，奮勇前進。

十、昨天,有些同學們問我,“造反有理”這句話對不對?革命,就是造反。我們就是要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反,造修正主義的反,造一切反動派的反。我們要有這種革命的造反精神。

在革命的進程中,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現象。我們鄭大的絕大多數師生員工都是革命的、都是最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指示辦事的。只要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學習十六條,掌握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字字句句照十六條辦事。我相信,你們之間的不同意見,一定可以經過正當的充分的辯論,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我相信,鄭大革命師生員工,一定能夠進一步團結起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徹底。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總攻擊。讓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舊風俗、舊習慣勢力,展開猛烈的進攻!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打倒、打垮,使他們威風掃地,永世不得翻身!

以上僅是我個人意見,不一定對,可以同意,可以批評,也可以反對。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革命師生員工萬歲!

偉大的中國人民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萬萬歲! 萬萬萬歲!

劉建勛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鄭州大學文革概述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作為河南省最高學府的鄭州大學，不僅成了河南省的焦點，也是全國起來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鄭州大學）之一。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送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大字報全文及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些，在鄭州大學引起了很大反響，歡呼、聲援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大標語貼滿校園。晚上，中文系一年級李學生、王相海、席戰修、劉作周等14位學生貼出了全校第一張批評校黨委的大字報：《請問學校領導，對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麼態度？》大字報中批評了校黨委壓制群眾運動，單搞學術批判，把學校搞得死氣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樣子的錯誤做法。接著，政治系七人也貼出了質問校黨委的大字報。當夜，校黨委派人向省文革小組楊蔚屏（省委書記處書記）彙報情況。楊蔚屏說：“省委是相信鄭大黨委的”，“你們不是陸平，怕什麼？”有了省委的表態，黨委書記兼校長王培育連夜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提出三條措施：①要立即反擊，追查寫大字報人的“歷史表現”、出發點；②不准進行串聯活動；③不准到校外工農兵中去宣傳。6月3日，全校性的反

擊開始了。保黨委的人貼出了《鄭大不是北大》、《反對校黨委就是反黨》等大字報。對率先寫大字報批評黨委的學生扣上“小鄧拓”、“小吳晗”、“右派”、“三家村黑幫”、“牛鬼蛇神”等帽子，進行專欄批判、點名廣播，王相海、席戰修還被拉到桌子上鬥爭，讓其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據不完全統計，全校當時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見《鄭大聯委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鄭大聯委勁松戰鬥隊1967.7）。

6月6日凌晨，共產黨員、團支部書記王相海跳樓自殺身亡。下午，以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黨若平為首的省委工作組進駐鄭州大學。工作組進校後，繼續壓制運動，鬥爭學生。6月7日晚，中文系四年級學生黨言川因聲援王相海的大字報被鬥爭。6月9日，學生、共青團員張鳳芝（蘭考縣委副書記張欽禮的妹妹），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報，被污為“反黨分子”，在強大壓力下寫了《絕命書》，決定走王相海自殺的路，後因被同學發現，未遂。張鳳芝在《絕命書》中說：今天早晨勞動後，我沒有吃飯，直赴教室，我已決定走王相海的道路，我要向我父母、哥哥、全家老幼、生長的故鄉、所有的親人告別。敬愛的父母，您的最小女兒再也見不到您了。我年邁的母親，您怎麼能想到春節的一面，便是母女的最後一別。我的生身父母，你們不要為此過分傷心，但臨死我要說明，您的孩子沒有反黨。我在您的身邊長大，我永遠不會忘記父兄是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不會忘記血淚斑斑的家史；不會忘記六歲那年二哥拿住我的手，指教我第一次寫出“毛主席萬歲”幾個大字。我永遠熱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我已抱定了沿父兄的革命道路一直走下去的心願。但是，現實對我的壓力使我失去了生存下

去的勇氣。全班烏烟瘴氣，聽到的是輔導員×××的厲聲訓話，看到的是×××殺氣騰騰的臉。偶然發現幾個積極分子——×的信徒，竊竊私語，跟踪別人。還有一些“勇士”和“闖將”們，所謂頭腦簡單被人利用充當炮灰。王相海的死，我一直不明白，一個貧農的兒子，共產黨員，團支書，剛剛離開部隊走向鄭大的一年級學生，怎能反黨呢？我不怕死後給我和上反黨的帽子，我也知道，這樣的道路太慘了。我的親人，敬愛的父母和同胞哥姐，我是被逼死的……。

6月18日晚，在歷史系學生任延慶、郝秀仲的帶領下，部分學生去找系總支書記張××，又到“高幹院”（即校領導住處）找黨委書記兼校長王培育均未見到，就自動聚集到文科樓前（王相海跳樓身亡處），聲討王培育鎮壓學生運動迫害階級兄弟的罪行。一時間，群情激憤，高呼“打倒王培育”、“槍斃王培育”等口號。——這就是著名的“6·18”事件。當天，省委決定撤銷王培育鄭大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職務。

6月19日，政治系四一班邵維鈞、賀長有等11位同學向中央發電報，說王培育反擊的根子在省委，要求中央派人來調查。

6月20日，省委對鄭大工作組加派力量，書記處書記趙文甫親自坐鎮。趙文甫先後召開黨員大會，強調省委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並採取種種手段，對邵維鈞、賀長有等提出的“王培育的根子在省委”進行反擊：對政治系四一班加派了幹部；利用同學們之間不同意見的爭論，支持一方壓制另一方；翻查邵維鈞、賀長有、李春蘭三同學檔案，企圖找出其它問題；開闢專欄大字報對他們進一步施加壓力；召開有全校各系各班代表參加的會議，號召全

校揭發他們的“錯誤”。工作組長黨若平甚至說過“對邵維均等同學，什麼時候有空隙，就踢他們幾腳”的話。在對邵維均等同學施壓、批判的同時，還對和他們觀點一致的同學，採取歧視、冷淡的態度。這種作法從一個班擴大到一個年級，使不少同學受到株連。（見黨若平：《省委前駐鄭大文化革命工作組領導上所犯錯誤的初步檢查》1966年11月8日）

6月21日，中文系決定全系聲討王培育，人已召集齊了，趙文甫不讓開聲討大會，改成分班揭發、批判，引起同學們的不滿。

6月29日至31日，在工作組即將撤離之際，根據省委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楊蔚屏的佈置，工作組在三天之內，倉促了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即“校文革”）。“校文革”沒有經過群眾的醞釀討論，正、副主席和黨組成員名單，由工作組主要領導人醞釀之後提名通過。一直到8月4日，工作組還派人幫助“校文革”“建立工作秩序”，起著“參謀”作用。（同上）

7月31日，河南省委決定撤銷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王培育黨內外一切職務（1978年12月省委為王培育平反）、改組鄭州大學黨委。《河南日報》對此作了消息報道，同時發表社論：《一場針鋒相對的奪權鬥爭》。報道中說：北大聶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報廣播後，廣大師生紛紛貼出大字報，聲援北大同學的革命行動，中文系一年級2班李學生等14名學生寫大字報，批評他們把政治鬥爭引向學術討論，把文化大革命引向錯誤的方向。革命的火焰剛剛燃燒起來，對校黨委的問題才開始揭露，這班“資產階級老爺們”，就暴跳如雷，驚慌萬狀，他們急急忙忙於佈置對革命師生進行“反擊”，他們把大好的革命形勢，說成是“像1957

年那樣的右派向黨猖狂進攻”；把革命的師生誣衊為“右派勢力”和“別有用心的分子”，把革命的行動，誣衊為“向黨委進攻”，對貼大字報批評校黨委的師生進行“專欄批判”、“點名廣播”，安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叛徒”等罪名，威逼在大字報上簽名的人寫“檢討書”；對批評校黨委的學生採取調整住室、派人監視、組織圍攻；有四名團支部書記被撤了職……。在歷數了王培育鎮壓學生運動的種種“罪行”後，省委號召：鄭大廣大革命師生員工團結要一致，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務必將王培育的罪行揭深揭透，徹底查清，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對於河南省委的這一決定，鄭大部分師生認為，揪出王培育值得慶賀。但是，省委拖了40多天才處理王培育問題，犯了嚴重右傾思想錯誤，是“替自己開脫應負的責任”。

8月1—3日，中文系學生方復山、劉松盛寫了《致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全文見《革命造反報》創刊號66.9.10，鄭州大學革命造反報編委會）。信中以真摯的感情反映了鄭州大學文化革命的情況，擺事實、講道理，指出河南省委、鄭大工作組壓制群眾運動犯了嚴重錯誤。8月2日，外語系鄭玉清、楊樹生等9人寫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脫責任！》的大字報。同日，中文系黨言川、王舉章等9人貼出了《徹底揭發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組執行的右傾路綫》的大字報，對工作組進行全面的批判，並提出要追王培育鎮壓學生運動的“黑根子”。但是，以“校文革”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學生則針鋒相對，認為：“河南省委駐鄭大工作組體現了黨的正確領導”、“否定工作組，實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黨言川是“陰謀家、野心家”。

8月6日，黨言川第一個去北京，向毛主席黨中央彙報鄭州大學文革情況。接著方復山、劉松盛二同學也去到北京。三人聯名發表《致北京革命學生的公開信》，系統地向首都人民說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問題，同時向國務院接待站作了彙報。為此，正在北京開會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專門接見了他們，主動地承擔了河南問題的責任，明確表態要按照黨中央的十六條決定搞好河南省的文革運動。

8月15日，黨言川、方復山、劉松盛和劉建勛一同離京返回鄭州。同日，方復山、黨言川等串聯部分同學籌備成立“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並於當天晚上組織召開了“赴京情況彙報大會”。鄭州市其它大中學校師生和各界群眾上百人前來參加。劉建勛和其他省委領導也來到會場。會上，方復山、黨言川把北京的“紅衛兵”、“革命大串聯”、“炮打司令部”等新鮮事物介紹給群眾，並宣傳了《十六條》精神。由於會議開始前，“校文革”主席彭學敏、副主席鄭毅濤要求主持會議，“聯委”同學不同意，雙方發生爭執，被“聯委”同學趕下臺去。所以，會議尚未結束，物理系教工即貼出巨幅標語：“我們決不承認非法的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物理、化學、外文三個系的教工還利用廣播站，聲討黨言川一夥“毆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

8月16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開“鄭州大學革命師生辯論會”，說是辯論會，實是聲討會。會上稱聯委的彙報會是“黑會”，說聯委是非法組織，把強行主持“聯委”會議被趕下臺去，說成是“打了校文革的人”，校文革一位委員在發言中說：“他們打的不是一個工人，打的是全校師生，打的是無產階級專政，打的是中國共產黨”。一些群眾高呼

“控訴黨言川一夥毆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黨言川”、“把黨言川揪出來”等口號。在指認所謂“打人凶手”時，有人就指認當時負責秩序的程天富同學，程說：“我打人了，打誰啦？”這本來是很明確的反駁話語，却被他們硬說成是“程天福已經承認打人了”。校文革的強詞奪理也使大家認清了他的真面目。

接著，連續三天對“聯委”同學進行圍攻鬥爭，使他們吃不好飯、睡不好覺，多數同學不敢出面。但也有例外，物理系一年級學生李長杰年幼體弱，不懼多人圍攻，按照十六條精神，擺事實講道理，進行辯論（後來李長杰成爲鄭大聯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這幾天也是個分化期，許多新的戰鬥隊宣佈成立或醞釀成立。

8月18日，劉建勛、紀登奎、戴蘇理等省委領導來到鄭大與兩派代表見面，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次日，劉、紀等再次來鄭大，召開全體師生員工大會，宣讀了劉建勛的《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中說：黨言川等三位同學到北京找黨中央、毛主席要求彙報鄭大文化革命情況，這不僅不是什麼非法行爲，而是一種革命行動；他們回校後召開的“赴京情況彙報會”不是什麼“黑會”，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會；鄭大部分同學認爲本校的文革會，不能代表他們的意見，因而自動醞釀成立聯委會，我認爲不能說是非法的……。大字報共十條，不僅肯定黨言川等少數派的“革命行動”，而且按照十六條精神號召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

劉建勛的大字報使倍受壓制的少數派歡欣鼓舞，隊伍迅速壯大，聯委也由原來的38人發展到近百人。1966年8月21日，鄭大聯委正式宣告成立。主要負責人是方復山、黨言川、唐伯緒（後改名唐一兵，青年教師）、任延慶等

十三人。奇怪的是，儘管不把黨言川放在第一位，但校文革還是稱聯委為黨言川一夥。

第二次的辯論會，校文革沒有沾到便宜。雖然校文革代表李月珍聲稱代表 1148 人，一人同時讀了三份內容相同的發言稿，但還是處於下風。而聯委只出一人，只念一份稿子，新成立的戰鬥隊却幾乎一律支持聯委而抨擊校文革。特別是物理系八一戰鬥隊的王立興，為論證聯委合法性，把憲法條文搬了出來，有意思的是，30 多年後，他真的取得了律師資格。

劉建勛的大字報遭到“校文革”的強烈不滿。8 月 30 日，李月珍、彭學敏、鄭毅濤等 21 人寫出《炮轟劉建勛》的大字報，對劉建勛支持黨言川提出疑問：“你們口口聲聲要支持保護少數，難道我校的絕大多數師生員工都成了‘保皇派’了嗎？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衊的作法，要給我們扣上這頂‘保皇派’的帽子，我們決不答應！”

1966 年年 8 月，鄭州大學金維珠同學貼出了一份轉抄河南省信陽地區光山縣一位學生寫的大字報——《千刀萬剮吳芝圃》。大字報中說：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製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自 1959 年重陽節吃最後一口米飯至 60 年春，光山縣四五十萬人被打死餓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嚴重的時候，走一段路就會遇見幾具屍體，妻離子散、全家餓死者數不勝數，人民遭到了大劫殺，財產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壞，其慘狀不堪耳聞目睹，痛苦不堪回憶，筆舌無法描述！要知道 58、59 年光山縣的糧食獲得了大豐收啊！可是 59 年連種子一粒不剩地徵走，抖一抖稻草，篩下幾粒糧食也得上交，哪裏談得上口糧！……。”這張大字報在聯委部分同學中引起了共

鳴。1966年9月3日，在“聯委”發出的“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籲書》中寫到：“多少年來，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樣子，五千萬河南人民被窮白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尤其是在1958年以來，出現了一系列極其嚴重的問題和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這些事件，必須徹底追查清楚，堅決地把根子挖出來！……”

9月4日，“聯委”成立了“專揪吳芝圃戰鬥隊”，在歷史系二年級學生任延慶（聯委主要頭頭之一）的帶領下，十餘人專程去廣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

9月5日，“聯委”在鄭州市體育場組織召開了全省首次“省會各界革命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綫煽風點火大會”，來自鄭州、開封、新鄉、洛陽、許昌等地100多個單位的工人、農民、幹部、學生及外地來鄭串聯的師生5萬餘人參加了會議。大會發言中控訴了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1959年前後形左實右、左傾蠻幹、大肆浮誇，造成“信陽事件”的罪行。

9月11日，“鄭大聯委”第二次主持召開“省會各方革命群眾炮打河南省委黑綫煽風點火大會”，再次聲討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大颯浮誇風，高估產，高徵購，造成數十萬人死亡的“悲慘歷史”，由於吳芝圃已調離河南，就把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趙文甫掛上“歷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臺。對此，參加會議的紀登奎等當場質問：你們有什麼根據說他是“歷史反革命”？

9月7日，“鄭大校文革”和“鄭大紅衛兵”針鋒相對地發出了《全省人民緊急動員起來，炮打河南省“司令部”裏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的呼籲書。《呼籲書》中說“我省五千萬勤勞、勇敢的革命人民，在黨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

確的領導下，尤其是從 1958 年以來，在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們把持了一些部門。”“把省委內部所有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統統地鬥倒鬥垮！犁庭掃穴、斬草除根，使之斷子絕孫、萬劫不復！……。”

66 年 9 月 9 日，與“聯委”相對立的“紅衛兵戰鬥師”宣告成立。其成員主要是擁護“校文革”的人，負責人為職承平、葉先青。這時候，黨言川的私人信件披露出來，被“戰鬥師”抓住了“把柄”。事情的經過大體是這樣：66 年 8 月下旬，新鄉師院“八三一”（保守派）得知該院學生朱××和黨言川曾有書信來往，趁該同學外出之際，拿出他的讀書筆記和信件，發現 1962 年黨言川給該同學的信中有“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進行拍照後送給院保衛科長，保衛科長又送到新鄉市公安局內保科。9 月初，曾在新鄉師院擔任工作組長的省監委書記丁石得知此信，如獲至寶，親赴新鄉要回照片，並交給公安廳白副廳長放大保存，並披露出來。

黨言川在信中談到對農村 58—59 年情況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追根求源是我們黨中央在那幾年犯了不小的‘左’傾錯誤，其次在於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缺乏經驗，以及敵人的蓄意破壞有關。三面紅旗，現在我們的黨中央還想竭力地舉起來，但是三面紅旗中的兩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號召力，不用說工人、農民，就是參加 58—59 年實際生產不多的我們這些青年學生中間，提起大躍進，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

種極度混亂的情況。從理論上講，大躍進、人民公社在中國是完全應該有的，誰不想中國早日富強，誰不想中國早日進入社會主義。然而如果像前幾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最好還是不實行的好，我認為三面紅旗已大體失去人心，要舉起來，是有困難的了，不過總路綫這一面旗幟，還可以更多的舉起來，其它兩面旗幟如果換換招牌，或者不經過相當的努力，反覆的宣傳，要舉起來難極了。”以上這些言論使這封信成了黨言川“反對‘三面紅旗’”的“鐵證”。此後，鄭大“紅衛兵戰鬥師”大造聲勢，聲討黨言川的傳單散發全省乃至全國，連遙遠的桂林也召開萬人大會“聲討黨言川一夥的罪行”。

1966年9月15日，以理科為主體，與校文革有分歧的部分戰鬥隊聯合成立了“鄭州大學文化革命造反委員會”（簡稱“造委”）。負責人是數學系四年級學生張書震、物理系四年級學生馬鴻勛、楊欽寶等。“造委”的成立扭轉了“聯委”的被動局面，使戰鬥師處於腹背受敵的境地。造委一成立，就立即亮明支持聯委的一切革命行動，批判黨委、工作組和校文革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並明確對《火急呼籲書》表態。對“聯委”的《火急呼籲書》，肯定它大方向正確的同時，又認為說法有些片面。如“造委”的一份大字報上這樣寫道：九月三日，“聯委”發出一個《火急呼籲書》，呼籲全省革命群眾行動起來，炮打省委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呼籲書》是革命的，但有些說法有些片面。當時，校文革和紅衛兵戰鬥師認為，這下可抓住鬥“黨言川一夥”的大好時機。於是，他們根本不看“聯委”的大方向，抓住《呼籲書》中的枝節問題大做文章，又有重新掀起學生鬥學生的趨勢。

對於“聯委”的《火急呼籲書》和黨言川的《信件》，省委領導文敏生、紀登奎等也認為有“原則錯誤”。在“聯委”主持召開的9月5日大會上講話表態“你們的大會，風煽得好，火點得好，我堅決支持你們”的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會上說：“對鄭大聯委要採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則，表面上應付它，暗地裏慢慢壓垮它，我看黨言川不是個好東西”。既然省委認為“聯委”的《火急呼籲書》和黨言川的《信件》有錯誤，為什麼還要“明支持”？顯然，他們也不得不承認，“聯委”的鬥爭大方向是符合十六條精神的，是正確的。

9月25日，“聯委”發出《關於九月三日〈火急呼籲書〉的聲明》。聲明中說：《呼籲書》中出現某些言詞偏激，對河南存在問題的某些提法不當，“我們虛心接受批評”。我們發出呼籲書的目的，是爲了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是爲了炮轟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資派。因此，我們認為，起草的這個《火急呼籲書》大方向是正確的。“不徹底改變河南一窮二白的面貌我們死不瞑目”。此後，“鄭大聯委”抓住運動初期省委和校黨委工作組執行的“壓制群眾運動”、“挑動學生鬥學生”、“逼死人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大方向狠批猛攻。9月19日，“鄭大聯委”再次召開河南省“揭發批判趙文甫大會”，公佈了《把趙文甫的反動嘴臉拿出來示衆》的系統材料。此後，省委副書記、副省長趙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邊站了。

1966年10月15日，以王志明爲首的部分學生成立了“東方紅公社”，和“聯委”、“造委”並肩戰鬥。造反隊伍中又多了一個方面軍，校文革、戰鬥師的日子更難過了。

時間僅僅過了一個多月，戰鬥師由殺氣騰騰神氣十足

迅速滑向氣息奄奄，他們突發奇想，在東門口搭起了一個小席棚，以示受迫害，沒有辦公室，企圖騙取人們的同情。不想反而成了反動路綫失敗的見證物。更有好事者送了一幅對聯：曲率半徑點點相等，磨擦係數處處為零。橫批：又圓又滑。戰鬥師把一切都歸罪於劉建勛，決心到北京揪回劉建勛。1966年11月底，鄭大戰鬥師衝擊了中南海。這倒行逆施的行為更加加速了戰鬥師的滅亡。

1967年1月，“鄭大聯委”串聯省會各大專院校造反派再次組織了“專揪吳芝圃聯絡站”。一方面深入信陽等地調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廣州揪吳芝圃。鄭大聯委始終堅持清算以吳芝圃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傾蠻幹、大颶五風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數群眾的支持，由少數派成了多數派，保守派“戰鬥師”已基本瓦解。然而，河南省軍區介入文化革命後，風雲突變。

1月22日，來河南串聯的清華大學學生唐偉以“清華井岡山駐鄭聯絡站”名義發出了《27個為什麼——劉建勛是什麼人》的文章，在鄭州大量印發、張貼。文中說：為什麼省委揪出來的全是吳芝圃的老班底，而劉建勛帶來的班子却紋風未動？為什麼不去批判反動路綫，却先翻59、60年老帳？……省軍區公開支持唐偉，並把是否打倒劉建勛，是否支持唐偉作為衡量是否左派的標準。圍繞《27個為什麼》，鄭州地區造反派出現了分歧。“鄭大聯委”等多數造反派認為不能打倒一切，明確提出保護劉建勛、紀登奎、耿其昌等革命領導幹部。而鄭州工學院“造反隊”等少數造反派和軍區保持一致，認定劉建勛是“走資派”，鄭大聯委是新的保皇派，形成盛極一時的口號：“打倒劉建勛，氣死黨言川”，其後的“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即由此而來。

1月25日，鄭棉三廠兩派發生糾紛，鄭大聯委和炮校155紅色造反團前往支持，意見不一，發生衝突，這是地方院校和軍隊院校的第一次交鋒。1月30日，省軍區遊行，到鄭大東門時，呼喊：“堅決鎮壓反革命組織、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明顯針對鄭大聯委，將其作為反動組織。鄭大聯委等組織派人赴京前往清華大學瞭解情況，陸續反饋消息：唐偉不能代表清華井岡山，是“冒牌驢”。後來，因為一件偶然事件，“冒牌驢”的帽子却又被戴在鄭大聯委負責人之一的任延慶頭上（詳見附件四）。

1967年2月7日，在上海“一月革命”風暴影響下，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糧院聯委、豫農紅總、國棉六廠“工人赤衛隊”、鄭大附中紅旗、第二砂輪廠“造聯”、印染廠“八一”、新鄉師院“八·一八”、洛陽“八·一六”等74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當日，並奪了《河南日報》的出版權。

2月9日，鄭大“聯委”、“造委”、“東方紅公社”召開會議，聽取赴京調查劉建勛問題的同學彙報，根據劉建勛到北京後的表現和北京幾個主要造反派組織對劉建勛的看法，統一了認識，決定保護劉建勛。2月10日，“鄭大戰鬥師”在行政樓開始活動。社會上出現許多針對黨言川的鉛印大傳單，如：《黨言川是個政治大扒手》、《揭開河南省委收買黨言川的內幕》等。這些傳單大都是以劉、文、紀是河南省委“走資派”，黨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等為內容。

2月13日晚，“聯委”、“造委”、“東方紅公社”三組織召開合併大會，統稱“鄭大聯委”或“鄭大革聯”。14日，黨言川接到清華大學井岡山負責人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電報。接著，北京和全國許多著名的造反派組織都發表“嚴

正聲明”表態支持“鄭大聯委”和“河南二七公社”。

3月6日，河南省軍區支持“鄭工造反隊”和“中醫學院八三一”等成立的“河南省造反派總指揮部”（簡稱“河南造總”）在市體育場召開“省會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新反撲誓師大會”。清華學生唐偉在會上發言，說：“河南省市委內一小撮反革命兩面派的醜惡面目已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他們操縱的政治扒手黨言川之流煞費苦心拼湊起來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河南省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在會上講話並宣佈“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動”，“鄭大聯委中的一小撮頭頭，必須向河南人民低頭認罪，必須交待他們的幕後策劃人”。會後，省軍區用飛機在全省散發《告全省人民書》（這就是衆所周知的“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的由來）。大會之後，“鄭大聯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殘酷鎮壓，史稱“二月黑風”。會後，趙文甫多次給軍區寫信，說何運洪的講話是“極其重要的文獻”、“大長了無產階級志氣，大滅了保皇派威風”、“真正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你們幹得好！你們要幹到底！”

3月8日，鄭州市公安局發出四條《通令》（《鄭州晚報》1967年3月10日第3版）：①“鄭大聯委”這個非法組織，必須遵照軍區決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動。這個組織中的一小撮頭頭，必須交代你們的幕後策劃人，向河南人民低頭認罪。②“鄭大聯委”中的一小撮頭頭，限於本月15日前來鄭州市公安局進行登記。凡是屬於“鄭大聯委”的一切文件、資料、物資等，必須全部交出，不准轉移，不准銷毀。③凡是為“鄭大聯委”保存文件、資料、物資的單位、群眾組織和個人，必須立即向公安局報告。資料全

部交出。④大多數受欺騙、受蒙蔽的群眾，要迅速覺醒，揭發“鄭大聯委”的一切罪惡事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上來。《通令》最後說：“本通令自公佈之日起生效。若有違反本通令上述各條者，一律以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論處”。同日，省公安公社（公安廳保守組織）和鄭州市公安局派員進駐鄭州大學。在鄭大東生活區樹起了“非法組織鄭大聯委骨幹分子登記站”的大牌子，勒令 200 多名“聯委”成員前往登記，投案自首，交待罪惡，48 小時內寫出像樣的檢查。在化學系，“聯委”成員必須填寫“非法鄭大聯委成員罪惡登記表”。在歷史系，50 名“聯委”成員中 3 人被捕，10 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記，38 人被鬥，102 人次被搜查，大字報點名 40—50 人，寫檢查 113 份，4340 頁。在鬥爭中，讓這些學生低頭、彎腰、翻戴帽，並對他們高喊“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等口號，40 多名聯委學生被投入監獄。3 月 9 日，黨言川在商丘被捕。1967 年 8 月 18 日，河南省軍區直屬機關披露一份“二月黑風”中的“黑名單”，是從軍區參謀長東××隨身攜帶的本子上抄下來的。當時是為隨時抓人準備的。其中有“鄭大聯委”16 人：黨言川、方復山、任延慶、唐伯緒（唐一兵）、孟福海、殷樹山、杜秀萍、梁國喜、席戰修、袁寶珠、劉玉欽、余明湘、張松黎、李玉芳、李清雲、李長杰、王志亭（原件中個別人名姓有錯，這裏作了更正）。名單中有的人被抓起來，有的人因及時逃離幸免。後來，由於中央的一再干預，軍區才有所收斂。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總理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雙方到北京彙報。可是，軍區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參加北京談判，竟然支持“十大總部”多次

挑起武鬥，製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〇”、“七·一六”等駭人聽聞的攻打、圍剿二七派的武鬥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眾傷殘數百人，死亡數十人。當時鄭州大學文科樓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員的墓地。原鄭州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龔依群，曾寫過一組詩詞，取名《抗逆小集》，可作為河南“二月黑風”的佐證。如：①五月吟：刀光劍影遍街頭，烈火頻燒二七樓。熱血橫流何所懼？紅旗依舊傲中州。（1967.6.2）②水龍吟：堪恨河南劉鄧，槍口對二七戰友。二月黑風，幾番血案，頻施毒手。小丑跳梁，蚍蜉撼樹，何傷之有？聽中州子弟，凱歌高唱，共風雷吼！（原載《革命造反報》鄭大聯委主辦，1968.2.7）

經過“二七公社”艱苦不懈的鬥爭，在中央有關精神和周總理的干預下，被捕頭頭得以釋放。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河南省三方（河南二七公社、河南造總、十大總部）進京彙報會。1967年7月10日，中央發出解決河南問題的〔1967〕216號文件。文件中指出：①河南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綫性錯誤；②河南省黨內走資派是文敏生、趙文甫；③劉建勛是革命領導幹部，並回河南籌備河南省革委會。軍區在給中央的檢查中這樣寫道：“我們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綫錯誤，打擊了鄭大聯委與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錯誤地把劉建勛、紀登奎當成走資派，把他們支持的造反派組織看成是‘御用工具’；……在3月6日宣佈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以後，造成連鎖反應，全省各地宣佈解散了許多革命群眾組織，錯抓了許多人。……黨言川同學也被拘留和遊了街；社會上一度出現了肅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讓革命群眾掛黑牌、請罪的錯誤傾向；這時，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乘機興風作浪，操

縱保守組織，進行打擊報復，打擊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央文件和省軍區的檢查等於給“鄭大聯委”和黨言川平了反。67年8月以後，鄭州大學成了“聯委”的“天下”，聲討何運洪的罪行、敦促戰鬥師“反戈一擊”、批判劉鄧陶、批判王培育的大字報比比皆是。聲討會上聲淚俱下，批判會場口號震天。在“鄭大聯委”主辦的《革命造反報》第31期（67.9.1）頭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一文寫道：“鄭大面貌煥然一新。被戰鬥師拆毀的大字報欄又林立在校園。大字報、大標語、巨幅宣傳畫，琳琅滿目。看大字報的人們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整個校園充滿了火熱的戰鬥氣息。”“二月黑風”中軍區鎮壓造反派的內幕被揭露出來，證據確鑿，駭人聽聞。被軍區逮捕迫害的“聯委”同學，成了英雄人物。1967年8月23日下午，鄭州市公安局二七聯絡部在二七紀念堂召開“控訴何運洪滔天罪行大會”，特邀鄭大外語系杜秀萍同學介紹“鄭大聯委”鬥爭史，特別是她在“二月黑風”中被捕坐牢的情況，十分感人。後來，杜秀萍等還應許多部隊邀請，去宣講河南二七公社的這段光榮鬥爭史，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和好評。

1967年11月1日，鄭大革命委員會成立。黨言川擔任革委會主任。副主任由龔依群、任延慶、張書震、李長杰擔任；常委除正副主任外還有程天富、馬鴻勛、劉作周、方復山、唐一兵、孫日新、李恒福、袁寶珠。接著，各系革委會相繼成立：數學系11月10日下午成立，主任朱久海；中文系11月11日上午成立，主任席戰修；政治系11月12日夜成立，主任殷樹山；化學系13日上午成立，主任韓立忠。革委會成立後的主要任務是大批判和教育革命。1968年8

月 26 日，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鄭大。9 月 26 日，鄭大聯委宣佈撤銷。11 月 1 日，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進駐鄭大。

1968 年 8 月以後，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和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開展，黨言川等同學相繼離開學校，到解放軍農場、農村“接受再教育”。1969 年 6 月 1 日，毛澤東在鄭州的專車上接見劉建勛和紀登奎時，還問到“你們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嗎？黨言川怎麼樣？”這說明毛澤東還沒有忘記黨言川。

縱觀鄭州大學文革這段歷史，以“聯委”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始終堅持正確的鬥爭方向，把矛頭對準河南省委內搞形左實右、大颯“五風”造成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的原省委領導人吳芝圃、趙文甫等，批評、支持、保護革命領導幹部劉建勛、紀登奎、耿其昌等，這一革一保在河南文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以上關於鄭州大學文革概述，主要是依據筆者所存資料，其準確性、完整性遠遠不夠。誠望鄭州大學文革親歷者，給予批評指正。

2005 年 12 月初稿

2008 年 12 月修改

附件一：“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的由來

文革時，黨言川是鄭州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初期由於受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的圍攻、壓制，得到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的支持，後成爲“鄭大聯委”負責人。1967年2月，河南省軍區介入文革後，認定黨言川是劉建勛的“保皇派”、“反動學生”。3月6日，省軍區召開10萬人大會，第二政委何運洪宣佈“鄭大聯委”爲“非法組織”，會後，用飛機撒發《告全省人民書》等傳單。3月9日，黨言川被捕。由此，“飛機撒傳單，氣死黨言川”成爲當時家喻戶曉的順口溜。

在“河南造總”奪權主辦的《鄭州晚報》上（1967.3.12）登載有一首小詩，是3月6日在飛機上執行撒傳單任務的一個戰士寫的。題目很美：“春光無限好”。詩句很美：“豫西的群山在歡呼 / 奔騰的黃河在歡笑 / 與坐在機艙裏的戰士 / 有同樣的心情，同樣的思潮…… // 是什麼使我如此激動？ / 是什麼使我今天的熱情這樣高？ / 是這堆滿機艙的傳單啊 / 把我的心與革命左派的心緊緊相交 // 《告全省人民書》是大奪權的進軍號 / 我們要徹底把資產階級當權派鬥臭鬥倒 / 《給毛主席的致敬電》是我們共同的心聲 / 表達了我們無限忠於毛主席的教導 //……千萬張傳單飄下去了——像春天的花種 / 在革命左派的心窩裏扎根長茂。”……毋庸置疑，在戰士的心中，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支持“左派”

是光榮的，而承擔“飛機撒傳單”的任務更是神聖的。所以，詩中表現出來的真誠、自豪、激動、愉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戰士的心是潔白無瑕的。至於支持的是否真正的“左派”，恐怕這位戰士也不會真正明白。時隔4個月，河南省軍區向中央作檢查，承認“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綫的錯誤，鎮壓了革命左派”，飛機撒傳單顯然是錯了。後來，黨言川擔任了鄭大革委會主任、省革委會常委、滑縣縣委副書記等職務。再後來，毛主席去世，文革被徹底否定後，黨言川因“造反罪”成了階下囚，撒傳單這件事又成了萬分正確。——就這樣反反復復，構成了這段特殊的歷史。

附件二：奇文共賞—— 《鄭大聯委興衰演義》節選

文革中以長篇小說形式描寫對立派組織的作品並不多見。在筆者的藏品中，有長篇小說連載——《鄭大聯委興衰演義》第二回，油印，16開。雖然沒有全本，作者、時間不詳，但從內容上來看，顯然是對立組織所作。細讀之，語言精煉、幽默，人物刻畫入木三分，對黨言川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假如筆者當時讀到此文，一定會稱其為“大毒草”的。如今，文革已成歷史，黨言川已經作古，功過是非，歷史自會有公論。試想當年兩派針鋒相對、勢不兩立，水火不容，寫出這樣的文字實在不足為怪。

這裏節選片斷，寫的是1966年8月15日，黨言川、方復山、劉松盛到北京告狀和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同車回校後的事情。文中“凹面官人”是指劉建勛，“文大老爺”是指第二書記文敏生，副書記楊蔚屏冠以“黑貨”，書記處候補書記紀登奎冠以帶引號的“好同志”……看官注意：事情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文革”這一特殊年代，不然的話，這樣醜化省委官員，那還了得！

《鄭大聯委興衰演義》節選

第二回 劉、文、楊應邀赴會 黨言川打人起家

話說車門開處，托地跳出一位青年來，顴骨高高，下巴尖尖，一副金燦燦的深度近視鏡，神奇的座在鼻樑之上。衆人一見是黨言川，怎禁得住一聲喝彩道：“好齊整的一條闖將！”這時只見一位女士搶上前去，一面接過言川手中之書包，一面說道：“哎呀！你可回來啦，言川！”在衆人喝彩聲中，悄悄地從車中又鑽出“文聯”的哼哈二將：一位大眼，尖臉，姓方名復山，字號石波，外人譏爲“保皇先生”者。另一位，小眼，矮個兒，黑瘦子，姓劉名松盛者是也。問問知其底細者，無不啐道：“好個政治投機分子！”

歡迎儀式之後，早有一群人擁簇著往樓裏而去。人聲嚷鬧，話不盡相逢之喜，就中一位兄弟高叫道：“言川哥，想煞俺也。”正說話間，一聲喇叭響亮，衆人回望階下，只見那小臥車掉轉車頭，砰砰煽出一股黑烟，急匆匆告別“皇”親而去。

見縫插針兒。如今且藉黨言川在樓梯上講演之際，說話人交代幾句：這許多歡迎黨言川的同學中，多數還是革命或者要革命的，他們不同意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影響了的校文革，要自己起來鬧革命，好得很！但不合信錯了黨言川，受了欺騙！後來有人寫詩嘆曰：

不看衣著不看容，只看他心紅不紅；

交了好友同進步，碰上扒手害非輕！

且說中午宴罷，只見一個個往校門外機械廠去了。共是三十多條好漢。相見畢，黨言川徑自取了一塊半截磚朝

屁股下一塞，便宣佈會議開始。好言川，端的了得！不到一個午休時間，就把晚上要開的“赴京報告會”安排得停停當當：你貼海報，他送通知，並組織了大會主席團和保衛人員。黨言川心懷鬼胎，私下對幾個心腹說道：“咱不好好幹，將來就被劃成右派”，幾個人聽罷，叫將起來：“阿川你放心，憑咱十八般武藝，又有書記劉……”，黨言川連忙打斷：“不可聲張！”於是幾個人便小聲說道：“又有劉書記……，管保弄個左派當當。”黨言川聞言，頓時眉開眼笑，又叮嚀一番，不在話下。

說話間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大操場人山人海，要聽北京經驗。……

這當兒，只見主席臺北邊一陣騷亂，閃過來四抹黑影。燈光下，只見是：凹面官人、文大老爺、“好同志”紀登奎和黑貨楊蔚屏。凹面官人還致了詞，說了些“大力支持”、“由群眾解決”一類的吉利話。這話有甚厲害處？是你有所不知，這官家封過的敢字當頭的小將，誰敢動他一下？切莫說他與這位官人又恁地要好！此是後話不提。

附件三：關於黨言川的漫畫

文革中漫畫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被群眾組織廣泛應用。

這組傳單形式的漫畫產生於 1967 年 2 月，4 開，鉛印，共 9 幅。傳單名稱：《徹底揭開河南省委司令部的蓋子，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新反撲》；傳單署名：中共河南省委機關《韶山》革命造反隊。產生背景：河南省軍區介入文革運動後，把省委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視為“走資派”，把鄭大造反學生黨言川視為“保皇派”。這組漫畫就是以“劉、文、紀”和黨言川之間的所謂“主僕關係”、“秘密勾當”為內容而繪製的。

對於漫畫的內容，筆者不能苟同，但繪畫水平却令人叫絕，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黨言川，個個形象逼真，惟妙惟肖。從收藏角度來看，不失為精品。



(左) 黨言川 (右) 文敏生

(左) 黨言川 (右) 劉建勛



(左) 黨言川 (右) 劉建勛、紀登奎、文敏生

附件四：“冒牌驢”綽號的由來

文革時，任延慶是鄭州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學生，“聯委”主要負責人之一。1967年1月，清華學生唐偉以“井岡山駐鄭聯絡站”名義寫出《27個爲什麼——劉建勛是什麼人》的大字報，鄭州地區造反派在此問題上發生分歧。以“鄭大聯委”爲首的多數造反派組織認爲“清華駐鄭聯絡站”不能代表清華井岡山，唐偉是“冒牌貨”。1967年2月2日，鄭大聯委、造委得到第二天鄭州工學院造反隊等要在市體育場召開大會的消息。爲防止對方“奪權”，決定也去參加大會。2月3日一早，鄭大造委的部分成員便趕到市體育場，從西北角門進入佔領了主席臺。隨後，鄭工造反隊從南門進入，佔領了南半部，看到主席臺已被佔，索性關上了大門。於是，鄭大、河醫、農院後來的同學被擋在了門外。恰在這時，任延慶帶著清華井岡山的袖章來到（任延慶和來鄭串聯的清華井岡山魯夢明同學關係甚好，平時就互換袖章佩戴），把門的以爲是唐偉一夥來到，便打開了大門，鄭大、河醫、農院的部分同學趁機涌進。見此情況，工學院造反隊連忙去關閉大門。這時，任延慶說：讓河醫、農院的人進來。因爲鄭工和鄭大過去一起戰鬥過，有人認出了任延慶，當場被扭送到軍區，照了相。何運洪政委還親自指示鉛印傳單數千份。會後，《活抓冒牌驢》的傳單在鄭州地區如雪

片般大量散發。“冒牌驢，冒牌驢，不是人家是自己”的順口溜廣泛流傳。從此，“冒牌驢”成了任延慶的代號。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大家對任延慶仍以“老冒”稱之。

活抓“冒牌驢”

這些天來，流言頻傳，雪語濺耳，驅趕“冒牌驢”的聲音，傳遍全市，一時滿城風雨，烏煙瘴氣。二月三日，在市體育場，真的發生了一件趣事“冒牌驢”的事情。

事情是這樣的：這天，在一片“清華井岡山駐鄭聯絡站從河南滾出去！”的叫喊聲中，一個年青的“關將”跳出風雨球場門台，嘶聲喊叫：“我代表剛到鄭州的清華井岡山人向大家講幾句話。我是井岡山的。河醫東方紅、農學院這幾個組織是革命的組織。應該讓人家進來……”眾人聞聲駐足細看，啊！可不見：他明明是戴著井岡山紅衛兵的袖章，誰個不信？！

然而，騙子手的壽命是不長的。

事實對造謠者是毫不留情的。

騙子手，造謠者的下場是可悲的。

這位“關將”正在好說好講，天知道，台下竟有熟知內情的人，早已認出這位“關將”才是真正的“冒牌貨色”，原來他是鄭州大學文化革命聯絡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任延慶（歷史系二年級學生）。當場揭露了這個“冒牌貨”，被革命造反派的羣眾抓住。這一位見露了馬腳，立即由神氣活現，變成了垂頭喪氣，由叫聲朗朗變成了啞口無言，由耀武揚威變成了狼狽不堪。在一片人喊打聲中，這一位被帶走并給了特殊優待——照相并錄音。這就是“冒牌驢”的下場。

真沒想到，這些人竟魚目混珠，造謠惑眾，冒充井岡山，為自己評功擺好，自封左派，中傷別人，如此手段，想得出，千得到，高明！高明！

署名：鄭州工學院革命造反隊
傳單背面（局部）



這就是冒牌驢——任延慶
（鄭大革聯主要負責人之一）的丑態

鄭州工學院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

附件五：鄭州大學文革小報報頭選登



《紅衛戰報》
鄭州大學“校文革”主辦

《革命造反報》，鄭大聯委主辦，1966年9月10日創刊



見鄭州大學紅衛兵戰鬥師實況紀要



《紅衛兵報》，鄭大戰鬥師主辦，66年12月22日創辦

《新鄭大》，鄭大革命造反派指揮部主辦





《革命造反報》特刊

1967年11月1日上午，鄭州大學召開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河南省委、省軍區領導劉建勛、王新、張樹芝、紀登奎等出席大會并講話。鄭大革命委員會主任黨言川在大會報告中，歷數了鄭大聯委的戰鬥歷程：66年同資反路綫的斗爭、67年遭受軍區二月的壓、三月的抓、四月的拉、五月的打、六月的殺，3月6日被軍區宣布“非法”后，39人被捕坐牢，137人被非法登記……

附：郑州大学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

- | | |
|----------------------------|---|
| 主任委員 党言川 | 委員 (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鸿勋 方复山 |
| 副主任委員 龚伟群 (原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 刘作周 孙日新 (干部) 任廷庆 李世存 (教师) |
| 任廷庆 张书震 李长杰 (以上共四名) | 李长杰 张书震 李克四 (干部) 杜秀萍 (女) |
| 〔革代委员一名〕 | 李振福 (干部) 李德庆 (教师) 徐明湘 唐一兵 |
| 常務委員 党言川 龚伟群 (干部) 任廷庆 | (教师) 党言川 袁宝珠 (工人) 殷树山 龚伟群 (干部) 程天雷 韩三中 (以上共二十名) |
| 张书震 李长杰 程天雷 马鸿勋 刘作周 方复山 | 暫缺 学生四名 革委干部三名 郑大附中一名 |
| 唐一兵 (教师) 孙日新 (干部) 李振福 (干部) | 革代一名 |
| 袁宝珠 (工人) (以上共十三名) | |

《八年日記》自序

這本《日記》已經塵封十多年了。這是我一生中八年艱難歲月心路歷程的真實記錄，當時取名為《心迹》。

世紀末的一天，在與好友的一次談話中偶爾提到這本日記。引發了夫婦二人的興趣，提出是否可以看看，我欣然同意——現實使我愈來愈認識到，該如何正視那段苦難歲月。他們讀懂了我的日記，還為它流了淚。我也讀懂了他們的眼淚——淚水中決非只有同情。我想，在金錢至上、物慾橫流、人情淡薄的今天，有人能為它流淚，就說明真情還在，正義還在，天理還在。我決定接受好友的建議把日記整理出來。於是，我坐在電腦前開始敲打這本日記。看到那一行行泪痕斑斑的文字，眼淚不由自主地從老花鏡片下流淌出來，順著臉頰滴灑在鍵盤上……二十年過去了，歲月把雙鬢抹成了斑白，條條皺紋刻上額頭，却不能撫平內心的傷痕。這傷痕決非僅僅是個人的。我所以再次經受感情的折磨，用不太靈活的手指，把舊時的磨難裝進現代的電腦裏，是希望後人能從中瞭解我們這代人的精神世界——理想、追求以及為之所奉獻出的青春、真誠、熱血甚至生命，從而激發他們為人民、為社會，去學習，去思考，去奮鬥。即使有人僅僅只是為它流淚，我也會感到欣慰。

因為泪腺不乾涸的人，思想是不會枯竭的。

《日記》所記述的艱難歲月始於1979年11月25日。從這天起我的丈夫由一個共產黨的縣委副書記成了“罪犯”，而我自然也成了“犯屬”。過去那熱情、友好、信任的目光不見了，繼而是冷漠、躲避和同情。更難忍受的是遭受不白之冤。他沒有貪污受賄，沒有瀆職失職，沒有道德敗壞，沒有違法亂紀，何罪之有？只因文革中當了造反派，硬是被扣上“打砸搶”的罪名。我像一下子掉進深淵，在痛苦中掙扎，絕望，想大聲呼喊，又不敢叫出聲來——紅衛兵、天安門、大串聯、革命造反、大字報、大辯論、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這一切不都是毛主席支持的嗎？……究竟是誰搞了“打砸搶”？造反派在同“走資派”的鬥爭中，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反黨”、“反軍”種種帽子，被關押、圍攻、毒打，甚至犧牲生命！鄭州大學操場曾經埋葬過的五十多座死難學生的墳墓就是歷史的見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耳聞目睹了無數革命同志被扣上“打砸搶”、“三種人”等莫須有的罪名被革職、批鬥、逮捕、判刑、入獄所遭受的種種磨難後，我終於明白了毛澤東曾說過的“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的含義。

1979年12月19日，丈夫以“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被判處徒刑十年，在洛陽市北郊邙山嶺下的“洛陽鋼球廠”服刑。當時我那撕心裂肺、五雷轟頂的感受，至今記憶猶新。作為同學、“戰友”、妻子，我對他是瞭解的。文革中，他能夠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從沒有組織過“打砸搶”，而是堅持文鬥反對武鬥；他積極搞大聯合，在全省第一個成立了由他擔任主任的河南農學院革命委員會，當時被譽為“春雷第一聲”；畢業分配時他帶頭到農村去，堅持在生產

隊勞動三年多。特別是在擔任滎陽縣委副書記、廣武公社第一書記期間，帶領群眾修公路、興水利、學大寨、辦工廠，做了不少好事、實事。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那裏的老百姓還沒有忘記他。“揭批查”期間，20多人組成的專案組查了兩年，也沒有查出他離開學校後的12年間任何違法亂紀的行爲。試想，但凡有一條，也不會不寫到判決書裏的。

丈夫被判刑的第二天，我到縣法院要了一份《判決書》。判決書把12年前“文革”這個特定歷史背景下，由他主持的省委、省軍區領導參加一次批鬥“走資派”（中央紅頭文件點名）大會上，對被批鬥者架“飛機”這一事件，擴大事實、編造情節作爲“侵犯人身權利罪”的依據。而治罪者恰恰就是當年的被批鬥者。首先應當承認，“架飛機”這一文革中司空見慣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錯與罪的界限不能混淆。我不禁要問：身爲農民子弟的青年學生，和你們這些“大官”何冤何仇，爲什麼去侵犯你們的“公民權利”？你們在文革初期把提意見的學生打成“反革命”、“右派”，有的甚至被逼自殺，算不算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文革後，被批鬥者重新擔任省委領導職務，並親自主抓“揭批查”，在電視上頻頻亮相，從他那滿面春風、耀武揚威的樣子，我實在很難和判決書中描述的“耳朵被揪爛，胳膊被扭殘，肝病引起浮水，病危三次”聯繫起來。

面對丈夫坐牢的現實，終於，理智戰勝了感情。我橫下一條心，挑起生活的重擔，堂堂正正地做人：孝敬老人、養育孩子，關心安慰囹圄中的親人，更要戰勝外界的鄙視、冷眼，做生活的強者。我決定拿起筆來，記下我逆境生活的點點滴滴。

從1979年11月25日丈夫被捕，到1987年8月8日

出獄，7年8個月零14天。在這兩千八百多個日子裏，我肩挑重擔，忍著痛苦，以勇氣、毅力和信心，堅定地向前走著。工作的辛苦，家務的勞累，感情的折磨，生活的貧困，探監的奔波，小人的嘲諷，惡人的刁難都沒有使我屈服。我積極工作，鑽研業務，獲得了省農業科技成果獎。1986年我和省科研單位一起創辦了“滎陽微量元素肥料廠”；我贍養了老人，養育了孩子，安慰了囹圄中的親人，信念堅定，始終如一，辛勤為立足之本，克己為難人傾情，用自己的行動維護了做人的尊嚴，贏得了同志們的尊敬。從35歲到43歲，歲月揉皺了面容，身心傷痕纍纍，而孩子們却長大了，長高了，上進了：大女兒以優異成績免試升入重點高中；二女兒憑自己的努力考到重點初中；小兒子是小學校裏的優等生。孩子們的每一點進步都使我們無比欣慰，成為我們苦難中的最大樂趣。這一切都可以從日記裏找到跡迹。

《日記》記述了我艱難歲月的足跡，飽含了我的喜怒哀樂；《日記》是獨白，是傾訴心聲的地方。丈夫在獄中勤奮讀書、苦練身體的舉動是我寫日記的動力。當思念親人之情無法排解的時候，我曾在日記中寫上維吾爾族詩人尼米依希的詩句：“相思的痛苦全凝聚為上空的烏雲，一場風雨之後你將瞭解我的心情”；當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時，我在日記中發一通牢騷，以泄胸中憤懣；讀一本書、一篇文章或看一場電影、一部戲曲，凡能引起共鳴之處，都會在日記上發幾句感慨，摘抄一些警句；同命運者的境況以及發生的有關事件也記了下來，從中人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悲慘遭遇以及與邪惡鬥爭的精神，這是衆多因當年造反而今獲罪者的境況縮影；朋友、同志的幫助更要記上一筆，它代表了親情、友情、同志情。當然，記述得最多的還是去洛陽

探監的情形：奔波的艱辛，冷遇的忍耐，分別的淒涼，內心的悲苦。如果“苦難是人生的老師”（巴爾扎克）“不幸是一所大學”（別林斯基）的話，日記就是我在這所苦難大學裏完成的作業，也是以“人生”為題的答卷。

由於我們的種種努力，丈夫提前一年零四個月於1987年8月8日出獄，日記就此停筆。丈夫出獄後沒有了工作單位，沒有工資，沒有任何生活待遇，特別是從思想觀念上和社會格格不入，只好在我參辦的微肥廠當臨時工。在同學、同志、朋友的幫助下，靠自己的雙手維持全家的生活。兩個孩子相繼考上了大學，因家庭困難而輟學的二女兒也到高等學府深造。如今，三個孩子都相繼參加了工作。日記裏的辛酸歲月成了永不磨滅的記憶。

《日記》封存至今已有十餘個春秋。這十幾年來，我倆在人生路上共同奮鬥留下的一串串深深的脚印就是日記的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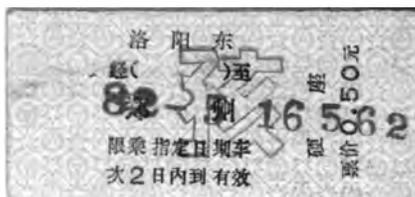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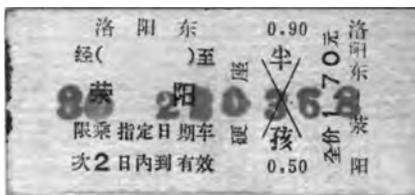
但願《日記》能成爲後人窺視我們這代人精神世界的窗口。

2000年5月

附件：八年探監用過的火車票一瞥



火車票一瞥（1980—1987）



鄭州—洛陽火車票：成人
1.7元（上），兒童0.5元
（下）

《八年日記》後記

原《日記》簡單、凌亂，許多事情遺漏、誤記、交待模糊，讓人不明不白。經過我的回憶、整理、訪問當事人，特別是插入丈夫的獄中來信後，比較完整了，經過幾次修改，終於完稿。《八年日記》是我個人逆境生活的紀錄，同時也是“揭批查”這段歷史的真實見證。何時能見天日？只有等待。

丈夫出獄、日記停筆後的情況，這裏簡要交待一下。

1993年，我因身體不適提前退休。我們參辦的微肥廠早在91年就停辦。獄中苦讀馬列、學毛著的丈夫，很難融入現實社會。他曾被聘去當過七個月的廠長，終因不能“向錢看”而辭職。戶口上一直寫著“待業”二字的他沒有單位，沒有工資，沒有公費醫療，沒有一切基本生活待遇。物價成倍成倍地增長，孩子們的學費也與物價同步上升，高消費的呼聲震耳欲聾，我們又有了緊迫感。我們試著做生意，一次次地失敗了：沒有後臺，受不了大蓋帽的敲詐；沒有過多資金，賺得起賠不起；社會嚴重扭曲：要賬的是孫子，欠賬的成老爺；假貨充斥市場，黃賭毒沉渣泛起；治安混亂，惡性案件頻頻見於報端；腐敗之風愈演愈烈，貪官的層次越來越高，手段愈來愈卑劣；農民進城、工人下崗……

面對這些，我們束手無策、憂心忡忡。只好“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冬夏與春秋”，過起節衣縮食的隱居生活。然而，無事可做的滋味很不好受，我們又對跳舞、打麻將之類的消遣不屑一顧（在我從小看的電影中，打麻將的大都是國民黨的姨太太之流。迂腐的我，至今觀念轉不過來）。這時候，社會上出現“毛澤東熱”，紅太陽的歌聲響徹大江南北，我們的心被震撼了。一幕幕往事在腦海裏時隱時現，記憶像無數小蟲子爬上心頭。毛澤東不就是爲了杜絕這些醜惡現象才發動文革的嗎？……可是，我們又能夠作些什麼呢？

從1993年起，我開始收集毛澤東的語錄、詩詞、著作、照片、形象品以及文革小報、傳單、宣傳畫、資料等“文革文物。”我深信，文革給人類社會、歷史帶來的影響是久遠的，無法估量的。我頻頻出現在鄭州舊書市場上，像淘寶一樣搜尋、購買文革“文物”。久而久之，收集文革文物就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或的一部分。有付出就有收穫。我的文革藏品數量大增，僅文革小報就有2500多種！我把擺放“文物”的書房冠名爲《潤之書屋》，1999年秋，著名軍旅作家魏巍爲書房題名。

目前，我正在電腦上整理文革專題資料，資料目錄取名《文革之窗》。收集、整理、研究文革的過程，將成爲我《日記》的續篇。

2000年8月

收藏文革文物 見證真實歷史

——《歷史的見證——文革文物展示》序言

1993年冬，我因身體不適等原因，提前退休。一天，在整理舊物時，從雜物室的角落裏發現一個木箱子，揮去塵土，打開一看，原來是我存放二十多年的毛主席語錄、詩詞、著作、紅衛兵證件、袖章、日記、信件、資料，還有一個裝滿毛主席像章的精美小盒子。我的心一下子被觸動了。像神奇的鼠標點擊到保存在內心深處的存儲文檔一樣，思緒一下子回到那“激情燃燒的歲月”……。

1966年夏，我正在讀大學三年級。作為一個貧苦農民的女兒、祖祖輩輩的第一個大學生，我對毛澤東主席始終心存感激。當毛主席發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時，我毅然帶上了紅衛兵袖章，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像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一樣，我經歷了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大批判、大聯合；經歷了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鬥私批修、接受再教育……。這些物品就是我火紅青春的見證。後來，毛澤東去世，文革成了沉重的話題。許多親歷者沉寂在經濟大潮中，文革物品或被燒毀，或被賣掉，或被遺忘在角落……。然而，文革這段經歷在我心中的烙印實在太深太深，

無論時隔多久，一旦觸動它，內心就會久久不能平靜。我很想為這段歷史做點什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到舊書市場閑逛，發現幾乎每個攤位上都擺放有毛主席語錄、詩詞、像章、宣傳畫，甚至還有文革小報、傳單、書籍等文革物品。當我看到這些物品和古玩字畫一樣被收藏者討價還價的時候，我突然受到啓發，情不自禁的加入到收藏文革文物的行列中。於是，無意中存放的這箱物品，就成了我最早的藏品。

十幾年來，無論嚴寒，還是酷暑，每到星期六，我就帶上挎包去鄭州舊書市場“淘金”。每當看到舊書攤上擺放的那些紅彤彤的文革物品時，心裏總是熱乎乎的。就這樣，年復一年，義無反顧。初時，鄭州市還沒有“古玩城”，舊書市場先是在鄭州大學“金水河”段河沿，後搬到西郊工人文化宮院內，另外還有桃源路、建設路等小書攤。無論搬到那裏，無論書攤大小，都留有我的足迹。其中有艱辛，有樂趣，有遺憾、有滿足，真是體驗人生百味，品嘗苦辣酸甜。有時看中一本語錄或一份小報，因價格不合適沒有成交，等下次再去時已成別人囊中之物，心裏會後悔難過好幾天。有一次，我們買了幾份文革小報合訂本後，發現兜裏的錢所剩無幾，只好先留下公交車費，餘下的買了兩個燒餅充饑。當品相完好、價格適中、心儀已久的“文物”終於成爲自己的藏品時，那份愉悅，那份得意，那份滿足，真是難以言表。除了逛舊書攤外，同志、朋友的饋贈也是我藏品的主要來源。有的同志搬家，我知道後，就去撿一撿“破爛”。久而久之，不少朋友知道我收集文革文物的事情，有的還主動提供綫索或親自送物上門。舊書攤位的“老闆”跟我十分熟悉，有新東西就與我電話聯繫，我是召之即去。其實，

賣舊書的人中，不少是收廢品出身，他們在收廢品的同時，把“文物”挑揀出來，攢到週六、週日到舊書市場擺攤賣。後來有的人也成了“收藏家”。他們十分看重套紅文革小報和創刊號，價格比普通報紙高幾倍甚至十幾倍。而我看重的是小報的內容和史料價值。比如油印小報刊，資料性強，信息量大，也更原生態，價格又便宜，我就比較喜歡。有一次，文革中河南省最大的群眾組織——“二七公社”的大批資料出現在舊書攤上，首批被我買了一編織袋，全是嶄新的文革小報，全國各地都有，真是令我喜出望外。可是，下週再去時，另外幾麻袋被另一藏友買走。這個藏友是“票證”收藏家，他把自己需要的信封、郵票、彩色報刊等“精品”挑選後，打電話讓我去吃“二饅”。於是，我和老伴就到他家購買我們需要的小報品種，同時他把油印小報、傳單、資料無償送給了我們。就這樣，在炎熱的夏天，我們多次去他家挑選購買“文物”。其實，更想得到的是饋贈部分。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穫。幾年來，我節衣縮食，把收集文革文物當成唯一樂趣，藏品頗為可觀。我的收藏品種多而雜，足以辦個“家庭文革文物博物館”。現有文革小報 3000 餘種，涉及面包括西藏在內的 29 個省市自治區，有鉛印、油印、謄印等。其中幾種報紙從創刊到終刊，幾乎完整。例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報、河南《二七公社報》、河南省委《井岡山》報等。還有的報紙比較珍貴。如一份《中學文革報》創刊號，登載有遇羅克的《出身論》，當時在全國影響很大，我是偶爾在古玩城一個書攤上發現的。還有一份文革中聾啞人辦的報紙——《革命聾人報》，比較少見，是最近才和別人交換而來的。在我的小報藏品中，油印品有 500 餘種之多。油印品一般是由基層群眾組織（戰

鬥隊)或較大組織受壓時創辦的,和鉛印相比,印刷質量較差,視覺效果不好,隨著科技的發展,這種印刷方式本身已被淘汰,所以,這一品種仍很珍貴;藏品中有“紅寶書”100多種。比較珍貴的有袖珍本的英、法、德、意大利、日、越南文、藏文、朝鮮文等;大小有16開、32開、64開、128開、256開;盲文版的《毛主席語錄》,由於特殊文字特殊紙張,其大小為長30厘米,寬28厘米的大八開語錄,由於發行量少,更是彌足珍貴;群眾組織印製的語錄更是品種繁多,如毛主席《論農業》、《論教育》、《論金融》、《論科學》、《論階級與階級鬥爭》等等;《毛主席詩詞》也被我列入“紅寶書”之列。文革中印製的《毛主席詩詞》,集詩詞、解釋、手書、照片、詩詞譜寫的歌曲等為一書,大小一般為64開,也有少量128開,均配以紅色塑料封面,十分精美;藏品中有一本手刻油印《毛主席詩詞註釋選編》,輯錄了毛主席詩詞的原著、手書、書信、原註、自註、註釋、註解以及有關革命故事、題字、篆刻、地圖、插圖、尾花等,內容豐富、書寫工整、手書逼真、插圖精美,實為油印之精品;另一本《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篆刻》是山西大學藝術系王紹尊同志1972年篆刻、山西省測繪局內部印刷的,它把毛主席37首詩詞全部篆刻出來,創意新穎、構思獨特,功底深厚,沒有對毛主席的滿腔熱情和精湛的篆刻藝術功底是絕對創作不出來的;毛主席像章我沒有刻意收集,但本人藏有千餘枚,材質有鋁製、竹製、塑料,大小不等,形狀各異,也算一種景觀;文革中的各種證件,如“紅衛兵證”、“畢業證”、“平反證”、“工作證”、“會議代表證”、“上山下鄉光榮證”、“持槍證”、“出入證”、“結婚證”等,時代印記直觀、鮮明,其中本人當年的“紅衛兵證”和“二七公社

工作證”，幾經滄桑，十分珍貴。藏品中的信封、信箋、郵票、糧票、布票，數量很少，僅能作為品種代表展示一下；文革老照片有兩種，一種是新聞照片，有 300 餘幅；另一種是個人存放的老照片，有筆者本人的，也有近年來朋友送的。照片中顯現出來的文革時代人們的裝束以及精神風貌，無遮無掩，真實可信；文革中的文藝作品，也是我比較看重的藏品。特別是樣板戲，有劇本、劇照，還有部分唱片；美術作品有宣傳畫、漫畫、文藝刊物等；老唱片有膠木和薄膜兩種，內容有文革歌曲、毛主席語錄歌、老三篇朗讀片、配樂詩朗誦、相聲，更多地是歌唱紅太陽歌曲；歌本有正規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有群眾組織自行編印的，還有精美的手刻油印本，共計 50 餘本；中小學課本也是我的收藏內容之一。特別是河南省小學一年級的《毛澤東思想課》，體現了那個時代重視思想教育的程度；在我的藏品中，數量較多的是文革資料，現已按地區、種類、單位、專題進行數字化整理，其中不乏一些對文革研究有價值的資料，這裏不再贅述。

儘管我的收藏比較豐富，還稱不上收藏家，充其量只是個收藏愛好者。在我所知道的文革品收藏家中，雖然品種單一，如“像章”、“票證”、“門券”、“紅寶書”、“連環畫”、“宣傳畫”、“文革小報”等，但由於資金集中，精力集中，藏品數量多而且精美。而我由於年老體弱、家庭負擔重、資金緊張等因素，活動範圍基本限於鄭州地區，很少到全國其它地方去，也很少參加各地舉辦的“文革藏品交易會”，所以不僅精品較少，相對數量也不算多。最近出版的一本《文革小報目錄》，其中有文革小報 4000 餘種，顯然比我收藏的小報數量多。就文革資料而言，既不能和官方圖書館相比，

也不一定是個人收藏最多者。因為全國還有很多深藏不露者。在一份署名“瀋陽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三一郵電紅旗”的傳單中這樣寫道：“八三一編輯部專門收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各革命造反派出版的一切刊物，作為珍貴的革命文獻保存和供我總司戰士閱覽，請您大力協助。1967年10月30日（蓋章）”，由此可見，文革中就有人留意收集資料。

2001年7月，筆者購到一批署名“李懷通”的28本（8開）裝訂成冊的文革資料，其中有：《紅衛兵早期傳單》、各個時期的《領導講話》、《重要事記》、《戰報集》以及由所在單位（河南省醫藥公司）文革中十幾個群眾組織（包括初期的戰鬥隊）的成立宣言、宗旨、負責人、所辦油印小報（共有13種之多）和該組織主要大字報為內容的集子，時間跨度是1966年6月至1969年。其中一份該單位的“群眾組織演變示意圖”，簡直可以稱為文革研究的“化石”。為了弄清這批“文物”的來龍去脈，筆者幾經周折找到李懷通同志，如今他是一位古瓷器收藏家和藏書家。當問及這批資料為何流落市場時，他道出了實情。原來由於他有收藏意識，文革初期就著手收集傳單、小報等資料，通過不間斷的收集，最後終於整理裝訂成這28本集子。1969年底，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向各單位徵集文革資料時他無償捐獻了出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30年後這批資料成為我的藏品。

收藏過程也是對文革的認識、思考、研究過程。二十多年來，對於“文革”這個話題，許多人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文革親歷者沒有話語權；“文革研究”也只能在弱小的自由度內，在“強勢語言的解釋下”蹣跚而行，出現了“文革在中國，而文革學在國外”的扭曲現象。隨著經濟大潮的到來，人們關心的只是錢——“一切向錢看”！普通老百姓

為住房、為結婚生孩子、為養家糊口、為孩子上學，找門路當苦力辛辛苦苦流血流汗去掙錢；當官者為得到權、再把權變成錢、再用錢去升官去揮霍去享受去瀟灑走一回也是忙碌不堪。貧窮者想享樂，鋌而走險去“坑、蒙、拐、騙、偷”，有錢有權者腐化墮落去“吃、喝、嫖、賭、抽”，“五毒”、“十惡”充斥社會……。面對現實，人們不得不去從新思考文革。老百姓對屢禁不止愈反愈烈的腐敗現象開的處方竟是：“只有像文革那樣，放手發動群眾”；一些文革中受過衝擊甚至遭受冤獄之苦、曾經對文革耿耿於懷的老同志也開始對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進行理性的分析與思考；接受“正史”教育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中自發出現的文革研究者更是難能可貴。他們頻頻訪問文革的當事人，因為每個當事者心中都會藏有一本“文革史”；他們腳踏實地進行調查研究，帶著疑問聽文革當事者講故事：什麼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澤東為什麼寫“我的一張大字報”？老舍等知識分子究竟是誰整死的？武鬥的罪魁禍首是誰？文革既然是“浩劫”，為什麼國營企業迅速發展、國家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國際地位空前高漲？如何看待毛澤東對文革的評價“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文革成為互聯網上的熱門話題。

文革不可能成為被封存的歷史。許多親歷者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理解愈來愈深刻。經受過千災萬難磨礪的“革命造反派”中，仍有視信仰如生命，視金錢如糞土者，他們不會永遠沉默。筆者從一份資料中看到，因“造反罪”被判處20年徒刑的工人造反派領袖胡厚民（武漢“鋼工總”二號服務員、湖北造船廠工人、共產黨員）在法庭的被告席上竟然以兩首《法庭吟》作為最後陳述的結尾：“肉軀刀可斷，主義槍難滅。身首異處分，

魂尤信馬列”、“行至地獄入口處，當像遊子返故居。入黨當許獻終身，捐軀豈能頭反顧。一刀可將生命斷，萬槍難使真理屈。共產黨人誰惜死，敢擎方寸照環宇。”這兩首詩，折射出經過文革鍛煉的一代工人堅信馬列，面對坐牢、殺頭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光輝。儘管他已於90年代死於獄中，但他的精神一定會點燃沉默者心中的火種，去回顧，去思考，去疾呼，用自身經歷給後代講述文革的真實故事。這段歷史終究會揮去塵土，洗掉污垢，還其本來面目。

文革開始距今已近四十年了。討論、關注、研究文革的人越來越多。許多親歷者拿起筆來書寫自己的“文革史”。一位作家曾經對文革研究說過這樣的話：“首先必須對文革的過程和事件進行一種清理。文革像一頭極其巨大的象，我們每個人都只摸到它的某個局部。”我想，假如每個文革親歷者都去觸摸這頭“大象”，那麼局部就會變成全部。

歷史無情，歲月有痕。“文物”是歷史剝落的碎片，是時代的印痕。對於浩瀚歷史來說，它不過是滄海一粟，然而，却是歷史真實的見證。文革時代是極其崇尚信仰的時代，這個信仰就是毛澤東思想。“頭可斷，血可流，主席思想不可丟”就是當時的誓言；文革時代是火紅的時代，“紅心紅書紅旗紅袖章紅衛兵一紅到底”就是當時的寫照。《歷史的見證——文革文物展示》一書，試圖通過文物展示、圖片說明、講述文革故事，使後人得到比較直觀、系統的印象，感受紅色魅力，從而啓發他們去關注、分析、正視共和國的十年文革歷史。而對於文革親歷者，則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喚起他們沉睡的記憶，去回憶、思考自己的經歷，為文革研究留下寶貴的歷史資料。

2006年元旦

往事漫憶

文革中我是怎樣當上造反派的

文革開始時，我是河南農學院大三學生。1966年5月，我們在省著名土壤專家劉大同教授帶領下在鄭州花園口搞“稻改”實習。所謂“稻改”就是引黃河水淤灌後把鹽鹼地改水田種稻子的工程。現在聞名全國的“鄭州大米”就是“稻改”的成果。

6月中旬，我們接到回校參加文革運動的通知。回校後，首先看到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專欄，內容大都是針對教授、講師的。他們一個個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三家村”、“歷史反革命”等帽子，進行批判。當時，學生對老師的個人情況知之甚少，“歷史問題”大都是由幹部或教師揭發出來的，有不少公佈的是檔案材料。學生只是寫一些聲援標語和批判文章。在這種情況下，院、系領導給我們進行“補課”，動員我們向反動學術權威猛烈開火。那時候，在我的心目中，院黨委就代表光榮偉大正確的黨。所以，我是跟著院系領導的指揮棒，高呼“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口號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的。

1966年6—8月，我耳聞目睹了一些學生由於受到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影響向院系領導及工作組提意見而被打成“小右派”、“小反革命”、“小三家村”遭受圍攻、專欄批判、公佈檔案甚至被逼自殺的悲慘景象，對我觸動很大。1966年6月21日，我校畜牧系發生了學生公開反抗工作組的“6·21事件”：之前，工作組爲了整學生的材料，曾私扣私拆學生信件，引起少數學生的義憤。21日，少數學生針對此事自發組織了聲討大會，工作組阻撓未成，就把聲討會說成“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事件”，在全院開展對少數學生的批判鬥爭。批判學生的大專欄在校園內抬來抬去。“6·21”大會的參加者，或被圍攻、鬥爭，或被談話、威脅，工作組多次搞“生活會”，強迫學生檢查、過關。“6·21”大會主持人王德亮同學慘遭圍攻批鬥後，服安眠藥自殺（未遂）；有一同學因受到威逼、恐嚇，“精神分裂”住進醫院；還有一個同學因不承認“6·21”是“反革命事件”，不承認“受到蒙蔽”，遭到極大壓力，以至神經失常，半夜大哭大叫。這些情況讓我對校領導的信任產生了動搖。後來，我又聽到鄭州大學有一個團支部書記因給校黨委貼大字報被逼跳樓自殺身亡的消息。於是，正義感、同情心、革命熱情一股腦兒被調動起來，貼出了聲援受壓學生的大字報，毅然參加到同“走資派”鬥爭的行列。——就這樣，我開始“造反”了。

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公開支持少數派，並指出工作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隨之工作組開始撤出學校。但工作組的衍生組織“主席團”（有的學校叫“文革會”）在少數領導的支持下繼續整造反派，執行沒有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

綫。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我們學校的赴京學生代表幾乎都是從保守派“主席團”中選派去的。紅衛兵運動興起後，“主席團”把紅衛兵袖章發給保院系黨委和工作組有功的人，成立了“官辦”紅衛兵——“抗大”戰鬥隊。而各系少數派也紛紛自發成立紅衛兵組織，由於院黨委不給經費，只好自己掏錢買布做了紅衛兵袖章。農學院的兩派群眾組織由此產生。



筆者的“紅衛兵證”
1966年8月23日

從1966年8月至9月，少數派通過學習《十六條》，把鬥爭矛頭指向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強烈要求院黨委、工作組銷毀整群眾的“黑材料”，給被打成“反革命”的群眾平反等。而官辦紅衛兵却把“黑材料”視為秋後算賬“抓右派”的“證據”，藏匿於機要室。雙方就此展開辯論和鬥爭。在這一時期，我們把“四大”這一民主武器運用得淋漓盡致。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時身挎小喇叭在校園裏徹夜不眠大辯論的情景。那時候，每個人都有參加辯論的權利和退出辯論的自由。為了避免雙方以遭圍攻為藉口互相攻擊，我們在圍成圈辯論時留個缺口，以示隨時都可以退出辯論。我們學校的造反派隊伍就是在大辯論中成長壯大成為多數派的。

我所經歷的一次武鬥

毛澤東曾多次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然而，事物的發展總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由於文革初期當權派把提意見的少數群眾打成“反革命”，導致“革”與“保”兩派組織的產生，以至後來“勢不兩立”，“文鬥”變成了“武鬥”。毛澤東認為，凡是武鬥嚴重的地方，原因有三條：一是有走資派操縱、教唆；二是造反派內部混進了壞人，他們利用造反派的缺點、錯誤搞陰謀活動；三是群眾組織領導人的私心雜念，爭核心、爭席位和小團體主義、山頭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顯然，毛澤東是在總結全國範圍內發生在文革各個階段的武鬥後得出這個結論的。例如：1967年2月軍隊介入地方文革後，在不少地方支持一派，鎮壓另一派，有些地方甚至挑動農民進城圍攻造反派，引起大規模武鬥。革委會成立前後造反派組織鬧分裂、爭席位引發武鬥，等等。對於文革中的武鬥，毛澤東採取一反對，二不怕的態度。毛澤東認為，對武鬥不要看得太緊張，哪裏有武鬥，必然有後臺。讓他表演一下，越表演，越孤立，使群眾看得更清楚。群眾孤立他，事情就好辦了。文革中筆者曾親身經歷過一次武鬥，對毛澤東關於武鬥的論斷深有體會。

1967年春天，河南省的文革運動由於軍區的介入變得十分嚴峻、複雜。在“一月奪權”風暴中成立起來的河南

省最大造反派組織“河南二七公社”遭到軍區的殘酷鎮壓。後來，毛主席指示要求河南雙方（包括軍區認為是“反革命”的一方）到北京彙報，解決問題。省軍區爲了壓垮二七公社，使其不能赴京參加彙報，從67年3月至7月，公然逮捕二七派的頭頭、軟禁支持二七派的領導幹部，強迫二七派的基層組織解散、請罪，還支持“公安公社”（公檢法組織）、“十大總部”多次挑起武鬥，致使二七派死傷慘重。其中焚燒國棉六廠大樓的“5·30”流血事件最爲慘烈。在這一武鬥事件中，“十大總部”、“公安公社”調動數萬不明真相的工人、群眾圍攻鄭棉六廠工人赤衛隊（二七公社骨幹組織）所在大樓。先是斷水斷電，然後動用消防車、推土機、吊車撞樓、推樓、潑汽油放火燒樓，最後用棍棒、石頭、鐵鉤等毆打守樓的二七派工人，致使5人死亡，30多人受重傷，200多人被送到農村勞改。據一份參加武鬥的部分車輛調查資料披露：此次參加武鬥的車輛中，省委指揮汽車2輛（長卡斯69型，車號19-0008、卡斯51型，車號19-01387），車上裝有手搖警報器、鐵棍、石頭，曾5次拉響指揮進攻警報；小轎車4輛（黑色轎車，車號19-00432、波蘭轎車3輛，（車號分別爲19-01203、19-01382、19-00371）；軍車3輛（中吉普戊3-13-18、戊3-10-17；轎車戊3-10-01）、公安車1輛（車號19-40007）、消防車3輛、5噸起重機1輛、10噸吊車1輛、推土機2輛、解放牌汽車3輛、卡車4輛（拉繩子用）、救護車3輛。從武鬥動用車輛情況上看，沒有當權派的支持，這些小轎車、軍車、公安車是不可能動用的。“5·30”武鬥流血事件教育了群眾，北京和全國革命派聲援河南二七公社的聲音不斷傳來。6月，周總理親自主持的河南省赴京彙報會傳來“大局已定，二七必勝”的大好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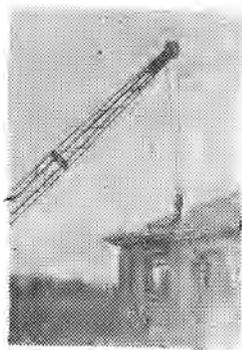
二七派倍受鼓舞，決心堅持最後鬥爭，迎接勝利曙光的到來。當時，我所在的群眾組織“二七公社豫農紅總”，在經歷了解散、請罪、抄家等種種白色恐怖後，組織已經恢復，並被譽為“二七公社的解放區”。當時的我，常常為自己是“堅強的二七戰士”而自豪。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我再次到平頂山特區串聯，傳播北京消息，鼓動二七造反派儘快恢復建立組織。在這裏親身經歷了一次類似鄭州“5·30”的武鬥事件。

平頂山是五十年代興起的中國煤炭基地，煤種多，質量好，是發展鋼鐵、電力的優質燃料，六十年代曾被定為特區。由於平頂山距我的家鄉魯山較近，再加上我的哥哥在此工作，所以四、五月份我就去那裏串聯過，對平頂山的文革情況有初步的瞭解。1967年2月，平頂山駐軍和武裝部介入地方文革後，勒令解散了平頂山高中“東方紅”、特委機關“新籌委”、選煤院“文革會”、文工隊“紅藝兵”四個造反派組織。接著，以“公安公社”為首的保守勢力對造反派進行鎮壓。4月份我來到平頂山時，造反派仍處於受壓狀態，不敢公開活動。由於武裝部、駐軍和“公安公社”對二七公社的醜化宣傳，給“二七公社”扣上“反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等帽子，還顛倒黑白地把鄭州的武鬥說成是二七公社所為，所以，大街上經常出現圍攻、毆打二七觀點學生的現象。後來聽說郊區有一個廟後村，“二七”觀點的人佔多數，我和同時在平頂山串聯的鄭州大學李松勝等同學一起到廟後生產大隊，成立了農村二七造反派組織——“勁松”戰鬥隊。白天，我們在農民家吃飯、商量事情，晚上，怕為防止鄰村保守派的“襲擊”，大隊部派民兵在我們的駐地站崗、放哨。就這樣，我們以廟後村為落

腳點，到市內的學校、工礦串聯，瞭解情況。有時找不到“自己人”，連飯都吃不上，經常餓著肚子跑來跑去。後來，我認識了平高東方紅的王海龍、馬德昆以及工礦企業的胡金山、徐明德等人。4月中旬，在首都紅代會赴平串聯學生和解放軍赴豫調查團的支持下，煤校“中南海革命造反總部”和高中“東方紅”提出了“堅決踏平公安公社”的口號，公開進行抗爭。

第二次到平頂山是在1967年6月初。住在煤校“中南海”所在的教學樓上。這時候，“平頂山二七指揮部”已經成立，總部就設在這所樓上。6月10日，跨單位保守組織“平煤總”成立後就和“公安公社”一起，不斷製造藉口，挑起事端，企圖壓垮“二七指揮部”。煤校“中南海”一號服務員叫李養璋，採煤專業學生。他信念堅定、性格率直、激情澎湃，我們很快熟悉並成了同志、戰友。我們和王海龍、胡金山、徐明德、項雨田等人多次在煤校分析形勢，商議成立“平頂山二七分社”的有關事宜。

6月26日清晨五點多，樓房裏忽然一片漆黑，樓下面鬧鬧嚷嚷，樓上住的同學從夢中驚醒，大家意識到這是有人故意斷電。接著，聽到校門口汽車聲、口號聲響成一片：“誰反對解放軍，就砸爛誰的狗頭！”、“‘中南海’不投降，就叫他滅亡！”、“堅決鎮壓反革命！”……從窗口向下看，黑壓壓一片人群把教學樓包圍。大約6點鐘，我隱隱約約地看



的情形。
← 暴徒用重刑吊车破坏楼房

“6·26”事件照片(《中南海》報第13期1967.8.19)

到從小轎車、吉普車上下來的人一面指揮著人群，一面仰起頭向樓上喊話：“受蒙蔽的同學快下來，反對解放軍沒有好下場！”……我馬上意識到，這是來“圍剿”二七造反派了！事情緊急，不容思考。大家自覺地集中到合班大教室裏，從窗戶向外喊口號：“要文鬥，不用武鬥！”、“堅決維護中央《六·六》通令！”、“堅決揪出挑動工人鬥學生的罪魁禍首！”……雙方就這樣對峙著。大概上午10點鐘左右，我看到了遠處開來的消防車、推土機和吊車，心裏咯噔一下：難道鄭州“5·30”事件會在這裏重演嗎？果然，中午時分，大吊車撞倒校門，衝進院內，消防車也接踵而來。教學樓的頂部發出陣陣轟鳴，走廊的門窗、牆壁震得嘎嘎作響，水泥碎塊從天花板上掉下來，我們從四樓被趕到三樓、二樓、一樓大廳。這時，消防車開過來，用高壓水龍頭向我們身上猛澆，面對強大的水柱，我們手挽著手，喊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只要打不死，還要幹革命！”的口號，含淚高唱：“抬頭望著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衣服濕透了，密集的石塊劈頭蓋腦打來。接著，頭戴安全帽手持棍棒的工人衝進大廳，一邊驅打我們，一邊說：“誰叫你們反對解放軍？！”同學們被石塊、棍棒打傷，鮮血淋淋，不得不抱頭向樓外衝。就在這時，不知誰在我的頭上戴了個安全帽（可能是煤校的同學，他們下礦井實習用的），棍棒打在安全帽上，又從安全帽落在我的肩上，約摸挨了十幾棍才衝到大門口。這時候，大門口停放著幾輛軍車，受傷的人都被解放軍戰士拉到汽車上，然後送到一個駐地，包紮、治療。記得和我同住一室的有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是礦務局中學初中學生，傷勢比較重，頭部縫了6針，我只是右肩軟組織損傷。當時我是個很不起眼的“醜小鴨”，根本不像個

大學生，假如他們知道我是鄭州來串聯的大學生，可能就更慘了。

後來得知，給我們治療、養傷的駐地是解放軍炮兵二師（8221 部隊）獨立 51 團團部。我們在炮團住了大約一個星期，和團政委于光生也熟悉了。炮二師師部設在河南省駐馬店地區確山縣，是河南省最早支持造反派的駐軍之一。中央對河南問題表態後，炮二師師長蔡鐸擔任平頂山軍管會主任職務；1968 年 2 月，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師政委李中順擔任了省革委常委；副政委宋寶芝擔任平頂山市革委會主任。

平頂山“6·26”事件，完全是鄭州“5·30”事件的翻版。據資料披露，早在 6 月中旬前後，“平煤總”、“公安公社”就先後 4 次到鄭州學習“武鬥經驗”，並邀請鄭州國棉六廠同觀點組織宣講“攻樓戰術”，同時就如何攻下“中南海”大樓，提出幾種方案。6 月 20 日以後，“平煤總”總指揮通過礦務局各單位當權派調動汽車，準備吊車配件。6 月 23 日，煤校和“中南海”對立的“延安兵團”先將辦公樓前的圍牆推到，準備為攻樓打開方便之門，然後撤離學校……。

多行不義必自斃。“6·26”武鬥事件之後，平頂山周圍縣市的人民群眾，全區男女老幼來到武鬥現場，看到牆倒頂塌、門窗被砸、書冊狼藉、擊痕處處、血衣件件，教學儀器散落在地，無不義憤填膺！“二七公社打砸搶”的論調不攻自破。平頂山地區文革形勢也發生了根本變化：許多幹部、工人、群眾對二七派學生由同情變成了公開支持，有的還毅然參加了本單位二七派組織。

1967 年 7 月 10 日，中央發出了解決河南問題的（67）216 號文件，指出河南省軍區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綫性錯誤。

1967年8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平頂山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在《關於所犯錯誤的檢查》中說：“我們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給平頂山地區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嚴重損失。我們對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黨中央，對不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對不起平頂山十八萬人民。2月



筆者收藏的印章

份我們介入平頂山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正趕上‘鄭大聯委’和河南‘二七公社’以及平頂山相同觀點的組織，激烈反對河南省軍區2月3日的《嚴正聲明》，堅決抵制軍區錯誤路線。當時我們在省軍區方向路線影響下，錯誤地認為反對軍區聲明，就是把矛頭指向解放軍，就是反革命復辟逆流。我們全盤否定了大方向正確的一月份的革命造反派奪權，進行武裝遊行，十輛宣傳車上街，大造輿論，向革命造反派示威，抓了‘鄭大聯委’負責人之一王殿方同志等人，壓制和打擊了革命造反派，錯誤地支持了‘公安公社’等一些保守組織。3月7日，在河南軍區宣佈‘鄭大聯委’為非法組織之後，我們也跟著錯誤地擅自宣佈平頂山高中‘東方紅’、特委機關‘新籌委’、選煤院‘文革會’、文工隊‘紅藝兵’等4個造反派組織是受‘鄭大聯委’領導和他們的外圍組織，勒令他們立即停止一切活動，解散組織，並到支左辦公室登記，甚至迫使他們的領導人進行所謂檢查、揭發，而且灌製錄音在全區各地播放。我們的這一嚴重錯誤，在全區造成了惡劣影響，引起了連鎖反應，使得不少相同

觀點的革命群眾組織受到壓制，甚至被擠散壓垮，從組織上、政治上嚴重地打擊了革命小將和革命造反派……。”

平頂山支左部隊馬政委 1967 年 8 月 31 日晚在 17 級以上幹部會議上宣讀了《檢查》之後，講到“6·26”事件時說：“6·26”事件值得我們深思，40 噸大吊車上大吊杆是前幾天就換上的，不是臨時發生的，武鬥雙方都是我們的同志，他們無罪，背後操縱者終有一天會搞清的。

碰巧的是，30 年後，我在收集文革資料時發現一份《平頂山 6·26 事件調查報告》。該報告詳細記載了“6·26”事件中參加指揮的“當權派”單位、名字以及出動汽車種類、車牌號碼以及受傷人名單、傷勢情況等。據《調查報告》記載：這次武鬥共出動車輛 51 部，其中有小轎車、吉普車、卡車、消防車、大型吊車；指揮和帶領本單位人員參加武鬥的有：公安局副局長、礦務局副局長、處長、保衛科長、礦黨委書記、武裝部長、正副廠長、辦公室主任等各級當權派有名有姓多達 92 人。參加武鬥人員多達 2 萬人。《調查報告》還附有被打傷住在炮團的 149 人名單及傷勢情況（沒有包括 8221 部隊醫院和郊區醫院以及輕傷沒有住院者。）名單上大部分是煤校“中南海”的同學，也有高、初中學生和少數工人、幹部。筆者的名字也在其內（見圖）。

究竟誰是武鬥的罪魁禍首？誰搞“打砸搶”？我所親歷的“6·26”事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在

姓名	傷情
郭照榮	面部裂傷
楊香芳	右面部皮軟挫傷
孟香云	头部裂傷、右肩部軟組織損傷、輕度腦震蕩。
陳廣民	背部軟組織挫傷。
武彩雲	右肩部軟組織挫傷。
狄同元	右額軟組織裂傷。

6·26 事件《調查報告》(續表四)
傷員名單 (局部) 1967 年 12 月

文革結束後的“揭批查”中，却把武鬥的帽子統統扣到造反派頭上。“6·26”事件的受害者成了“打砸搶”分子被革職、判刑。煤校“中南海”頭頭李養瑋的遭遇就是典型例子。

“6·26”那天，李養瑋在混亂中帶傷逃了出去，到鄭州向“二七公社”彙報情況。李養瑋出身於舊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爺爺李子培是很負盛名的書法家，精於小楷，長於大楷，妙於行草，尤其擅長魏碑，是開封書壇“魏碑三家”之一，60年代應晉寶齋之邀在北京舉辦個人書法展，曾轟動一時。1964年受文化部之托到鄭州為焦裕祿展覽書寫展板。1966年冬，李養瑋大串聯回家時，73歲的爺爺在病中為“曆京粵滬漢進行串聯的養瑋孫”題寫《打退牛鬼蛇神勝利凱旋》的條幅。這剛健沉雄的題字，怎能不激勵李養瑋以極大的熱情投身到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呢？文革中李養瑋曾擔任平頂山市紅代會主任、市革命委員會委員職務。1968年畢業離校後當了煤礦工人。後來因為家庭社會關係複雜因素，沒有被提拔重用。“揭批查”中，以文革“打砸搶”罪被判刑十年。出獄後，沒有工作，沒有工資，沒有任何生存條件，只好靠妻子兒女生活。妻兒下崗後，已經年近花甲的李養瑋却又“上崗”——到煤礦當老“打工仔”挖煤去了！

這正像老百姓說的：武鬥者升官，挨打者坐監；造反一陣子，挨整一輩子。

紀登奎被“搶”記

文化革命中，紀登奎曾被二七公社“豫農紅總”、鄭大“附中紅旗”造反派組織從軟禁中“搶”出來，偷送到北京。以下是這段“傳奇”的背景和始末。

1966年8月，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寫了一張大字報，支持鄭州大學少數造反學生。對此，時任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的紀登奎持積極態度。9月初，劉建勛調到北京市委工作，文敏生代理省委第一書記，紀登奎分工負責大學文化革命工作。到66年底，河南各大專院校無產階級革命派已取得絕對優勢。其間，紀登奎態度明朗，做了不少工作，



文革中的紀登奎（1968年）

造反派親切地稱他為“老紀同志”。67年1月奪權時，文敏生、紀登奎等省委領導明確表態：“革命造反派奪權，堅決支持，保守派奪權，堅決頂住。”可是，省軍區的介入，破壞了這種局面：劉建勛、文敏生、紀登奎成了“走資派”；造反派組織“河南二七公社”受到鎮壓；軍區支持的“河南造總”、“十大總部”喊出“打倒劉、文、紀”的口號。在這樣的情況

下，省委工作基本癱瘓，文敏生稱病住進醫院，紀登奎被“省委造總”軟禁起來，多次挨批鬥，被扭住胳膊“架飛機”成了紀登奎的家常便飯。

1967年5月，河南雙方代表在北京彙報期間，周總理多次要求支持二七公社的領導幹部代表來京參加。可是，在軍區的控制下，支持二七的領導幹部有的被逮捕（如蘭考縣委書記張欽禮），有的被軟禁（如紀登奎等），而大多數則迫於軍區壓力不敢公開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簡稱“豫農紅總”）負責人范念民等十分焦急。恰在這時，《紅旗》雜誌第四期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革命幹部》發表了。通過學習，他們認識到：對於“走資派”要敢於造反；對於革命領導幹部，要敢於保護。於是，一個籌劃“搶”革命領導幹部的行動開始了。

1967年5月15日，得知省委副秘書長張耀東在省委大門口看大字報的消息，范念民親自帶上十幾個人和一輛卡車朝省委奔去。到了那裏，汽車停在一旁，范下車後裝作看大字報的樣子和張耀東站在一起，悄悄地對張說：“到我們學校看看我們的大字報吧？”張說：“可不敢，我出門登了記，有人管著我哩！”這時候，范看商量不通，就示意車上的學生實行另一套方案。這時候，只見有兩個學生突然跑上前去抱住張耀東，把他推到汽車駕駛室裏，張耀東喊道：“農學院搶人了！”汽車鳴地一聲開走了，張耀東的喊聲被淹沒了……。張耀東到農學院後受到很好的接待，負責看管他的學生反覆向他宣傳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彙報的情況以及鄭州發生的一些事件的真相。本來就跟著劉建勛一起支持過造反派的張耀東，兩天後發表了支持二七公社的《我的聲明》。

“搶”張耀東的成功，使范念民等對早已醞釀好的“搶”紀登奎計劃更加有了信心。1967年5月17日大約11點，鄭州大學附中的一位同學氣喘吁吁地跑到農學院對范念民說：紀登奎被批鬥後，剛剛被送到省委北院西一字樓，因為大會還沒有結束，現在也沒有人看管……。鄭大附中離農學院很近，這些“紅旗”小將們經常到農學院串聯，他們中多是省委幹部子女，對省委大院和省委領導比較熟悉，所以范向他們佈置了“任務”：打聽到紀登奎的情況，及時通報。范念民聽到這一情況，感到機會難得，時間緊迫，倘若去遲，“十大總部”散會返回，或“省委造總”警衛看守人員趕到，事情就難辦了。事不宜遲，范念民迅速通知人員、準備汽車。鄭大附中紅旗的幾個學生也趕到了。根據這一同學的描述，范念民簡單畫了草圖，商量的方案，就出發了。

汽車到省委北院的北門附近，按約定提前滅火，悄悄停在西一字樓後邊牆根，很不顯眼。車上幾十名同學按預定分成三組：第一組佔領傳達室，控制電話；第二組留守汽車，等待接應老紀；第三組下車後直奔西一字樓紀登奎住處。

西一字樓坐北朝南，北邊靠馬路。按照方案紀登奎下樓後從臨街的廁所窗戶上跳牆出來，可是實地一看，廁所的窗戶上有鋼筋，人根本出不來，有同學看到樓東邊後牆上靠著一輛架子車，正好是一木梯子。真是老天配合。這時，幾個人已經把紀登奎從樓上抬了下來。老紀很配合，疾步走到梯子旁邊，幾個學生從“梯子”上把他推過牆去，牆外車上幾個同學順勢接住，頃刻間，汽車隆隆兩聲，箭也似地飛去。從進去到出來，總共不超過十分鐘。

接著，范念民和 20 幾名同學分成幾股，步行回校。走到省委黨校門口，看到從後面追來的吉普車上跳下來幾個手拿木棍的青壯年，范喊了聲：“分散，快跑！”，大家才沒有被抓住。後來，聽說 5 個附中學生被“省委造總”拉走，痛打一頓後送到農村管制勞動。

事後，到樓上“搶”老紀的同學說，剛剛坐罷“噴氣式飛機”的老紀，看見學生來，以為又是來鬥他，習慣地從枕頭下取眼鏡和筆記本，忽然一側身，認出了是農學院的幾個同學，吃驚地往後退了一步。學生忙說：“別怕，我們接你去農學院，你去不去？”老紀果斷地說：“走！”時間緊急，不容多說，抬起老紀就往樓下跑……。

紀登奎被秘密安排到農學院一號樓三樓一間屋子裏，和張耀東一牆之隔，但彼此沒有見面。同學們給紀登奎送吃送喝的同時，還送去很多材料，如：北京消息、各地支持二七公社的聲明等。紀登奎迫不及待地認真閱看材料。

紀登奎被“搶”一事很快被“省委造總”發現。他們立刻組織宣傳車，用高音喇叭在農學院周圍高喊：“憤怒聲討二七公社的滔天罪行！”、“如不交出紀登奎，就要採取革命行動！”、“二七公社不投降，就叫它滅亡！”等口號。軍區第二政委何運洪更是恐慌，不知道二七公社還會“搶”誰，急忙把其他領導幹部轉移到豫西山區“保護起來”。後來，周總理點名何運洪把王廷棟（省委副秘書長）、張欽禮（蘭考縣委書記）送到北京時，王是從盧氏縣出發，張是從看守所出來的。

紀登奎被“搶”到農學院的當天晚上，鄭州火車站被封鎖，主要道路設置攔截障礙，新鄉、安陽等地還設有“檢查站”。護送老紀上北京的任務更艱巨、更危險。農學院紅

衛兵總部加緊部署護送老紀去北京的計劃。

5月17日晚上，紀登奎裝扮成鐵路工人模樣乘坐拉煤的火車，被幾個同學護送到北京（詳見附件）。接著，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其昌也被新鄉師院“八·一八”同學“搶”出來護送到北京。本來是周總理指示要紀登奎等去北京參加彙報的，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却用這種方式到了北京。

據當事者回憶，紀登奎到北京後，先被送到北京航空學院，住在一間教室裏，沒有床鋪，睡在鋪著稻草的地上。為安全起見，兩天後，又被轉到北京醫科大學的一間實驗室裏，由開封師院“八·二四”學生黃澤生等負責飲食起居，準備彙報材料，並和劉建勛取得聯繫。幾天後，紀登奎被劉建勛派車接到西苑旅社，參加了河南三方彙報。

紀登奎被送到北京和張耀東聲明支持二七的消息像一股春風，吹遍了鄭州，吹醒了河南。許多跟著劉建勛支持造反派，後來迫於軍區的壓力不敢公開表態支持二七公社的領導幹部，開始活躍起來，紛紛“亮相”支持二七。

67年7月，北京三方會談結束，中央表態：河南省軍區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綫性錯誤；河南二七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劉建勛是革命領導幹部。8月，劉建勛、紀登奎回

“空城”救老紀
五月十七日上午十一
時正。
一幅綠色下車從農學院
駛出。汽車經過農學院，
從花園路直奔行政區。
汽車流風似的向前飛
馳，車上四十名二七戰士
个个英姿颯爽，人人精神
煥發。大家的心情就象張
緊了的弓弦，緊張而又鎮
定。大家清楚地知道，省
委造總為了監禁紀登奎同
志，隔絕老紀與革命群眾
的聯繫，已經是挖空心
思，費上了九牛二虎之
力。今日又在搞聲東擊
西，想讓我們上當撲空，
誰知這個把戲露了餒，
給我們造成了智擒老紀的
好機會。我們就將計就
計。來一個“空城”救
老紀，給他一個措手不及。
越想大家越感到機會之
難得，越感到時間之短促，

紀登奎脫險記
北斗星
(三)

原載《新農院》1968.8.3

到河南籌備河南省革命委員會。68年2月，省革委成立，劉建勛擔任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紀登奎等擔任副主任。

有關紀登奎被“搶”到農學院後的情況以及被送走的經過，請參看附件：1967年8月27日《新農院》報上連載的《紀登奎脫險記（四）——闖關破險赴京城》一文。

註：紀登奎，山西武鄉人。文革前曾任河南省許昌、商丘地委書記、洛陽礦山機械廠廠長、河南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1967年8月，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路過鄭州時，在專列上接見了劉建勛、王新、紀登奎。毛主席說：“你是紀登奎，老朋友了！聽說你被‘架飛機’100多次？”紀登奎回答：“大有好處！”毛澤東比紀登奎大整整30歲，為什麼稱他為“老朋友”呢？原來，解放初期紀登奎任許昌任地委書記時，曾單獨向毛主席彙報過工作，後來主席幾乎每次到河南，都要把他找來，聽彙報，問情況。截止到文革前，有十三次之多。作為一個基層幹部，能有這樣的機遇，足見毛主席對他的賞識和器重。毛澤東對紀登奎“大有好處”的回答十分滿意。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對批鬥會“架飛機”的錯誤做法認可，而是領導幹部對群眾運動的態度問題。文革中，許多老幹部對毛主席為了“防修反修”而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不理解”，對自己受到衝擊耿耿於懷，甚至成為運動的阻力。而紀登奎却把被批鬥看成群眾運動對自己的鍛煉和考驗。所以，“九大”會議上，毛主席親自指定紀登奎代表“革命幹部”發言，並當選為中央委員。在隨後的“九屆一中全會”上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後“十大”、“十一大”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等職。毛主席去世後，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

中全會上，辭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職務。1988年7月1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附件：紀登奎脫險記（四）——闖關破險赴京城

北斗星

汽車載著勝利的凱歌回到農學院。

老紀一下車就被廣大二七戰士圍了起來，伸過來一雙雙溫暖的手，迎來了一張張親切的笑臉，大家問長問短，熱情萬分，那老紀更是激動，他只是緊緊地和同志們握手，感動的話都說不上來，一串串豆大的熱淚奪眶而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綫把大家聯繫在一起，革命使我們成爲戰友，革命使我們成爲真正的同志。“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爲了一個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毛主席的諄諄教導，我們雖然讀了千遍，但從沒有像今天感到這樣親切。

這樣親切的情景，和兩小時前老紀在市體育場坐“噴氣式”飛機時對比起來是何等不同啊！真是幾步之差，却是另一個新天地。

老紀上了二七大樓以後，第一句話就說：“遺憾的是我的材料沒有帶來！”。大家問老紀需要什麼，老紀說：“我被監禁鬥爭幾個月，外邊的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我最需要聽聽黨中央毛主席的聲音，看一看中央有哪些新的指示。”在這最緊張的時候，老紀想到的是毛主席、黨中央，想到的是對敵鬥爭。總部把“中央軍委十條命令”、有關安徽問題的五項指示、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等重要文件馬上給了老紀，老紀如饑似渴地看了起來。

下午，大家根據形勢的分析和鬥爭的需要，決定馬上送老紀去北京，參加北京“三方彙報”會，並且決定當天晚上就走。

消息傳出後，紅總戰士的心情都緊張起來。鐵路已被軍區何運洪控制，交通要道也已經被封鎖，農學院也處在層層包圍之中，闖關破險赴京城真是危險啊！大家無不為今天的行動擔心憂慮。

夜，降臨了。農學院的燈光依然輝煌。大家都在關注著農學院二七大樓的行動。都在猜測著紅總作戰部的巧妙安排。

晚上十點中，農學院的所有路燈突然熄滅了。頓時院內一片黑暗。這時二七大樓上的高音喇叭喊了起來：“電工李師傅，請趕快修理路燈！”

伴隨著電燈的熄滅，從二七大樓前開過來兩輛滿載著人的卡車，緊接著，汽車鳴著喇叭開出了農學院，一輛朝北，一輛朝南，箭也似的飛去。大家想著，汽車速度快，又有人包圍，衝破包圍圈還比較容易。大家為老紀安全擔憂的緊張心情有點緩和。不料想汽車走後，又從二七大樓過來了三十輛自行車，那自行車十輛一組，一前、一中、一後，各自相隔二三十米，相繼出了農學院。自行車的出動，使大家又議論起來：老紀到底是怎麼走的？

半小時以後，兩輛汽車分別返回學校，車上還是滿載著人。大家就肯定老紀肯定是騎自行車走的。

再說三十兩自行車從農學院出發後，沿小道駛向鄭州機務北段，前十輛車是前衛組，後十輛車是後衛組，老紀坐在中間一組“紅總”作戰部負責同學車子的後坐上。他頭戴鴨舌帽，身穿工作服，已是一個工人的打扮。當快接

近機務北段的時候，前衛組打鈴報警，大家抬頭前望，有一隊汽車直衝過來，“馬上隱蔽，準備戰鬥！”一聲令下，大家隱蔽在附近麥地。只見滿載著手持長矛人的三輛卡車飛馳而過。

前衛組走到車站，到了約定地點却找不到聯絡人，我方聯絡人在焦急的等待。突然，從側面過來一隊手持凶器的警衛隊：“幹什麼？是不是想扒車？什麼觀點？”“過路的，自行車壞了，修修車。”聯絡員作了機警答復。過了片刻，聯絡員來了，迅速把老紀和幾個護送老紀的負責人帶到機務北段“八一革聯”，研究赴京的具體事項。

不一會，“八一革聯”的負責同志出來了，老紀跟在後邊。只見老紀左手提燈右手拿錘，成了一副鐵路工人模樣。大家分別爬上已挂上車頭的列車，幾分鐘後，一聲汽笛長鳴劃破了夜空，列車拖著濃濃的長烟，向著北京方向奔馳而去。

五月的夜還有些寒意，列車上的風還有些刺骨，坐在敞車上的同志們却感到無限溫暖。大家知道，每走一秒鐘都要和毛主席近一步，車輪轉一圈都與勝利更近一分。大家望著明亮的北斗星，內心激起了對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無限懷念的波濤。“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們二七戰士想念您！”……幾十名戰士的心啊，早已飛向毛主席身邊。

列車接近安陽車站，機務北段“八一”革聯跟隨的工人同志向大家發出命令：“安陽快到了。安陽是一個控制嚴密的檢查站，大家要提高警惕！”同志們的心情開始緊張起來。大家清楚地知道，多少首都紅代會戰士在這裏被拉下車去慘遭毒打，多少二七戰士在這裏被搜、被查、被關起來監禁。根據歷來的教訓，大家作了準備。

列車開入安陽車站，果然是真的。一隊隊手持長矛、

頭戴安全帽的“武士”正在等待。列車停住後，他們迫不及待地跳上各個車廂，進行搜查盤問。這時老紀早已跳下了火車，在叮叮噹噹地敲打車輪。在這些勇敢機智地二七戰士面前，再嚴密的搜查也不過是一陣徒勞的空忙。

爲了安全到京，平常用不上一天的路程，他們輾轉換車却走了兩天。貨車無餐車，他們就頂著餓肚皮；下雨無雨衣，他們就擠在一起集體朗讀毛主席語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二七戰士，天塌壓不垮，地裂不能移，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一切困難、艱險以及階級敵人的破壞，在他們面前注定要失敗。

黑暗過去，曙光在前。他們迎著萬道霞光，飛馳到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的身邊。

紀登奎同志脫險的喜訊，很快就傳遍鄭州和全河南，有多少神話般的傳說在群眾中流傳著，人人爲二七戰士敢革敢保、勇敢機智的行爲豎指叫絕。而省委造總在老紀被搶之後，喪魂落魄，恐慌萬分，他們把自己所管制的幾百名領導幹部連夜送到盧氏山區，鎖在窑洞裏，設上“重兵”看守，還設警犬警衛。哈哈！二七戰士在政治上的勝利已逼得他的敵人走投無路了。

原載《新農院》報 1968年8月27日

父親寫春聯的故事

在我最早的記憶裏，最開心、最有價值、最要緊的要算看父親寫對聯的事了。

我家住在魯山縣沙河岸邊一個小村子裏。解放前，由於交通閉塞，文化落後，貼春聯時把“槽頭興旺”貼到“鍋灶”上確有其事。由於我父親從小就去縣城綢緞莊（魯山柞蠶絲綢店）當“相公”（現在稱店員），練得一手毛筆字，成了村上的“秀才”，逢年過節，全村寫對聯的事自然落到父親身上。那時候我不過六七歲，寫春聯的事至今記憶猶新。

每年從臘月二十開始，我家的小院裏就熱鬧起來。屋裏屋外打掃得乾乾淨淨，堂屋桌子上擺放著文房四寶（筆、墨、紙、硯），鄉親們滿面春風，夾著大紅紙，陸陸續續到我家來。父親寒暄幾句之後，便極熟練的裁好紙，提筆蘸墨，龍飛鳳舞，一張張門對、喜貼躍然紙上，擺滿了小院。我呢，一會兒幫父親磨墨，一會兒展紙，快樂地像小鳥一樣，跳來跳去。當然，也有不快樂的時候，如把墨汁弄灑了，踩住對聯了，少不得挨父親幾句罵。就這樣，我家一直忙到二十七、八。當家家門上貼上對聯、爆竹聲聲、歡聲笑語新年開始的時候，父親坦然地笑了。笑的那麼愜意，那麼滿足。

父親寫的春聯內容非常豐富。有文雅的：“松竹梅歲寒三友，桃李杏春暖一家”、“一冬無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有通俗的：“紅紅綠綠花花樹，白白青青處處烟”、“向

陽門第春光好，勤儉人家喜氣多”；有傳統的：“門臨大道財源廣，樹對青山聽鳥音”、“春滿乾坤來瑞鶴，花開錦綉照青松”；還有現代的：“共產黨恩比天高，毛主席情深似海”；“吃水不忘打井人，幸福常記毛主席”。

除門聯外，還要寫許多吉利喜貼。院子裏“滿院春光”；大門外“出門見喜”；衣櫃上“錦衣滿箱”；堂桌上“福祿禎祥”；廚房裏“小心燈火”；水缸上“川流不息”；糧囤上“年年有餘”；牲口棚裏“槽頭興旺”；石磨上“白虎大吉”；樹上“樹木興旺”等等，不一而足。

寫春聯是老傳統，免不了有些封建色彩。父親在寫春聯時，總還要寫一些關聖帝君、增福財神、天地衆神、宗親歷代等各種牌位。灶王爺是家家都供奉的。“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生動的道出灶王的功績。土地廟家家都有，解放後破除迷信扒掉了，但家家仍要貼紙牌位，然後寫上對聯：“千處有求千處應，一方誠敬一方靈”。說到土地神，父親還給我講過一段故事：據說當年土地爺被玉皇大帝封為“宏門大進”的大官，可他錯聽成“逢門就進”，於是，家家都有了土地廟。

父親寫對聯，還很會跟形勢，趕時髦。至今我還記得1958年大躍進時父親在公社食堂門口寫的“食堂巧煮千家飯，公社飽暖萬人心”的對聯呢！

父親一生寫的對聯無計其數，只有一副深深刻在我的心裏：“竹不如花青且雅，蘭雖似草秀而香”。這副對聯，對仗工整，寓意深刻。你看那竹，雖不如鮮花那樣嬌艷，却四季常青，自有雅致；你看那蘭，雖像草一樣，却是那樣秀麗，且散發出縷縷清香。這竹，這蘭，就像父親平平淡淡的人生，雖沒有繁花似錦，轟轟烈烈，却為他人、為

社會默默奉獻。父親去世一年多了，看到人們過節寫春聯的情景，我不由得想到父親，思念父親。

父親寫對聯的故事，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想，以後無論時光多麼久遠，只要我看到對聯，就會想到父親的。

1984年元月 春節前夕

註一：我的父親武洪範，河南省魯山縣城西五里頭村人。1913年10月6日（民國二年農曆九月初七）生，1982年10月7日（農曆八月二十一）因患腦血栓去世，享年69歲。

註二：這篇短文原存於《八年日記》。1994年春節前夕，正值寫春聯的時候，我又想到父親，就抄錄出來，略加修改，作為稿件投向《鄭州晚報》社，後以《父親與對聯》為題登載在《鄭州晚報》（1994.2.5）副刊第七版上。

讀了于光遠一篇文章之後

最近，我們從網絡上讀了于光遠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讀了余秋雨兩篇自白之後》。余秋雨的兩篇文章是針對余杰的《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而寫的。而于先生的文章是應《深圳週刊》某人之約，對余秋雨的文章發表高見的。于先生是泰斗級的人物，我們作為社會最底層的一介草民，本不敢對其大作評頭論足的。可是，讀了于先生這篇文章之後，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只好斗膽在這裏說幾句心裏話，不知是否會以“人還在，心不死”之名而招惹禍端。

我們認為，余杰的文章是敦促余秋雨懺悔的，而于先生的文章給我們的感覺是要把余秋雨這個“文革餘孽”揪出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文革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于老先生說他“對文革期間一般造反派的興趣倒是不小的”。於是，由余秋雨的文章想到文革中的造反派，繼而又想到清算文革“罪行”時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清查“三種人”的運動。什麼是“三種人”？于老先生的文章中說的再清楚不過了（這也算是在給八十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人補上一課吧）。于老在文章中寫道：回想起 1983 年，有一回我參加了胡耀邦在中南海召開的會議，研究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的文件《關於整黨問題的決議》

的草稿。在這個文件的草稿中提出要在黨內清理“三種人”。所謂“三種人”中的第一種便是“造反起家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緊跟林彪、江青一夥造反奪權，升了官，幹了壞事，情節嚴重的人；第二種人是“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竭力宣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反動思想，拉幫結派幹壞事，粉碎“四人幫”以後，明裏暗裏繼續進行幫派活動的人；第三種便是“打砸搶分子”。我記得很清楚，在那個會議上我即席發表了一個意見，說：如果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立即著手查明誰屬於整風文件中的“三種人”，那是很容易的。當時黨也投入很大的力量去做這個工作，揪出了許多這樣的“三種人”。可是當時沒有可能把這樣的工作做得徹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提出中央認為適應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及時地、果斷地結束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這個會議的參加者——包括我在內——都同意這個提法，因為真要把“四人幫”爪牙的問題查清並作出處理是要花很多的時間的，因此在粉碎“四人幫”一年之後，實行這樣的轉移是必要的。到了五年後的1983年，黨中央從國家長遠的事業考慮，感到純潔黨的隊伍的必要性，決定在二中全會上討論整黨問題。這時候大家認為讓“三種人”留在黨內會是一個禍害。於是在文件中把清理“三種人”作為黨中央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可是這時候機關裏的許多造反起家的人挪了位置，各單位的人事也有了更大的變動，造反起家的人就不在原來瞭解他們的那些人的視線之內了，有的人還擔任了負責工作，再去查他們，就不那麼容易了。

接著，于先生在會上提議，成立個“三種人研究所”（于

老不喜歡“專案組”這個名稱)。“這種研究不妨帶一點學術性，而且爭取長期存在”；還提出了具體設想：“建議從若干文革中有名的造反派組織，如首都紅三司、上海工總司、清華井岡山、北大的新北大……；若干個有名的造反派製造的事件，如揪軍內一小撮、黃帥事件、張鐵生事件、張志新事件……；若干個有名的造反派寫作組，如北京的池恒、梁效、洪廣思、唐曉文、鍾佐文，上海的羅思鼎、石一歌、丁學雷……等出發，把所有重要當事人一個一個列出來，區別當時參加活動的情況和文革後的表現，進行科學研究，然後採取對策。”

可惜的是，于老先生關於成立“三種人研究所”的建議胡耀邦只是“當即表示贊同，但最後沒有被採納”。以至於使一些“三種人”“蒙混過了關，反而神氣了起來”，有的還成了著名的教授、作家、學者，甚至還掌握了某些權力。更令他遺憾的是，由於中央沒有採納他的建議，致使文革中“揪于光遠聯絡站”的造反頭頭至今沒有揪出來。這樣一來，已經 85 歲高齡的于老先生何以能瞑目呢？！

于先生在文章中說：“我一點不覺得當年對這些人的審查如何‘嚴格’，大家如何如何可以完全放心”。在這裏，我要鄭重地告訴于老先生，當年對“三種人”的清查是够嚴格、够徹底甚至是够殘酷的。1977 年 10 月，河南省委某領導在常委擴大會上講道：“進行揭批‘四人幫’這場鬥爭，沒有當年打日本、打蔣介石、推倒三座大山那樣的革命氣勢，沒有當年搞土改，控訴黃世仁、南霸天那樣的階級仇恨，是不行的”（據說該提法源自中央某領導的講話精神。）試想，以這種“氣勢”搞清查，又歷時 7 載，能有多少人漏網呢？

以下是河南省清理“三種人”中的幾組數字^[1]，敬請參考。

①幹部被處理情況：該省對省、地（市）、縣三級領導班子中的“三種人”和犯有各種錯誤的人，共立案審查4248名，截至1981年9月，已處理4240人，其中判刑51人，受各種處分2025人（開除黨籍323人，留黨察看493人，撤銷職務452人，警告、嚴重警告347人，開除公職20人，開除留用140人，其它處分250人）；免於處分的2020人，不結論不處分的107人。（所謂“免於處分”的2020人，是批判後降職下放，是不處分的處分。這是官方公佈的數字，實際上遠遠不止這個數。）

省委常委中，地方幹部14人，清查、批判和處理了10人，佔66.7%；其中2人在審查批判中致死，判刑3人，留黨察看1人，撤職1人，嚴重警告2人，上報處分未獲批准令其離休1人。

省委、省革委五大部（組織、宣傳、統戰、辦公廳、生產指揮部）正副部長33人，清查、批判、處理23人，佔69.7%，其中，判刑4人，開除黨籍3人，留黨察看2人，撤職6人，嚴重警告1人，批判後令其休息4人。

該省有地市委正副書記118人（缺一個市），批判處分97人，佔82.3%。其中，審查批判期間死亡7人，判刑17人，開除黨籍4人，留黨察看9人，撤職18人，嚴重警告4人，批判後令其休息28人，降職下放10人；省直各廳、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餘全部受到批判處理，分別給予

[1] 河南省“揭批查”數據來自原河南軍區司令員張樹芝、原省委副書記副省長王維群、原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張耀東、原省委常委秘書長王大海於1996年9月16日聯名寫的《關於河南揭批查嚴重擴大化的歷史遺留問題向省委、黨中央的申訴報告》。

撤職、警告、免職不用等處理；原縣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審查批判處理，未受審查，保留原職者甚少。

②逮捕判刑情況：1981年1月5日，原省委第二書記胡立教在省委工作會議上講到揭批查時說：“全省共判處打砸搶分子、反革命分子1700多人。”實際上遠遠不止此數，以刑事罪名抓的，實行勞動教養的，還不包括在內。例如一個焦作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勞教37人，抓一兩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時間內，全省各監獄中關押犯所謂“文革罪”的近半數以上。

③突擊判刑：

1979年底，該省為避免《刑法》、《刑事訴訟法》於1980年元月1日生效以後，束縛手脚，就緊急佈置，各級政法部門對“揭批查”中關押起來的人，不論有沒有罪行，以“清理積案”為名“突擊判刑”，共判處2400人左右。量刑不憑事實，不少人是按“文革”中擔任職務大小定罪。同時，為阻止被判刑人向中央最高法院上訴，把“終審權”掌握在自己手裏，他們把本應該由高級法院審理的案子，強行壓給縣、區法院審判。有的人法院已經向本人宣佈沒有問題可以釋放了，又判了重刑。

看了以上情況，于老先生是否會有些許安慰？

不過，我比較贊同于先生的下述觀點：“我認為是否是‘三種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頭銜或者參加哪個組織為根據，而要看他們的行為和思想政治本質”。可是，在清查“三種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頭銜定罪的，並且把造反派和“三種人”等同起來。誠然，如果這些被處理的人真的是罪有應得，也無話可說。事實却不是這樣。如能進行一下調查研究，就會發現，許多被處理的“三種人”，

被扣的是莫須有罪名。如今，他們中有的已經含冤死去，有的現在沒有工作，沒有工資，沒有任何生活保障，加上子女受牽連，在貧困交加中活著（不能叫生活！）。

二十年來，社會上對造反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批判、圍剿始終沒有停止過，而且全是一種腔調——聲嘶力竭的控訴和狗血噴頭的謾罵。其形式或文件，或講話，或電影，或電視，或文章，或小說，多種多樣，不一而足。在青年人心目中，造反派早已被妖魔化。在“不爭論”的前提下，誰敢說一個“不”字？可是，爲什麼“余秋雨之流”和“揪于光遠聯絡站”的頭頭們還能隱藏下來，甚至“被重用在要害部門擔任重要工作”呢？從文化大革命過來的人都知道，這場史無前例的、震撼世界的運動，是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發動的，是億萬工農兵、幹部、知識分子參加的群眾運動。一句話，跟著毛主席造反的人太多了。可是真正的“打砸搶”分子和幹壞事的人却是少數。多數人是造反而沒有起家，即便是掌了權也沒有行賄受賄、貪污盜竊、以權謀私、瀆職失職，而是帶領群眾“學大慶”，“學大寨”，抓革命，促生產。於是，氫彈爆炸成功了；萬噸遠洋巨輪高陽號成功下水了；我國自行設計、製造的南京長江大橋提前通車了；最大的水泥廠、氮肥廠、大型軋鋼廠建成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了；雜交水稻研究成功了；河南林縣人民自力更生修建的全長一千一百多公里的紅旗渠通水了……甚至創造了偌大一個國家，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奇迹。

有人會說：經濟發展是廣大工農群眾的功勞，與你造反派何干？請不要忘記，這些成績的取得是在文革期間，工農兵也是文化革命的主力軍。有人還會說，如果沒有文

化革命，經濟發展會更快。請問，這裏的經濟是指國營經濟、集體經濟還是私營經濟？對於私營經濟來說，文革就是它的墳墓。事實上，文革期間發展的正是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而私營經濟才真是到了“崩潰的邊沿”。因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爲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誠然，近二十年來，科學技術發展了，人們生活提高了，城市建設擴大了。可是國家的土地、礦藏資源損失多少？人們的生存環境受到多大破壞？國家內債外債究竟有多少？敢不敢公佈於衆？如果也像當年毛澤東領導人民償還蘇修的債務那樣，恐怕就不是“勒緊腰帶”，而是“刮骨熬油”也還不清。共產黨的宗旨就是爲人民服務，可是如今貧富差距日益嚴重，90%的錢掌握在10%人手裏；國營企業紛紛垮臺、兼併、走不出困境；工人下崗、官僚腐敗、黃賭毒泛濫、惡性案件不斷發生究竟是何原因？難道是因爲“三種人”沒有清查徹底所造成的嗎？

毛澤東曾說過：“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麼會認識足呢？”毛澤東在評價文革時還說：“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當然，文革被定性爲“浩劫”徹底否定後，毛澤東的這段話也就不是“最高指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每個人都不例外。文革中許多老同志遭受批鬥，階級鬥爭擴大化的教訓應該永遠汲取。但是，糾正階級鬥爭擴大化不等於不要階級鬥爭。蘇東解體的教訓是深刻的。幾年來，

許多文革中受到衝擊的老同志站在黨性立場上，不去計較個人恩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和一切不良現象進行堅決地鬥爭。他們不愧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有的人，聽到“階級鬥爭”這個詞，就嚇得屁滾尿流，以為文化革命又來了。難道他們真的不講階級鬥爭了嗎？不，他們講的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鬥爭。他們的邏輯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所以，當年於先生提出要成立“三種人研究所”，大可不必了。實踐證明，“三種人”絲毫沒有阻擋改革開放的步伐。比如像筆者這樣思想的人，一沒權，二沒錢，貧困潦倒，半截入土，說這麼幾句過時的話，也不會有人聽，興許還被一些人耻笑為“弱智”、“迂腐”。倘若遇上“算賬派”把筆者抓起來，那就更謝天謝地了，鄙人可有吃飯的地方了。

在于老先生文章的啓發下，我突發奇想，是否應成立個“新三種人”（“走資派”、“腐敗分子，貪官污吏，賣官鬻爵者”、“資產階級自由化”）研究所，把他們的特徵、危害研究一下，以便找出對付辦法，我想老百姓是會拍手稱快的。現在回過頭來，再看一看當年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人，哪些打對了，哪些打錯了，該是鑒別真假對錯的時候了。如果那時候還看不清一些人的真正面目，或著說他們的表演還不充分的話，經過這些年的實踐，應該看清楚了。說到這裏，我想到一個真實的故事。八十年代中期，經濟上實行雙軌制，一些人就利用手中的權力，倒賣計劃內指標，大發橫財，中飽私囊。有個縣石油公司的經理也到北京想搞點石油計劃，却空手而歸。此人原認為根本沒有什麼“走資派”，文革中還常為此與別人爭論。這次從北京回來後，竟找到一個當年造過自己反的

人說：“原來我不相信有走資派，現在到北京一看，走資派不僅有，而且跑起來了！”于先生說他文革中是“走資派”，是真“走”還是假“走”，是否也需要在“新三種人”研究所研究一番呢？我看于老先生是“跑”不起來了，老矣！

關於成立“新三種人”研究所的建議只是草民的遐想，絕不可能被採納。請于老先生不要害怕。

有感而發 2000年10月16日
(本文原署名“草民·匹夫”)

讓更多的人瞭解打工詩作

——《打工詩選》代序

我不會寫詩，但我喜歡讀詩。特別喜歡讀那些來自工人、農民等社會底層的詩篇。

世紀初的一天，我收到一本青年農民梁彥選的詩集——《世紀的微光》，讀後心潮澎湃，感慨萬端。多年來，謳歌國家民族、弘揚正氣、反映勞動人民喜怒哀樂的詩篇愈來愈少，而詩壇的“貴族氣、脂粉氣、洋酸氣、劣紳氣、浪子氣、痞子氣，甚至是自我裸展的荒淫無耻之風”（李子語），早已令人厭惡、憎恨甚或悲哀之至。讀梁彥選的詩，像久住城市的人乍到鄉下，清新、自然、粗獷、豪放，耳目一新。於是我把梁彥選的詩加以選編，以《來自社會底層的詩篇》為題陸續介紹給朋友們。同時，我也和彥選成了好朋友。

今年年初，彥選給我送來他的第二本詩集——《梁彥選世紀詩選》。較之第一本詩集，不僅有對領袖的崇敬和懷念、對英雄人物的謳歌和對社會醜惡現象的詛咒，而且有憤怒的吶喊、思索、抗爭以及對苦難者的希望和寄托。

梁彥選作為貧困山區的農民、到處流浪的打工仔、土煤窑的挖煤工，對打工生活有刻骨銘心的感受。就在我們談論詩集的時候，他吐露了想收集打工詩的想法。他說，

在《打工》雜誌上有一個“打工大詩人”欄目，有不少描寫打工生活的詩，許多詩作者本身就是打工仔，因而詩風純正，樸實貼切，感受濃烈。在打工族已成為龐大的社會群體的今天，能有一本《打工詩選》，讓打工者和關心打工群體的人享用，真是一個好而又好的想法。我百分之百的贊成並積極地投入其中。於是，梁彥選買來了部分《打工》雜誌合訂本，加上在其它地方收集的詩篇，由我負責選編，並輸入電腦。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第一輯《打工詩選》終於完成了。

根據內容，我把《打工詩選》分為八個部分：離家尋工篇、打工生活篇、工種咏嘆篇、打工愛情篇、鄉情篇、感悟篇、心語篇。梁彥選的打工詩單獨列為第八部分。這種劃分也許有些牽強之處，有待讀者批評指正。

選編過程，也是閱讀、品味的過程，不少詩篇感人肺腑，催人淚下。

離家尋工是打工者邁向社會的第一步，離家時的彷徨、心酸、無奈，在《表哥進城》、《出門》、《打工的妹妹》等篇中都有真切地描述。在《那天清晨的霧很大》中這樣寫道：

母親把圈裏
唯一一頭長膘的架子豬
賣了
給我做了奔赴南方的路費

那天清晨的霧很大
鄰家的犬吠和鷄鳴
攪碎了黎明的靜謐
母親在灶房裏忙碌著

那盞十五瓦的燈
忽明忽暗像母親的心情

我捂著母親一瓢一瓢舀出來的鈔票
提起母親為我收拾的帆布包
堅決地跨出門檻
走向無法預測的南方……

從《求職者的一天》中，可以充分體驗到尋工求職時的委屈、艱辛、憤懣：

清晨 起床 梳洗
咽下
幾塊餅乾和
幾條招工廣告
戴上
謙卑的面具
出發

在一座座宮殿似的
寫字樓裏
遞上簡歷 證件 微笑
把身體坐成良駒和寶馬
膘肥 毛亮 省料 牲靈
讓買主的眼光
探針一樣 亂刺
在嗅到買或者不買的味道後
匆匆逃離

日落之時
開始燒烤
一天的飯食和收穫
攪著淚水和希望咽下
在天亮之前消化。

詩中對打工生活的描寫可謂淋漓盡致。如《排隊打飯》中寫道：

開飯的鈴聲響了
饑餓使勁敲擊著胃壁
乘機發動最後一次進攻
一粒米的微笑
在眼前晃來晃去
終於有人暈倒了
暈倒在咫尺之外的“美味”面前
排隊打飯
其實很像我們的打工生活
在長長的忍耐中
等待
那麼一點欣喜與慰藉

《打卡》中寫道：

宿舍與車間
隔著一個恍惚的夢
六點四十五分
工廠大門口

長長的隊伍後面
是長長的呵欠

快點快點
保安催命似的
啣嚙一聲脆響
像一顆釘子
把我們牢牢地
釘在十六個小時上……

《舊衝床》一詩中對打工者致殘過程的描述令人心痛、辛酸和憤慨：

一臺報廢的舊衝
被精明的老闆
用低廉的價格
買下 拖進工廠

可是舊衝床的脾氣
却變得倔強暴躁
只要電流一接通
就發出恐怖的聲響
背井離鄉的打工者
爲了生計
提心吊膽的面對
鋼牙鐵齒的舊衝床
小心翼翼的與它合作
然而換回一身的疲倦

和無法抵擋的瞌睡

終於讓舊衝床有機可乘
一聲慘叫
四根手指被它斬落
打工者從此殘廢一生

打工詩中對貪婪狠毒老闆的控訴可謂入木三分。如《老闆和蚊子是兄弟》：

蚊子
趴在左脚上
吮吸我的血液
就像我的老闆
不發給我六月份的工資一樣
難受

一掌過去
蚊子飛了
而我的老闆
讓每一位離去的員工
留下
一個月的汗水和忍氣吞聲
一陣冷笑過後
他依舊坐在新買的別克車裏
用蚊子的思維
盤算著今後的日子

我想
我的老闆和蚊子
可能是兄弟

詩中散發的鄉情親情真摯感人。如《鄉愁》中寫道：

燈火輝煌的夜晚
時時亮起故鄉的油燈
燈旁
老母親一針一針地縫著
浪子的歸期

《臨近春節》中寫道：

自從涌入了打工族
全家團圓
便成了一種奢望
可以想像
母親失望的心情
媽媽喲
如果
老闆不扣押金和年終獎
如果
火車票上漲幅度不太大
如果
能給你帶回兒媳婦
兒明年一定回家過年

打工仔的愛情純真、執著。如《九毛錢的愛》中寫道：

愛人
出門在外
我只能給你九毛錢的愛
你曾經埋怨
我把你忘懷
只怪我的口袋
不敢向你表白
多少個孤星伴月
我伏在鐵桶上寫信
爲的只是給你
九毛錢的關懷

《打工仔的愛情》中寫道：

流水綫上
你是我的上座
你的背影便是我全部的風景
我每天都能在你的風景裏
尋找到不同的美麗
多功能的電板
有一些配件是你插的
有一些是我插的
更多的
是打工的姐妹們插的
她們代表了打工的全部生活……

當然，也有一些詩，既有閃光的句子，也有格調不甚高雅、令人不知所云之處，暫時選入，待聽取讀者的意

見後再決定取捨。縱觀整個《詩選》，令人惋惜和不安的是詩中無奈的嘆息和委屈的傾訴過多，豪邁的吶喊、深刻的思索和抗爭的勇氣太少。相比之下，梁彥選的詩雖過於直白，但有思想、有深度，有一定的震撼力。

編選《打工詩選》的目的是讓更多的人瞭解打工詩作，同時也是一種拋磚引玉的嘗試。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推薦更多更好的詩篇充實進去，以至有第二輯、第三輯……詩集出現，使之真正成爲勞動人民的心聲。還應說明一點，編選《打工詩選》，是純粹的義務勞動，無有絲毫功利之心，因此不存在侵權之說。

誠望讀者提出寶貴意見。

2004年4月 完稿

人民懷念毛澤東

——為毛主席逝世 28 週年而作

涼風送來秋的信息，又到九月九。偉大領袖毛主席離開我們已經 28 週年了。二十八年，斗轉星移，地覆天翻，不變的却是人們對領袖的無限懷念……

二十八年前——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
人民領袖毛主席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噩耗傳遍四海，悲憤籠罩五洲。
高山低頭致哀，大海拍岸送行。
無數海外朋友為失去偉人，悼念致哀，
億萬中國人民為失去舵手，痛哭失聲。

二十八年了，
毛主席，您現在哪裏？
是和馬克思敘談共運的歷史，
還是和列寧評點乾坤的變更？
記得 1966 年 6 月 10 日

您和胡志明談話中說過：
“我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
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
接班人究竟是誰？
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
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
於是，您發動了那場
史無前例、震撼世界
觸及人們靈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啊！毛主席
您不會離開中國大地
爲了她的繁榮昌盛，
您傾注了心血畢生
您不會離開中國人民
他們的冷暖永遠在您的牽挂之中
當年 您視察農田
綠野中傳來您和農民兄弟的朗朗笑聲
當年 在煉鋼爐旁
您的臉膛和工人師傅一樣通紅通紅
校園裏
您佩帶著紅領巾和孩子們簇擁一起
軍營裏
“練好本領，保衛祖國”的聲音響徹雲中
啊！我仿佛看到
您臂戴紅袖章，
在天門城樓上容光煥發頻頻揮手

紅海洋中熱淚盈眶的仍是當年的紅衛兵

……

二十八年了

毛主席，面對人間的巨變

是惋惜、憤慨，還是意料之中？

蘇聯解體，美帝橫行

“公社”稱“鄉村”

“國營”變“民營”

工人下崗，農民打工

官吏腐敗，邪惡橫行！

……

二十八年來

對於您和您創造的那個人民的時代，

有人惡毒謾罵，

有人陽奉陰違，

有人出於怨氣，認識糊塗，

有人通過“實踐檢驗”，心亮眼明！

然而廣大人民群眾

對您的熱愛始終如一

懷念之情愈來愈濃！

啊！毛主席

您的理論，您的思想，您的教導，您的行動

連同您的生活——

紅燒肉、紅辣椒、54個補丁的毛巾被

73個補丁的睡衣、20多年的皮拖鞋

都和人民群眾息息相關，
“爲人民服務”五個大字
成爲真正共產黨人的座右銘！
您那濃重湖南口音喊出的“人民萬歲！”
早已銘刻在全世界勞動者的心中！
無論三十年、三百年、三千年，三萬年
……
您永遠活在人民心中！

東方紅，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爲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人民懷念毛澤東！

2004年9月9日

四十週年話文革

按語：從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算起，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整整四十週年了。近來，網站上出現許多討論、紀念文革的文章。作為文革親歷者和“文革文物”收藏者，我油然而產生寫點文字的衝動。於是，就從《歷史的見證——文革文物展示》的初稿中選出幾部分，取名《四十週年話文革》發在網上，以表心願。

2006 年 5 月

談談文革中的《毛主席語錄》

《毛主席語錄》，又稱紅寶書，是毛澤東時代特殊的精神產品。文革期間的紅寶書，其版本之多、發行之大，影響面之廣、之深，創造了世界之最。據記載，僅文革幾年，國內外就出版發行了用 50 多種文字印製的 500 餘種版本，總印數達 50 餘億冊。

這本小紅書是怎樣產生的？為什麼能成為六十年代世界上發行之最大的書？它是怎樣從軍內走向全國、走向全



各種開本的《毛主席語錄》

世界的？
筆者參考
《毛主席
語錄》編
發全程追
踪》（丘石
編，見1998

年5月20日《大河報》連載）以及《潤之書屋》藏品資料，概述如下。

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兼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在1960年9月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提出要加强部隊政治思想工作，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要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此後，全軍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隊視察時明確指示：“《解放軍報》應當經常選登毛主席的有關語錄。”根據林彪的這一指示，當時在解放軍報社資料室工作的田曉光承擔了為報紙選編毛主席語錄的任務。《解放軍報》每天選登一段毛主席語錄的做法，在部隊引起很大反響。那時候，戰士多數都是從農村招來的，文化程度不高，讀毛主席的原著有困難，而摘編的毛主席語錄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簡潔、最通俗、最精闢部分，戰士一讀就懂，一講就明白。



最早的小開本語錄
(52開，1964.5)

許多幹部戰士把解放軍報上的毛主席語錄剪下來，分門別類彙集成冊，有的戰士甚至用小本子天天抄錄，自製成語錄本。有的部隊把毛主席語錄製成語錄牌，走到哪裏，帶到哪裏，行軍、拉練背在背包後面，戰術訓練挂在訓練場上，學習挂在宿舍裏，勞動挂在工地上。1962年2月3日，時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在“解放軍報毛主席語錄宣傳小結”上批示：“大型輯錄形式好，以後還可以用。”鼓勵了這種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方式。在這種情況下，田曉光向報社領導提出要為部隊編一本《毛主席語錄》的想法。1964年12月20日，解放軍報副總編唐平鑄把此建議帶到全軍召開的政治工作會議上，總政領導同意由解放軍報社編寫一本《毛主席語錄》，並作為會議文件下發。於是，1964年1月5日，16開本的《毛主席語錄200條》徵求意見本出版了。1964年5月，總政領導在部隊內部發行了《毛主席語錄》，幹部

每人一本，戰士每班一本。為了攜帶方便，將16開改為52開本，這是最早的小開本《毛主席語錄》。出版前，請林彪為《毛主席語錄》題詞，並建議題寫雷鋒用於自勉的幾句話。林彪題了“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其中的“聽”字多了一點成了“口斥”（左圖）。1966年8月，總政在全國發行64開本《語錄》時，將林彪題詞中寫錯



“聽”（听）寫成“口斥”

的“聽”字作了糾正。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許多人對《毛主席語錄》前言部分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應該根據 1966 年 8 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提法重新改寫。所以，1966 年 12 月，在全國大量發行《毛主席語錄》時，林彪為其寫了《再版前言》。

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大大促進了《毛主席語錄》的出版發行。1967 年後，《毛主席語錄》在正規出版發行的同時，地方各部門、各單位乃至許多群眾組織也自行印製《語錄》，品種由《毛主席語錄》發展到《毛主席詩詞》、《最高指示》、《老五篇》、袖珍本《毛選四卷》以及毛主席論農業、論工業、論教育、論金融、論黨的建設、論青年運動等等。《語錄》的大小由最初的 64 開本，到 100 開本、128 開袖珍本。1967 年 7 月，中國盲人、聾啞人協會盲人月刊社，在北京出版發行了《盲文版毛主席語錄》，由於特殊文字特殊紙張，其大小為長 30 厘米，寬 28 厘米的大八開語錄版本。群眾組織還編印了《林彪語錄》、《魯迅語錄》、《馬恩列斯語錄》等。據報道，從 1968 年元月到 11 月，河南全省敬印《毛主席語錄》100 開本 420 萬冊；《毛澤東選集》袖珍合訂本 12.5 萬套；毛主席語錄標語 3013 萬對開張；《毛主席論教育革命》545 萬冊。僅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 1968 年全年印製《毛主席語錄》200 萬本。



藏文版《語錄》（100 開）

《毛主席語錄》的大量發行，對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推動了毛澤東思想的大普及。文革中，全國各族人民從白髮蒼蒼的老人到三四歲的娃娃，從工人到農民，從解放軍戰士到青年學生，人人學語錄、背語錄，唱語錄、用語錄，《毛主席語錄》成了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糧。從1966年8月18日到1966年11月26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1300萬人，每一次接見，宏大的天安門廣場，紅旗、紅寶書、紅袖章，匯成一片紅海洋，群情激昂，山呼海嘯，氣勢磅礴、感天動地。真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毛主席語錄》不僅風靡國內，而且還走出國門，走向了世界五大洲。在1966年的廣州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上，港澳客商購買一批《語錄》，帶回去後供不應求。在一些工人和學生的紛紛要求下，香港方面派人到廣州新華書店聯繫



德文版《語錄》（100開）

《語錄》出口事宜。10月，中宣部批准《語錄》出口，解放軍報社著手修改《前言》。後來，由於香港讀者要求迫切，等不及修改“前言”，經陳毅副總理批准，將“內部發行”字樣去掉，先出口3萬冊，等改好“前言”後，叫香港自行出版，以滿足海外讀者的需要。據1969年10月中國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特刊》上記載：《毛主席語錄》被熱情頌為“紅寶

書”。從1967年10月至1969年6月的三年中，《毛主席語錄》在25個國家和地區裏，有分別用英、法、西班牙、德、意、希臘、丹麥、荷蘭、挪威、冰島、芬蘭、阿拉伯、老撾、希伯來等25種文字出版的51種版本。阿爾巴尼亞還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論無產階級專政”、“論突出政治”、“論階級鬥爭”等十多種語錄本。印度革命者用七種文字出版了九種版本的《毛主席語錄》。日本朋友出版的日文版《毛主席語錄》有縮印本、教科書本和增補本等八種之多。1969年上半年日本革命者出版的《毛主席語錄》增補本的附錄中，收錄了毛主席給日本朋友的重要題詞和1960年以後毛主席對日本人民發表的多次重要談話。日本東方書店，為適應日本革命群眾的需要，精心印製了可以掛在牆壁上每天翻閱的《毛澤東語錄抄》。瑞典一家進步書店自行翻譯出版的瑞典文版《毛主席語錄》，深受革命讀者歡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就先後再版了四次。

國外友人對毛主席語錄的摯愛令人感動萬分。在1969年春季廣交會上，希臘海員曾到毛主席著作館參觀，看到書塔上的外文版《毛主席語錄》中沒有希臘文版本，就向大會工作人員表達了他們渴望獲得希臘文版《語錄》的強烈要求。秋季交易會開幕不久，一批希臘海員進館參觀，當他們看到書塔上擺放有希臘文版本的《毛主席語錄》時，就高興得跳了起來，並當即向我工作人員索取，頻頻對工作人員說：“中國偉大！毛澤東偉大！”另一批希臘海員及其它國家的海員還一起朗讀了三段毛主席語錄，每讀一段，就高呼“毛主席萬歲！”，有的海員還在留言簿上寫道：“中國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國家！”、“毛澤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表達了他們共同的心聲。

毛澤東帶領人民創造的那個紅紅彤彤的時代已經成爲歷史。被世界革命人民稱之爲“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已成爲舊書攤上的“文物”，記憶中的紅色漸漸褪去，但作爲“文物”的“紅寶書”却是愈紅愈受歡迎……

談談文革中的大字報

“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作爲毛澤東時代賦予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於 1975 年被寫進憲法裏。而其中的“大字報”形式更是受到毛澤東的推崇。1958 年，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說：“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商店、機關、



毛澤東在上海棉紡廠看大字報 1958

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了的，應當永遠使用下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人民“拿起筆，做刀槍”，把大字報這個“新式武器”運用得淋漓盡致。1966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

鏡》，社論說：“對待革命的大字報採取什麼態度，是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區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區分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保皇派的一個重要標誌。你是革命派麼？你就必須歡迎大字報，保護大字報，帶頭寫大字報，放手讓群眾寫大字報，放手讓群眾揭露問題。你是保皇派麼？你就必然對大字報怕得要死。見了大字報臉色發黃，渾身出汗，千方百計地壓制群眾的大字報。害怕大字報，就是害怕群眾，害怕革命，害怕民主，害怕無產階級專政。”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走進各單位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專欄。周恩來總理曾連續三天（66年7月25-28日）抽空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看大字報。他對同學們說，你們寫了很多大字報，我從大字報中學習到不少東西。你們懂得用毛澤東思想來分析、比較、研究事情了。我謝謝你們給我自由和機會看了三天大字報。

文革中大字報的內容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揭露問題；二、辯論是非；三、大批判文章；四、對某人、某個事件的表態或聲明；五、群眾組織之間的相互摩擦、碰撞、攻擊；六、標語口號。凡是內容能引起共鳴的大字報總是能够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達到暴露敵人、團結群眾的效果。文革初期受到迫害的“少數派”就是運用“大字報”這個武器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作鬥爭由少數變成多數的。許多群眾組織的“領袖”也都是因寫大字報而成名。

西安交大工程系學生、團支部書記李世英，帶領全班同學寫了校工作組的大字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身上刷漿糊、頭上戴“高帽”、架著“噴氣式”連續三天在學校遊鬥，不堪受辱服藥自殺（未遂），後被毛主席稱為“學生領袖”；1966年9月，鄭州大學中文系學生黨言川以“鄭

大聯委”署名寫出《關於組織動員省會各界紅衛兵戰士、革命同志炮轟河南省司令部、大鬧河南省委的〈火急呼籲書〉》，引起鄭州大學乃至整個省會兩種觀點的爭論，鬥爭十分激烈。一派認為《火急呼籲書》號召群眾炮打省委司令部代表了運動的大方向，是革命的大字報，另一派認為《火急呼籲書》污蔑了河南省委五八年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反革命的大字報。黨言川也因此成為河南省文革運動風口浪尖上的人物、家喻戶曉的“造反領袖”；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學生蒯大富率先提出“炮轟”壓制“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遭到工作組的打擊，曾被關押了18天，並被開除團籍，在這期間，蒯大富不僅進行了絕食鬥爭，還寫了37篇有分量、有水平、有影響的大字報，後來成了北京學生“五大領袖”之一；北京航空學院學生韓愛晶，文革開始後，給駐北航的工作組貼出大字報，反對工作組壓制學生“造反”，工作組撤走後，韓愛晶成為北航“紅旗”的總負責人；譚厚蘭是北京師範大學政教系的一名調幹生。文革初期聯合17人，在北師大貼出了矛頭指向校工作組長的大字報，受到批判鬥爭，後成為北師大“井岡山”的負責人。當然，這些因寫大字報而成名的“領袖”、“闖將”們，後來的表現不盡相同，有的甚至犯了錯誤受到毛主席的批評。

不過，在毛澤東去世，文革被否定後，他們這些因帶頭寫大字報造資產階級反



毛澤東和譚厚蘭、王大賓、蒯大富、韓愛晶（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

的“闖將”們，也因政權的變更而大都經受隔離審查、批判鬥爭，甚至成爲階下囚。例如，黨言川被判三年緩三年；李世英被審查兩年半後免予刑事處分調出西安安排基層工作；蒯大富被判徒刑 17 年；韓愛晶獲徒刑 15 年；北京地質學院學生領袖王大賓，1978 年被捕，1982 年未作判決回原籍接受處分；譚厚蘭於 1978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後免予刑事處分，於 1982 年 11 月被癌症奪去 45 歲的生命，終生未婚。和學生相比，1937 年投奔延安的聶元梓算是老革命了。她自認爲文革中受到江青、謝富治的“迫害”，却仍未幸免，1978 年被捕，預審 5 年後被判刑 17 年。看來，因“大字報”或得福，或罹禍，並非“大字報”本身的問題，而主要是政權的本質問題！

關於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1966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七人貼了《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一篇大字報。這張被毛澤東譽爲“全國第一張馬克思主義的大字報”是怎樣寫出來的？又是怎樣推向全國的？筆者通過親自訪問聶元梓和翻閱有關資料，談一點粗淺看法。

1964 年 7 月，北大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即“社教”）運動。時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聶元梓以及哲學系的部分幹部教師響應工作隊的動員號召，向校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提了意見。成了“社教”積極分子。1965 年春夏之交，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國際飯店召開會議，把“社教”工作

隊和北大黨員幹部集中起來“整風學習”。會議不是正確地解決北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分歧意見，而是整給校黨委、給陸平提意見的人，整社教運動的積極分子。從那以後，學校的矛盾加深，也公開化了。擁護陸平的和反對陸平的分成兩派，誰也壓不服誰。由於陸平有北京市委的支持，末了，還是把反對陸平的聶元梓等人下放到農村搞“四清”。就在聶元梓到懷柔縣報到後回北京治病不久，1966年5月19日，北大黨委傳達黨中央的關於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作為校黨委委員的聶元梓在關鍵時刻先一步聽到了中央的精神。

“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使聶元梓既震驚又激動，中央號召批判和清洗“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不是和北大搞社教運動的目標相一致嗎？彭真在這次會議上受到批判，使北大在社教運動中的積極分子所受到的錯誤批判和冤屈有了解決希望。



文革初期北京大學的
大字報專欄

聶元梓說：“我當時對於什麼是走資派，什麼是修正主義，並沒有搞清楚。……我就是憑感覺，以為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等工作上存在的問題，都像陸平這樣發展下去會變修，全黨全國就會變顏色。現在中央下了決心，要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反修防修，並且這次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我當然要積極響應

了。”關於北大的問題，聶元梓想再給毛主席寫一個報告。這樣就找到了哲學系黨總支副書記趙正義，讓他找了哲學系的老師宋一秀、高雲鵬和已經調離北大的楊克明以及後來下農村參加“四清”回來的夏劍豸，討論寫報告的事。楊克明建議採用大字報的形式，得到聶元梓的贊同。因為此前在國際飯店受批判時，聶元梓曾經托田家英轉給毛主席、劉主席（少奇）一封信，反映北大情況，沒有任何回音。寫大字報，不僅能讓校內群眾知道，也準能反映到上級領導那裏去。聶元梓等都是黨員、幹部，從組織觀念出發，想把寫大字報的事請示領導。請示誰呢？請示北大黨委，陸平就是黨委書記。請示北京市委，彭真已經倒臺。於是，就請示了當時中央文革派到北大蹲點搞調查研究的曹軼歐（康生夫人），曹軼歐也沒有問大字報的內容，只是說“五·一六通知”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就是要發動群眾，大字報可以寫。於是，宋一秀寫了第一稿，然後一起討論，改成了第二稿。大家還是不滿意，最後由楊克明執筆，大家修改定稿、簽名，5月25日下午2時把大字報貼在了大飯廳的東山牆上。

聶元梓等七人的這張大字報首先是在北大掀起軒然大波。有人認為這是反革命大字報，是右派反黨，也有贊同大字報的觀點，自然形成了辯論的場面。同時也出現了許多給校黨委提意見的大字報。當天晚上，陸平就召開黨委常委會組織了反擊的大字報，同樣貼在校園內和大飯廳的牆上。第二天，陸平組織各系開會，誰表示贊同聶元梓的這張大字報，就要檢討。還要求聶元梓把大字報撕下來。後來聶元梓等又寫了一張大字報，回答別人的批評，並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這樣，圍繞大字報的兩種觀點激烈

辯論，持續了五六天，直到大字報被毛澤東知曉，並指示向全國廣播後，聶元梓緊張的心情才放了下來。

1966年6月1日，正在杭州的毛澤東看到了《紅旗》雜誌社和《光明日報》總編室所編的《文化革命簡報》第十三期刊登的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在大字報上作了批示：“康生、伯達同志：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參閱《毛澤東傳》1414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發了這張大字報，北京大學校園內就像開了鍋一樣，立即沸騰起來。第二天，《人民日報》又全文刊登，並由王力、關鋒、曹軼歐執筆，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一篇《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該評論員文章時，毛澤東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句話後面，加了一條批註：“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93頁）

北大的這張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扭轉了當時的鬥爭方向，把單純批判“學術權威”、“三家村”導向了“走資派”。全國許多大專院校出現針對本單位領導的大字報，領導陷於被動。爲了控制局勢，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爲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同一天，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學校派工作組。全國各省市也陸續向各

大中學校派了工作組。工作組進校後，大都和校黨委唱一個調子，把率先貼大字報的學生、教師（稱少數派）扣上“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小吳晗”、“小三家村”等帽子，進行圍攻、批判、鬥爭。不少學校出現不同程度的白色恐怖，甚至出現被逼自殺事件。這就是被毛澤東稱之為“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階段。

1966年8月，北京大學成了文化革命的“聖地”，全國到北京串聯的學生、紅衛兵都要到北大參觀學習。在一份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者派到北京學習的同學給在校同學的信件（1966.8.15）中這樣寫道：“早上3點我們才睡下，6點鐘就起來上北大去了，因為知道15號晚上要鬥陸平，我們需要弄票。不管什麼人，你認識不認識北大都不要緊，只要跟著人群走，前方目的地一定是北大。去北大的人多極了，從西直門一直排到北大大門口，而且每處的人群都很密集，從這種現象你們可以想像北大院內的情況。院內真是人擠人，肩並肩，一個擦著一個走。北大校園內到處都是大字報，而且都是大塊頭的，一寫都是二十幾張，都是擺事實講道理從頭至尾的分析。我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到了北大會不被他們的熱情所感動。他們真是‘五敢’的闖將。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他們首當其衝為全國大專院校殺出一條路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對全國文化大革命產生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試談毛澤東的一張大字報

1966年8月5日，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國第一張馬



文革小報報頭《炮打司令部》

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

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為什麼要寫這張大字報？為什麼提出“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所描述的五十多天裏的情況是事實存在，還是危言聳聽？筆者依據資料作如下簡述：

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去談話，他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

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凶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佔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後分類排除。”“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什麼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佔領不了的。在過去的鬥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涌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王任重日記，1966年6月11日）

同一天，毛澤東會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談話時說：“中國現在也出了修正主義，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問，以前我們知道不知道？我們是知道的，彭真犯過一系列的錯誤。早幾年我已經要撤換他。北京是個獨立王國，誰也不能過問。毛澤東說，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我們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在談到當前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說：“我們最近這場鬥爭，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已經7個多月了，最初姚文元發難。他是個青年人。討論清官等問題。你（指胡志明）不是贊成清官嗎？你說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沒有見過。……現在我們不搞清官、貪官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藝界、學術界、哲學界、史學界、出版界、新聞界。”毛澤東還說，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共和國史記》吉林人民

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第三卷 101 頁)

6 月 15 日，毛澤東在火車上接見江西省委幾個負責人時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爲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我與毛澤東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版第 41 頁）

7 月 8 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中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滅。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

由以上毛澤東的話不難看出，毛澤東試圖通過這場全國性的反修防修大演習，揭露“司令部”中的修正主義分子，達到鍛煉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目的。可是，從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向全國公佈後的五十多天裏，毛澤東親自點燃的文化革命之火却遭到劉鄧工作組的撲滅。

1966 年 7 月 18 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後，連續聽取各方面的彙報，並看了北大、清華等大學的文革簡報，認爲運動搞的冷冷清清，少數學生受到壓制，很不滿意。毛主席說：“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阻礙革命勢力，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他坐山觀虎鬥，學生跟學生鬥，擁護工作組的一派，反對工作組的一派。群眾對工作組有意見不讓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西安交大就是這樣。……我們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總有一天命要

革到自己頭上來。”196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

爲了重新點燃文化大革命之火，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發表他的大字報。大字報中所描述的五十多天的情況，事實確鑿，絕非空穴來風。從劉鄧的檢查以及典型事件足以證明。

劉少奇、鄧小平的檢討摘錄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

劉少奇：“在北京許多學校進行所謂‘排除干擾’的鬥爭。由此，就在許多學校工作組的領導下發生了學生鬥學生的現象，發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圍攻了革命派，壓制了不同意見，甚至將一些學生定爲‘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這樣，就在不少學校造成了一種恐怖氣氛，這種恐怖氣氛是反動的、白色的恐怖氣氛。我過問過的、王光美同志參加過的清華大學前一段文化革命運動中所犯的錯誤，是這一錯誤路綫的典型例子。我曾聯繫過的師大一附中，也進行過‘排除干擾’的鬥爭。”

鄧小平：“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的錯誤的性質……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制左派、打擊左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導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於扭轉，

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之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繼續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麼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綫的錯誤。”

五十多天“白色恐怖”典型事件選登

（一）清華大學的五十天“白色恐怖”

1966年6月21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在一張大字報上批示“要向工作組奪權”，被工作組視爲“右派學生要奪權”，“是一種反革命行爲”。從6月24日至7月8日，工作組多次召開鬥爭蒯大富等同學的大會。提出“要把蒯大富當活靶子打”，罵蒯大富是“小牛鬼蛇神”，“要奪共產黨的權”“是反面教員”。蒯大富被關押了18天，並被開除團籍。蒯大富以絕食方式進行鬥爭。工作組在各系各班大抓“蒯氏人物”。先後20多天全校700餘人被批鬥，多人被迫害神經失常，7月2日、5日、7日連續發生三起自殺事件，一人身死。大批革命師生被整了黑材料，不讓參加“七一”黨的生日慶祝活動，連學毛選也被說成打著“紅旗”反紅旗。當毛澤東否定工作組後，蒯大富獲得了“解放”。（摘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編，1967年）

曾任清華大學工作組長的王光美在1966年10月的書面檢討中說：“我們對蒯大富同志進行的四次全校性的大會批判時，由於造成強大的政治壓力，而發生了三起自殺事件，對死者教師史明遠的親屬致以親切的慰問，並向他們請罪，

對傷者學生朱德義賠禮道歉，並向他請罪。你們有權利控訴我，是我所犯的嚴重錯誤，使你們受到了傷害。”

（二）西安交通大學“六·六”事件

1966年6月5日，工程系學生李世英（班團支部書記、預備黨員），帶領全班同學寫了工作組的大字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管制起來。7、8、9連續三天，李世英身上被刷上漿糊，貼滿標語，頭戴“高帽子”、架著“噴氣式”在學校遊鬥，受盡人身侮辱。他實在想不通，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何罪之有？於是就想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9日中午，他寫下三封遺書，服安眠藥自殺。幸被同學及時發現，送到醫院搶救，才留住了21歲的年輕生命。而和李世英相同遭遇的交大學生會勞動生活部長王永婷同學，却在當日跳樓自殺身亡。

據《西安交通大學校史》（西安交大出版社2003年4月）記載：“據校文革總會後來統計，工作組接管學校的五十多天裏，全校有1000餘人被批鬥。在66名處級幹部中，有63人靠邊站，29人被打成‘黑幫幹將’、‘黑幫骨幹’、‘黑幫分子’，佔處級以上幹部總數的44%。全校912名學生幹部中，有680人被‘查上當、放包袱’，佔學生幹部總數的75%。”

原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1966年11月16日在陝西省三級幹部會議上的檢討發言中說：“許多革命同學被錯整錯鬥，有些被打成‘反革命’，有的還被迫自殺。例如李世英同志，本來是積極帶頭的革命同志，却把他看成是帶頭‘鬧事’的尖子人物，把他打成了‘反革命’，進行圍攻和鬥爭，以致被迫自殺。還有王永婷同學，由於我們的錯誤自殺了。

我們有極大的罪過。錯誤責任，都應該由省委負責，首先要由我負責。”“總之，在‘六·六’事件上，我們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圍攻了革命派，壓制了不同意見，實行了白色恐怖。八月初，根據中央指示，對所謂‘六·六’事件進行了平反，但當時檢查很不深刻，領導上承擔責任很不够，平反很不徹底，特別是沒有認真在廣大幹部和群眾中作政治思想工作，消除對交大革命師生的歧視和誤解，這就為以後群眾鬥群眾，學生鬥學生埋下了禍根。”

（三）鄭州大學的王相海被逼自殺事件

1966年6月2日，鄭州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王相海等14位同學貼出《請問學校領導，對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麼態度？》的大字報，批評校黨委壓制群眾運動，單搞學術批判，把學校搞得死氣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樣子。鄭大黨委連夜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會上提出要立即反擊，“鄭大不是北大”，要追查寫大字報的人的“歷史表現”、出發點。接著的三天裏，他們對寫黨委大字報的人進行孤立、分化、盯梢，私拆信件。對王相海同學進行圍攻，揚言要開除他的黨籍、學籍，同情王相海的同學被劃為“右派”，上了“黑名單”。在這樣的殘酷壓力下，共產黨員、復員軍人、團支部書記王相海失去了生存的勇氣，在5日夜跳樓自殺，臨死前寫了一篇很長的遺書。王相海死後，還被工作組說成是畏罪自殺，甚至派人利用省委的名義，到王相海家鄉向群眾宣佈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你們大隊的鄧拓”。當時，王相海的父母一言不發，這兩位老實巴交的農民，

實在不知道自己的兒子爲什麼會反黨?!

(四) 南京大學的“匡亞明”事件

1966年6月2日下午，正在進行勞動建校的南京大學溧陽分校的革命師生貼出大字報，聲援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同時對黨委第一書記匡亞明領導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態度，提出了嚴肅的批評。晚上，匡亞明在分校連續召開黨總支擴大會和全體黨員大會。會上把批評他的大字報說成是“毒箭”，把寫大字報的人說成是“不懷好意”、“別有用心”。會上提出要立即組織“反擊”，要大家“不能手軟”。3日上午，匡亞明在他召開的黨總支擴大會上，要求進一步“跟踪追擊”。會後，用大大小小的“討論會”打擊革命派。給寫大字報提意見的積極分子戴上各種“帽子”，強迫他們“檢討”，下令取消他們的預備黨員資格。從2日到5日，在溧陽分校的500多師生員工中，被鬥70人。其中學生64人，教師4人，工人2人。被鬥者大部分是勞動人民子弟，其中黨員9人，團員22人，甚至還有革命烈士子女。4個團總支書記，除一人不在學校外，3個全被批鬥。4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標兵，也被鬥了。他們有的被誣爲“小三家村”，有的被說成是“黑幫”，被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帽子，受到人身侮辱。

(五) 蘭州大學“七十天的白色恐怖”有關記載

據資料記載：1966年6月7日至8月20日，蘭州大學學生被批鬥的658人（佔在校學生總數的25.5%），其中自殺2人，自殺未遂12人，逃跑31人；教職工被批鬥的380人（佔在校教職工總數的32.8%），其中，自殺4人，自殺

未遂 2 人，逃跑 7 人。在這些被批鬥的人中，黨員 288 人，佔黨員總數的 60.9%，其中，學生黨員 135 人佔 75.5%。這些被批鬥者被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跳梁小丑”，遭受戴高帽、遊街（校內馬路）、罰跪、“勒令寫檢討”、“罰低頭”、“挂蚊帳”（床的上下四周貼滿大字報，睡覺時只能鑽進去，不慎碰破，嚴加處理）等等酷刑，情節惡劣，令人髮指。蘭大化學系學生張超仁，只因在“六·七”事件中帶頭同工作組進行義正詞嚴的辯論，就被打成“牛鬼蛇神”，從 6 月 7 日到 8 月 8 日的 60 天中，經常處於被“轟”鬥、推打、辱罵之中。8 月 8 日，這個年僅 23 歲的青年學生終因忍受不了迫害撞火車自殺。在他的遺書中寫道：“永別了，同學們！祝願我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早日在我國實現沒有人剝削人，沒有人壓迫人的共產主義社會。”

由上可知，1966 年 6 月至 8 月實行“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裏”，無論是走資派，還是工作組，針對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寫了大字報，向當權者提出批評的青年學生，鎮壓手段之殘酷，可見一斑。“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的實例觸目驚心舉不勝舉。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不僅解救了無數受迫害的革命群眾，更重要的是扭轉了文化大革命的被動局面，端正了鬥爭的大方向。此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勢在全國開展起來。

介紹毛遠新的一張大字報

——《我為什麼參加紅色造反團》

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侄兒，毛澤民之子，1965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在連隊當兵半年後，經過自己申請，上級批准，1966年9月返回哈軍工參加了文革運動。那時候，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展三個月了，哈軍工的兩大派群眾組織——“紅色造反團”（簡稱“造反團”）和“紅衛兵八八紅旗戰鬥團”（簡稱“八八團”）相繼成立，“革”與“保”陣綫基本分明。毛遠新通過調查研究，參加各種活動，對文化大革命運動有初步瞭解後，參加了紅色造反團。1966年12月11日，毛遠新寫出了一篇大字報《我為什麼參加紅色造反團》。大字報中，毛遠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解剖，以自己的親身體會分析了“八·八團”右傾保守的本質及其思想根源，肯定了“造反團”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作鬥爭的革命造反精神。同時，也對造反團存在的缺點錯誤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整篇大字報，擺事實，講道理，推心置腹，對於如何認識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提供了一份寶貴史料。

（一）大字報的產生背景——哈軍工文革概況（1966年6月至12月）

哈軍工是全國有名的軍事院校，雲集了許多高幹子弟。得天獨厚的條件、特有的政治嗅覺和強烈的使命感使他們

較早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去。幹部子弟的優越感使他們毫無顧忌，他們以“紅色造反者”的名義，到全國各地串聯，煽風點火，成爲全國有名的響噹噹的造反派組織之一。但是，有造反就有保守，“造反團”和“八·八團”就是軍工學院革與保鬥爭的產物。

1966年6月2日，北大聶元梓等7人大字報廣播後，軍工學院出現了矛頭對準院黨委的大字報，院黨委連忙開會、指示、啓發、誘導，規定寫大字報要向黨支部彙報，挑起保護黨委的一部分群眾對另一部分群眾的圍攻，哈軍工學院的運動陷入了冷冷清清的局。6月9日，在高壓下出現了19人的大字報（19人全是紅色造反者，後來大部分人成爲總團負責人），在哈軍工放了一把火。7月16日，一些學生衝破阻力，在五系門前發起一場群眾性的大辯論，再次聲討院黨委壓制群眾的錯誤路綫。院黨委內少數人爲了保自己，給發起大辯論的人施加壓力，扣上“反革命、右派”的罪名，說辯論會是“非組織活動”、“少數人鬧事”。7月18日，院黨委召開“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佈置“抓小鬼”，會後一部分造反者成了被“盯梢”、“積纍黑材料”的對象，另一部分人緊跟院黨委，成爲“抓小鬼”的急先鋒。8月3日，紅色造反者組織“俱樂部辯論會”，主張徹底清算院黨委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8月9日，八八派召開“小樹林辯論會”，會上強調黨的各級組織一定要領導運動，“廣大黨員革命群眾應當主動要求各級黨組織來領導”。就這樣，兩種對立的思想狀態，孕育了“革”與“保”兩個對立的群眾組織。軍工“紅色造反團”和“八八紅旗戰鬥團”分別於8月3日和8月8日宣告成立。在對待省委和軍工黨委問題上，兩派鬥爭日益加劇。

1966年8月16日晚，黑龍江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各單位組織討論“省委是不是革命的？”這一辯論話題。紅色造反團認為省委是藉這個題目煽動工廠、學校、機關團體的群眾圍攻他們，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大陰謀，因而群情激憤，當晚就到省委貼大字報，強烈要求收回這個錯誤的通知。而八八團緊跟省委、院黨委，說省委通知是全省的一件大事，要求和造反團聯合貫徹，進行大辯論，遭到造反團拒絕。8月17日，八八團召開誓師大會，會後，20多萬工人和八八團人員示威遊行，高喊“誓死保衛省委”、“省委是革命的”等口號，向造反團施加壓力。在這關鍵時刻，從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回到哈爾濱的省委書記潘復生接見紅色造反團部分學生，稱他們是“革命左派”，表示堅決支持他們。次日，即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哈爾濱也召開大會，潘復生臂戴“紅色造反團”的袖章在大會上講話：“毛主席就是讓我們站在革命左派一邊，我們就是要站出來，支持你們！”、“你們的大方向是正確的，我堅決支持你們。”潘復生誠懇檢查了運動初期的錯誤，毅然宣佈省委“8·16”通知是錯誤的。會上八八團有人遞了一個條子，問潘復生參加大會和戴上紅色造反團的袖標是自願還是被迫，潘復生念了條子後說：“完全出於自願，我還要努力做一個够格的紅衛兵戰士。”潘復生的這些行動，使紅色造反團揚眉吐氣、歡欣鼓舞；八八團却認為他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罪魁禍首”。接連十幾天，八八團對潘復生進行圍攻。

1966年8月20日以後，八八團率先呼應首都紅衛兵的破“四舊”行動，在哈爾濱市“大破四舊”，甚至還摧毀了“極樂寺”、“喇嘛臺”，大會批鬥靜觀和尚。八八團的這

一行動被造反團稱之為“轉移鬥爭視綫”。造反團說：在我們猛搞猛攻省委時，你們去鬥和尚、尼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執行者是來自省委的“走資派”，而不是和尚、尼姑。對此，八八團批駁道：《人民日報》熱烈稱讚“破四舊，立四新”好得很，並且向全國報導了上海、天津、南京等地“破四舊”的消息，難道也是“轉移鬥爭視綫”麼？有些人指責我們“鬥和尚”，這個極樂寺的方丈，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日本特務，他極端仇視我黨和人民政府，包庇窩藏惡霸地主、漢奸、特務，惡毒攻擊三面紅旗，咒罵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難道這樣的“和尚”不應該鬥嗎？你們是站在什麼“立場”上呢？（據記載：1966年11月份八八團還籌備了“極樂寺破四舊展覽”。）

1966年9月4日，在造反團主持的一次批鬥省委領導李範五、王一倫、陳雷的大會上，有人打了陳雷。這一過激舉動，雖然出於義憤，却是極其錯誤的行為，不僅不能教育人，還起到反作用，甚至授人以柄。果然，會後八八團開動宣傳車，散發傳單，聲討紅色造反團的打人罪行。9月7日，大批工人群眾上街，圍攻紅色造反者。省委門前，工人和幹部舉行示威，要求解散紅色造反團，這就是“九·七”事件。對於這一事件，省委內部鬥爭也很尖銳，有人說：“讓工人整整學生也好嘛”，但潘復生又一次表態：“紅色造反團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他們的缺點錯誤只是支流，決不是主流！沒有像他們這樣一批敢於造反的革命小將，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搞下去。”

1966年11月至12月底，哈軍工出現嚴重學員外流現象，有的長征，有的到工廠串聯，還有的當上逍遙派。校園內，兩派分別召開批判會、控訴會，鬥爭各自認定的“走資派”

對象，時有爭端發生。八八團率先進行開門整風，雖然承認運動初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却不能觸及靈魂，從思想深處挖根源。而造反團總以“大方向始終正確”自居，不認真學習政策，掌握策略，把八八團當敵人對待，不去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

毛遠新作爲哈軍工這段運動的親歷者，對軍工兩派的問題看得比較清楚。12月12日，軍工校園貼出了毛遠新的一張大字報：《我爲什麼參加紅色造反團》。造反團內部對毛遠新的大字報有兩種意見：一種是贊同，另一種是對大字報中的批評部分不能認可。而八八團對大字報基本持反對態度：有提出要和毛遠新辯論的；有把毛主席同毛遠新談話中批評章節抄出，到處張貼的；有貼大字報進行冷嘲熱諷的。

（二）大字報內容淺析

大字報一開頭，毛遠新說：“上級批准我回院參加文化大革命，回來和同志們一起革命，一起造反，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也造自己思想裏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遺毒的反；造個人私心雜念的反。九月初回到學院，做了一些調查研究，參加了不少活動，對文化革命有了初步理解。是造反團的小將們教育了我，鞭策了我；也是八八團部分同志從另一方面教育了我，開始認識到思想裏有很多錯誤，對自己進行了批判，在這裏交給大家，請同志們進一步批評和幫助。”這段話觀點鮮明，坦率真誠，給人一種談心的感覺。

大字報的第一部分用很大篇幅談自己大學六年來的思想狀況以及存在的問題。通過從自身開刀挖掘保守思想的

種種表現，剖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產生的思想根源，從而道出了自己參加紅色造反團的理由。

毛遠新對自己評價是“三七開”，成績是主要的，主流是好的。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學習成績優良，一直擔任班長、黨小組長，三好、五好學生、優秀黨員，領導信任，同學誇獎。“似乎很不錯了，現在看起來正是這些東西也害了我，是學院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深深地毒害了我，同時又利用我去執行過錯誤路綫，害了別的同志。”

毛遠新說：“現在我明白了，儘管造反派有生活上的毛病，但他們具有革命者造反的性格，我儘管‘處處皆好’，却代表了保守思潮。何謂保守？就是我常處在優越的整別人的地位，當骨幹，黨組織信任，群眾中有威望。三好、五好頭銜重重，在很多問題上自然屁股就坐在上級領導一邊，而不是坐在群眾一邊，無論如何都要維護這個立場。於是怕打亂了習慣的秩序，怕人不守規矩，維持現狀保住尊嚴，自己不革命也不許別人造反了。何謂造反？就是他們在政治上常處於受壓狀態，領導上不滿意，被人看不起，三好、五好、骨幹從不沾邊，往往處在群眾地位，對領導錯誤看得清楚，就要提意見，結果反而受壓制，於是就要反抗，就要造反。”

毛遠新還說：“可惜八八團有一些同志對此並不認識。把如此生動活潑的兩條路綫鬥爭，歸結為沒有‘小道消息’，什麼幹部子弟問題，這是不對的，是表面的。同樣小道消息有人相信，有人就不相信。至於幹部子弟，肯定有其弱點，但譚立夫把‘紅五類’、‘黑五類’劃開是唯成份論。如果當初我沒有畢業，肯定會支持並參加八八團，但那是錯誤的。當然，9月份以來，八八團也做了不少好的工作，對文化

革命有所貢獻。八八團大多數是在力爭站到正確方面來的，也有很大的進步，但由於對過去的錯誤沒有進行深刻批判，堅決劃清界限，所以做的事難免有右傾保守特點，甚至有些事情帶有深厚的機會主義色彩。這樣是不可能徹底革命的。正因為我批判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心服口服認錯，這樣我才認為自己有資格參加紅色造反團。”

大字報在肯定“造反團代表了運動的大方向”的同時，也毫不掩飾地指出了造反團存在的問題。

毛遠新認為：一是造反團在對八八團的態度和作法上分不清敵友，把執行錯誤路綫的責任加在八八團頭上。八八團中多數人曾以“對運動不理解，被領導利用”來為自己辯護過，部分人在幹部指使下收集過學員的黑材料，維護和執行了省委、院委的錯誤路綫，後來又做了些錯事。但是，“他們有多大罪過呢？院內錯誤路綫絕大多數是各級幹部執行的。八八團多數學員是我們的同志，和我過去一樣是受害者。”因此，對八八團思想批判要從嚴，要提高到路綫分歧上來認識。在作法上應該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要以理服人，熱情耐心去做艱苦的思想工作，同時允許人家有轉變過程。毛遠新堅決反對造反團中的某些以嘲笑、謾罵，以力服人的做法對待八八團。大字報中說：“戰爭是以力服人，那是對付敵人。過去八八團某些人執行了錯誤路綫、壓制過群眾。你如果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又執行了什麼路綫？至於那些幕後指揮頭上有皺紋的傢伙，只有八八團廣大群眾覺悟提高了，把少數頑固不化者孤立出來，才能徹底揪出。以勢壓人造成更深的感情對立，對他們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對文化大革命有何好處？”二是造反團應該加強主席思想和政策的學習。大字報中說：“目前形

勢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只憑‘造反有理’一股勁猛衝是不夠的了，現在既要造反到底，又要掌握穩政策，既要猛打猛衝，又要善於運用鬥爭的策略，如果再不加強主席思想的學習、政策的學習，團內思想水平已不能滿足鬥爭的需要。”

大字報還對學院裏的幹部、教員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批評意見。大字報中說：“學院裏還有相當一批幹部，至今還憂慮重重，有的滿腹怨氣，有的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不敢有鮮明觀點，美其名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請問這些老首長、老教員們，我過去做的錯事，八八團前期跌的跤子，不正是你們直接精心栽培的結果嗎？不正是你們言傳身教教出來的嗎？運動前期不是你們最積極的執行錯誤路線嗎？當前造反團不給你們算賬，而是把矛頭指向黨委，已經够寬厚的了，還有什麼氣出不來呢？我說責任主要在省、院領導，可是你們就沒有一點錯誤嗎？上推黨委下推八八團，你們就清白了嗎？爲什麼毛主席講了幾十年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你們聽不進，可省委、院黨委的指示却接受那麼快，執行那麼得力呢？這不說明你們對上面的東西具有選擇性嗎？符合自己利益的接收，不符合的選擇。正是那些指示和你們腦子裏的‘私’私字共鳴，你們才如此合拍的。”

在大字報最後，毛遠新語重心長地說：“我過去沒有學好主席思想，特別願意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中和同志們一起學好運用好，同時也建議同志們到社會上去和工農群眾一起學好用好主席思想，只要我們思想提高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對自己頭腦中的‘私’字的批判，才能批倒、批臭，文化大革命才能進行到底。”

以上對毛遠新大字報的介紹和分析，雖然十分膚淺，但大字報本身的魅力，決不是因為毛遠新的特殊身份，而是一篇認識毛主席革命路綫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鬥爭的很好教材，特別是對瞭解文革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提供了寶貴資料。

介紹一組對聯形式的大字報

——哈軍工的“對聯事件”

1966年8月，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和“八八團”兩派群眾組織在院黨委、省委問題上唇槍舌劍，爭論十分激烈。16日，在不到三個小時內，造反團在軍工校園內，一下子貼出了上百幅對聯，發生了著名的“對聯事件”。從筆者保存的76副對聯來看，其內容主要是針對八八團保省委、保院黨委，成立“官辦紅衛兵”等問題。這些對聯語言幽默、尖刻、鋒利、鮮活，字裏行間有論理，有規勸，有希冀，但更多的是諷刺、挖苦、嘲笑，甚至謾罵。其實，對聯這種別具一格的形式在文革大字報中並不少見，但數量如此之多，時間如此之集中，實屬罕見。利用對聯這種語言極度濃縮的形式批評對方，不可能充分地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實在不能褒揚。但從中也折射出青年學生思維敏捷、標新立異、嫉惡如仇等特點。針對“對聯事件”八八團說：“造反團有組織，有計劃地一下子貼出了上百付對聯，其言之惡，十分罕見，他們用最惡毒、最庸俗的語言，大罵八八團，結果大大加深了同學之間感情上

的裂痕。”顯然，就團結而言，八八團的說法是不無道理的。

以下是筆者從 76 副對聯中選出部分，供讀者參閱。

有機就投見縫就鑽體積無窮小
見巧就取遇風就轉慣性趨於零
橫批：尖端“學術”

打腫臉充胖子恬不知耻
掛羊頭賣狗肉口是心非
橫批：心懷鬼胎

八一六省委通知熱烈響應
八一八書記糾正堅決擁護
橫批：緊跟錯不了

鬚生三尺看不見
鬚長一丈才露頭
橫批：臉皮？城牆

武松打虎活虎打死
文松打狗死狗打活
橫批：各有千秋

變色龍變色千變萬變不離其宗
假猴王變形醜態百出難逃如來
橫批：誰像給誰

昨日吹捧“通知”體育館“八八團”動員
今朝緊跟“中央”俱樂部“紅衛兵”成立
橫批：謹防扒手

對左派咬牙切齒殺氣騰騰百般刁難
鬥黑幫端茶送水春風滿面恭恭敬敬
橫批：立場堅定

理應當回心轉意齊心造反
真不該執迷不悟繼續保皇
橫批：紅衛兵希望

想昨天省委門前嘩衆取寵我是八八團
看今日俱樂部內梳裝打扮吾乃紅衛兵
橫批：非驢非馬

二階導數等於零園滑過渡
六耳彌猴卅六變又顯神通
橫批：常有理老正確

介紹四位美籍專家一張大字報

在筆者收藏的文革“文物”中，有一份在中國工作的美籍專家陽早、寒春、史克、湯反帝（湯姆森）寫的大字報，油印，八開，署名“三八紅旗翻印”，時間1966年9月24日。這個“三八紅旗”（戰鬥隊）是哪個省、縣，哪個單位，已

無從考證，但從不太工整的書寫以及作者英文名字字母多處謬誤來看，一定是比較基層的單位。唯其如此，才說明這張大字報在當年流傳的廣度、深度。

大字報中，四位外國專家要求取消對他們生活上的優厚待遇，要求和普通中國人民一樣參加勞動，參加思想改造，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在當時得到許多人的支持和敬仰。特別是毛澤東主席作了“我同意這張大字報”的批示，更增加了大字報的傳播速度。四十年過去了，文革已經成了歷史。在金錢佔據人們心靈，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崇洋媚外成了時尚，大款、富翁成爲高貴，貧窮、落後成爲卑賤的今天，就更凸顯這張大字報的價值。可是，當年寫大字報的四位美籍專家現在如何？後悔了？回國了？這個問題一直纏繞在我的心頭。

世紀末的一天，筆者在《中流》雜誌十週年座談會上，有幸見到大字報作者之一的寒春同志。後來又專程到北京昌平農機修造廠家屬院拜見了大字報的另一作者——寒春的丈夫陽早。一走進他們的家，我就感觸頗深。牆上懸掛著毛澤東接見陳永貴的照片十分醒目。住房和普通職工一樣是幾間平房，屋內的擺設簡單、陳舊，地上鋪的地板革，



寒春和陽早（2000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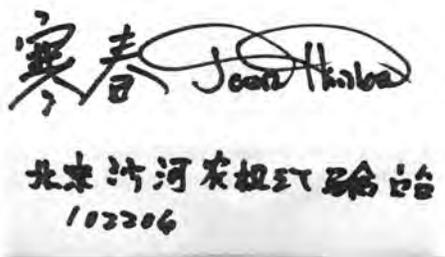
有幾處已經破裂卷邊。尤其令人感嘆的是他們自己用磚塊壘起來上面放木板而搭成的工作臺。顯然，在物慾橫流的今天，他們依

然沒有享受生活上的特殊待遇，而是保持著艱苦樸素的作風。從工作臺上放著的圖紙、繪圖工具和一摞摞的資料、英文報刊雜誌來看，年近八十的寒春、陽早還在工作著。

當談到文革中的那張大字報時，他們十分激動。寒春翻出保存多年的大字報稿、毛主席的批示和 1966 年 9 月在揭發外國專家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上的發言讓我看。從和他們的交談和寒春的發言稿中瞭解到他們的經歷和寫這張大字報因由所在。

寒春，著名國際友人韓丁的妹妹。早年在美國從事核物理學研究，曾參加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後因對美國把原子彈投放日本廣島用於戰爭不滿離開專業，1948 年來中國從事農牧業研究至今。陽早，寒春的丈夫。早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和韓丁是同窗好友。1947 年隨韓丁來到中國延安投身革命，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從事農牧業研究。

文革初期寒春全家被“保護”在高級賓館內，與火熱的外界隔絕了。寒春說：“政治待遇上，我們完全被當作資產階級專家來看待了，剝奪了我們所有的政治生活，甚至連同中國同志一起進行政治學習的機會都沒有了。在生活條件上，我們被安排到新僑飯店裏住，給我們的工資也是難以置信的，費了好大的勁，我們的工資才降到仍然非常高的水平。我的孩子原來一直生活在農場裏，生下來就和工農生活在一起，現在突然住



寒春給筆者題字（1999.12）

到賓館裏，讀書送到一個專為外國孩子和特殊的中國孩子開辦的住宿學校，這種特殊待遇使他們很不習慣。特別是以‘安全’為藉口，不許他們和中國孩子一起參加文化大革命，除了坐小車外，不許他們上街、上公園裏玩。由於孩子對這種和以前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和教育，根本不能理解，九歲的女兒神經失常了：她見東西就摔，說我是中國人，我不是外國人。有一次，她突然拿起鋼筆亂寫一氣，我怕她把墨水滴在賓館的被單上，就把一張廢報紙墊在上面，她發狂地一股勁地往下寫，突然停住了，像個獅子似的，一下子撲向我，大聲喊：你看！你看！你這個壞蛋臭特務幹什麼？你還敢讓我破壞《人民日報》？讓我在《人民日報》上亂寫？”顯然，在孩子的心目中，《人民日報》象徵著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後來，寒春一家到人民公社經過一個月的正常生活，和勞動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女兒才恢復了正常。對此，寒春曾給外國專家局寫了一封長信，質問他們為什麼要以高水平生活來收買外國人，剝奪他們的政治生活，剝奪他們與勞動人民接觸的機會，剝奪他們通過革命實踐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機會。接到信後，一位外專局的領導曾經來看寒春一家，但根本回答不了他們的問題，只是一個詞為了“安全”。寒春說：“為誰的安全？為革命的安全？根本不是。這是防止外國人被革命的中國人民‘污染’的安全，是讓修正主義的牛鬼蛇神把革命的外國人的孩子用金盤子獻給資產階級的安全！”

從寒春的發言可以看出：①他們寫大字報決不是心血來潮，不是趕形勢，而是發自肺腑的聲音。②他們是帶著國際主義精神來中國革命的，而不是來享受的。所以，當受到高於中國普通幹部的待遇時，他們由衷的憤怒，大字

報中大聲疾呼：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給外國人這樣高的待遇？制定這樣的待遇是什麼思想支配的？③他們更看重的是政治待遇，迫切要求和普通中國幹部一樣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他們十分懷念來到中國的最初十年，儘管那時物質生活十分貧乏，但平等的政治生活使他們無限滿足，所以他們稱這十年是“充滿著延安精神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階段”。④他們最喜歡和工人農民在一起。在賓館居住的日子裏，生活待遇可謂優厚之至，然而與世隔絕的政治環境使他們極度絕望，女兒甚至精神失常。當他們到人民公社和農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一個月後，疾病不治而愈。⑤他們非常注重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中鍛煉和改造自己。寒春說，被排除在三大運動之外“就等於切斷了正確思想的唯一來源，使人們完全失掉對錯誤思想，對修正主義腐蝕的抵抗力。”⑥他們對兒女的最大要求是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寒春說：“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為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絕不允許成為修正主義分子。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應當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

筆者繼而還瞭解到，大字報另外兩位作者的情況：湯反帝（湯姆森）後來回了美國；史克（韓丁的前妻）仍在北京工作。當寒春介紹我去拜訪史克時，她在電話裏用英語和她的前嫂嫂說話，我在一旁不時地聽到“大



筆者與史克（2000.11 於北京）

字報，大字報”的字眼。後來史克——這位 85 歲高齡的美國老太太，熱情地接待了我。她 1948 年來中國，從事英語教學和外文出版工作至今。她談了她的家族革命史，談了文革中寫大字報的經過以及其他外國朋友對大字報的不同看法。在說到 1967 年 9 月 8 日她在國家外文局革命造反委員會隆重紀念毛主席對大字報“九·八”批示大會上的發言時，雖然已經過去 30 多年，但那種自豪、自信和對毛澤東的無比熱愛之情，依然蕩漾在那張藍眼睛、高鼻樑的白人老太太的臉頰上。最後，她從書架上拿出韓丁的《翻身》中譯本，介紹說：這本書是描寫土地改革後中國北方農民是如何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而韓丁的另一本書《深翻》還沒有中譯本。^[1]

史克的爽朗、健談、還算流利的中國話，特別是對文革中這張大字報的清晰記憶和對毛主席的深厚感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對此次談話錄了音。最後還合影留念。

附件一：大字報的全文（中文）

《爲什麼在世界革命心臟工作的外國人被推上修正主義道路?? ?》

爲什麼在革命心臟工作的外國專家被推上修正主義道路？是哪個牛鬼蛇神指使對外國人這樣的待遇：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不論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什麼態度，都受到了這樣的“五無二有”的待遇。

[1] 《深翻》中文版已於 2008 年出版，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香港）2008 年 5 月第 1 版。

五無：沒有體力勞動；沒有思想改造；沒有接觸工農的機會；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生產鬥爭。

二有：有特別高的生活待遇；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這樣的待遇是什麼思想支配的？這不是毛澤東思想這是赫魯曉夫的思想，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結果是什麼呢？

(1) 使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真正的掌握毛澤東思，只能口頭上說說。

(2) 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

(3) 阻礙在中國的外國人的孩子成爲堅強的革命者。

(4) 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弟兄隔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我們認爲，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世界革命的原則問題，我們堅決反對這樣的待遇。

我們認爲，要成爲堅強的革命者，成爲堅強的反修戰士，爲了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決心鍛煉考驗自己，我們的後代必須成爲堅強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絕不允許我們成爲修正主義分子。爲此，我們要求：

(1) 以階級兄弟對待我們，而絕不是以資產階級專家看待我們。

(2) 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

(3) 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

(4) 允許鼓勵我們緊密的結合工農群眾。

(5) 允許並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

(6) 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

(7) 生活的待遇和同等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

(8) 取消特殊化。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爲毛主席要求的革命者。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

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

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人民、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
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萬萬歲！

美國：陽早、史克、寒春、湯反帝

1966年8月29日於北京

附件二：毛澤東在1966年9月8日的批示

我同意這張大字報。

外國革命專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不許兩樣。請你們討論一下，凡自願的，一律同樣做。

如何請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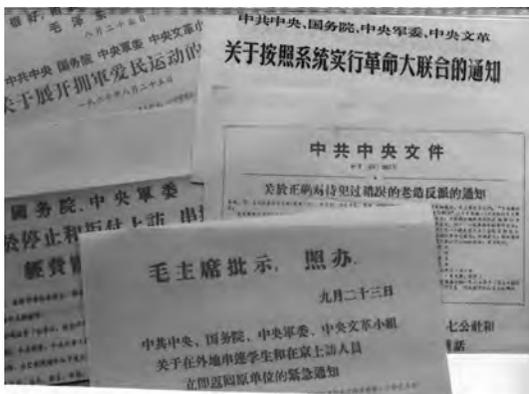
毛澤東 9月8日

談談文革中的傳單

傳單，是印成單張對外散發的宣傳品。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傳單以傳遞信息最迅速、高效、簡便易行等特點被廣泛應用，其數量之多，發放範圍之廣可謂世界之最。官方印發的傳單大都是中央通令、政策一類。大量的傳單是

群眾組織印發的。內容多為某組織的成立宣言、嚴正聲明、通告、領導講話、特號消息、號外、揭露某事件的內幕與真相、著名大字報等。比較有經濟實力的群眾組織（背後有當權派支持或掌權後）一般是鉛印傳單，個人、戰鬥隊或群眾組織處於受壓地位時往往是採取手刻油印形式。不少傳單專門註上“請傳抄、請宣傳、請翻印”的字樣。有的傳單幾經傳抄、翻印，流傳全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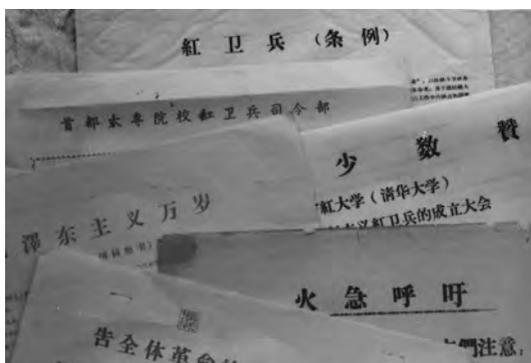
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簽發或單獨簽發的文件、通告、通知、通令等以傳單的形式公佈於群眾，是文革的首創，也是當時形勢的需要。它完全打破以往自上而下逐級傳達貫徹的形式，使中央的部署、意見直接地，不打折扣地給群眾見面，再經群眾組織的翻印、張貼或散發，達到透明度高、傳遞速度快、範圍廣泛等前所未有的效果。文化大革命中，凡是黨中央、毛主席發出的聲音，廣大革命群眾都是熱烈歡迎，堅決照辦的。即使有反對者，也只能在幕後“煽陰風點鬼火”，絕不敢明目張膽地反對，否則就會被人民群眾“砸個稀巴爛”。中央精神



文革傳單一瞥

往往是根據文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而及時制定的，所以對一些群眾組織的人和事，必然有針對性，群眾中有一些人對中央精神不理解也是正常的。由於廣大群

衆對黨中央、毛主席的信任，多數人都會通過學習在實踐中去理解。但是，往往有些群眾組織頭頭對中央精神或消極對抗或各取所需，甚至陽奉



文革傳單一瞥

陰違，這樣，就會遭到對立派群眾的口誅筆伐，使其陷於孤立，從而團結大多數。這就是黨中央毛主席既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又能及時引導群眾，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在筆者的藏品中，反映首都早期紅衛兵活動的傳單很多，如：清華紅衛兵的《三論》（66年6-7月）、蒯大富給葉林的三封信（66.6.22—7.6）、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66.8.1）、北京8中的《紅衛兵宣言》（油印、66.8.4）、北京26中學的《毛澤東主義萬歲——告全國同胞書》（66.8.21）、北京74中學的《告全體革命的共青團員書》（66.8.29，反對解散共青團）、新北大紅衛兵宣言（66.8.22）、北京人委人事局紅衛兵的《紅衛兵條例》（66.8.27）、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司令部《誓詞、宣言》（66.8.27）、北航紅旗串聯小組的《對對號》（66.9.3）、清華大學紅衛兵的“少數贊”（66.9.4）、首都井岡山一中紅衛兵《革命的大串聯萬歲》（66.9.13）、北航紅衛兵的《紅衛兵跟著毛主席闖出一條路來》（66.9.13）、《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猛烈開火——全國在京革命師生誓師大會通電》（66.10.6）、《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

命造反司令部第一、二、三號通令》(66.10.8-14)等，對當時全國文革運動起到不同程度影響和推動作用。但也有也有一些宣傳“血統論”，產生負面影響的傳單，如：北大附中《紅旗》戰鬥組的《自來紅們站起來了》(66.9.4)、北京二中紅衛兵關於取締“飛機頭”“波浪式”髮型、“牛仔褲”等為內容的《最後通牒》(66.8.18.零點)等，其中，以人大附中紅衛兵的《八項禁令》(66.8.29)比較典型。

群眾組織成立宣言一類傳單，內容大同小異，大都是表明革命造反的動機和決心、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以及標語口號等。每一份宣言裏都有滾燙撩人的語言，這是早期紅衛兵最具代表性的語言，有極強的感染力、煽動力，讀後令人熱血沸騰、激動萬分。例如：在一份《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南下兵團宣言》傳單中這樣寫道說：我們是舊世界天生的造反者！我們要造一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封建主義的反，要造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反！要把舊世界砸個落花流水、天翻地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起來革命，誰革命？我們不起來造反，誰造反？不造反就為資本主義鳴鑼開道，為無產階級生存斷路絕道；不造反就意味著背叛，就是百分之二百的修正主義！我們今天到



文革傳單一瞥

上海就是和上海紅衛兵並肩戰鬥！《復旦大學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宣言》中說：紅衛兵就要造反，不造反就是假紅衛兵，就是修正主義紅衛兵。我們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鼓足造反勁，把矛頭狠狠地指向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那條又黑又粗又長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鬧一番，大幹一場，鬧他個地動山搖，幹他個人仰馬翻！我們就是要揪住那條黑綫，狠狠地打，狠狠地打，什麼溫情、折衷，統統滾他媽的蛋，不斬斷這條反動路線，十六條就不能貫徹！不搗毀這條反動路線，鬥批改就不能完成！不炸掉這條反動路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勝利，不砸爛這條反動路線，中國就要變色！我們人少，人少又有什麼可怕？！人數雖少，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能量無窮，心懷一輪紅太陽，刀山火海我敢闖，在革命的烈火裏千錘百煉，到鬥爭的風雨中摔打滾爬，煉就一支非常戰鬥化、非常革命化的革命造反大軍。打不散，拖不垮，頂得住，衝得上，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の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鬥下去，這樣的紅衛兵，無敵於天下！《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宣言》中說：要造反，當然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甚至會遭受迫害，遭受犧牲。革命，還能輕輕鬆鬆？造反，還能一帆風順？我們頭可斷，血可流，革命的造反精神不可丟！割掉我們的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砍掉腦袋也不過碗口大個疤！過去，我們連國民黨的大刀水龍也不怕，今天，難道還怕你們小小圍攻和恐嚇嗎？過去，我們連殺頭坐牢都不怕，今天難道還怕你們扣什麼“反革命”、“反黨分子”等等帽子嗎？老實告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老爺們，我們工人造你們的反是造定了！這個反是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逼出來的。我們既然起

來造反了，這場造反仗打多久，打到什麼地步，就由不得你們了！敬愛的毛主席，我們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隊全體同志向您宣誓：我們對您永遠赤膽忠心，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辭！革命需要我們流血，我們決不皺眉，革命需要我們獻出生命，我們決不後退！我們誓死保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堅決、乾淨、徹底地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使人民江山永不變色！

從以上“誓言”中不難看到，文革時代青年人的火熱、真誠、無私、無畏的革命精神。如今這些火熱的語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上的冷漠、道德上的頹廢、物質上的享受、思想上的空虛。有人在成為大款、富豪後這樣說：“現在除了錢，我窮得什麼也沒有了。”就是當前這個社會很好的註腳。

淺談文革中的改名故事



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當時，北京師大女中學生宋彬彬給毛主席帶上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問了她的名字後隨口說道：“要武嘛！”以後，宋彬彬

便改名為“宋要武”。此事報道後，全國大中學校一些熱血青年懷著對領袖的無限熱愛，也把自己原名改為具有革命寓意的名字（工廠機關也有，相對少些）。許昌一高慕振奎同學是當時全國有名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他在一份“關於共青團的聲明”傳單署名後加上“我要改名毛要武”的字樣，連“姓”也改了。另一份“聯合聲明”的傳單，署名六人中有四人同時署上新改的名稱。

新改名字中以“紅兵”、“小兵”、“向東”、“衛東”最多。當然，也有些名字改得令人費解。比如，新疆造反派“紅二司”頭頭、新疆大學學生“吳巨輪”，改名“胡亂闖”。1968年7月20日晚，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新疆部隊和群眾組織代表時，周總理對吳巨輪說：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給中央的同志介紹你叫胡亂闖。康生接著說：你是數學專業，頭腦應該清醒，邏輯性強，更不能胡亂闖。顯然，胡亂闖這個名字改得不好。不過我想，吳巨輪同學當時改用這個名字是為表明造反當“闖將”的決心，以及對運動初期的各種清規戒律的反抗，不一定真的就“亂闖”。

文革中所改的名字，與當時出生的人所起的名字不同，文



白瑩改名毛海紅

革後大多數恢復了原名。如：武漢閱馬場中學紅小兵白瑩，因家住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文革初期就和大學生一起造反，參加了武漢水電學院“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總部”，改名毛海紅，寓意為“要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插遍全世界，實現五洲四海一片紅”。文革後她雖然恢復了原名，但是“戰友”們至今仍以“小毛”稱呼她。

當然，文革中改的名字，也有堅持用一輩子的。例如，開封師範學院“八·二四”一號服務員，原名陳榮升，改名“陳紅兵”，雖然文革後被冤獄二十年，至今仍叫陳紅兵，很多人已經不知道他的原名了；重慶特種鋼廠王敢鬥，原名王福先，文革初期是該廠黨委監察幹部，如今已經70多歲，仍叫“王敢鬥”，他說，那時候我改名“敢鬥”，就是要決心同邪惡勢力鬥爭一輩子，而不是一陣子；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原名湯本貴，文革中改名“湯向東”，畢業後我們各奔東西，從未謀面。九十年代初，我在一本農業科技雜誌上看到署名“湯向東”的論文，就給他電話聯繫：現在時興對文革“撥亂反正”，你為啥還叫這個名字？他嚴肅地說：我的名字本來就不亂，返什麼正？我的心裏頓時充滿敬意。“向東”——永遠嚮往毛澤東，他無愧於這個名字。

還有一對夫婦的改名故事很值得書寫一下。武漢最大的學生造反派組織“鋼二司”的一號勤務員原名楊書貴，文革中改名楊道遠，取革命事業任重道遠之意，曾擔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職務。1970年，湖北省委藉清查“五·一六”之名，大整造反派。楊道遠被打成湖北省“五·一六的總頭目”被關押，8年失去自由。1978年楊道遠又被誣為“四人幫”在湖北省的代理人被判刑12年。1983年出獄後，為生計，在朋友幫助下做了一筆中介生意，得了一點“辛苦

費”，湖北省委又以“貪污罪”對楊道遠判重刑 15 年。楊道遠的夫人原名孫五經，和楊道遠一樣，出身于貧苦農民家庭，文革前就是學生黨員，團支部書記。文革中改名孫衛旗，取決心捍衛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之意。他們既是同學、同志、戰友，又是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的伴侶。在楊道遠先後失去自由、坐牢的 27 年間，孫衛旗不畏強勢，堅守信仰，吃苦耐勞、無怨無悔。捍衛毛澤東思想的征途任重而道遠。楊道遠和孫衛旗所表現出來的鋼鐵般的意志和革命精神，無愧於他們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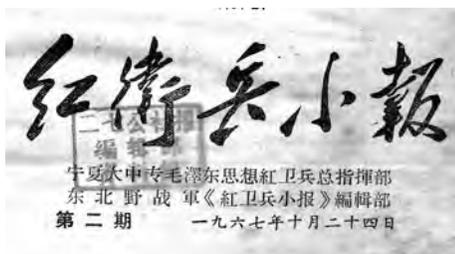
文革中的改名，看似一件小事，却反映了文革這個大背景下青年人熱愛領袖、崇尚革命的心態。

淺談文革小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報紙作為輿論宣傳的重要工具，被群眾組織應用到極致。經歷過文革的人大都知道，“出版”文革小報，無需經任何部門批准。群眾組織、戰鬥隊，甚至幾個人一商議，一份小報就出來了。當然，多為油印小報。鉛印小報大都由比較有名氣的群眾組織創辦。文革

小報品種之多、名稱之新異、出版之隨意，在中外報刊史上絕無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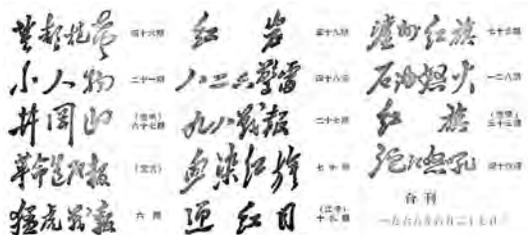
文革小報究竟有多少種？確切數量很難考證。從 1966 年 8



寧夏紅衛兵

月到 1969 年春，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全國各地群眾組織創辦的“文革小報”（或稱“紅衛兵小報”）據說有萬種之多。所謂“萬種”之說，恐怕很難囊括在鋼板上蠟紙刻寫，然後手工油印的小報。油印小報，簡便易行，文革中特別受到“戰鬥隊”的青睞。例如：河南省醫藥公司從 1966 年 11 月 27 日到 68 年 1 月 19 日，共成立過群眾組織（戰鬥隊）12 個，伴隨著每個組織的誕生，都有一份油印小報問世。一個不大的行政單位竟有小報 12 種。文革小報數量之多，由此可見一斑。應該說明的是，油印小報雖然印刷質量良莠不齊，但資料性極強。組織的成立宣言、綱領、領導組成員、重要大字報躍然紙上，原始而無雕琢。河南省醫藥公司較大的群眾組織“二七公社革聯”主辦的《勁松》油印小報，從 1967 年 5 月 20 日創刊，到 1968 年 6 月 8 日終刊，共出版 127 期。每一期都刻寫工整、印刷清晰、欄目齊全，或紀實，或評論，或詩，或文，或插圖，或漫畫，詳細記錄了這一時期鄭州地區發生的許多事件，是一份難得的比較系統的文革參考資料。

文革小報品種數量的多寡，可以直觀反映出該地區文革運動的進程。筆者通過對 29 個省、市、自治區 3000 餘種文革小報進行統計分析，品種數量佔前四位的地區依次是：北京、四川、上海、江蘇，較少的是青海和西藏（系筆者一家之言）。西藏自治區，文革前人口 180 萬，僅有



四川省《紅十條》派十四種報合刊

一所大學（西藏民族學院）還設在陝西咸陽，文革運動發展相對滯後，小報品種自然稀少。而與之毗鄰的四川省，7000萬人口，20餘所大學，文革運動異常激烈，小報的數量却是“全國罕見”。1968年5月，《四川日報》評論員文章《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思潮》一文中說：“在四川，群眾組織的大小報紙，數量之多，是全國罕見的。”1968年3月15日，周總理接見四川省革籌和駐軍代表時說：“毛主席看了許多小報。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性》，主席說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塗。還有什麼《嘉陵江上烟雲滾滾》，主席都看了。”毛澤東對小報的重視，從一個側面說明小報地位之重要。

文革小報的名稱，有鮮明的時代印記。“紅衛兵”是文革中率先出現的新生事物，受到毛澤東的高度稱讚。所以，以“紅衛兵”或“××紅衛兵”為名稱的小報各地都有。其中，寧夏一份小報乾脆就叫《紅衛兵小報》；很多小報採用毛主席語錄或詩詞中的詞語或革命聖地作為小報名稱。如《風雷激》、《換新天》、《萬山紅遍》、《指點江山》、《井岡山》、《延安》等；文革中以“革命”、“紅色”、“造反”為時尚，所以《革命造反報》、《造反有理報》、《紅紅紅》、《紅爛漫》、《紅色造反》等比比皆是。以“新”字打頭的小報，如《新北大》、《新師大》、《新復旦》、《新南開》等，取其“舊貌換新”、“破舊立新”



清華大學《井岡山》（創刊號）

之意；也有一些與群眾組織名稱相吻合的小報。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報、北京航空學院《紅旗》報、地質學院《東方紅》報、人民大學《人大三紅》報、河南《二七

公社報》、開封“八·二四”、武漢《鋼工總》、湖南《湘江風雷》等；還有一類報紙，僅從名稱就可以聞到濃濃的火藥味。如：《血戰到底》、《××怒火》、《文攻武衛》、《殺派報》



蕪湖地區《為人民》報第24“炮”

等，其中有的還把“第×期”改為“第×聲”、“第×炮”、“血戰×號”。從這些小報上頻頻刊登的死難“烈士”的照片、××慘案經過、聲討文章等，就可以理解“聲”、“炮”的含義，一期報紙何嘗不是一發炮彈，一聲吶喊！1967年2月以後，不少地區軍隊在支左問題上支一派、壓一派，調動不明真相的農民進城圍攻造反派，頻頻發生武鬥，造反派死傷慘重。這些小報大都產生於這個背景。

有的小報名稱聽起來怪异，其實是有背景的。例如：河南省安陽縣《鷄毛上天》小報名稱，來源於1955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為安陽縣南崔莊農業生產合作社《誰說鷄毛不能上天》一文寫的按語，稱讚他們克服種種困難，由小變大、由窮變富，鷄毛終於



河南安陽二七分社主辦

飛上天精神的事；還有《狂人》、《大喊大叫》、《反到底》、《闖報》等，形象的反映出文革中人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狀態；還有《專刊》、《會刊》、《批



內蒙古造反派小報

× 戰報》等，是對某人某事件的專題報道；而《揪壞頭頭戰報》、《反極左戰報》、《反武鬥戰報》、《反復辟戰報》、《反逆流戰報》等，更直觀地反映了辦報者鮮明的政治觀點。文革中兩派群眾組織都辦有小報，其中內蒙古自治區造反派報頭上都帶有鐮刀斧頭標記，區別十分明顯。總之，林林總總的小報名稱就是文革的一道獨特風景。

文革小報的版面五花八門。一般多為八開4版，也有少量對開4版、4開4版的；有16開雜誌型的，也有32開書籍型的。報頭幾乎都是採用“毛體”（毛澤東手書），以示對領袖的熱愛和崇敬。套紅版小報一般用於創刊號、各種紀念日、最高指示的發表、革委會成立等重大事件，彰顯出“紅彤彤”的時代風采。

文革小報大都是不定期出版。只有少數著名群眾組織所辦小報，規律性、連續性較強。如：清華大學《井岡山》報，從1966年12月1日創刊，到1968年5月31日，出版了154期，其中包括一些合刊或專刊；上海復旦大學的《新復旦》報，創刊於1967年1月10日，出版51期後，9月1日改為《復旦戰報》，1969年5月7日終刊，共出版152期；河南《二七公社報》的前身是《直搗中原》報，出版33期後，1967年9月2日改版為《二七公社報》，1968年8月8日，隨著二七

× 戰報》等，是對某人某事件的專題報道；而《揪壞頭頭戰報》、《反極左戰報》、《反武鬥戰報》、《反復辟戰報》、《反逆流戰報》等，更直觀地反映了辦報者鮮明的政治



河南《二七公社報》終刊號
(1968.8.8)

公社“倒旗”（即撤銷）而終刊，共出版 148 期；1968 年 8 月 12 日，《河南二七報》創刊，仍是《二七公社報》原班人馬，沒有署主辦單位，實際上是由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直接領導，出版 37 期後（1968 年 11 月 5 日）停刊整頓，11 月 25 日改為河南省工代會主辦；河南省委機關“井岡山兵團”主辦的《井岡山》報，創刊於 1967 年 9 月 10 日，到 1968 年 2 月 29 日終刊，共刊出 30 期。1968 年 4 月 16 日復刊，仍由原省委機關井岡山兵團主辦。到 1968 年 8 月 10 日第 59 期，改為原省委機關鬥批改領導小組和原省委機關，井岡山兵團合辦，1968 年 12 月 16 日，第 82 期改為省直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三團六營一二三連和原省委機關鬥批改領導小組主辦，共出版 86 期，是筆者收集到的比較完整的一份文革小報。

文革小報的內容主要有：首長講話、中央文件、重大消息、批判文章、聲明、通告、以及組織之間的辯論文章等等。報頭旁大都刊有和主題內容相關聯的《毛主席語錄》，這是文革小報的顯著特徵之一。文革小報作為一派群眾組織的“喉舌”，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同一次武鬥事件，兩派小報的報道大相徑庭。各自斥責對方是“挑起武鬥的罪魁禍首”，言之鑿鑿、慷慨激昂，讓人難辨真偽。所以，對重大事件的判斷，主要看大局、大方向，看旁觀群眾的評判，還要看當事者對事件的反思以及中央關於該事件的調查和表態，不能完全聽小報的一派之辭。

還有一份小報不能不提一下。1967 年 1 月 18 日，北京四中牟志京等同學創辦了一份《中學文革報》，署名“首都中學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傳部”。因創刊號上刊登了遇羅克（署名“北京家庭問題研究小組”）的《出身論》而名聲大振。《出身論》約 3 萬餘字，從理論上批判了反動的“血統論”。

該報首次印數3萬份，一售而空，在全國引起反響，一時洛陽紙貴。同時，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第一期在印刷廠就被“聯動”搶走一部分，在以後



《中學文革報》創刊號

三個月裏，共出版了6期，其間重版了《出身論》9萬份。該報發行時間短、期數少、發行量大、影響面廣，在文革小報中獨一無二。

毛澤東說：文化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就是打擊面寬了，致使不少老同志受到衝擊。“全面內戰”就是武鬥。這些被毛澤東稱為文革“三分不足”的錯誤，在文革小報中都留有痕迹。比如，含有諷刺、醜化成分的漫畫、宣傳畫、插圖、頭像等在不少小報中都能找到。1968年7、8月間，河南省一些小報登載了部分省委領導（時稱“走資派”）的頭像，受到省革委主任劉建勛的嚴厲批評。同時，也加速了小報的停刊和群眾組織的“倒旗”（即撤銷）。

文革小報的鼎盛期是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1969年上半年大都停刊，少數更名後改為革命委員會機關報繼續出版，黨組織恢復後幾乎絕迹。由於文革小報是文革時代的歷史見證，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收藏價值。筆者收藏約3000種文革小報，涉及29個省市自治區。特別是500餘份油印小報，隨著印刷業的數字化，油印方式被淘汰，其中字體工整、排版合理、插圖齊全的上乘之作，更顯得彌足珍貴。

從傳單的署名看文革時代的詞彙特徵

筆者是文革品的收藏愛好者。在整理藏品的過程中發現文革中的傳單署名具有強烈的時代感。這些署名除極少數是真名實姓外（文革初期），絕大多數都是戰鬥隊的名稱或隨意署的化名。把這些林林總總的署名集中起來幾乎就是那個時代詞彙的縮影。

於是，筆者對千餘份傳單署名進行了粗略的歸納分類，從中選出了 500 多個不同的署名。從這些署名可以看出文革時代特有的詞彙特徵。

首先是“紅”字打頭的署名。“紅衛兵”、“紅衛隊”、“紅鬪將”、“紅號角”、“紅旗”、“紅星”、“紅心”、“紅遍全球”、“紅色風暴”、“紅色宣傳員”、“紅色小老虎”、“紅色造反者”、“紅紅紅”等等。這些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創造出來的，充斥中國文化領域各個角落的“紅色”詞彙，表現出那個時代人們的火紅、真誠、無私、無畏、狂熱的心理狀態和創造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的雄心壯志，是文革中最有代表性的詞彙。

傳單署名中用的比較多的還有借用毛澤東詩詞中的詞彙。如：“縛蒼龍”、“全無敵”、“千鈞棒”、“雲水怒”、“風雷激”、“只爭朝夕”、“倒海翻江”、“中流擊水”、“激揚文字”、

“赤遍全球”、“鷹擊長空”、“百萬雄兵”等，既說明毛澤東詩詞中特有的詞彙魅力，也說明人們對偉大領袖的無限熱愛和崇拜。

以時間（月日）為戰鬥隊名稱的有：（1）毛主席接見日：如“八·一八”、“八·三一”等；（2）群眾組織成立的日子：如開封師院“八·二四”、四川大學“八·二六”、重慶大學“八·一五”、洛陽“八·一六”等；（3）革命紀念日：如“二·七”公社、“十·一”戰團、“五·四”戰團等。

還有一些深刻、幽默、怪异、諷刺一類署名，更能反映出文革中階級鬥爭的尖銳性、複雜性。從中似乎可以嗅到濃濃的火藥味，聽到紅衛兵小將的戰馬嘶鳴聲……。這些詞彙的出現，大多都有其特殊的事件背景。比如“鬼見愁”曾是一首流傳很廣的對聯譜寫的歌曲的名稱，歌詞的前兩句“老子革命兒接班，老子反動兒背叛”是由“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充滿血統論觀點的對聯改編的。1966年8—9月，北京一些自封“自來紅”的高幹子弟所以抬出“血統論”來，完全是為了對付響應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號召起來造“走資派”反的少數派學生的。在他們眼裏，這些造反派就是“反革命”、“牛鬼蛇神”，他們認為造反派見了這幅對聯就害怕了，一籌莫展了，故取名叫“鬼見愁”。後來，接受江青的建議後修改了。修改後“鬼見愁”中“鬼”的含義就完全變了，這個鬼就是包括“走資派”在內的一切反動派、“牛鬼蛇神”。在筆者收藏的傳單署名中還有“不怕鬼”、“殺閻王”、“照妖鏡”、“鐵棒槌”、“斬修根”、“掘墳墓”、“挖黑綫”、“打鬼”、“降妖”“驅魔”、“叛逆”、“斬妖除蛇”、“虎口拔牙”等都表現了傳單作者同邪惡鬥爭的決心；“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喝水”、“不怕死”、

“越壓越硬”等更直白地道出在同“走資派”鬥爭中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氣象站”、“摸營地”、“攪拌器”、“給你稻草”、“紅辣椒”、“吃螃蟹”等看似怪异難解，實則幽默有趣；“沒有理”、“想坐牢”、“阿斗”、“狂妄”等恰恰是反話。

以下是筆者對傳單署名的分類，僅供愛好者參考。

一、“紅”字打頭

紅旗、紅星、紅衛、紅心、紅鷹、紅哨、紅松、紅光、紅流、紅笛、紅纓、紅鬃、紅嫂、紅衛兵、紅衛隊、紅衛軍、紅小兵、紅鐵兵、紅先鋒、紅號角、紅世界、紅五星、紅海嘯、紅燈照、紅飛虎、紅戰隊、紅鐵筆、紅鐵錘、紅尖兵、紅闖將、紅尖刀、紅老虎、紅刺刀、紅炮手、紅旗手、紅鋼刀、紅纓槍、紅旗手、紅旗飄、紅全球、紅紅紅、紅心向黨、紅色革命、紅色雷達、紅遍全球、紅色風暴、紅色前哨、紅色戰友、紅色小卒、紅色暴徒、紅色尖兵、紅色戰士、紅旗飄飄、紅色風雷、紅色宣傳員、紅色遊擊隊、紅色遊擊兵、紅色小老虎、紅色造反者、紅色無產者、紅色勞動者

二、借用毛澤東詩詞中的詞彙

長征、勁松、狂飈、赤旗、長纓、昆侖、伏虎、縛蒼龍、千鈞棒、從頭越、追窮寇、雲水怒、在險峰、炮聲隆、全無敵、奔騰急、爭朝夕、風雷激、乾坤赤、飛鳴鏑、驅虎豹、真如鐵、鏖戰急、學闖道、鏢未殘、傲霜雪、今勝昔、重開戰、送瘟神、多奇志、起宏圖、仍從容、滿江紅、戰鯤鵬、盡朝暉、看今朝、凌雲志、不爭春、漫天雪、叢中笑、盡開顏、浪滔天、過大江、傾盆雨、孫大聖、驚回首、主沉浮、從來急、征腐惡、起風雷、換新天、曾記否、浪遏飛舟、只爭朝夕、倒海翻江、秋收起義、獨立寒秋、中流擊水、激揚文字、赤遍全

球、五洋捉鱉、鷹擊長空、東方欲曉、百萬雄兵、雄關漫道、白浪滔天、知向誰邊、戰地黃花、還看今朝、衆志成城、五洲風雷、颯爽英姿、揮斥方遒、東風萬里、金戈鐵馬、萬山紅遍、踏遍青山、笑指沙場、指點江山、長纓在手、橫空出世、刺破青天、山上山下、巋然不動、風景這邊獨好、萬馬戰猶酣

三、“革命”打頭

革命無罪、革命造反、革命暴動、革命狂飈、革命火種、革命闖將、革命火炬、革命青年、革命到底、革命先鋒、革命烈火、革命狂人、革命大批判、革命敢死隊、革命敢闖隊

四、標語、口號、語錄

衛東、忠東、跟東、向東、向陽、永革、永向陽、向太陽、東方紅、太陽升、永衛東、齊衛東、齊向東、共向東、齊衛紅、衛東彪、向日葵、誓衛東、三忠於、鬥批改、十六條、衛三紅、更堅強、心向黨、反帝修、毛林之兵、造反有理、鬥私批修、破私立公、破舊立新、大破大立、滅資興無、文攻武衛、不怕犧牲、排除萬難、革命大批判、炮打司令部、關心國家大事、捍衛六六通令、保衛毛主席、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毛澤東主義、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綫、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五、地名、人名、紀念日

韶山、遵義、延安、古田、瑞金、南昌、寧崗、長城、黃河、淮海、韶湘、岷山、東海、井岡山、平型關、金沙江、

羅宵山、向北京、黃河浪、井岡松、韶山紅日、井岡紅旗、延安之火、黃河之濱、黃河怒吼、東海前哨、萬里長江、天安門縱隊、井岡山的敢松、焦裕祿、劉胡蘭、黃繼光、魯迅、雷鋒、歐陽海、七一、五一、八一、十一、五四、五·七、八·八、八·五、八·一八、八·一五、八·一六、八·二六、八·三一、九·一五、四·二二、四·一四

六、深刻、怪異、幽默、諷刺

吶喊、橫眉、橫掃、好鬥、狂人、抓鬼、降妖、除害、死硬、怒火、玩命、狂妄、驅魔、叛逆、敢死、阿斗、鬪謠、投槍、金睛、掃敵、怒潮、敢拼、敵敵畏、紅辣椒、吃螃蟹、六月狂、笑笑笑、小猛虎、小人物、尖刀班、原子彈、高射炮、叛逆者、反倒底、上刀山、下火海、天不怕、狼牙山、鬼見愁、不怕鬼、硬骨頭、想坐牢、不怕死、死不怕、反逆流、反迫害、照妖鏡、摸營地、殺閻王、明槍手、鐵棒槌、駁謬論、揭陰謀、沒有理、敢死隊、戰妖風、殺妖風、挖黑綫、掘墳墓、斬修根、挖毒根、闖天下、鬧天宮、狂妄人、何所懼、壓不垮、主義真、大無畏、攪拌器、小口徑、衆愚公、揭醜事、拼刺刀、大聖棒、氣象站、消毒隊、敲警鐘、老部下、給你稻草、專打老保、斬妖除蛇、專揭真相、越壓越硬、刺刀見紅、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喝水、一拼到底、解放自己、頂天立地、烈火熊熊、炮火連天、逢山開道、炮火連天、挺身而出、互相啓發、銅牆鐵壁、鷄毛上天、虎口拔牙、點火大軍、含熱核原子彈、巡迴醫療隊、提著腦袋幹革命

七、其它

火種、火炬、風暴、響箭、先鋒、衝鋒、烽焰、烽火、

霹靂、鋒芒、遠征、巨浪、東風、永紅、海燕、星火、轉戰、險峰、反修、群革、烈火、無畏、燎原、閃電、尖刀、覺醒、雄鷹、激浪、青松、春雷、猛衝、要武、真理、風雷、激流、暴風、山鷹、抗大、號兵、山高、洪流、繼紅、火焰、鐵騎、敢闖、赤旗、赤峰、赤膽、赤潮、旌旗、文鬥、鐵軍、捍真、前進、奔流、火花、朝陽、蒼松、新兵、雪蓮花、東風烈、看得遠、小觀察、小評論、瞭望哨、前哨兵、子弟兵、大方向、赤衛軍、赤衛隊、野戰軍、萬山紅、宇宙紅、滿天紅、迎風浪、爲人民、無產者、老三篇、敢革命、迎阻力、北斗星、挺進隊、火車頭、學紅軍、過大關、鐵掃把、虎山行、小分隊、梅花笑、孺子牛、進軍號、經風雨、大民主、雷達兵、鐵騎尖兵、碧血中州、鏖戰中原、第一紅岩、新生力量、高舉紅旗、筆下雷聲、千錘百煉、五洲風雷、五湖四海、星星之火、東風勁吹、跟踪追擊、南征北戰、窮追到底、星火燎原、普通一兵、萬衆一心、乘風破浪、國際歌戰團、青年近衛軍、毛主席警衛大隊、工農兵突擊兵團。

筆者從文革的署名，聯想到改革開放初期充斥城鄉的小飯館、小商店、理髮店等名稱以及如今網絡時代的網名來。它們五花八門，隨意性、個性的張揚極強，但缺乏的恰恰是文革時代的戰鬥性、革命性、群體性。

附件：一份傳單的署名（122 個戰鬥隊）



傳單說明：

(1) 傳單的名稱：《鬥爭三反分子楊勇、廖漢生籌委會宣言》，這是發起單位的署名部分。

(2) 從傳單內容看，這份傳單屬於解放軍某部的。

軍營生活的回憶

29年前，我們67、68屆大學畢業生，在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戰鬥洗禮”後，被分配到解放軍農場接受再教育。這裏記述的是那段特殊軍營生活裏發生的真實的故事。

畢業前夕

1968年夏秋之交，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進入了“鬥、批、改”階段，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了大中學校，工人階級佔領了教育陣地。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叱咤風雲的紅衛兵小將們，熱烈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滿懷革命豪情到農村去，到工礦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正在蓬勃興起。8月24日，河南省省會鄭州召開了歡送首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會，在鑼鼓喧天、鞭炮齊鳴聲中，薛喜梅等71名鄭州中學生響應毛主席關於“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號召奔赴河南省郊縣人民公社去“經風雨，見世面，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上山下鄉的浪潮震蕩著每個青年學生奮發向上的心。

我們 67、68 屆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何去何從？面對去向問題，學校“工宣隊”組織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學習毛主席有關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的教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與工農民衆相結合”、“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它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起。”我們一次次口誅筆伐，批判“讀書做官論”，批判小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我們在毛主席像前表決心、立誓言：服從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於是，我們被分配到解放軍農場和農村接受再教育。

1968 年 9 月，河南農學院 67、68 屆畢業生 200 餘人和全省其它大專院校及外省分配來的大學生一起，分別奔赴平頂山、安陽、開封、商丘、湖北等解放軍農場勞動鍛煉。

“大班幼兒園”

那是個秋高氣爽的日子，我們一行數十人，高唱革命歌曲，一路歡聲笑語從鄭州乘車來到了平頂山 8212 部隊解放軍農場。一下車，部隊首長、戰士熱情地歡迎我們並忙著安排食宿。一排排平房宿舍雖然簡陋，却收拾得乾乾淨淨，給人一種樸素、舒適的感覺。下午，我們三五成群，熟悉環境。這是個約有 500 畝地的小型農場，南邊是一條人工河（後來知道叫湛河），河水清而深，流動緩慢，岸邊垂柳成蔭，樹蔭下長著青草。我們的營房緊靠岸邊。田地裏沒有秋莊稼，只有麥茬還在那裏仰著頭頑強地掙扎著（也許是在等待著

我們去開墾它吧!)朝北望去,平頂山很近,山不雄偉,樣子却奇特,突兀頂平,名副其實。好一派田園風光!!晚飯後,因為奔波了一天,我們正準備睡個大覺,忽聽軍號響起來,接著緊急集合。毫無準備的我們,一個個鬆鬆垮垮,稀稀拉拉,排好隊聽連長講話:“從今天起,你們就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戰士了。戰士有戰士的規距,一切行動聽指揮,今天晚上看電影,不准請假,不准早退。”接著,每人發了一個小方凳,我們排著不太整齊的隊伍,邁著不太整齊的步伐來到露天電影院——打麥場上。連長喊“放凳子,坐下!”,我們幾十個20多歲的大學生撲通撲通,下餃子一樣坐下來。“站起來,坐下!”排長口令:“再站起來,再坐下!”就這樣反復幾次,仍是不理想。就這樣,電影開始了……第二天,有人就把第一晚的情景戲稱為“大班幼兒園”。

接著,我們這些“大班幼兒生”就開始了第一課軍事訓練。大學生活的後兩年,我們停課鬧革命,紀律性差,自由散漫,現在一下子緊張起來,真有點不適應。軍訓是艱苦的,枯燥無味的,只有機械的動作,規範的行動。早晨5點鐘,清脆、響亮的起床號聲驚醒了我們的好夢,我們一骨碌爬起來,穿衣、洗臉、刷牙,要求在幾分鐘內完成。開頭幾天,不是這個衣服穿錯了,就是那個鞋穿反了;這個褲帶沒系好,那個的扣子系錯了;這個頭髮沒梳,那個臉沒顧上洗,洋相百出。解放軍要求很嚴,立正,稍息,齊步,跑步,一遍遍地訓練,還有真槍實彈的射擊訓練,光榮傳統的思想教育等穿插進行,這時候我們這些自認為經受“文革”錘煉的大學生才感到和解放軍比起來真是“大班幼兒生”呢!一個月的軍訓生活,我們臉曬黑了,體格壯了,隊伍整齊了,紀律性強了,“大班幼兒生”真成了不

穿軍衣的兵了！

思想教育

如果把第一階段軍訓比作“大班幼兒園”的話，第二階段的思想教育就是“升級”了。我們是懷著各種各樣的思想來到解放軍農場的。有人認為，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衝鋒陷陣，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沒有必要接受再教育。有的認為，我們有知識，有文化，哪點不比工農兵強？還有人認為，讓我們來這裏幹原始式的農活，大材小用。針對種種思想，部隊領導就大學生要不要接受再教育的問題展開了大學習、大討論。請軍隊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做報告，請老煤礦工人講過去，聽部隊首長講戰爭經歷，講革命烈士為國獻身的英雄事迹。同時舉辦“鬥私批修”講用會，採取多種形式讓我們在對接受再教育必要性的討論中接受教育。

8212 部隊（駐豫炮兵二師）蔡鐸師長從小沒上過學，是個苦出身，十幾歲參軍後，扛槍打仗，參加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身上帶著敵人的彈片，打仗空隙學文化、學軍事，在給我們講他的戰鬥經歷時，哪個山頭有多高，哪裏地形如何，都記得清清楚楚，他的報告很感人，我們很服氣。

對於這段思想教育，我在當年的“學習筆記”中這樣寫道：“通過這一段的軍訓和思想教育，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和解放軍相比，我們多喝了幾年墨水，我們有知識、有文化，

但解放軍的純樸、忠誠、吃苦耐勞、人格高尚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雷鋒不就是解放軍這所大學校裏培養出的英雄嗎？農場的生活苦，農活累，恰恰可以磨煉我的意志，使我親身體驗‘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內涵。”這段話現代青年聽起來也許是可笑的、不可思議的。但對我却是那樣印象深刻，永誌不滅，終生難忘。幾十年來，我自願到基層、到農村工作，和工人農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榮譽面前不自滿，困難面前不低頭，權力在手時不謀私利，金錢面前不貪婪。我始終是一個平凡普通問心無愧的人。

“四不准”

大學生畢業生集中到解放軍農場勞動鍛煉，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戰略舉措，在實行過程中出現一些苛刻要求和近人情的東西，“四不准”就是這種產物。

到農場的第二天，我們在進行編制時，就出現了使人不理解的事，即男女學生分成男生連和女生連。男女連隊之間還相隔一段距離。我們除了軍事訓練、政治學習外，還要從事耕田種地等重體力勞動，如果男女學生一起就能在農活上互相幫助，為什麼偏偏要分開呢？部隊首長來連隊給我們宣佈紀律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大學生在勞動鍛煉期間要執行四不准：一、不准回家探親；二、不准談戀愛；三、不准結婚；四、結了婚的不准過夫妻生活。好一個“四不准”！簡直像王母娘娘的簪子一樣劃個天河把我們分成男生連、女生連。碰巧的是，我們男女連隊之間

正好隔著一條人工小河！“四不准”使我們女大學生吃盡了苦頭。農場的勞動是把旱地改水田的體力活，我們只能像男生一樣捲起褲管，趕著水牛在泥裏、水裏犁地、耙地，然後插秧、管理、收穫，完成水稻從種到收的全過程。一天的農活幹下來，一個個累得身子骨像散架一樣，還得裝成若無其事的樣子，高唱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有些體質柔弱的女生只有在被窩裏抹眼淚。

學校畢業前夕，有的男女生已經戀愛，雙雙來到農場。“四不准”使他們飽嘗咫尺天涯的相思之苦。於是，遠送秋波，傳遞紙條，鵲橋暗渡之事屢屢發生，當然也因此而屢屢受到連長的訓斥。甚至還出現因違犯“四不准”受到黨紀處分的事件。有個女大學生，德才兼備，還是學生黨員，已婚的愛人是現役軍人，享受探親假從遙遠的西北來到農場。恰逢“四不准”，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在這裏居住下來。他的妻子，那個女大學生却因此而受到黨紀處分。

到了1969年8月，我們來這裏已經一個年頭。同學們對軍營生活已經適應，却對“四不准”始終耿耿於懷。一天，河南省軍區政委、省革委主任劉建勛來到我們農場視察。因為我的未婚夫是我校紅衛兵頭頭，省革委常委，他分配到離此30公里的農村勞動鍛煉，因“四不准”，我們彼此不能見面，大家就鼓動我去找劉建勛反映“四不准”問題。於是我去見劉建勛。劉建勛向：“小范呢？”我說：“在葉縣插隊。”“你想見他嗎？”“四不准，不敢見。”劉建勛笑了，讓我坐上他的車，在8212部隊蔡師長的陪同下到了葉縣田莊公社龍潦大隊，見到我的愛人後又一起返回平頂山。回

到農場的時候，整個農場沸騰了！“啊！劉建勛帶頭打破了四不准，我們自由了！”從這以後，雖然沒有正式宣佈解除“四不准”，但這條規矩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了。到1970年2月鍛煉結束時，竟然出現了新的情侶，甚至發生解放軍和女大學生戀愛的事。看來，“四不准”是擋不住青年人的愛情的，然而因違反“四不准”而受處分的，也就白白冤枉了。

勞改犯？大學生？

我們勞動鍛煉的平頂山8212部隊農場原是個勞改農場，部隊接管後，那裏不再有勞改犯。我們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戰士。但衣服爛了，可以用舊軍裝打補丁。一些男同學不知是真的沒衣服穿，還是處於對“四不准”的不滿，或是故意幽它一默，破衣服補滿黃補丁，加上頭髮不理，鬍子不剃，打扮得真有點像勞改犯。一次，幾個這種打扮的男同學和解放軍戰士一起去附近的東工人鎮買菜（因礦工居住區而得名），招來鎮上群眾異樣的目光，有的小聲問解放軍戰士，什麼時候來勞改犯了？戰士笑道：什麼勞改犯，是來勞動鍛煉的大學生！“啊，大學生！”人們心目中的驕子，竟穿得像勞改犯一樣走在大街上，這既是對“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思想的挑戰，也是對“四不准”這一極端做法的抗爭！

病號飯

解放軍是一個團結和睦、互相關懷、互相愛護的大家庭，誰有了病，連、排長問寒問暖，連隊還專門設有醫務室。我所在的排有 30 多個女大學生，排長是一個年僅 19 歲的解放軍戰士，他既嚴肅又活潑，背地裏我們稱他“可愛的小弟弟”。我當時被任命為副排長，主管女同學的一些事務。女同學月經期間不能上早操和幹重活，我給排長請假：×××、×× 有病了，排長以為真有病了，就發揚雷鋒精神，給這些同學端來了“病號飯”，當她們吃著這香噴噴的病號飯時，都咯咯地笑了。時間久了，“怎麼每天都有病號？”排長犯了嘀咕，我實在不好意思當面給他解釋（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對談男女之事十分忌諱），只好紅著臉去給連長反映，讓連長去給這個單純、可愛的解放軍小弟弟解釋去吧！

歡樂的軍營生活

俗話說：“仨女一臺戲。”幾十個女大學生在一起更是熱鬧非凡，勞動歸來，學習之餘，歌聲、笑聲不斷。自編自演節目，自辦文藝晚會是經常的事。晚會的內容豐富多采：唱革命歌曲，唱樣板戲，唱本連本排的好人好事，唱我們的好排長、好連長；晚會的形式各種各樣：京劇、豫劇、

曲劇、快板書、三句半，吹拉彈唱，樣樣俱全。由於有師院藝術系的學生參加，節目的質量還相當高。

由於營房緊靠湛河，得天獨厚，游泳成了我們最喜愛的運動項目之一。在解放軍指導下，我們這些北方的旱鴨子大都學會了游泳，還常常舉行游泳比賽。這是我一生中僅有的游泳生涯，我至今還保存著當時的游泳衣。

詩朗誦、演講會是大學生的拿手戲，這裏的湛河、平頂山為我們增光添色。“平頂山下，風展紅旗如畫”、“湛河兩岸盡朝暉”、“平頂山高，沒有黨的恩情高；湛河水深，沒有階級感情深”，這些充滿激情的句子至今記憶猶新。

更有趣的是跟我們的解放軍連、排長開玩笑。排長是河南信陽人，口音比較特殊。我們問：“今天吃什麼飯？”排長答：“大米飯。”“啥大米飯？”“大米稀飯。”這幾句話在排長口中變成了“索法？”“島米法。”“索島米法？”“島米西法。”於是我們為排長的這幾句話譜了曲：| 5 4 | 1 3 4 | 5 1 3 4 | 1 3 7 4 |。我們的連長是黃河北長垣縣人，他的口音裏把 an (安) 讀成 ai (哎)，有同學給他編了順口溜：出了門，往正南 (nai)，腰裏塞了三分錢 (三讀作 Sai，錢讀作 qiai)，買了三個綠豆丸 (丸讀作 Wai)，光加醋，沒加鹽 (鹽讀作 yai)，酸甜，酸甜 (酸讀作 Suai，甜讀作 tiai)。連長讀著順口溜笑得前仰後合，同學們也笑了，笑聲在農場的上空回蕩……

要奮鬥就會有犧牲

一年的軍營生活，鍛煉了我們思想，強健了我們身體，

却也付出了血的代價。我的同學劉成姣，是河南農學院 68 級農機系學生，她潑辣能幹，事事處處不甘落後。1969 年秋打稻子時，不慎將右手絞到脫粒機裏，手臂被打成肉糊，當我們把她的胳膊拉出來時，只見兩個鮮血淋淋的指頭系在筋管上，她很堅強沒有哭，雖然立即送到醫院，後又轉到上海治療，最終還是失去了右手，成了終身殘廢。

鍛煉期間，我們還到平頂山十礦體驗煤礦工人的生活。在那裏，我親眼目睹了一個 26 歲叫王清江的礦工受傷的情景。下井前，我們還在一起談笑，他讓我們看他女兒的照片，下井後，由於冒頂事故，他的臉被擠壓在鐵柱子上，造成面部受傷、牙齒全部脫落、鎖骨粉碎的重傷。10 天的礦井生活，使我深深地體會到煤礦工人的辛苦與奉獻精神。

1970 年 3 月，我們結束了這段特殊的軍營生活，重新分配到各地去工作。如今，我們已是年過半百的人了。歷經滄桑，回憶往事，有激情、有汗水、有歡樂、有不解、有遺憾、有反思，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實實在在地當了一回普通一兵，在苦和累中磨練了自己，去掉了驕嬌二氣。“經歷是財富，苦難是老師”，每當我給孩子們講起這些故事時，他們總是像聽天書一樣不能置信，然而，這的確是真真實實的故事。

1996 年 8 月完稿

原載《1966 我們那代人的回憶》（徐友漁主編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 1998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平頂山解放軍農場留影 1970年2月



與李令英留影
(1969年4月於
平頂山十礦)



下井之前留影
(1969年4月於平
頂山十礦)

關於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看法

對於 1966—1976 年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席捲全國、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立場不同，看法也截然不同。毛澤東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而毛澤東去世後，曾信誓旦旦保證“永不翻案”者却把文化大革命定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而徹底否定。二十多年來，隨著中國社會實踐的驗證，文化大革命的功過愈來愈清楚地展現在人們面前。究竟該如何評價這場偉大革命運動，不只是關係到對毛澤東的評價，而且是關係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甚至涉及到世界“共運”的諸多理論和實踐。所以，每個願意繼續革命的人不得不對此作出判斷和認識。

2001 年春，北京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由於中國的社會現實，使他很想從新認識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於是，就請幾位經歷過文革的同志敞開心扉，各抒己見，談論自己對文革以及彭德懷問題的看法。筆者有幸看到寫給這位老同志的發自肺腑的文章或信件，就結合自己的看法，分別就幾個焦點（也是要點）問題，寫出《關

於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看法》一文。後來，由於某種原因，這篇文章在電腦文檔裏躺了六年，最近才進行了修改，供讀者參考和評論。

毛澤東爲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理論依據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毛主席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綫。”（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8月）“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5年9月）“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有無產階級專政變爲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爲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1967年2月的一次談話）而鄧小平否定文革的論點是：“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的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究竟孰是孰非？談一點粗淺看法。

（一）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論點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的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寫道：“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存在著復辟的希望，並把這種復辟的希望變成復辟的行動。這些復辟行動除武力的就是和平的，在共產黨裏找代理人是最好的辦法。”列寧又說：“……在革命已經爆發，鬧得熱火朝天的時候，有的是為了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為了貪圖祿位，在這時候做一個革命家是不難的。無產階級在勝利之後，要費極大氣力，可以說要用千辛萬苦的代價，才能從這種‘蹩腳’的革命家手裏‘解放’出來。”這些蹩腳的革命家，這些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就是黨內走資派。他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進行了各色各樣的表演，有的唱紅臉，有的唱白臉，但是萬變不離其宗：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在所有制上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竭力維

護、鞏固、發展私有制。只要認真回顧一下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鬥爭的史實，再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觀點加以分析，就可以斷定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論點是完全符合中國實際的。

新中國的誕生，標誌著民主革命的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大講資產階級剝削有功，批評山西省委發展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經毛澤東嚴肅批評後，他暫時收斂了。在毛澤東和黨中央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綫的照耀下，我國於 1956 年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從而又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經過 1957 年反右派，打退了不甘心失敗的地主階級、官僚買辦階級和資產階級妄圖復辟的猖狂進攻以後，激發了全國人民極為高漲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在黨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鼓舞下，掀起了大躍進運動。隨著農村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發展生產力的需要，又出現了在原來農業高級社的基礎上興辦人民公社的高潮。這時階級鬥爭曾表現一段時間的緩和，但絕沒有停止。資產階級在反右派以後感到自己大勢已去，便轉換手法，採取從黨內尋找代理人搞和平演變的方法繼續向無產階級進攻。而黨內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並沒有因建國初期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而誠心轉變，加上一些革命意志不堅定經不起資產階級和平演變考驗的人，逐漸演變成為黨內的資產階級，他們不願繼續革命，甚至反對革命，嚮往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伺機向無產階級發動進攻。在我國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出現失誤加上自然災害、蘇修逼債等客觀原因造成國民經濟發展受挫，出現人民群眾生活嚴重困難的情況，儘管毛澤東最早覺察失誤並立即指導全黨有效

地努力糾正錯誤，黨內的資產階級仍然藉機向黨發動了進攻。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突然向黨向毛澤東發難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彭德懷在我國民主革命和抗美援朝戰爭中是建有卓越功勳的，對此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但是即使在民主革命中，他也是這樣那樣錯誤，受到過毛主席和黨的批評。而他對毛主席的批評一直耿耿於懷。作為黨的高級幹部，軍隊的高級將領，彭德懷如果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應該十分關心維護我國新建立起來但還有許多不完善地方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應該對大躍進中一時出現失誤造成的挫折有一個客觀的正確認識的，應該對毛澤東最早察覺並領導全黨正在有效糾正錯誤的舉動作出充分肯定和評價，努力維護毛澤東的威信採取和毛澤東合作的態度，並提出自己對進一步糾正錯誤的意見的。但他並不是這樣，而是在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都不講任何意見，在廬山會議進一步糾“左”作出佈署基本結束時，突然以萬言書的形式向毛澤東發難，提出什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能不令人感到不正常。思考他這樣做的動機，不管他主觀願望如何，在客觀上已起到了與國際上的帝修反、國內的資產階級、臺灣國民黨惡毒攻擊我國三面紅旗的配合作用，而且在言語上也近似一個腔調。彭德懷的萬言書，實際上是攻擊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制定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綫和人民公社、大躍進是“極左”，攻擊 1958 年以來毛澤東和黨中央執行了一條“左”傾路綫。彭德懷的這一思想當時也並不是他一個人，在參加會議的人中有一定代表性，只是有些人沒有明顯暴露就是了，這些已經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歷史發展事實完全證明了。不是已經完全否定了黨的八屆八中全會對

彭德懷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定，給彭德懷徹底平反了嗎？不是已經在全國解散了人民公社，拋棄了總路綫，大躍進嗎？不是已經作出毛澤東從 1956 年以來搞的是一條“左傾”的錯誤嗎？不是把當年彭德懷的萬言書寫的甚至還沒有敢完全直言的全部都實現了嗎？這樣做的結果不是已經為實踐證明是一條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綫或叫修正主義路綫嗎？並且這條路綫已經基本上把我們黨的事業斷送了嗎？所以，如果說當時許多同志“不識廬山真面目”的話，四十年後的今天，再看那場鬥爭的真面目已經一目了然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廬山出現的這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們黨，這一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我們可以把這場鬥爭看成是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階級鬥爭重點轉移到黨內的開始，是毛澤東形成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依據之一。在這以後，毛澤東在同劉少奇關於“四清”問題的針鋒相對的鬥爭，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常委同意農村實行分田單幹實際是解散人民公社的鬥爭，在同國營企業實行一長制、獎金利潤掛帥、單純依靠科技人員辦企業的資產階級辦企業路綫的鬥爭，在同上層意識形態領域裏的資產階級路綫的鬥爭，都說明黨內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一直十分激烈。都說明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而在廬山會議後不久出籠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實際是廬山會議鬥爭的繼續。毛澤東敏感地覺察出這是右傾機會主義者要為彭德懷鳴不平進行翻案，便立即安排組織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進行反擊。而文章寫成後，全國許多省市黨報都不刊登，毛澤東不得已

採用發行小冊子的方式向全國散發。這時北京市已成爲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可見當時資產階級的氣焰已經囂張到什麼程度。這就是毛澤東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由來。這說明並非當時毛主席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分嚴重，而是估計得完全符合實際情況。

如果毛澤東不用文革的方法，而採用整風的方法是否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呢？答案是：否。因爲當時情況和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和 1942 年整風根本不同的。1942 年整風，是在全黨以毛澤東正確路綫爲指導基本團結一致的情況下，爲進一步增強團結，提高思想水平，通過學習文件理論聯繫實際總結黨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解決歷史上所犯的“左”右傾機會主義，主觀與客觀相脫離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問題的。是以反對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爲中心內容的思想革命。而 1966 年黨面臨的情況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種路綫的鬥爭越來越激化，在“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尋找到的一種“公開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發動廣大群衆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方式，這就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顯然，這樣一場以反對修正主義維護馬克思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爲中心內容的政治大革命，是不可能用整風的方法得到解決的。

如果不用文革的方法，用遵義會議的方式行不行？答案也是：否。因爲這和遵義會議的情況也不同。遵義會議時我們黨不是執政黨，不存在一部分當官做老爺不願革命甚至反對革命的問題，而僅是共同在爲實現革命勝利的大

目標下怎樣革命，執行一條什麼樣的路綫才能奪取革命勝利的問題。當時跟著王明犯左傾機會主義路綫錯誤的同志，絕大多數都是忠心耿耿幹革命的，其錯誤也屬於思想方法思想認識問題，不是立場問題。因而在錯誤路綫使革命不斷遭受嚴重挫折和損失以後，絕大多數同志都會從實踐中吸取教訓，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這就決定了遵義會議摒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綫，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是遲早必然要發生的。而我們黨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特別是湘江戰役的慘敗，絕大多數同志的思想認識已經從血的教訓中提高了，毛澤東已是衆望所歸。所以，遵義會議就成爲我黨結束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綫，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對革命勝利具有決定意義的會議。而1966年我們黨的主要問題，既然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生死決戰問題，要用遵義會議的方式，用召開黨的政治局會議通過民主集中制做出決定的方式來解決，顯然是不行的。

所以，在1966年的情況下，毛澤東斷然採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起來，運用大民主的方法進行文化大革命來解決當時黨內存在的已經十分嚴重激化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問題是十分英明正確的。這也充分顯示了作爲人民領袖的毛澤東一貫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的偉大思想，顯示了毛澤東爲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真理，堅持革命而敢於向一切敵人和阻力挑戰的大無畏的勇氣和氣勢磅礴的英雄氣概。

（二）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既有當時的經濟基礎又有當時的政治基礎

在1966年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國的經濟狀況是怎樣的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國的工業固定

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了三倍。棉紗、原煤、發電量、原油、鋼和機械設備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都有巨大的增長，全國糧食也有大幅度的增長。這些成就完全是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的結果。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巨大優越性。到 1966 年全國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已經建立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人民公社，小農的個體生產經營，私有制經濟已基本絕迹。這時廣大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人民在想什麼呢？他們想的就是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國營、集體生產，使生活蒸蒸日上，不再走回頭路，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們深惡痛絕的是那些掛著共產黨招牌、佔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領導職務，却不賣勁為社會主義出力，反而拉倒車、走歪門邪道，糟踏、破壞集體經濟，以權謀私、高高在上的官僚主義者、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當時不是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而是是否真心實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真心實意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問題。因為全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已經使得公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到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這突出表現為在工廠是搞物質刺激還是政治掛帥，是專家治廠還是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是自力更生大搞技術革命、大搞科學實驗，還是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在農村則表現為是鞏固發展隊辦、社辦的集體經濟，大搞科學種田，提高產量，改善人民生活，為國家多做貢獻，還是削弱集體經濟，鼓動社員個人顧個人，採取保守、守舊的耕作方法，瞞產私分，分光吃光，挖社會主義牆角。這一切反映在思想、政治和文化教育等意識形態領域就是嚴肅的、激烈的階級

鬥爭。而黨中央政策的搖擺（如四清運動中前十條和後十條），各省、市、自治區、各地區的各自為政，都顯示了黨內兩條路綫鬥爭山雨欲來。所以毛主席在這時發動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及時的，是完全必要的。因而毛主席一聲號召，全國從下到上，男女老少，不分城鄉，不問南北，群眾運動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這難道說文化大革命沒有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

對毛澤東在文革中選擇用人的看法

毛澤東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然首先要選用能够正確理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堅決擁護支持他的方針政策，忠實地執行繼續革命路綫的人。可以想像，毛澤東一定很希望在同他一起出生入死戰鬥幾十年久經考驗的老戰友中，能够有很多老帥、老將、老總像過去一樣和他志同道合一起再搞文化大革命，成爲他依靠重用的力量。但事實證明，這只是毛澤東的一廂情願。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站在了運動對立面，對運動百般指責，甚至反對，毛澤東自然是無法用他們的。事實證明，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用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員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等都是十分英明的決策。

（一）關於周恩來

周恩來在文革中始終是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的。文革中，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密切合作支持，鞠躬盡瘁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將是不可想像的。毛澤東在文革開始寫給江青

的信中明顯流露了他對林彪的疑慮，而這封絕密信件是首先送給周恩來看的，這充分表明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信任。

文革中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使用是非常得當的。他不但把國務院的全部工作交周恩來領導，也把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交周恩來負責處理。文革中解決全國各省市的問題，幾乎都是由周恩來主持和中央文革的一些成員共同聽取省市群眾組織代表團的多次彙報後，再向毛主席彙報，最後代表中央作出處理決定的。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新政權的建立，九、十次黨代表大會和四屆人大的召開，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人事安排，都是毛澤東指定以周恩來為核心組織籌備和逐一確定的。文革中周恩來還擔負著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廣泛聯繫做好對文革有抵觸情緒，有阻力的老幹部的工作，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是其他任何人不能勝任的。正是由於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周恩來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中國的政壇上，明裏暗裏製造著一種輿論：毛、周鬥爭論。說周恩來和毛澤東之間是有矛盾的；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受壓抑、受排擠、不被信任，權力和處境都岌岌可危的；這似乎暗示人們：“徹底否定”文革是周恩來留下的一個遺願。這完全是翻案派玩弄的“抬周貶毛”的鬼把戲！另外，他們還編造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故事。“批林批孔”中著名寫作班子“梁效”成員之一、北京大學老教授周一良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追查‘梁效’的罪行之中，很突出的一條是緊跟‘四人幫’，反對周總理。如揭發出江青說‘總理是大儒，批儒目標指向總理’等等。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遲（群）、謝（靜

宜)在任何會上暗示過。周總理逝世,‘梁效’成員都很悲痛,不少人自動佩帶白花。有兩人在‘四·五’期間去了天安門,我是其中之一。”(《每週文摘》1998年第97、98期)

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關係,正如柬埔寨國王西哈努克在悼念毛澤東逝世的日子裏寫的一篇文章中所比喻的:“毛澤東主席是一位偉大的設計師,而周總理就是一位偉大的工程師。”(1976年9月《人民日報》)這實在是一個真知灼見。

(二) 關於林彪

文化革命前期,儘管毛澤東對林彪的某些作法心存疑慮,但仍是把他作為副統帥委以重任。其原因有兩點:一是林彪有長期以來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綫的態度和行動。林彪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勳,1959年兼任國防部長並主持軍委工作後,首先在軍隊裏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在以後全國普及毛澤東思想上起了很關鍵的作用,紅遍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就是解放軍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產物。這些都是毛澤東對林彪信任的基本因素。其二,文革開始後,軍隊裏不少資格老、威信高的將軍元帥們對毛主席發動文革很不理解,很不支持,很不得力,有的甚至站到對立面,而文化大革命運動又必須得到軍隊强有力的支持。這時候,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對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態度十分積極,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選擇並重用林彪作為副統帥是完全是正確的。但是,毛澤東從林彪關於政變的講話(指1966年5月8日)以及過分誇大“紅寶書”的作用等舉動中看出端倪。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中這樣說:“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

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麼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顯然，這裏所說的“朋友”就是指的林彪。但是，隨著文革的深入，林彪“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以及提出“四個偉大”等，更增加了毛澤東對他的反感和提防。1969年黨的“九大”期間，毛澤東一方面在原則問題上不讓步，對他的權力進行限制，另一方面仍把他作為接班人寫進了黨章裏。毛澤東這樣做，一是給他機會，對他寄予希望，二是客觀情況的需要。文革中林彪作為副統帥在億萬群眾中享有較高的聲望，只有讓他的真面目充分暴露出來，廣大群眾才能辨別真偽。“九大”以後發生的事，充分說明了階級鬥爭的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以林立果、葉群以及黃、吳、李、邱為核心的反革命集團，為了搶班奪權企圖進行反革命政變的陰謀終於暴露，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國的溫都爾汗，史稱“九·一三事件”。此後，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林彪專案組工作，查出了林彪反革命政變的大量確鑿的罪證，特別是企圖謀害毛主席的《571工程紀要》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儘管有人對“九·一三事件”中林彪的出逃是主動還是脅迫、是飛機失事還是打下來等問題上存在疑義，但是，中央文件公佈的大量林彪集團的罪證（影印件、圖片、錄音等），白紙黑字，鐵證如山。這裏對相關的三個問題談點看法：

第一、關於起草“九大”的政治報告。“九大”報告有兩個本子，一是以陳伯達為主起草的，二是以張春橋為主

起草的。雖然有的人說這兩個本子都與林彪無關，林彪只是開會時照本宣讀了一遍，但以後“批陳整風”中揭發出來的事實說明陳伯達的本子與林彪有關。最終，毛主席選擇了張春橋的本子。這無疑是對林彪的沉重打擊，林彪的問題也逐漸暴露了。當然，關鍵在於兩個本子的區別。陳伯達的本子中體現了淡化階級鬥爭而以生產為中心的論調，這是從根本上是違背毛澤東思想，違背文革路綫的。這也說明毛澤東所說的“林彪不是極‘左’，而是右，右得不能再右”的原因所在。

第二、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九大”期間，林彪及陳伯達強調要設國家主席，遭到毛澤東的反對。這絕不是單純的工作意見分歧。正因為林彪發現自己的問題已被主席察覺，便加緊了搶班奪權的步伐。設國家主席，既是林彪進一步對自己處境的試探，也是為進一步謀取更大實權和影響力。林彪雖然是黨內二號人物，但黨內、軍內要受毛主席的限制，他自己不敢稱“老大”。在國務院系統，周恩來是總理，他只是副總理，如果他當上國家主席就不一樣了，他可以這個身份影響國務院，限制周恩來，擴大他自己在政府中的影響。設國家主席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促成林彪自己當主席。林彪作為寫進黨章的接班人，假如心不虛，假如與毛主席沒有路綫分歧，他是決不會冒這個風險的。正因為他感到自己正在被毛主席所覺察，正在被冷落，再不採取行動就會處於被動，所以最終演出了爭當主席的陰謀鬧劇。林彪爭當國家主席決不是毛主席將其小題大做，正因為此，毛主席更認清了林彪問題實質的緊迫性，再不解決林彪問題，事情就嚴重了。

第三、關於林彪是否搞反革命政變問題。《571 工程紀

要》是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綱領。其影印件是作為中共中央 [1972]4 號文件《粉碎林陳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的附件公佈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後，在全黨開展了“批陳整風”，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綫教育，毛主席一方面採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林彪集團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教育，另一方面，於 1971 年 1 月改組北京軍區，挖了林陳集團的牆角。1971 年 3 月 22 日至 24 日，林立果等寫出了《571 工程紀要》（以下簡稱《紀要》），“571”是“武裝起義”的諧音。《紀要》分析了武裝政變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條件和時機，提出“利用集會一網打盡”、“逼宮形式”、“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車禍、暗殺”等形式對待以毛主席和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並制定了詳細的實施方案，包括人力、物力（武器、車輛、通訊器材）等物質準備，最後還提出“不成功便成仁”的日本軍國主義式口號。顯然，《紀要》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革命政變綱領。關鍵的問題是林彪是否知道或參與制定《紀要》的活動。據直接參與研究制定《紀要》的成員之一李偉信的交待：1971 年 2 月，林立果跟林彪、葉群一起到蘇州，以後，林立果又到杭州、上海，3 月 18 日，林立果在臥室對李偉信等說：“根據目前形勢，要設想一個政變計劃”，3 月 21 日，林立果對李偉信等說：“目前從各地區實力來看，‘首長’（指林彪）講話還有一定作用，這件事與‘首長’談過，‘首長’讓先搞個計劃”。他們研究了形勢，分析了林彪接班的三種情況：和平過渡、被人搶班和提前搶班，最後提出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寫一個計劃——就是後來的《571 工程紀要》。究竟是林彪指示，還是林立果假藉林彪之名？李偉信的交待揭發中還有這樣一段話：“‘571’計劃寫成後，我沒有見過，

但是于新野（直接參與研究制定《紀要》的主要成員之一）曾誇耀自己說：林立果把計劃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錄的關於武裝起義的事例，都還留在北戴河‘首長’（指林彪）、‘主任’（指葉群）那裏。”由此可見，即使林彪沒有指示和參與《紀要》，但事後他是知道的。退一萬步說，即便是林彪不知道，但作為黨的副統帥，又是林立果的父親，難道他就沒有覺察嗎？特別是乘飛機逃往蘇聯時，就能輕而易舉地上林立果的當嗎？總之，希望為林彪鳴冤叫屈的同志，認真看一看中央處理林彪集團的有關文件、毛主席有關指示以及林彪集團成員的揭發交待材料，否則，不管你的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就會起到傷害毛主席和背離毛主席革命路綫的作用。

（三）關於江青、張春橋

毛澤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當然必須要依靠重用一些真正接受他的思想理論，忠實執行他的革命路綫的人。而江青、張春橋等對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完全接受，衷心支持，是忠實於毛澤東革命路綫的。如果我們真正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堅持我國社會主義不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需要，是符合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那麼，在衆多老師、老將、老總們大都抵觸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下，有這麼一些人不顧風險挺身而出，忠實跟隨毛澤東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從主要方面看，他們的精神是可貴的，是值得稱道的。試想，如果沒有這些人對毛澤東的忠實跟隨和支持，恐怕作為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而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很難發動起來。所以，毛澤東在文革中信任重用江青、張春橋等人是合乎情理的，是革命的需要。事實上，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捍衛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思想，無愧於旗手的稱號。

儘管江青有一些曾被毛澤東批評過的錯誤、弱點，但就大節而言，江青至死是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忠於馬列主義、忠於無產階級革命、堅持同修正主義鬥爭到底的。她是黨內修正主義分子和所有資產階級反動知識分子的死敵。隨著時間的推移，強加於江青的許多不實之辭也得到澄清。比如《鄭州晚報》（2000年12月4日）登載的《在世紀偉人的身邊——首訪毛主席的保健醫生徐德隆》一文中透露，社會上流傳的關於江青“給毛主席翻身，企圖謀害毛主席”的說法是不存在的。因為徐醫生在主席臨終前的四、五個小時裏，一直守在主席身邊，負責給主席量血壓。當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徐醫生很慎重地說：“我不知道，在我的值班時間裏，在主席最後的時間裏，我沒有見到過這樣的事情。”1996年，陳永貴在接受某作家採訪時說：“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壓力了，所以我才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當問到“你對江青這個人的印象怎樣”時，陳永貴說：“老實說，我看不出人家有什麼不對，我在粉碎他們以後的講話，都是根據中央統一調子來說的。江青這個人對她的工作人員據說是很不錯的。我親自聽她身旁的服務員講過，江青對我們很關心，給我們打毛衣，送錢給生病的人。”“1976年9月江青到大寨的時候，曾經對我說：‘毛主席親自樹立的大寨這面紅旗就是中國的未來，紅旗究竟能打多久？將取決於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如果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他們要砍倒的首先就是這面紅旗。樹立大寨，是經過了長期的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綫鬥爭的。現在我們除了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以外，沒有其它的道路可選擇。’”“她（江青）由於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同樣有

著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譬如她從來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大寨回來給她捎帶點特產，她從來都是付錢的。她說：老陳，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毛主席培養的黨的幹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允許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是在黨的原則和範圍內進行的。”陳永貴還說：“據我瞭解，她不但對我是這樣，對其他同志也是這樣。就是和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之間也是這樣。我親眼看到這一件事：一次，王洪文給江青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方面付錢，江青一直追問他給錢了沒有。最後江青從自己的工資裏拿出錢交給王洪文。江青喜歡照相，她使用的相機和膠捲，都是自己掏錢買。她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了付伙食費和外出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捲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够花的。但是我絕對不沾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陳永貴還說：“毛主席批評江青，我看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而絕不是要打倒她，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至於江青的歷史，特別是在延安時期，已經有很多文章證實，是革命的，是無愧於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的。從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受審以及獄中情況來看，都表現了一個堅貞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高尚氣節和情操。可以想像，江青入獄後，面對生與死的考驗，如果貪生怕死，背叛毛澤東，變節屈從修正主義，檢討認罪，攻擊文化大革命，那將對毛澤東的偉大形象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對以後反對修正主義的革命鬥爭造成怎樣不利的影響。因此，

江青和楊開慧一樣，是無愧於毛澤東夫人的稱號的。

張春橋也是毛澤東文革中十分信任的人。毛主席所以信任他，不僅是欣賞他的文采，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1957年9月，年輕的張春橋就寫出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稱讚。1969年九大籌備期間，毛主席又採用了由他執筆起草的政治報告。1975年張春橋又發表了著名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文中說：“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仍然存在著變修的危險。因為不但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念念不忘侵略和顛覆我們，不但老的地主資產階級人還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正像列寧講的那樣每日每時產生著。”以上這些難道不是已經被現實所證明了的嗎？張春橋被捕、被判處死緩後，所表現出的大無畏的“五不怕”精神難道不發人深思嗎？

（四）關於華國鋒

華國鋒自稱為毛主席的接班人，但他完全辜負了毛主席的重托。他表面上高喊“繼承毛主席的遺志，堅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口號，背地裏却在毛主席逝世28天後，迫不及待地用非法手段逮捕了文革功臣；他表面上高喊“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背地裏却接受鄧小平的假惺惺的上書。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他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勢力所嚇倒，推行一條右傾投降主義路綫；另一方面是他私心膨脹，惟恐失去“英明領袖”的桂冠，竟然置黨紀國法於不顧，編造謊言，欺騙人民，不僅葬送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葬送了整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最終，還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結束了他的“短暫春秋”。

怎麼看文化大革命是勝利還是失敗？

毛澤東對文化革命的估價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他是充分肯定文革取得的成績的。

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組織縣團以上的幹部認真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毛主席指示中有這樣一段話：“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歷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不要輕視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志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面去指責。”（《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488頁）這段話中，不僅有毛澤東對文革具體評價，也有毛澤東對文革中造反派的批評和對受到衝擊的老同志的諄諄告誡，要求老同志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能站在群眾

的對立面去指責他們。

從毛澤東同志發動文革要達到的目的來說，在毛澤東同志生前文革是勝利了。因為發動文革奪回各級黨委特別是中央被修正主義、走資派篡奪了的那部分權力的主要目的基本實現了。其標誌是以劉鄧修正主義路綫被摧垮了。經過“九大”、“十大”兩次改組，黨中央和政治局裏劉鄧勢力已失去多數，毛澤東的正確路綫可以順利得到貫徹執行了。在經濟基礎方面，它擊退了黨內的那股欲分地單幹解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修正主義思潮，鞏固了農村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在國營企業內部批判了反對黨委領導的廠長負責制以及所推行利潤掛帥、獎金掛帥、利益驅動，批判了把工人階級看作雇傭奴隸，實行管卡壓的管理方法等修正主義的辦企業路綫，使毛澤東的無產階級辦企業路綫基本得以貫徹執行。國營企業出現了嶄新面貌，這就使我國工農業生產和高科技發展在文革的大好形勢下取得了穩步增長和輝煌成就，並為以後更快更好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方面不論在教育、文藝、衛生等各條戰綫，無產階級革命路綫都得到了全面的貫徹執行，各方面煥然一新。作為無產階級文藝精品，受到工農兵廣泛喜愛的革命樣板戲誕生了；廣大知識分子煥發了延安革命精神，努力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千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三大革命實踐中經受鍛煉。工農兵學員上大學改造大學，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針，已開始結出碩果；根據毛澤東“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方針，全國農村普遍實行了合作醫療制度，解決了佔我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看病吃藥難的問題，受到農民的衷心擁護，成為世界上一大奇迹，得到

國際上廣泛讚揚。所有這些豐碩成果表明文化大革命確實取得了偉大勝利，而不能說文化大革命只是在理論上是正確的，在實踐上失敗了。可惜的是，毛澤東沒有取得進一步鞏固文革的勝利就逝世了。毛澤東去世後，文革造反派遭到殘酷打擊，原本對文革不理解又受到“三分錯誤”衝擊的老同志以及許多黨員群眾，對文革中出現的“三分錯誤”看得過重，對其產生的原因缺乏全面分析認識，沒有足夠看到文革取得的上述偉大成果，就得出文革失敗了的結論。那些原本對毛澤東有刻骨仇恨的反動派和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公開地解散人民公社、瓦解公有制經濟，公開搞私有化，一句話，公開地在資本主義道路上奔跑，肆無忌憚地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已不僅僅是推翻了文革的全部成果，而事實上也推翻了建國以來整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事實上，正是殘酷的現實教育了許多老幹部、老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使他們重新認識和理解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深遠意義。只有用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分析認識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與失敗，才是符合歷史事實情況的。

文革中經濟是發展了，還是瀕臨崩潰的邊緣？

文革中，毛主席解決經濟問題的一條思想主綫，就是“抓革命，促生產”。這是在文革之初（1966年8月），毛澤東在他審改多次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中首次提出的。1966年10月，毛澤東在向全黨全國印發陳伯達的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綫鬥爭》上批示：“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麼地方加

進去，請考慮”，再次提出了這個指導思想。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風暴”，毛主席立即表示支持並在講話中指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接著，1967年2月，毛主席批示解放軍進行“三支兩軍”中，除“支左”外，“支工”、“支農”、“軍管”、“軍訓”都是爲了保護生產和工作的繼續進行。1967年7月至9月，毛主席在視察大江南北時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害衝突”，“要實現大聯合”，同時又指示：“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968年7月，毛澤東批准發出“七·三”、“七·二四”佈告，強令武鬥地區的工人回到工作崗位。在毛澤東決定向仍舊混亂的大學派出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同時，也向生產秩序尚未恢復正常的工礦企業派出解放軍宣傳隊，此後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全國經濟形勢趨向穩定。1969年至1971年，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躍進”高潮。以上情況可以說明，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始終沒有放鬆經濟工作。這一點，《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我國社會主義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

那麼，文革期間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那些成就呢？

（一）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

農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龍，農業現代化裝備水平有了較大提高。1976年與1965年相比：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的產量，分別相當於1965年的6.7倍和6.6倍，全國三分之一的耕地實行了機械耕種；農村排灌動力機械的擁有量增長了4.9倍，機電灌溉面積增加了一倍多；農用化肥產量增加了2.1倍，每畝化肥施用量增加了2.1倍；每畝用電量增加了4.7倍；農用載重汽車擁有量增加了3.3倍；糧食產量增

加了 1836 億斤，在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下，同期人均產量增長了 12.1%。

（二）建設了一批技術先進的大型工業企業。

繼大慶油田之後，又相繼開發了勝利油田和大港油田。1976 年我國原油產量為 1965 年的 6.7 倍，我國由貧油國一躍而為自給有餘的產油國，石油化學工業也迅速崛起。1973 年從國外引進 13 套大型先進化肥生產設備，生產能力合計為合成氨 357 萬噸，尿素 580 萬噸。同時引進的大型化工、化纖生產設備，也先後在北京、上海、遼陽等地安裝建設。

在此期間，冶金工業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鋼鐵廠、酒泉鋼鐵廠、成都無縫鋼管廠、貴州鋁廠等重要企業。為了解決鋼材品種問題，武漢鋼鐵公司還從國外引進了先進的一米七軋機工程設備。機械工業方面，建設了湖北第二汽車製造廠、四川大足汽車製造廠、四川德陽第二重型機械廠、陝西富平壓延廠等一大批企業。煤炭工業方面，建設了貴州六盤水、四川寶頂山、芙蓉山、山東兗州等大型煤礦。電力工業方面，重點建設了甘肅劉家峽、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電站和火電廠。著名的葛洲壩大型水電站及國外引進設備的唐山陡河電廠，也開始動工興建。

（三）建成了一些內地鐵路幹綫和長江大橋。

1970 年 7 月，建成了全長 890 公里的焦枝綫。1971 年，全程 1085 公里的成昆綫全綫通車。接著全程 209 公里的大焦綫也全面動工。此外，還修建了襄渝綫，並在該綫的安康另修一條鐵路與寶成上的陽平連接。華北地區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綫和通（縣）坨（子頭）綫。

全長 6700 米，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雙層鐵路、公路兩

用南京長江大橋，由 1959 年動工，1968 年勝利建成。

此外，1974 年還先後建成了從大慶油田到秦皇島、由秦皇島到北京、由山東臨邑到南京等長距離輸油管道。

郵電通訊方面，1976 年建成全長 1700 多公里的中間軸 1800 路載波通訊幹綫，和連通全國 20 多個省市區的微波通訊幹綫，北京、上海還各建了一條衛星地面站。

（四）科學技術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繼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後，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國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69 年 9 月 23 日，我國又首次成功地進行了地下核試驗。在空間技術方面，1966 年 10 月，我國第一次試驗發射核導彈成功。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國又成功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75 年 11 月 26 日，第一顆返回式人造地球衛星發射、回收成功。我國成爲美、蘇之後第三個可以回收衛星的國家。

在此期間，我國農業科技人員，於 1972 年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籼型雜交水稻種，提高畝產 20% 左右。

以上情況表明，文革期間國營、集體經濟確實得到了大發展。“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的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應當怎樣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

如何正確看待文革中的造反派，正確認識文革和文革中發生的許多問題，是關係到今後在同修正主義進行鬥爭中發展壯大革命力量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認識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文革中的造反派就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

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鬥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文革之初，毛澤東在一次與外賓談話中，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那麼，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這種“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的“形式”和“方式”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造反有理”。儘管《十六條》中，沒有一處使用“造反”這個詞，但是，“造反有理”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響亮的口號。一切群眾組織都打出“造反”的旗幟，無一例外地自稱是“革命造反派”，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都深深打著造反的烙印。

難道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造反也有理嗎？顯然，這一次有理的造反，不是針對著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現政權的，而是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發動億萬人民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進行的一次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全國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情況下，如何起來造反的探索和訓練，或者說是一場真兵實彈的演習。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鬥爭的主力軍。

但是，自從毛澤東逝世以後，他在文革中始終支持的造反派却成為人們口誅筆伐十惡不赦的壞人、影視中的丑角。這真是天大的冤枉。

文革中的群眾組織情況很複雜，代表各種不同的思潮，出現一些問題和壞人壞事是難免的，不能都統統加罪於造反派。造反派中也確有一些組織和個人有過激甚至報復行為，也不能說沒有混進壞人。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不也

仍然混進有壞人嗎？實際上，文革中發生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大規模武鬥的事，多數是保守派在推行劉鄧資反路綫的當權派操縱下挑起來的。群眾中分裂成爲保守派、造反派，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首先造成的。保守派是在運動初期受黨委或工作組操縱，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鎮壓群眾運動中形成的。造反派是運動初期受“資反路綫”打擊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在毛主席《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和中央關於文革《十六條》公佈後，起來造反發展壯大的。從整個文化大革命看，打擊面最寬、傷害人最多、整人最殘酷是在運動初期，毛主席不在北京，劉鄧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那五十天。而恰恰這也正是造反派被圍剿受打擊迫害的時候。現在官方把文革片面描寫成一場大災難，只講陰暗面，看不到光明面，把文革中不管什麼人的過激行爲和幹的壞事統統加罪於造反派，實在不符合歷史的事實。由於造反派的命運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他們最聽毛主席的話，最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這一大方向，堅決反對劉鄧推行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由於他們在運動中多次受到劉鄧資反路綫的迫害，又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團“打著 B52 旗號，打擊 B52 力量”（B52 是《571 工程》中毛澤東的代號）的反革命路綫的迫害。每次都是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給他們平了反，所以他們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對修正主義、走資派、劉鄧資反路綫、林彪反革命路綫最恨。從而他們也最需要最愛讀毛主席的書，對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接受得最快。他們最願意文攻進行大辯論，用毛主席的理論說服人，堅

決反對武鬥。他們經常是在唱著“東方紅”、“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的歌曲，流著熱淚，堅持同走資派、修正主義、資反路綫進行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的。在反對武力圍剿，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的鬥爭中，許多造反派戰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所以，應該說造反派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革命力量，是同走資派以及他們推行的“資反路綫”進行英勇鬥爭的主力軍。沒有造反派，也就沒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必須肯定造反派。這是與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講的道理相同的。

毛澤東逝世以後，隨著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造反派這支堅決反資反修的革命隊伍也在“揭批查”運動中被全部打壓下去了。全國受審查挨批鬥的人無法計算，僅河南省被逮捕判刑的造反派就達 4100 多人（係官方公佈數字，實際上更多），監獄中文革犯幾乎佔一半。不僅僅是造反派本身，就連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也未幸免。原河南省委第一副書記、老紅軍、雇農出身的耿其昌同志，因支持造反派罪被判刑，出獄後每月僅發 150 元生活費，不久因病未得到及時治療死在家中。焦裕祿同志的親密戰友，原蘭考縣委副書記兼縣長，抗日時期的老同志張欽禮，也因支持蘭考縣“衛焦”（保衛焦裕祿同志的造反派組織）被妄加罪名判刑十五年。焦裕祿的事跡被說成是瞎編加以否定。焦裕祿展覽館被查封，大批宣傳焦裕祿同志英雄事跡的材料被焚燒（大約 1990 年以後焦裕祿展覽館才又恢復開放）。領導林縣紅旗渠工程的原林縣縣委書記，後任公安部副部長的楊貴同志，也因支持造反派，被撤職受審多年。舉世聞名的紅旗渠被說成是“極左”產物加以否定，而且進行

批判。

儘管二十多年改革開放使造反派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少人由於在文革及“揭批查”中受盡迫害傷透了腦筋，對革命喪失了信心，政治上消沉了。有少數做生意發了財，甚至做了企業家，疏遠革命了。但是相當多的造反派仍然是目前革命的積極力量。他們對搞資本主義、搞私有化、搞腐敗最為不滿，他們最迫切要求改變現狀，也有鬥爭經驗。這部分人不管在原黨政機關幹部中，還是工礦企業工人、工程技術人員中，都是同修正主義進行鬥爭的重要力量。

如何評價文革的“三分錯誤”

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是客觀的，正確的。

如同歷史上任何革命造反運動一樣，文化大革命像大海的怒濤，它在衝走一切妖魔鬼怪的同時，也衝擊了某些本不該衝擊的事物，傷害了某些本不該傷害的人。其實，在任何一場戰爭中，無論怎樣英明的統帥，也難以保證自己的火力在摧毀敵軍的同時，絲毫不給自己一方造成某些損失。正像毛主席說的：“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當然，錯誤是客觀存在的。比如在“全面內戰”的武鬥中，確實是死傷了一些人。這不能說不是教訓。毛澤東對武鬥的態度一反對，二不怕。毛澤東認為，凡是武鬥嚴重的地方，原因有三條：一是有走資派操縱、

教唆；第二是造反派內部混進了壞人，他們利用造反派的缺點、錯誤，利用一些不正確的思想來搞陰謀活動；三是造反派的私心雜念，特別是領導人的私心，爭核心、爭席位和小團體主義、山頭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

分析“三分錯誤”產生的原因，主要有兩條：

（一）幹部和群眾沒有經驗。

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它與以往的任何政治運動都不同，它不僅提出了“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允許人民群眾結社造反，而且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爲了革命的對象。這就完完全全打破了傳統和常規，超越了幹部和群眾的經驗範圍。《十六條》中規定：“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做法是正確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確的。”於是，群眾的這種“識別”的過程，也就可能是他們犯錯誤的過程。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自然也就出現了人們靈魂的大暴露。在幹部和群眾中，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法權觀念，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和無政府主義，以及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潮、傾向和行爲都表現了出來。這樣，在幹部和群眾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也就不足爲怪了。對此，我們只能看作這是爲了探索解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與前途問題所付出的必要代價。

（二）資產階級的陰謀破壞。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從始至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綫的激烈鬥爭。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著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從運動一開始，便力圖利用他們對運動的領導權，拋出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轉

移運動的大方向，鎮壓革命群眾，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及時識破了他們的陰謀，發表了震驚中外的革命檄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扭轉了運動的大方向。

後來，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資產階級不斷變換手法，負隅頑抗。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各種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當著他們處在不利情況的時候，爲了保護他們現在的生存，以利將來的發展，他們往往採取以攻爲守的策略。或者無中生有，當面造謠；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現象，攻擊事物的本質；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擊一部分人；或者借題發揮，‘衝破一些缺口’，使我們處於困難地位。總之，他們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時他們會‘裝死躺下’等待時機，‘反攻過去’。他們有長期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鬥爭——合法的鬥爭和非法的鬥爭。”與此同時，由於歷史的、社會的和認識上的根源，黨內外上上下下始終存在著一股很强的保守勢力。無疑，這股勢力在客觀上也起到了保護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作用。

整個文化大革命運動，都是在不斷排除來自“左”的和右的干擾與破壞的情況下進行的。運動每前進一步，都要戰勝黨內資產階級的激烈反抗和混入革命營壘內部的反革命野心家、陰謀家們的種種陰謀。其中破壞力最強、給文化大革命造成損失最大的，除去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之外，就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和陳伯達這類政治騙子。他們以“左”的偽裝出現，拉幫結派，以售其奸。他們策劃搶班奪權，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在公開場合，以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自居，而在見不得人的角落裏，

却在密謀“解放在歷次運動中被打倒的人”，以實現他們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他們是一夥地地道道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分子。

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不僅給文化大革命運動帶來許多混亂，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他們被揭露之後，文化大革命運動出現了幾乎是致命的挫折。當“批陳批林”鬥爭發展成爲一場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的“批林批孔”運動時，黨內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勢力，也僞裝成爲“反對林彪”的好漢；還有的人，由於林彪叛黨事件的發生，灰心喪氣，認爲毛澤東看錯了人，對毛澤東的偉大產生了懷疑，由革命派變成逍遙派。實際上，如果不是毛澤東的偉大，識破了林彪集團的陰謀，跟隨毛主席革命路綫的革命派遭到屠殺的時間就會提前。中國政壇的這種突變，不僅帶來了政治力量對比的新變化，而且預示出一旦時機成熟，文化大革命必遭暗算的先兆。

如何理解“對文革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毛澤東作爲一位偉大哲學家，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越是到了晚年，似乎他的頭腦越是冷靜。1972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當美國人埃德加·斯諾手指著歡呼“毛主席萬歲”的人群向他稱道時，毛澤東告訴斯諾：其實擁護他的人沒有那麼多，很多人都是跟著喊的。1976年毛澤東在病危中，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說：“對於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可見他心如明鏡，洞若觀火。

毛主席一生是何等的輝煌，可是他却說自己畢生只做

了兩件事，其中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可見他對這場革命傾注的心血之多、寄意之遠。不過，他講的“反對的人不少”倒確實是實情。他辭世不到一個月，埋葬這場革命的準備工作便完成了。

其實，毛澤東所說的“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都不是指的人民群眾。他懂得他的人民。他說：“民主革命後，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却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後退了，反對革命了。爲什麼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可見，“擁護的人”和“反對的人”都是指“大官”中的人。毛澤東的這段話明確地指出了擁護的人爲什麼少、反對的人爲什麼多這個問題的實質。

顯然，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並不是人民要否定，而是大官中的“反對的人”要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從中央到地方，儘管各級領導幹部幾乎都受到了衝擊，有的甚至被宣佈“打倒”，但是這種“打倒”，不過是群眾組織的一種“運動行爲”，既不是黨組織的正式審查結論，更不是正式的組織處理。黨的“九大”以後，毛澤東提出：“幹部中只要不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一律解放”。後來，連鄧小平都出來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真正被打倒的全國沒有幾個人。

需要指出的是，“反對的人”們也不完全一樣。他們大致由三種人組成：

第一種人，是頑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儘管他們跟著中國共產黨幹了幾十年，但是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依然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從來沒有真正信仰過馬列主義，從來沒有真正接受過黨的共產主義綱領。他們是中國共產

黨的同路人。他們的理想是首先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走社會民主黨的道路。毛澤東在談到這種人的時候說：“我們黨內兩條路綫鬥爭，基本問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究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資產階級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很明顯的。在我們共產黨內部，我們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認為中國是個很窮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水平很低，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必須在一段時間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後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人無疑就是“走資派”。

第二種人，是那種官越做越大，離人民群眾却越來越遠的人。他們或者滿足現狀，迷戀特權，養尊處優，喪失鬥志；或者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目無群眾，作威作福；或者貪圖安逸，追求享樂，生活腐敗，蛻化變質；或者無意工作，追逐名利，死保既得利益，固守現存秩序。總之，他們是一些“船靠碼頭車到站”、主張“過去已經奮鬥，現在應該享受”的人。他們可能並不像第一種人那樣有明確的資本主義綱領，但是他們已經滑到資產階級泥坑中去了。

第三種人，是與前兩種人是根本不同的人。他們忠誠於黨的事業，無論在民主革命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都兢兢業業，埋頭實幹，為黨和人民做出很大貢獻，有很大功勞，在黨內、軍內和人民群眾中有很好的聲譽。但是，他們沒有做好社會主義革命可能會革到自己頭上的思想準備。他們一貫是革命的動力，當運動一來，他們不再是動力的時候，群眾運動中的過火行爲，以及這種過火行爲給他們個人的衝擊，就使他們的情感受到極大的傷害，為他們所難以忍受。因此，他們不能超越自己的

感受去理性地、客觀地、正確地認知運動。他們感到失落和迷惘，對群眾運動和運動中的群眾都產生了強烈的對立情緒。這些同志看不到，當這場以防修反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偉大革命運動，喚起了億萬人民群眾以排山倒海之勢，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迅跑之時，任何的“條條框框”、“規則”、“秩序”都是無能為力的；“規定”群眾這也不許幹，那也不許幹，實際上也就不取消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些同志想不通這個道理，十年文化大革命，他們十年沒有想通，當他們看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解體、國營企業私有化、工人下崗、官員腐敗，一步一步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時，終於想通了，然而，後悔晚矣。

即便如此，“大官”中的反對派們，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他們反對這場革命的立場。相反，正由於這三種人對文化大革命始終採取反對、算賬和“不理解”的態度，群眾看幹部，幹部看中央，由此在全國上下，以走資派為核心，以特權階層為骨幹，影響、裹挾了一大批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怨氣的幹部和群眾，形成了一股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强大逆流，致使運動反反復復，明爭暗鬥，冤仇不解，一拖十年。直到毛澤東逝世，終於迎來了“徹底否定”和“改革開放”的日子。

如今，當人們明白了“徹底否定”之後的“特色”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逝者如斯夫，歷史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不能不令人痛心的是，只是由於不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許多真誠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們，跟隨著走資派，歡欣鼓舞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從而也就打通了通往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這不獨是他們個人的悲哀或不幸，也是一切為了奪取無產

階級專政而犧牲的先烈和一切爲了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人們的遺憾或不幸！

2001年3月初稿

2007年3月修改

主要參考資料：

緯夫：《關於文化革命的思考》

易靜山：《給×老的一封信》

文革事件鉤沉（選登）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區都發生過在全國頗有影響的事件。這些事件，反映了激烈複雜、波瀾壯闊的文革運動的進程。重述這些事件，可以從某一側面凸顯該地區文革運動的特點，對認識文革，研究文革，總結經驗教訓，具有以小見大立竿見影的作用。誠然，對同一事件的評判，立場觀點不同，結論也往往會南轅北轍，大相徑庭。但是，歷史真實是改變不了的。筆者作為文革文物收藏者，在整理資料的過程中，對一些事件進行了考證、梳理，試圖用自己的思想觀點對這些事件進行表述，形成文字，再把這些文字彙集起來，取名曰文革事件鉤沉。雖是一家之言，但讀者可以見仁見智，評頭論足，批評指正。這裏選登四篇，以期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上海“安亭事件”

上海是產業工人相對集中的城市，文革中工人運動開展得早、影響大，“上海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負責人之一的王洪文，後來被選拔到黨中央副主席

的顯赫位置上。這裏敘述的“安亭事件”，就是剛剛成立的“工總司”同上海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首次較量，並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1966年6月12日，工作隊剛剛進駐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事王洪文就貼出《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的大字報，指出廠黨委不抓階級鬥爭、執行修正主義路綫、把群眾的意見當耳旁風等問題，王洪文因此被打成“反革命”。這張大字報後來被稱為國棉十七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關於上海工廠運動初期的情況，原上海市委主要領導曹荻秋在檢查中這樣說道：“我支持了舊市委提出的對各單位派工作隊的組織措施，把矛頭指向了廣大群眾。我沒有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綫，而是劃框框、定調子，說什麼大廠揪他五、六個，小廠揪他二、三個，排排隊。這樣就把運動的打擊重點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關係擺錯了，保護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扭轉了運動的大方向。……當我聽到國棉十七廠的工人貼的大字報時，非常錯誤地說：‘工作隊剛剛進廠沒幾天，就貼大字報，我看不是好人’，這輕輕的一句話，就斷送了人家的一生，把群眾打成反革命。”王洪文等正是因為被市委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在鬥爭中涌現出來成為工人組織領導人的。

1966年11月6日，上海工人頭頭王洪文、潘國平、陳阿大、黃金海等30餘人開會，決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組織——上海市工人造反總司令部。11月9日中午12時，“工總司”成立大會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大約10萬工人參加大會。王洪文被推舉為大會5人主席團成員之一。大會的主題是控訴上海市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會前和會議進行期間，工人們多次邀請上海市委書記前來參加大會，

市委不予理睬。一直堅持晚上 8 點，市委還是沒人來，工人們就遊行到市委門口。晚 10 點 40 分，市委領導答應在友誼電影院接見工人。就這樣，晚飯未吃、衣著單薄的工人冒雨到友誼影院門前等候。然而，市委領導仍是沒有露面。這時候，工人們想起毛主席在兩個多月裏先後六、七次接見了紅衛兵和革命群眾，而上海市委却如此無視工人群眾合理要求，於是，群情激奮的工人們高喊我們上北京見毛主席去！向火車北站涌去。“鐵”了心的工人們要進京告狀。——這就是“安亭事件”的起因。

1966 年 11 月 10 日早晨，經過和鐵路局交涉，2000 多工人先是上了進京的快車，後又改為慢車，到安亭車站後，列車拐到一個叉道裏停住。然後，一批批工人、幹部、工作隊長，還有科、局領導，從上海乘汽車趕到安亭車站，“勸說”工人不要進京。工人們感覺是受了騙。持續到 12 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來到安亭與工人見面，講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意義，勸說大家回廠去。工人擔心回廠後遭受打擊迫害，提出五項要求：①承認上海“工總司”是合法的組織；②承認“11·9”大會以及工人被迫上北京控告是革命行動；③這次事件所造成的後果，由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④曹荻秋（市委書記）必須向群眾作公開檢查；⑤對“工總司”今後工作提供方便。工人要求張春橋就地答復。張表示要給他時間。經過工人內部的辯論，大部分同意了張春橋的意見，返回到上海文化廣場。13 日中午，張春橋來到文化廣場，代表中央文革小組簽字同意“五項要求”，同時又提出幾點具體意見：第二條加上“以後碰到類似的問題要派代表”；第四條“同意市委領導向群眾公開檢查”的同時，要求必須保證領導的人身安

全；關於第五條張春橋說：工人要發揚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要像一些組織那樣，要汽車、錄音機、照相機，你們盡可能少用一些。張春橋最後說：“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爲全國的模範。上海有 200 萬工人，是有光榮傳統的。上海的文化革命運動一定能够走在全國的前面，如同工業上一樣。”

上海市委對張春橋處理“安亭事件”十分不滿。市委認爲，中央對工廠文化大革命還沒有具體文件，更不能成立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而毛澤東在 11 月 14 日下午召開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會議上，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毛澤東認爲，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僅存在於文化教育單位和黨政領導機關內，也嚴重地存在於工礦企業中。工廠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有助於著手解決這方面的問題。1966 年 11 月 17 日，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工廠文化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全國工人運動隨之興起——這就是“先有事實，後由概念”，事實就是“安亭事件”，概念就是“工廠文革十二條”。

南開大學的“抓叛徒”事件

文化革命中，南開大學的“衛東”和“八·一八”這兩個在校內問題上觀點相悖的紅衛兵組織，都在揪“劉少奇叛徒集團”案件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在全國享有盛譽。這裏根據一份資料，介紹一下“八·一八”紅衛兵在“抓叛徒”活動中驚心動魄的艱辛歷程。

南開大學文革初期有三個組織：①“衛東”紅衛兵，1966年8月12日成立；②“八·一八”紅色造反團，1966年8月18日成立；③“八·三一”紅衛兵，1966年8月31日成立。到了1967年5月4日，“八·一八”和“八·三一”聯合，統稱“八·一八”紅色造反團（簡稱“八·一八”）。“八·一八”和“衛東”在校內問題上認識有分歧，後來發展為勢不兩立。例如，在一份“八·一八”主辦的《新南開》（殘缺版）小報（第22期67.5.22）空白處的《啓示》中這樣寫到：“自本月18日以來，“衛東”隊中一小撮暴徒，連續闖進我校印刷廠，搶劫一空，霸為己有，剝奪印刷工人抓革命促生產的權利。本期第一版已被搶去，第二、四版經過整理，才終於和大家見面”。當然，“衛東”為什麼要破壞“八·一八”出報，也自會有他的理由。不過此事足以證明兩組織之間矛盾的激化程度。然而，這兩個組織在“抓叛徒”問題上，雖然各自一套人馬，各幹各的，却都作了大量艱苦細緻卓有成效的工作。1967年11月22日，陳伯達、謝富治等中央領導第10次接見天津赴京代表團時，謝富治說：你們“八·一八”抓叛徒有功勞，“衛東”抓叛徒也有功勞，這在北京是很著名的。可是，誰叫你們打架呢？

文革中有一份流傳很廣，版本頗多的資料，就是根據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賈淑琴關於“抓叛徒”的報告整理而成的，時間是1967年12月29日。賈淑琴在報告中詳細講述了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形成和多年來的復辟活動以及南開大學“八·一八”紅衛兵一年多來“揪叛徒”的曲折經歷，從資料中多次出現“呼口號”、“熱烈鼓掌”、“長時間鼓掌”的字樣，可以看出該報告的轟動程度。以下是根據賈淑琴報告內容對“抓叛徒”事件所作的簡述。

劉少奇叛徒集團的 61 名成員都是老革命，當初他們在敵人監獄中是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在“反共啓示”上簽字畫押後被釋放出來的。解放 17 年來，他們認定自己是“爲革命叛黨”、是“組織行爲”，所以，大都在重要領導崗位上擔任要職。可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對此却有不同看法。賈淑琴在報告中說，叛徒的出獄就意味著無數革命者的人頭落地，意味著許多黨組織的破壞。有一個擔任副部級職務的“叛徒”，出獄時出賣了 60 多個同志。安徽國民黨“反省院”一年內出來的叛徒就出賣共產黨員 4000 名，爲此，國民黨給這個“反省院”還發了嘉獎令。當然，也有因拒絕在“反共啓示”上簽字而被長期關押，解放後又受到叛徒集團打擊迫害的例子，這就是山西劉格平同志。1936 年，劉格平被關在北平國民黨“軍人反省院”監獄裏。當劉少奇的指示傳到監獄後，劉格平拒絕執行。有人說：這是黨的命令，你不執行，出獄後也給你黨籍處分。劉說：“我是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我要保持共產黨人的真正氣節。”就這樣，劉格平多坐了 9 年零 3 個月的牢。解放以後，劉格平是中央委員，行政 3 級，任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的職務。後來，劉少奇抓住劉格平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撤銷一切職務，將劉格平調任山西。在送往山西途中，劉格平被繩子捆綁扣押 20 多天。後來經中央決定，才不得不給劉格平一個有職無權的副省長職務。還說劉精神不正常，要強行送到瘋人院。直到文化革命中，劉格平才站了出來，當上了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文革中，劉格平曾 9 次接見“抓叛徒”調查團的同學，給予他們很大支持。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這些青年學生走上“抓叛徒”之路呢？賈淑琴在報告中說：文革初期，南開大學前任黨委

書記高××被群眾揭發出有歷史問題，學生根據綫索，到北京搞調查，經過多方查證，得知他的叛徒行爲曾是劉少奇的指示。當時正是1966年10月，劉少奇還以中央領導的身份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學生們十分猶豫，經過一個星期的辯論後得出結論：這個叛徒集團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頭等大事，飯可以不吃，命可以不要，一定要鬥爭到底。於是，1966年11月1日，他們給中央文革和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打倒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彙報材料。11月9日，南開大學出現《看，高××反黨反革命的叛徒嘴臉》和《告全國人民書》兩篇大字報，呼籲全國造反派，徹底砸爛劉少奇叛徒集團。從此，200多人組織了若干個小分隊，奔赴全國各地，查資料、找綫索、搞調查，除了西藏、臺灣兩個省，其它都跑到了。經費是校內外學生、工人師傅、農民兄弟捐湊的。

在“抓叛徒”調查活動中，出現過許多感人的事迹。有一個叫陳通的學生，共產黨員，是專管到圖書館查閱資料的。一次他三天三夜沒有出圖書館，直到勞累得了重病送到醫院搶救。還有一位趙福林同學，在他參加調查活動不久，他的父親接到匿名信，說他是“三反分子”，已經被開除團籍，他父親很生氣地寫信要他立即回家。當時，趙福林正在南京搞調查，接信後向同學借錢做了一面紅旗到雨花臺獻給烈士，墓前寫了一首詩：“半夜雨花臺，壯志滿胸懷。先烈爲黨死，血澆百花開。繼承先烈志，自有後來人。誓斬叛賊手，爲黨除奸害。”回來後含淚給父親寫了一封信，認爲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也可能叛徒集團挖不出來，自己就會被打成“反革命”，爲了不連累父母，情願和父母斷絕關係，不把叛徒集團挖出來，誓不回家。直到一年後他

當上中央文革的特派員才回家看望了父母。在學校留守的同學，爲了保護調查材料也付出了代價。1967年1月9日，得知有人要去砸辦公室，姚正思同學用棉襖抱住調查材料逃走，當他把材料送到北京的時候，渾身上下棉衣凍成冰棒，用剪刀割開胸口衣服才把材料取出來。還有一個小分隊到東北大慶油田搞調查，路過林海雪原，火車因雪停開，他們在雪地裏走了9天9夜，有的腳凍爛了還堅持走，行程幾百里，才到了目的地。

在“抓叛徒”的調查過程中，最難的是被調查人的逃避、刁難和訂立攻守同盟。在抓到一批叛徒的時候，發現都統一口徑，都說是柯慶施指示叛黨的。無奈之下，他們給中央文革發了一封電報，不料僅隔四個小時，周總理就親自打電話說明情況：北方局的叛徒與柯慶施無關。周總理的重視更加堅定了他們“抓叛徒”的決心。調查中被打、被抓事件時有發生。這種時候，總是能得到中央文革和周總理的支持而脫險。比如，到南京的13位同學被陷害逮捕，康生親自打電話，釋放了他們。最後，調查材料終於轉到周恩來手裏。周總理看了後，親自通知“八·一八”來京彙報。

1967年4月26日，首都北京舉行了《徹底粉碎劉少奇、彭真、薄一波叛徒集團》大會，南開大學“八·一八”代表在大會上發了言，大會還宣讀了劉格平的書面發言。《新南開》小報第16期上登載了對這次大會的報道和發言的全文。

“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中國不變色，死了也甘心！”這是南開大學兩派紅衛兵“抓叛徒”中的誓言。“中國不變色”道出了他們歷經艱辛參加“抓叛徒”活動的初衷。

青海省西寧“二·二三”事件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1月28日，中央軍委發佈了《中央軍委命令》（即八條命令），要求解放軍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奉命到西寧地區支左工作聯合辦公室擔任副組長。2月23日，西寧市發生了開槍流血事件，即“西寧二·二三事件”。這是全國最早發生的“支左”解放軍鎮壓群眾組織的流血事件。

1967年2月23日，爲了對報紙電臺實行軍事管制，趙永夫調動武裝部隊，親自任總指揮，組織武裝奪佔報社，與已經奪權控制《青海日報》的造反派組織西寧“八·一八紅衛兵戰鬥隊”發生武裝衝突。軍隊開槍射擊，共傷亡377人，其中群眾（多爲學生）死亡169人，傷178人，軍隊死亡4人，傷26人。青海軍區將此情況向中央軍委和林彪做了彙報。同日，葉劍英聽到趙永夫電話報告後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中央文革小組最初保持沉默。幾天後，他們在《簡報》上刊登紅衛兵控訴武裝鎮壓的來信，由張春橋等人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重新審查青海事件。毛澤東於3月1日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21日，毛澤東、林彪對青海問題的調查做了批示。根據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於3月24日做出《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中央經向有關方面進行了反覆調

查，青海問題的實質已經基本清楚。（一）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二）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二〇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 300 餘人，甚至向 15、16 歲的女孩子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三）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所謂“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枝，並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在現場的許多革命群眾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群眾，並沒有槍枝。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槍；（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根據這種情況，決定處理辦法：（一）中央軍委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並由蘭州軍區派負責人協助；（二）除獨立師、獨立團歸劉賢權司令員指揮外，其他駐軍在處理青海問題上，也統一由劉賢權司令員指揮；（三）向群眾宣佈“八·一八”為革命群眾組織。2月23日流血事件，應由趙永夫和張××負責。要為死難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給予撫恤。對負傷的群眾，要負責進行治療。因為這個事件而被逮捕的群眾和幹部，一律立即釋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四）受欺騙和蒙蔽的群眾，概不追究。群眾組織之間的問題，用整風的方法解決。嚴防壞人挑動群眾鬥群眾；（五）解放軍是偉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製造的，廣大的當地駐軍的幹部和戰士是沒有責任的。一切革命群眾同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緊密團結起來，堅決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六）著手籌備建立

以劉賢權同志為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七) 趙永夫隔離受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文革結束後，中央對趙永夫問題重新審查，認為趙永夫所犯錯誤是人民內部矛盾，決定給與撤銷黨內外職務處分，原級別不動，按正師職重新安排工作。)

從毛澤東和葉劍英對“西寧二·二三事件”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反映了在對待群眾運動問題上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兩條路綫的激烈鬥爭。

黑龍江省的“炮轟”省革委事件

文革中較早建立革命委員會的省市，大都出現“炮轟”新政權的現象。如上海、黑龍江、山東、陝西等。其中，黑龍江省“炮轟派”在全國影響最大。1967年8月9日，首都及全國在京革命造反派在召開聲援黑龍江省“炮轟派”大會，全國370多個造反派組織簽名，發表了《告全國人民書》和《對黑龍江省當前局勢的嚴正聲明》就是例證。

黑龍江省最早的造反派組織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後來，哈爾濱工業大學(哈工大)、黑龍江大學(黑大)、哈爾濱師範學院(哈師院)等14所大專院校以及工廠、機關也相繼成立“紅色造反團”，與之對立的保守組織是八八團、紅旗軍、榮復軍、戰備軍、赤衛隊(即三軍一團一隊)。早在66年8月，從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回到哈爾濱的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就明確表態支持“紅色造反團”。1967年初，保守組織紛紛瓦解(軍工八八團於1月21日宣告解散)，紅色造反團成了合法的左

派組織。1月中旬，哈爾濱先後成立了31個行業的紅色造反團總部，然後由大專院校造反團總部牽頭籌備成立聯合總部，準備效法上海一月風暴進行奪權行動。1967年1月16日，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成立聯合總部，發表了《紅色造反者聯合接管省市黨政財文大權的公告》。1月31日，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召開，宣告成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委”）。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省軍區政委汪家道在大會上分別講了話。潘復生說：我堅決和紅色造反者同志們戰鬥在一起，要把大權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頑固分子手中奪過來。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也曾一度犯過錯誤，在毛主席的教導下，堅決地改正錯誤，堅決地站在毛主席這一邊，和紅色造反者同志們站在一起，向紅色造反者學習，當小學生，在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把我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決進行到底。“紅革委”常務領導核心（當時稱勤務組）由5人組成：范正美（哈師院造反團負責人）任班長；游興懋（哈軍工造反團代表）、劉雪峰（石油配件廠造反團負責人）任副班長；潘復生、汪家道任成員。在《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第一號通告》第六條中把紅旗軍、榮復軍、戰備軍定為反革命組織，把八八團、赤衛隊定為保皇組織。黑龍江省的三結合（群眾組織、革命幹部、軍隊代表）奪權，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紅革委”成立當天晚上，周總理辦公室就打電話過問潘、汪的職務安排。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東北的新曙光》。《社論》中說：黑龍江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的經驗再一次表明，革命群眾組織的負責人，人民

解放軍當地的負責人和黨政機關的革命領導幹部，組成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對奪權鬥爭的勝利起了關鍵的作用。1967年2月9日，《人民日報》全文轉發新華社《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奪權鬥爭的基本經驗》一文，總結了四條基本經驗：①革命造反派、省委內執行毛主席正確路綫的主要負責人和解放軍的主要負責人，三位一體，聯合奪權；②奪取前，首先把報社、電臺和專政機關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裏；③堅定地依靠被奪權單位內部的左派力量，團結中間力量，打擊最頑固的反動力量；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了左派隊伍，左派隊伍運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奪權鬥爭。後來，毛澤東總結了黑龍江等省市的經驗，確定了由革命幹部、人民解放軍和革命群眾代表參加的，實行革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方針和政策，推動了全國的奪權鬥爭。1967年3月初，在周總理的安排下，黑龍江省“紅革委”彙報團到北京彙報工作。後來，根據中央的意見，“紅革委”改名為革命委員會。中央批准潘復生為主任，汪家道為副主任，范正美等為常委。1967年3月23日，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正式發出通知，“紅革委”改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歷時50餘天的“紅革委”從此完成歷史使命。但是，以潘復生為首的黑龍江省革委後來却屢屢遭到“炮轟”。以下是筆者根據資料整理出來的“炮轟派”的形成、壯大及平息經過。

一、1·31事件：炮轟省革委的前奏

在上海“一月奪權”風暴的影響下，“紅革委”的成立是必然的。但是，在班子的人選、幹部使用等問題上客觀地存在著不同意見。“紅革委”成立前夕的總部聯席會議上，在絕大多數人一致同意聯合奪權的情況下，哈工大造反團

劉錄等提出，黑龍江省奪權的時機還不成熟，省委主要領導人潘復生，文革前期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雖然表示支持造反派，但還沒有徹底亮相，還需要有一段觀察和考驗的時間。黑龍江省工人運動還沒有完全起來，現在運動主要控制在大專院校造反派手裏。“紅革委”成立後，劉錄等工大造反團多數派仍堅持其主張。在1月31日、2月1日連續舉行辯論會，提出炮轟潘復生等口號。他們在全市慶祝“紅革委”成立的同時，四處活動，將“東北新曙光”的“曙”字塗改爲“鼠”字，用白石灰水刷寫“潘復生沒有亮相”、“新鼠光長不了”、“學生領導工人運動，學生篡權”等大字標語——這就是著名的1·31事件。

遺憾的是，潘復生沒有吸取反對派意見中的合理成分，指出其錯誤，而是把“1·31事件”定爲“反革命事件”，把哈工大造反團定爲“右派組織”，劉錄等20餘人被逮捕，致使矛盾激化。1967年4月，根據中央軍委命令《十條》中“對前一段衝擊軍事機關和在奪權鬥爭中出現不同意見的革命群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關押的一律釋放，宣佈無罪”的精神，潘復生不得不釋放劉錄等人，但同時又作出“抓的有理，放的應該，性質不變，寬大處理”的決定，引起群眾的不滿，哈工大派代表到省革委上訪，要求爲“1·31事件”平反，“炮轟派”初見端倪。

二、黑龍江大學“于天放事件”和炮轟趙去非事件： 炮轟派形成

1967年4月中旬，黑大紅色造反團組建校革委會時，提出讓于天放（原省政協副主席、副省長）擔任黑大革委會主任，因于天放的歷史問題，未得到省革委會批准，黑大造反團因此對省革委會不滿。同時對潘復生把群眾正在

批判鬥爭的趙去非（省革委常委、原省公安廳長）拉入省革委不滿，開始調查、整理趙去非問題，貼出了“炮轟趙去非”的大字報，“炮轟派”由此得名。而黑大造反團的另一部分人却緊跟潘復生，針鋒相對的成立了“打倒于天放”聯絡站，黑大造反團發生分裂。與此同時，哈軍工、哈外專、哈工大相繼出現反對黑大“炮轟派”的聲明和大字報，並得到潘復生的讚揚和支持。潘復生召開省革委常委會，給炮轟活動定性為“矛頭指向革委會的反革命逆流”，並認定“炮轟派”的後臺是于天放、李範五（原省長、省委副書記）。4月27日，在省革委召開的反擊資產階級二月逆流誓師大會上，于天放被斥責為“二月逆流”在黑龍江省的急先鋒、鑽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被當眾逮捕，投進看守所。5月3日，于天放在看守所自殺身亡。潘復生指示以省革委會的名義，向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呈報《關於于天放畏罪自殺情況的簡要報告》。

黑大、工大、外專等院校的“炮轟派”頂著“反革命逆流”的帽子，毫不示弱，派人到處求聲援，他們說動了哈軍工、林學院、哈建工等造反團部分人，把矛頭集中在趙去非一人身上，成立“炮轟趙去非聯絡站”。後來，許多院校的造反團內紛紛成立新的戰鬥隊，脫離本單位造反總團領導，與黑大“炮轟派”配合，“炮轟派”形成並初具規模。

三、“捍聯總”：和“炮轟派”相對立的官辦組織

1967年5月23日，在潘復生的支持下，由省革委中的群眾代表牽頭，成立了“捍衛革命三結合總指揮部”（簡稱“捍聯總”）。“捍聯總”成立後，在打擊、圍剿、瓦解“炮轟派”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捍聯總”各級領導成員，大都由擁護潘復生、捍衛新政權的紅色造反團骨幹組成。但在有

的單位，曾參加過保守組織“八八團”、“赤衛隊”以及執行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幹部却成了“捍聯總”的主體和骨幹，被“炮轟派”稱之為“老保翻天”。在《哈師院老保翻天的調查報告》（原載《哈爾濱風雷》報第2期，哈爾濱汽輪廠紅色造反團野戰軍、中技校造反到底總部主辦）一文中寫道：哈師院“捍聯總”在潘復生、汪家道縱容和支持下，武裝顛覆了哈師院革委會，否定了師院紅色造反團，否定了師院文化大革命，正在完成黨內走資派及其所操縱的“八八團”所沒有完成的事業，這是一次老保翻天的表演。全院原“八八團”連以上的骨幹88人，除了幾個逍遙派外，都在“捍聯總”一邊，並成了“捍聯總”的骨幹，甚至決策人。師院“捍聯總”寫的《八八就是要翻天》的主要論點是：“八八團”翻天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是革命鬥爭的實際需要。因為造反團的主要特徵是左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運動前期需要造反團衝一衝，他們起過先鋒作用。“八八團”主要特徵是掌握政策穩，組織紀律性強，思想有些保守，運動後期“八八思潮”的優越性就表現出來了，它不但要翻天，而且一定能翻天……。哈師院“炮轟派”認為，紅色造反團是在白色恐怖中殺出來的，是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親切關懷下成長壯大的左派隊伍，否定造反團就抹殺了兩條路線的鬥爭，決不能讓“捍聯總”老保翻天。

四、哈軍工“6·5、6·9事件”：哈軍工山下派加入炮轟派

從1966年8月到1967年6月，哈軍工“紅色造反團”領導核心曾有三次變動：開始是幹部子弟主持工作，66年10月份後大部分外出串聯，換了一次班。66年底“紅色造反團”進行開門整風，在對待“八八團”問題上分成游派（游

興懋)和涂派(涂陣中)。游派主張徹底肅清右傾保守思想,加強團的戰鬥力,又稱“反右傾派”;涂派主張對“八八團”發起政治攻勢,反對形“左”實右,又稱為反形“左”實右派。67年1月奪權後,游派掌握了軍工革委會的領導權,游興茂還擔任了省“紅革委”副班長職務。這時候,軍工部分幹部子弟貼出了27人大字報。對於這張大字報,兩派都認為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為北京聯動分子鳴冤叫屈、把矛頭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江青,應該狠狠批判。但在具體做法和政策上發生分歧,涂派認為,游興懋、劉慶譜(一月份成為造反團勤務員之一)藉批判27人大字報,搞肅反擴大化,把矛頭指向老造反派和幹部子弟,使許多人受到牽連,受到打擊。軍工校內兩種思潮矛盾日益尖銳。

在對待潘復生、汪家道問題上,游派認為轟一轟也可以。涂派認為潘復生是無產階級當權派,堅決反對炮轟。3月7日,省革委以“對潘復生、汪家道進行封鎖、打擊、陷害,破壞三結合的罪惡活動”為罪名,逮捕了游興懋、劉慶譜。此後,軍工造反團中以杜美平為首的“井岡山戰鬥隊”,堅決站在潘復生一邊,成為“捍聯總”的骨幹組織,被稱為“山上派”。而另一部分以邊士軍、馮昭逢為首,認為潘復生、汪家道扶植保守派,打擊了真正造反派,是資本主義復辟的急先鋒,自稱“山下派”。

1967年6月5日下午,軍工“山下派”代表20餘人,到省革委會駐地要求潘復生、汪家道接見,彙報鷄西問題(省軍區支左部隊支持鷄西紅色造反團聯合總部(紅聯總),把軍工“山下派”支持的“紅色造反者第三司令部”(三司)宣佈為非法組織),遭到拒絕後,開始靜坐。潘復生對靜坐學生採取三個對策:一是緊急調動工人捍聯總進駐省革委

院內；二是加強省革委會警衛部隊，保衛省革委會機要部門；三是親自策劃和指揮，上千工人動手，把靜坐的軍工“山下派”學生架到省革委大院外。大部分學生撤離後，仍留少數學生在省革委對面大街上繼續靜坐。這就是“6·5事件”。

1967年6月9日，哈軍工“山上派”借助於校外2000餘名工人“捍聯總”的支援，衝進軍工56號樓，奪哈軍工革委會的權，“山下派”頑強抵抗，雙方發生了武鬥，造成流血事件，這就是哈軍工“6·9奪權事件”。同天，“捍聯總”把省革委會對面街上靜坐的軍工“山下派”學生架上大卡車拉至郊外，實行遣散，靜坐被迫結束。哈軍工“山下派”在丟掉了56號樓，失去革委會後，沉痛地寫出了《國際悲歌歌一曲——哈軍工紅色造反團喪權的歷史教訓》一文，全國許多造反派小報轉載，影響很大。

“6·9事件”以後，“捍聯總”屬下的哈建工學院造反團，其主要領導人率領多數加入“炮轟派”。於是，軍工、黑大“炮轟派”就把建工學院土建樓作為陣地。支起高音大喇叭，不停地揭露“6·5靜坐”、“6·9奪權”、“6·9遣散”事件的真相和群眾的各種評論。6月21日，“捍聯總”發動了對哈建工土建樓的奪樓攻勢。由於“炮轟派”拼命抵抗，發生了嚴重武鬥，造成雙方人員受傷流血，建築物 and 儀器設備遭受損失。

潘復生對“炮轟派”的打壓政策，使炮轟派失去了活動據點，却贏得了越來越多群眾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許多單位“捍聯總”倒戈加入到“炮轟派”隊伍。

五、省革委常委范正美等加入“炮轟派”：炮轟派隊伍迅速壯大

范正美文革前是哈爾濱師範學院政治教育系學員、系

學生分會主席、共產黨員，文革初期率先主持師院“造反有理”大會，後被推選為哈師院紅色造反團總部負責人，哈師院在兩條路綫鬥爭中堅持團結大多數的做法，被解放軍報社記者寫成長篇通訊，得到中央的重視，並以中共中央1967年1號文件名義轉發。“一月奪權”中，范正美被推舉為省“紅革會”勤務組班長，在潘復生擔任革委會主任後，范正美任常委，曾得到潘復生的信任和重用。從1967年4月中旬到6月初，范正美按照潘復生的旨意，擔任捍聯總負責人，參與反“炮轟派”的活動。“6·5事件”之後，他對潘復生打壓“炮轟派”的政策產生疑慮，認為“炮轟派”以靜坐的方式强行要求省革委主要領導接見的作法固然不對，但他們是群眾，省革委如此對他們大動干戈，大打出手，是在犯大錯誤。這時，范正美回到師院聽取本校造反派的意見，達成共識。在7月12日省革委常委會上，范正美公開了自己的看法，但潘復生根本聽不進不同意見。造反團的許多頭頭，同范正美一樣，都是因為主張正確處理“炮轟派”問題，而被被逼上梁山加入炮轟行列的。

1967年7月中旬，范正美和宋振業（省革委常委、農學院造反團負責人）在“炮轟派”的幫助下，改名換姓，化裝成鐵路工作人員，乘貨車到北京反映黑龍江問題。在京期間，他連續寫了《給全院紅色造反者和革命師生員工的公開信》、《炮轟我前段工作中的錯誤》、《給參加所謂〈捍衛三結合指揮部〉紅色造反者戰友的公開信》，還與宋振業聯名寫了《我們對當前我省我市形勢的幾點看法——給紅色造反者和革命同志們的公開信》，表明對鎮壓“炮轟派”的看法和應該採取的態度。哈師院造反團於7月27日，發表《炮轟宣言》，炮轟省革委主要負責人混淆敵我界限，把

“炮轟派”自下而上對新政權的公開批評和監督打成反革命逆流，壓制群眾，反對群眾，鎮壓群眾；炮轟某些領導人宣揚的軍工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建工是反革命堡壘的謬論；炮轟省革委某些領導對縣城、工廠資本主義復辟情況，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抓第一手材料，偏聽偏等等。後來，范正美等人在北京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等造反派頭頭的幫助下，受到周總理的親自接見。

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解決黑龍江炮轟派問題

1967年8月上旬，黑龍江省“炮轟派”彙報團和“捍聯總”彙報團，同一天住進北京西苑旅社。在“炮轟派”看來，他們能夠和“捍聯總”平起平坐，就是勝利。周總理的接見等於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給“炮轟派”平了反。1967年9月6日晨3:20~4:50分，周恩來、戚本禹、吳法憲等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接見了范正美、宋振業、邊世軍等“炮轟派”代表和潘復生、汪家道率領，陳造反等參加的“捍聯總”代表。在周恩來的親自主持下，雙方達成關於制止武鬥的《九條協議》。主要內容有：雙方就地查封武器，立即停止圍攻、衝擊；雙方取消戒嚴和警戒綫、停止經濟迫害，不准斷糧，斷電，斷水，不准克扣工資，不准歧視，不准報復；不准搞經濟主義；不准以任何藉口挑動農民進城，不准到農村去搞打砸搶；抓革命、促生產等。1967年11月24、25日，周恩來再次接見兩派代表，促使兩派在京達成了《十二條協議》。1967年12月4日，中央發出（67）374號文件，對《黑龍江省捍聯總、炮轟派雙方關於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協議》進行批示，同意兩派的大聯合協議。12月7日，潘復生、汪家道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交了書面檢查，承認在對待群眾問題上犯了錯誤。但是，“炮轟

派”代表對《檢查》並不滿意，認為他們對錯誤避重就輕、偷換概念，沒有誠意。1967年12月23日晚，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在人民大會堂再次接見黑龍江、遼寧、吉林三省各派代表，周總理在講話中強調，要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消除內戰，促進革命大聯合，儘快穩定黑龍江省這個反修防修的東北前哨，建立新秩序。炮轟事件逐漸平息。

說明：1999年5月，筆者在鄭州舊書市場購買到一大批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文革資料。資料署名王國凡、李桂蘭。這批資料內容豐富、系統。內容包括：《書信集》、《工學》雜誌、紅色造反團和八八團的數份大字報、大事記、《紅色造反團整風資料彙編》、《大字報選編》、數種自辦油印刊物、山上派和山下派辯論文章、黑龍江省“炮轟派”有關資料等等，本文主要參考的就是這批資料。

《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 按語

路石按：對於共產黨前進中的失誤，應該正視它，分析它，弄清事實真相，總結教訓。這不僅對那些誇大事實藉以攻擊共產黨的別有用心者是個有力的回擊，同時也是對一貫形“左”實右的走資派所犯罪行的徹底清算。

1958—1959年前後，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委，置毛主席的多次批評於不顧，實行“左傾”蠻幹、高估產、高徵購，大颺浮誇風、“共產風”，造成了舉國震驚的“信陽事件”。對於當時中央對吳芝圃“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幹，死不回頭”的批評，至今河南的許多過來人仍記憶猶新。雖然吳芝圃也承認“對河南五千萬人民犯了罪”，然而文革中，飽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對“信陽事件”又舊事重提，此時吳芝圃已調離河南，而追隨吳芝圃搞浮誇的省委副書記楊××、趙××首當其衝被群眾批鬥。1967年7月，楊、趙被中央文件定為“走資派”。文革後的“揭批查”運動中，趙××重新上臺掌握了河南省的黨政大權，又揮舞起“極左”的大棒，瘋狂鎮壓文革中的造反派和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綫的幹部，揚言“提漿糊桶的也不能放過！”（指貼大字報者）

從而造成大批冤假錯案。

《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一文的作者張樹藩在“信陽事件”發生時任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行政公署專員，經歷了“信陽事件”的全過程。1993年，張樹藩出於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感，抱病寫出了這篇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世紀末的一天，筆者在北京看望了張樹藩的妻子李瑞英（信陽事件的見證人之一）。此時張樹藩已經過世，李瑞英把這篇遺作送給了我們（此前已經在《百年潮》雜誌上發表過）。同時，我們還拜訪了當年被吳芝圃打成右傾機會主義的“潘楊王”事件中的楊珏同志，他語重心長地說：“說假話是要死人的啊！”。他給我們講了這樣一件事：1958年毛主席在專列上聽吳芝圃彙報後，指著窗外光禿禿的山頭說：“你一年能搞成綠化？我就不相信。”（關於主席對吳芝圃的批評見附件）。

鑒於《毛澤東論壇》“三年自然災害真相館”開館之際，獻上此文，供參考。

2001年4月

毛澤東對吳芝圃的批評（摘錄）

（一）1958年，在成都會議上，吳芝圃向毛主席彙報河南能搞幾百億斤糧食，河南糧食很快就過關了。主席不信，給他頂了回去。毛主席說：“試試看，這種人表面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

(二) 毛主席親自主持兩次鄭州會議，會上毛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却堅持大隊為基礎。毛主席到武昌後又親自給吳芝圃寫了一封信，嚴厲批評他，信中說：“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

(三) 1958年，吳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實現四化（即：糧食達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掃文盲）。毛主席在會上批評說：“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落實。”會後又把吳芝圃叫到武漢，說：“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最後毛主席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思，就說：“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

(四) 1958年4月29日，毛主席在《給生產隊長的一封信》中指出：“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這些，只要管現實可能性……。吹上一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收穫多少就多少，不可講不符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對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總是吃虧。”而吳芝圃却吹噓：“1958年夏季糧食產量223億斤，平均每人達450斤以上。”“1958年全省每口人合到1500斤左右的糧食。”為他的高徵購打下埋伏。

路石 2001年4月摘錄

關於《文敏生回憶錄》中一段 文字的復信

筆者按：2007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上海一位青年朋友的來信。信中說，最近他讀了《文敏生回憶錄》，發現其中一段文字好像說的是“范伯伯”，想求證一下。並發來如下文字：

1980年夏天，河南省委派兩名同志來哈爾濱找我出證言，讓我證明當時的一名縣委副書記、文革初時的農學院學生，曾作為紅衛兵頭子打過我，以至使我致殘耳聾。當時我聽到已找到凶手後非常激動，我說：“我49歲趕上文革，正是為黨為國家工作的時候，他把我打聾了，太可恨了。”當天晚飯我都沒吃。可是第二天，秘書來催我寫證言時，我又猶豫了，我說：“當時兩汽車學生，穿一樣黃衣服，鬥我打我，究竟是哪一個打的，我也說不清，如果我搞錯了，又寫了證言，這個年輕人一輩子就完了。糾正我們這一代人的錯案，不要由於不慎重給青年人留下新的錯案。你告訴外調的同志，請河南省委慎重定案，我不能寫沒把握的證言。”最後這兩位外調人員，只得回河南去了。臨走時和我秘書說：他們是帶著未完成取證任務的遺憾和對一位老

革命高尚品質和求實作風的崇敬，離開哈爾濱登上返回列車的。

讀了這段文字，我立即給朋友復信，原文如下：

小×：你好！

年紀大了就容易醒的早。今天，我又是五點多鐘起床、洗漱，然後打開電腦、上網、看郵件——這是幾年來養成的習慣。於是，就看到了你的這封信和《文敏生回憶錄》中的這段文字。

我早就聽說文敏生同志出版了回憶錄，一直沒有買到。沒想到這本書中還有關於我丈夫的文字。你是當今社會上較少的對文革這段歷史有興趣的年輕人，我非常樂意和你交流看法。我所以能不假思索地馬上復信，是因為作為你“范伯伯”的同學、戰友、妻子，我對這件事情太熟悉了。多年來的“申訴狀”、“上訪信”中，這些事情不知寫了多少遍。這段文字中所說的那名“縣委副書記、文革初時的農學院學生”，正是指你“范伯伯”。為了敘述方便，以下還是稱“范”或“老范”吧。

對於文敏生同志的這段文字，我有兩點看法：第一，對“耳朵被打聾”的時間、地點、情節，交待十分含糊，只是說“當時兩汽車學生，穿一樣黃衣服，鬥我打我，究竟是哪一個打的，我也說不清”，實際上他確實已經記不清楚了。第二，出於對歷史負責，他沒有寫證言材料，這是一位老革命令人敬佩之處。

實際上，老范在1979年底，就以“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被判刑10年（文敏生說的調查時間是1980年夏天，可見，沒有充分取證，就先突擊判刑）。判刑的主要依據是1967

年8月5日在河南農學院召開批鬥文敏生、趙文甫、楊蔚屏、丁石大會，當時范作為農學院紅衛兵總部頭頭主持了這個大會。會上對文敏生等採取架“飛機”的做法，致使他們受到傷害。據《判決書》中所述，“文敏生同志眼被打流血”（並非回憶錄中所說的“耳朵被打聾”）、“趙文甫同志耳朵被揪爛，胳膊被扭殘”、“楊蔚屏同志胳膊被扭殘”、“丁石同志兩隻胳膊被扭致殘”。當時，范還是在校學生，為什麼去侵犯省委領導的“公民人身權利”？當時實際情況又是怎樣呢？以下結合老范的《判決書》談幾點看法，供你思考和判斷。

（一）批鬥文敏生等大會的全稱是“河南省省會大專院校統一指揮部成立暨批鬥文、趙、楊、丁大會”。從會議的名稱就可以肯定，這個大會不是《判決書》所說的農學院“總部服務組的決定”，更不是范一人所為。

（二）大會召開的背景：1967年8月，中央對河南問題已經表態，中央（67）216號文件中把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敏生、書記處書記趙文甫定為河南省的“走資派”，指定劉建勛、紀登奎等著手河南省革命委員會的籌備工作。為了落實貫徹中央文件精神，在全省掀起大批判高潮，同時為了紀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一週年，省革委籌備組召開大專院校造反派頭頭會議，決定在8月5日召開省會大專院校統一指揮部成立暨批鬥“走資派”文敏生、趙文甫大會，由於楊蔚屏（省委書記處書記）和丁石（省監委書記）在文革初期和二月黑風中“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打擊迫害造反派，所以也作為這次批鬥對象。

（三）大會所以選在農學院召開，一是農學院的造反派佔多數，兩派鬥爭相對緩和（農學院於1967年9月27日實現大聯合成立全省第一個革命委員會，被譽為“春雷第

一聲”就是例證)；二是在鄭州的幾所大專院校中農學院的禮堂最大。所以,范作為東道主主持大會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四) 1967年8月7日出版的《直搗中原》報(《二七公社報》前身、第25期)上,對這次會議有詳細的報道:“到會的有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鄭部隊;有來自黃土高原的青海八一八造反戰士;有來自新鄉、焦作許昌等地無產階級革命派;有來自鄭州各工廠、機關、學校等方面的二七戰士共八千多人。大會上發言的除鄭大聯委、河醫東方紅、鄭工革聯等單位外,8202部隊代表、河南省軍區副參謀長、革命幹部王廷棟也講了話。”報道中所說的情況,《判決書》上隻字沒提,只是籠統地說:“1967年8月5日,在河南農學院召開批鬥文敏生、趙文甫、楊蔚屏和丁石同志大會。8月4日,被告范××主持召開了預備會議,宣佈了總部服務組的決定說:我們的批判會是全省第一場,要做出榜樣來……,要批出水平,批出威風,要把文趙楊批倒批臭……。”

(五) 首先應該承認“架飛機”是極其錯誤的行為(據說王光美搞四清“桃園經驗”時就有了,當時稱做“燕飛”)。這一錯誤作法在文革期間司空見慣,曾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屬於文革“三分錯誤”之列。但是,這次會議上架“飛機”是在數千軍民衆目睽睽之下,文敏生等受到的“殘酷迫害”及其“致傷致殘”狀況是有目共睹的。是否如《判決書》描述的那樣,事實是不難弄清楚的(河南省“揭批查”中的《判決書》大都採取編造情節,故意給人以“罪大惡極”的感覺)。根據當事人的回憶,這次大會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會議開始,根據小報記者拍照的要求,由農學院學生對文敏生等採取“架飛機”的做法,照完相後,范考慮到他們身體吃不消,怕堅持不到會議結束。就由解放軍

戰士替換下學生。不料年輕戰士比學生還厲害，只好又把戰士換成學生，並交代學生“做個樣子就行”。當時主席臺上就座的省委、省軍區領導張耀東、王廷棟、陳桂昌等都可以作證。文革結束後，趙文甫擔任河南省委書記並主抓“揭批查”，在電視上頻頻露面，看到他到老山前綫視察慰問時，精神抖擻、耀武揚威的樣子，很難和判決書中的“傷殘”聯繫起來。丁石“揭批查”時擔任省高級法院院長，把數千造反派逮捕判刑，不能不給人以藉機報復的嫌疑。

（六）《判決書》上所列“罪狀”，發生在1967年秋，到1979年冬范被判決時，已經過去12年之久，早已超過追訴期。1968年范離開學校後的11年間，包括擔任縣委副書記、公社書記期間，判決書上沒有列出一條罪狀。當時專案組20餘人，歷時一年，硬是沒有查出范任何違法亂紀的行爲。假如有一條，也不會不寫到判決書上。事實上，范在擔任縣委副書記、公社書記期間，帶領群眾學大寨、修公路、平整土地、修水利、辦工廠，不貪不佔，不謀私利，老百姓看在眼裏，記在心裏。1988年他出獄後，我倆一起到曾工作過的公社（已改爲鄉）去，面對這位毛澤東時代的黨委書記、鄧小平時代的“勞改釋放犯”，農民群眾爭相邀請去家裏吃飯，一碗打了8個荷包蛋的情景至今還記憶猶新。

文革時候，我們是20幾歲的熱血青年，犯有這樣那樣的錯誤，應該接受教訓。對於老同志所受的傷害，應該真誠的說聲道歉。但是，在處理這些錯誤的時候，要考慮“文革”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要把握錯與罪的界限。作爲青年學生，和省委書記無仇無怨，爲何敢去侵犯他們的“公民人身權利”？再者，文革初期，省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把許

多提意見的學生打成“反革命”，有的甚至被逼自殺，這是不是“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揭批查”中追究哪個領導的責任了？

實事求是地說，文敏生同志文革前後的表現遠比其他人要強得多。張耀東（文革前任省委副秘書長，文革後任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多次給我們說，文敏生能夠關心群眾疾苦，和劉建勛配合救災，積極解決吳芝圃等遺留下來的問題，群眾口碑不錯。只是往往在群眾運動中不知所措，不會應對群眾提出的問題，害怕見群眾。文革初期，文敏生代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後，基本上是按照劉建勛的作法公開支持“鄭大聯委”等造反派組織和造反派學生黨言川的。後來，由於保守派組織抓住黨言川和鄭大聯委“反對三面紅旗”的“罪行”，文敏生曾在省委常委會上提出對鄭大聯委要採取“明支持、暗瓦解”的態度。據張耀東回憶說，當時常委會上只有王廷棟一個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不是對待群眾運動的正確態度。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兩派鬥爭十分激烈，省委基本處於癱瘓狀態，文敏生住進醫院，躲避群眾。但是，“二月黑風”中，針對河南軍區鎮壓造反派的作法，文敏生又給中央文革寫信，客觀地反映河南情況，因而遭到“河南造總”和“十大總部”的反對，把文敏生說成是“二七公社”的黑後臺，喊出“打倒文敏生”的口號，這些情況有大量的資料為佐證。後來，中央所以把文敏生定為河南省的“走資派”據說是因為他和陶鑄的關係。

2007.8.6.

註1：文敏生，文革前河南省委第二書記，文革初期接

任劉建勛任河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文革中（1967年7月）被中央[1967]216號文件定為河南省“走資派”，遭到多次批鬥。文革後任黑龍江省委書記等職。

註2：文中的“范伯伯”，即范念民。文革中系河南農學院學生、農學院紅衛兵總部負責人，曾任河南省革委會常委、河南農學院革委會主任、滎陽縣縣委副書記等職。文革後的“揭批查”中，1979年12月被判刑10年。

附件：文敏生給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

中央文革小組：

河南鄭州市各大專院校，無產階級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絕對優勢。但自元月中旬起即開始分裂為兩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軍區和人民解放軍駐鄭部隊舉行了遊行之後，鬥爭即轉移為以軍區為中心展開了。一派支持軍區。軍區和另一

文敏生近几天来又在大肆放毒了。二月十日，他抛出了“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二月十三日，他又抛出了“我的呼吁”。这是两株大毒草，这是他们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新罪证。我们革命造反派，必须记住这笔账，彻底和他清算。现在我们就把文敏生二月十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所放的毒，剥开示众，请大家看一看，他贩卖的是什么货色。

一、继续给他们一手培植的御用工具撑腰打气，进行疯狂的反扑。文敏生二月十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一开头就说什么：“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这是什么话，这简直是胡说。众所周知，郑大联委、河医东为红以及他们强行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中的一小撮人，早已成为保护河南省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建勋、保护河南省最大黑司令部——河南省委的御用工具，成了顽固的保皇派。而文敏生直到现在还在为这些组织撑腰、打气，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是太可惡了。告诉你文敏生：你把这些顽固的保皇组织，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那是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我们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组织起来了，不管你使用什么依仗，给你的御用工具撑腰打气，丝毫也提高不了他们半点身价，丝毫也损伤不了真正革命派半根毫毛，也丝毫挽救不了你失败的命运。相反，更证明了你们仍在坚持你们的反动立场，继续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更证明你们都是一丘之貉。

二、攻击军区，诬蔑解放军。文敏生二月十日在给中央文革的信中，在肯定了他们的御用工具那副保皇派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后，接着又说什么：“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这番话的意思就是，河南军区和驻郑部队武装示威游行把这个“左派”队伍破坏了。这是多么恶毒地攻击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河南省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迅速联合起来的责任在于你文敏生、刘建勋和纪德奎；破坏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罪魁祸首是你文敏生、刘建勋和纪德奎一伙。你们给河南五千万人民造成的罪恶，你们不但不低头认罪，还嫁祸于人。把罪过推给军区，推给解放军。真是罪大恶极了。

文敏生的又一新罪行

——看文敏生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是什么货色！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红卫兵革命造反派

派則處於對立。鬥爭十分尖銳，工人、農民、機關幹部也參加了。不僅鄭州市如此，據說開封等地也有類似情形。我認爲鬥爭鋒芒應該是對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這樣的。

河南省委目前已完全處於癱瘓狀態，我除虛心聽取和接受廣大群眾的批判鬥爭並老老實實向群眾檢討認錯外，只要有一點可能還要按主席的教導站起來爲黨工作。

現在我誠懇的請求中央文革小組能派人來鄭州，對當前運動予以指導，以便早日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完成奪權鬥爭的歷史任務。

文敏生

1967年2月10日

圖片說明：1967年元月，《鄭州晚報》被軍區支持的“河南造總”奪了權。在“新生”《鄭州晚報》第27號（1967.2.24）上，登載一篇文章：《文敏生的又一罪行——給中央文革的一封信》，文章最後全文附上了這封信。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動簡記

(第一部分 1965·11——1969·10)

在紀念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誕辰 110 週年之際，筆者想起他老人家說過的這樣的話：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孤島上去了；另一件事就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很明顯，毛主席所說的兩件事就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然而，毛澤東為鞏固政權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在他老人家逝世後却被徹底否定。這期間，“文革”中的“三分錯誤”被無限擴大，許多事件被歪曲、肢解、顛倒，文革積極分子被妖魔化。在官方對文革臉譜化的定位下，在強勢語言的解釋下，只有辱罵和控訴。然後，那位曾信誓旦旦“永不翻案”的“老革命家”，斷然“取消四大”，在“貓論、摸論、不爭論”的理論指導下，打著“中國特色”的幌子，在資本主義道路上狂奔起來了。

然而，歷史和時間是最好的老師。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特別是中國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喪失和社會現狀不斷惡化，使人們變得清醒起來了。老百姓對屢禁不止愈反愈烈的腐敗現象開的處方竟是：只有像文革那樣搞群眾運動！一些曾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對自己所受到的衝擊耿耿於懷的老同志，也開

始進行理性的思考。他們或寫文章大聲疾呼：“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或公開上書“反對資本家入黨”，表現出一代老革命堅持馬列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偉大風範。在對待文化大革命問題上，認識也發生了變化，他們肯定了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肯定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積極意義。他們說：文化大革命只是毛澤東為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偉大鬥爭的一個環。他為此採取了許多重大措施，在理論上有一系列論述，這次運動是他的徹底革命理念的一個演習，是他發動群眾、教育青年、培養千百萬接班人，以保證黨不變修，國不變色的偉大實踐。如果因為文化大革命的失敗而一概否定他為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所作的努力和貢獻，否定他為此而提出的一切理論，就不啻因噎廢食。我們必須去掉感情色彩，冷靜地以理性思維去評價毛澤東為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所作的努力和貢獻。這不禁使我們想到當年馬克思對待巴黎公社的態度。巴黎公社失敗了，馬克思說：“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文革失敗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光輝是永存的。最近網上出現的戴愚公的文章——《論毛澤東的晚年》，更是一篇閃耀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光輝的好文章！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還是晚年的輝煌，從戴老的文章裏就可以找到很好的答案。

筆者是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也是文革資料收集者，為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週年，特從資料中整理出《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中活動簡記》一文，試圖為瞭解文化大革命開啓一扇視窗，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較系統的參考資料。

本文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從 1965 年 11 月至

1969年10月。這期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從初期發動到大規模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再到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以至中國共產黨“九大”的召開，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基本告一段落。第二部分是從1970年1月到1976年9月，這期間發生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到毛澤東逝世。從本文中可以看到，整個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基本上都是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進行，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部署，都傾注了毛澤東的心血。雖然運動中出現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錯誤，但畢竟是毛澤東為防止無產階級政黨演變為修正主義的黨，防止社會主義國家復辟為資本主義的一次偉大嘗試中不可避免的。正像毛澤東所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瑕不掩瑜。無論復辟者怎樣詆毀、歪曲、咒罵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將光輝永存！

現在奉獻給讀者的是第一部分（1965.11—1969.10）。由於是初稿，內容有待進一步完善，加之本人水平有限，難免會有欠缺、謬誤之處，請讀者提出寶貴意見。

2003年12月

一九六五年

11月10日 毛澤東批准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是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 1961 年寫的，主要宣傳海瑞剛直不阿、爲民請命的精神。姚文認爲《海瑞罷官》中的“退田”、“平冤獄”是影射當時對“單幹風”和對彭德懷的右傾“翻案風”的批判。後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很快發展爲文學藝術領域的一場大批判運動，成爲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導火綫。

12月21日 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發表關於教育制度的講話時說：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20 多年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試驗，但也要接觸實際。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但光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然後讀兩年書就行了。

一九六六年

2月12日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彭真爲組長，陸定一爲副組長，康生、周揚、吳冷西爲組員，負責領導文藝界整風等文化革命事宜。2月12日，中央批轉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2月至3月 毛澤東在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修改稿）上作了 11 處修改：將標題“江青同志召

開”改爲“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在“徹底搞掉這條黑綫”之後加了“搞掉這條黑綫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綫，還得再鬥爭”；還加了“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只好聽任黑綫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三月中旬，江青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找陳伯達、張春橋再次修改《紀要》，3月14日，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再次作了修改。3月17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紀要》的核心內容是16年來，文化戰綫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黑綫專了政，這條黑綫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

3月12日 毛澤東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致劉少奇的信。毛澤東提出農業機械化要以地方爲主的原則，說：此事以各省、市、區自力更生爲主，中央只能對原材料不足的地區有所幫助，也要由地方出錢購買，也要中央確有原材料儲備可以出售的條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則推遲時間，幾年以後再說。……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够打仗，……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沒有糧棉油等儲備，依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爲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够吃、衣被甚少著想。……所以，農業機械化要同這幾個方面聯繫起來，才能動員群衆，爲較快地但是穩步地實現此種計劃而奮鬥。蘇聯的農業政策，歷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群衆，以致造成現在的困境，主要是長期

陷在單純再生產坑內，一遇荒年，連單純再生產也保不住。我們也有過幾年竭澤而漁（高徵購）和很多地區荒年保不住，單純再生產的經驗，總應該引以為戒吧。

3月17日至20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在上海召開。會上毛澤東說：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很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輕人犯“王法”，不要扣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

3月28日至30日 毛澤東兩次找康生等人談話，對彭真查問上海發表姚文元文章為何不向中宣部打招呼一事，十分生氣。嚴厲批評北京市委、中宣部，批評《二月提綱》。他說：《提綱》是錯誤的，混淆階級界綫，不分是非；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他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主要是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他們扣壓左派稿件，是包庇右派的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他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並點名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寫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毛澤東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應多出一些孫

悟空，大鬧天宮。毛澤東發話以後，形勢急轉直下。4月1日，張春橋寫出《對〈二月提綱〉的幾點意見》。4月2日、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分別發表了原被中宣部“扣壓”的戚本禹、關鋒等人批《海瑞罷官》的文章。此後，批判文章大量出現在報紙上。

4月16日至24日 毛澤東在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上揭發批判了彭真的“反黨罪行”，同時還討論了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4月22日，毛澤東在會議上強調說：我們面臨嚴重的文化革命任務；吳晗問題的嚴重性，就在於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軍隊也有，鬥爭涉及面是很廣的。

5月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76人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組”提議增加的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人。事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草稿）》，對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綱》作了徹底否定和批判。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基本通過了中央《通知》的草稿。這次會議就是按照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進行的。康生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1966年3月底的3次講話後說：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講話，概括起來有兩條：一是批判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壓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

會議貫穿一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出了怎麼辦？6日下午，張春橋在會上發言說：姚文發表

以後，反映強烈，全國各地來稿來信 1 萬多件。意外的是發生三件事，一是《北京日報》社有人給上海《文匯報》社打電話追問姚文的背景；二是北京各報都不登，這是誰向誰專政？三是《文匯報》決定印小冊子，印出後北京新華書店不表態，姚文進不了北京。如果不是彭真統一佈置，又有誰有這樣大的權利，可以這樣佈置？

16 日，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5·16 通知）；轉發了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林彪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彭真、陸定一分別作了檢查；劉少奇發言作了自我批評。這次會議通過的《5·16 通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5 月 5 日 毛澤東會見以謝胡為團長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伍修權參加了會見。毛澤東說：“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種可能，我們就有點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在看出來了，還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們在做地下工作。列寧講過，被打敗了的剝削階級長期還強於勝利的無產階級。列寧又講，農民、小資產階級每日每時都生長資本主義。”

5 月 7 日 毛澤東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966 年 5 月 6 日，林彪給毛澤東送去中央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 7 日復信林彪。信中說：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

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幾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公社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通知》宣佈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通知》中說：《二月提綱》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綫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通知》最後說：“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

到我們重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5月25日 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宋一秀等七人，貼出了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康生把大字報底稿送給了在外地的毛澤東。毛澤東看到大字報後決定向全國廣播。6月1日，毛澤東對這份大字報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此後，毛澤東還將這份大字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大字報6月1日向全國廣播後，引起強烈震動，文化大革命急劇升級。

6月2日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文章說：北京大學“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文章號召，要“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8月5日，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加了一段註：“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幹部對於錯誤的領導，要廣泛地進行抵制。”

6月3日 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擬定關於運動的“八條規定”：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要在校內開，不要大規模的聲討會；不要上街示威遊行；不要串聯；不要包圍黑幫住宅；防止壞人破壞；注意保密。這八條規定沒有成文，是口頭傳達的。這期間，毛澤東在杭州，劉少奇曾打電話請示彙報，沒得到明確的答復。

6月9日 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

毛澤東指示：不要急於派工作組。可以不派嘛，亂就亂它一陣。

6月10日 毛澤東在杭州與越南胡志明談話。毛澤東對胡志明說：中國現在也出了修正主義，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問，以前我們知道不知道？我們是知道的，彭真犯過一系列的錯誤。早幾年我已經要撤換他。北京是個獨立王國，誰也不能過問。毛澤東說，一個黨不分裂，沒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我們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爲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

在談到當前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說：我們最近這場鬥爭，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已經7個多月了，最初姚文元發難。他是個青年人。討論清官等問題。你（指胡志明）不是贊成清官嗎？你說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沒有見過。……現在我們不搞清官、貪官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藝界、學術界、哲學界、史學界、出版界、新聞界。毛澤東還說，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

6月20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社論中寫道，毛主席說：“大字報是一種極有用的新式武器”，對待革命的大字報採取什麼態度，是在這場文化的革命中區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區分無產階級革命派和資產階級保皇派的一個重要標誌。

7月3日 紅旗雜誌發表社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必須組織和發展無產階級左派隊伍，並且依靠他們發動群

衆，團結群眾，教育群眾”。“領導與群眾相結合是黨的領導方法的一個根本原則。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也必須堅持這個原則。”

7月8日 毛澤東致信江青。信中寫道：“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再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指林彪5·18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麼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吧。……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爲主，也有些猴氣，是爲次。……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的越高，跌的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全世界100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後還要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爲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信的最後說：“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爲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能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的地區（例如北

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的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7月18日 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後，聽取了中央文革關於工作組問題的彙報，看了有關學校的材料。隨後發表了談話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群眾路綫，為人民服務，却是走資產階級路綫，為資產階級服務。”毛澤東還說，“藉‘內外有別’是怕革命，貼出來又蓋起來，這樣的情況不能允許，這是方向性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現在這個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反對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的立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鬥二批三改。”毛澤東強調說，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志，應該有這個準備。

7月22日至26日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江青四次來到北京大學。25日、26日兩個晚上，江青等親自主持北大全校師生關於工作組問題的辯論會。毛澤東親自聽了北京大學辯論會的錄音，並看了辯論會上遞的條子。明確表示支持反對工作組。

7月24日 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研究工作組問題。毛澤東說，工作組成了群眾運動的障礙，

要立即撤出。中央好多部，沒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

8月1日至12日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全會第一天，印發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並附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份大字報。毛澤東在信中寫道：“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們的革命戰友們，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從新做人的出路。”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兩份大字報分別題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中引用了毛澤東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8月4日 毛澤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講話中說：“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現在到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什麼分別！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

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另一種意見却是津津有味。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綫問題，是路綫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問題，否則很危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人家起來了又加以鎮壓。所謂走群眾路綫，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克思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爲什麼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往來，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却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麼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允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澤東要求各組傳達討論他的講話。

8月5日 毛澤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全文如下：“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

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 1962 年的右傾和 1964 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8月7日 十一中全會印發了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並附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8月8日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決定》共十六條，闡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目的、鬥爭對象及採取的方式和有關政策規定。決定說：“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決定》列舉了各級黨組織對運動的領導存在的問題，指出：“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於這場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於軟弱無能的地位。”“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軟弱的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又願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參加戰鬥，撤換那些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裏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取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嚴格區分各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要文鬥，不要武鬥，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決定》最後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8月10日 毛澤東來到中央接待站接見前來慶賀《十六條》公佈的群眾。毛澤東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8月12日 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講話。毛澤東說：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還是不正確，要看以後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個決定就是關於文化大革命，廣大學生和教師是支持我們的，而過去的那些方針，廣大的革命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抵抗的，我們是根據這些抵抗來制定這個決定的；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議和公報的實行；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出路，要准許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我們這個黨不是黨外無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就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了？它就是有，比如說對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佔多佔少的問題。如果不開這次全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要壞得多。所以，我看這次會議是開得好的，是有結果的。

8月18日 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首都舉行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身穿綠軍裝，在天安門接見來自全國各地到京串聯的紅衛兵。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

毛澤東對林彪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義。”林彪在大會上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講了話。他說：“我們堅決支持你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的毛主席。”“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制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北京大學代表聶元梓、各地學生代表先後發了言。

8月23日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他說：主要問題是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是亂他幾個月，堅決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呢！《人民日報》發了一個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運動。提倡要文鬥，不要武鬥。我看北京亂得不利害，學生開了十萬人大會，把凶手捉回來，驚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

8月31日 毛澤東第二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

參加接見的有 50 萬人。林彪在大會上代表毛澤東和黨中央講話，說：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好的很！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象雨後春筍一樣發展起來。他們走向街頭，橫掃“四舊”。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鬥爭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也是這樣。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周恩來在大會上也講了話：“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的同學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分期到北京來。”

9月1日 毛澤東復信章士釗。信中說：“行嚴先生：來信收到，甚為繫念，已請總理予以佈置，勿念為盼！順致健康。”8月30日，章士釗寫信給毛澤東，信中講述了北京大學紅衛兵如何抄了他的家並鬥爭了他，毛澤東便回了信。同時，周總理通知章士釗，北大紅衛兵已受到嚴厲批評，命令他們立即送回被抄物品。同日，周恩來按照毛主席的批示，擬定了一份應受保護的民主黨派和幹部名單。

9月7日 毛澤東致電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的信。信中寫道：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組織工農反學生，都是錯誤的。要求由中央發一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11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

9月15日 毛澤東第三次接見來京的學校師生和紅衛兵，參加接見的群眾約百萬人。林彪代表毛澤東、黨中央

講話。他說：“紅衛兵戰士們，革命的同學們，你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澤東和黨中央堅決支持你們。廣大工農兵群眾也堅決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成果，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的對，做得好！”

9月21日 新華社播發了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去世的公報。萬曉塘在受到揪鬥和關押後去世，有50萬人參加了追悼會，毛澤東指出，“這實際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10月1日 毛澤東在國慶十七週年紀念大會上第四次接見來京師生和紅衛兵，150萬人受到接見。林彪代表毛澤東、黨中央講了話，他說：“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進行的一種嶄新的創造性的大革命。這場大革命，是鬥倒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橫掃社會上的一切牛鬼蛇神，破剝削階級的‘四舊’，立無產階級的‘四新’。目的是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綫的鬥爭還在繼續。”

10月9日至28日 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為中心內容。參加會議的有各大區負責人，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中央各部委負責人。

葉劍英在當天第二組的會議上發言說：主席說，這次運動暫定搞到明年1月，還有4個月。十一中全會後搞兩

個月，要很好地總結經驗。爲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一是爲了防修反修，第二是爲了戰備。現在備戰的任務很重，時間很緊。可能在1968年前後發動戰爭。主席說，三綫不建起來，覺也睡不著，文化革命就是最好的戰爭動員。

16日，陳伯達在會議上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綫》的講話，講話中說：“整個文化革命運動，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國歷來幾次大革命的群眾運動，都來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毛主席提出的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路綫，是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可是提出錯誤路綫的代表人，把群眾當成阿斗，把自己當成諸葛亮。”陳伯達在講話中引用了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並點名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

24日，毛澤東在陳伯達講稿的送審稿上批示：“改稿看過，很好。抓革命，促生產兩句，是否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一本。”

10月18日 毛澤東第五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約150萬人。此次接見前，發生了“口號”事件。17日，中央中宣部廢除了16日爲這次接見擬定的“標語口號”，另發了一個“呼喊口號”，刪去了一些過長的文字，其中將“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改爲“無產階級革命路綫”，還刪掉了另外4個口號。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認爲這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立即起來“鬥爭”。18日晨5時，中央政治局在毛澤東身邊開會，討論通過了首都三司提出的“革命口號”，並增加了一條“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口號事件”歸罪於陶鑄、熊復等人。

10月23日 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會議上作檢討。9

月 14 日，毛澤東曾在劉少奇檢討初稿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寫的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註：即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妥一些，請酌定。”劉少奇在檢討中說：“在今年 6 月 1 日以後的 50 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是路綫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他在敘述派了工作組，作出“內外有別”等規定，批發北大工作組關於文化革命的簡報等項活動後說：“由我主持的中央彙報會議就陸續地作出了前面所說的那些錯誤決定。”“事實上就站到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運動打了下去……，雖然才五十多天，但損失是很大的。這種後果直到現在還沒有肅清，有些地方變本加厲造成了群眾的對立。”

毛澤東 10 月 22 日曾在鄧小平檢討送審稿上作了批示，表示肯定。

10 月 24 日 毛澤東召開工作會議並講了話。講話的主要內容：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允許人家革命，讓紅衛兵看看《阿 Q 正傳》；這次會議開得比較好些，上次是沒有經驗，這次會有了兩個月經驗，一共不到 5 個月的經驗。民主革命搞了 28 年，犯了不少錯誤，死了多少人，社會主義革命搞了 17 年，文化革命只搞了 5 個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出經驗。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誰也沒料到，連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學生也犯了些錯誤，主要是我們這些老爺們犯了錯誤；我的責任是分一二錢。我想在死之前

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面。（陶鑄插話：大權旁落）這是我故意大權旁落，現在到鬧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與我商量；劉鄧二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與彭真不同；要准許劉鄧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

10月25日 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講了話。他說：“17年來，有些事情，我看做的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十一中全會以前，我處在第二綫，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許多事情讓別人去做，想讓他們在群眾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麼震動。以前的意思是那樣，大家也贊成這個意見。但處在第一綫的同志處理的不那麼好。現在這個第一、二綫的制度已經改變了。”“我也有責任。爲什麼說我也有責任呢？第一是我提議搞書記處，政治局常委裏頭有一綫、二綫。再，就是過於信任別人。”“引起警覺，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從許多問題看來，這個北京就沒有辦法實行解決，中央的第一綫中存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我就發出警告說，北京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這是在去年9、10月間說的。我感覺到，在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推行不了。爲什麼批判吳晗不在北京發起呢？北京沒人幹這件事，就在上海發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發表的。北京的問題，到現在可以說基本解決了。我要說的再一件事，就是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我闖了一個禍，就是批發了一張大字報；再就是，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北大的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這個運動才5個月，

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文化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很倉促。只幾個月。跟28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比較起來，這個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麼通，有抵觸。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過去盡搞經濟工作、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或者做一些別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沒有想到搞這場文化大革命。”“這一次會議的簡報，差不多我全部看了。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綫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犯錯誤也有原因。”

11月3日 毛澤東第六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有200萬人受到接見。林彪代表毛澤東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很好！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轟轟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確路綫的指引下，我國廣大革命群眾，創造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發展大民主的新經驗。這種大民主，就是黨無所畏懼讓廣大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分實現人民民主權利。……這種大民主，是毛澤東思想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新形式，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講話還說：“毛主席是支持同志們步行串聯的。”

11月8日 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以黎笋為團長的越南勞動黨代表團，參加會見的有林彪、周恩來。越南代表團感謝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越南抗美救國戰爭所給予的巨大援助，毛澤東重申中國將繼續支持和

援助越南人民，直至取得最後勝利。

11月9日—10日 以王洪文等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上海市委認為“工總司”是一個違反中央規定的跨行業組織，採取了不贊成、不支持、不參加的態度。“工總司”會後組織了請願遊行，並要求市委領導接見，市委領導拒不出面。在毫無結果的情況下，“工總司”2000餘人乘火車赴北京請願。火車離開上海不久，被鐵路局下令阻留在安亭車站，“工總司”群眾當即下車，臥軌攔截客車，致使滬寧綫中斷30多小時，製造了“安亭事件”。事情發生後，上海市委向中央作了彙報。先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指示：堅決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的革命組織，不能承認“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在問題解決不下的情況下，中央文革派張春橋處理這一事件。張春橋到上海後，驅車去安亭和王洪文等“工總司”的頭頭開會，達成協議。13日下午，張春橋在上海文化廣場正式簽字同意了“工總司”的5項要求：一、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二、承認11月9日的大會和工人上京告狀是革命行動；三、安亭事件所造成的後果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負責；四、曹荻秋必須向群眾作出公開檢查；五、對“工總司”今後的活動提供各方面的方便。為此，上海市委負責人曾打電話向中央彙報，並開會對張春橋提出了批評。但事後，中央文革小組同意張春橋的做法，毛澤東也肯定了張春橋的處理，並說：可以先斬後奏，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

11月10日至11日 毛澤東第七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約200萬人受到接見。毛澤東在檢閱臺上對一些負責人說：“你們要政治掛帥，到群眾裏面去，和群眾在

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這次接見採用檢閱方式，毛澤東乘敞篷汽車檢閱。

11月25日至26日 毛澤東連續兩天第八次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約250萬人受到接見。從8月18日以來的三個多月中，毛澤東共接見了1100多萬師生和紅衛兵。

12月3日 中央軍委轉發毛澤東、林彪同意南京軍區黨委緊急指示中的三條意見：一、一切轉業復員軍人不准成立紅衛軍或其他名義的單獨組織，只應參加所在單位的文化革命組織。二、不准衝擊解放軍機關及所屬部隊。三、所有專業、復員軍人必須保持和發揚解放軍的光榮傳統，並協助解放軍加強戰備，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2月21日 毛澤東接見了波蘭共產黨臨時中央的楊力。毛澤東在接見時說：一大群人挂著馬列主義的招牌，現在成為資產階級分子，在中國也是這樣。有一群人，我們看到了，他們是國內的修正主義。單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是不夠的，還要反我們黨內的修正主義，不然的話，再過多少年，中國的顏色就要變了，到那時候就晚了。過去作了一些，只修修補補，沒有當作整個階級鬥爭去做。先從學校的學生和機關的幹部做起，再到工廠、農村，把工人農民組織起來。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有些人很不理解，說我們太過分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不贊成。他們只贊成我們反對的資產階級分子。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在中國的希望就是他們。並且他們還在黨內，早就鑽了進來，有老黨員，也有新黨員。我們的黨員80%是1948年以後入黨的，有些是資產階級投機分子。領導機關對他們毫無辦法，他們就怕紅衛兵。在工廠要組織紅衛兵，在農村也要組織紅

衛兵，看看誰勝誰負，勝負還未定。

12月29日 毛澤東批示轉發林彪關於浙江問題的指示。27日，南京軍區向林彪報告了浙江省軍區同浙江大學紅色造反聯絡站談判的情況，林彪指示：要把對學生的工作當作群眾工作來做。這是送上門的群眾工作，不但不應當由於這個問題引起軍隊與革命學生的對抗，而且應當藉這個機會加強軍隊與學生的團結。

一九六七年

1月8日 毛澤東就《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問題發表談話。毛澤東說：“《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5日的告全市人民書，可以轉載、廣播。他們內部造反，過幾天可以寫一個綜合報道。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毛澤東還說：“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產，這是很大的階級鬥爭。”

1月9日 《人民日報》轉載《文匯報》1月5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發表編者按語，這一按語經毛澤東審定。按語說：“上海《文匯報》1月5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

1月10日 毛澤東對《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發動總攻擊》一文和《緊急通告》寫出批語：“伯達同志和小組同志們：（一）此兩件很好；（二）請你們在二三日內，替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起草好了以後，開一次較大的會通過發表。”批語最後補充說：“關於反經濟主義的文件，不要發了，上海這個就很好。”

1月11日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賀電全文如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32個革命群眾組織：你們在1967年1月9日發出的《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你們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你們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模範。你們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方面，你們及時地識破和揭穿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新反撲的陰謀，進行了有力的還擊，你們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的戰鬥任務。你們根據毛澤東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制定了正確政策。你們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你們這

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勝利前進。

1月13日 毛澤東與劉少奇談話。毛澤東派秘書乘車接來劉少奇，在談話中，劉少奇說自己犯了錯誤，鄭重地向毛澤東提出要求：“一、這次路綫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職務，和妻兒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澤東未置可否，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介紹了黑格爾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德《機器人》。臨別時毛澤東送劉少奇到門口，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1月17日 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等八人。參加會見的有康生、劉寧一。毛澤東在會見時說：“我們黨內的鬥爭，過去有些你們可能不知道。有一部分你們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的鬥爭。關於社會主義教育究竟走什麼道路，採取什麼方針和政策，同劉少奇同志的這個鬥爭是從1964年夏天開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條就是這場鬥爭的結果。”“王明到現在還不承認錯誤。他在莫斯科寫文章反對我們。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下次代表大會，他恐怕選不了。劉、鄧是不是能選上？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黨內總有左、中、右，那麼乾淨就不太好。但很危險，可能紅衛兵不同意。”

1月21日 毛澤東做出派軍隊支持左派的批示。當日，安徽省造反派計劃召開大會，批鬥省委主要負責人李葆華，要求軍隊支持，保護現場，防止對立派的衝擊。毛澤東在安徽省軍區的請示電報上批示：“林彪同志：應該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請酌處。”毛澤東同時指出：“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要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就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佈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周恩來向軍委碰頭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批示。次日，毛澤東接見軍委碰頭會議人員時，要求他們“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戲一樣，要亮相。”他批評許多軍區把造反派講的一片黑暗，好像一點光明也沒有。要求軍隊“能夠公開支持的，就公開支持，時機不成熟的，就半公開支持。”

1月22日 毛澤東接見中央軍委碰頭會人員。受到接見的軍隊領導人紛紛向毛主席訴說挨鬥被整的情況。徐向前說，造反派“要揪誰就揪誰”，毛澤東說：“那還得了，到處抓人怎麼行。”同時毛澤東要求軍隊幹部在受委屈中取得經驗教訓，不要吃老本，要支持左派。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

1月28日 中央軍委發佈八條命令，是由徐向前提議，林彪口授的。其中第八條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增加的，內容是：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爲，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2月3日 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卡博·巴盧庫等。毛澤東說：“多少年來，我們黨內的鬥爭沒有公開化。比如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7000人的縣委書記以上的幹部大會，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就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過去我們只抓了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此外還搞了文化界的鬥爭，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來揭發我們的陰暗面。”毛澤東還說：“現在兩方面的決戰還沒有完成，大概二三四這三個月是決勝負的時候，至於全部解決問題可能要到明年二三月或者還要長。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

2月5日 “上海人民公社”舉行成立大會。張春橋、姚文元參加大會並講了話。大會《宣言》稱：“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地平綫上，……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

2月12日 毛澤東把張春橋、姚文元召到北京談話，毛澤東說：“考慮到國家體制改變的複雜問題，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2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指示各地在建立新政權時“不要使用人民公社的名稱”。張春橋回到上海後，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通知的精神，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在懷仁堂召開，譚震林、葉劍英、陳毅、李先念等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展開激烈鬥爭。會議由周恩來主持。譚震林在會上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哩！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什麼？這時形而上

學！你們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幹部。老幹部一個一個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蒯大富，是個什麼東西？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醜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譚震林要退出會場，陳毅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當晚，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記錄，江青給毛澤東寫了個條子：“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幾小時後，毛澤東召見了張、姚，聽取了彙報。

2月18日 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嚴厲批評了譚震林等老同志。毛澤東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葉群是代表林彪出席會議的），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臺，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你譚震林也算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綫上說話呢？”毛澤東還說：“我提議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發動全黨黨員來解決。”毛澤東說完，就退出會場。從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懷仁堂召開七次“政治生活會”，解決老同志的思想問題。

2月19日 毛澤東對北京衛戍區《關於五所高等學校短期軍政訓練試點的總結報告》和《關於兩個中學軍訓試點工作總結》作出批示：一、此兩件立即轉發全國；二、

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每年訓練一次，每次 20 天。在軍訓的 20 天中，軍訓時間每天不要超過 4 小時，同時學校原課程每天相應減少 4 小時；三、黨、政、軍機關，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實行軍訓，每年 20 天。

2 月 23 日 青海西寧市發生開槍流血事件。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是西寧地區支左工作聯合辦公室副組長，爲了對報紙電臺實行軍事管制，趙永夫於 23 日調動武裝部隊，親自任總指揮，組織奪佔報社，但當時《青海日報》已被西寧“八一八紅衛兵戰鬥隊”控制，雙方發生武裝衝突，開槍射擊，共傷亡 377 人。其中群眾死 169 人，傷 178 人，部隊死 4 人，傷 26 人。青海軍區將情況向中央軍委和林彪做了彙報。同日，葉劍英聽趙永夫電話報告後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中央文革小組最初保持沉默，幾天後，他們在《簡報》上刊登紅衛兵控訴武裝鎮壓的來信，由張春橋等人聯名給毛澤東寫信，要求重新審查青海事件，毛澤東於 3 月 1 日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3 月 21 日，毛澤東、林彪對青海問題的調查做了批示。根據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於 3 月 24 日做出《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宣佈對趙永夫隔離審查，宣佈“八一八”爲革命群眾組織，著手籌備以劉賢權爲首的青海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否定文革後，趙永夫被平反，重新安排工作）

2 月 24 日 張春橋在上海“進一步開展奪權鬥爭誓師大會上”傳達毛澤東 12 日以來幾次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內容。所傳達的毛澤東講話的主要精神是：這次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是我們發動的。因爲無產階級專

政機構中有一部分被篡奪了。“徹底改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是反動的，是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正確的說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無產階級專政；青年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做了不少貢獻，但是他們馬上接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的班還不行；現在各省市都學習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國務院叫什麼？那國號改不改呢？如果改為中華人民公社，那國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長了。國號一改，還有個外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我看蘇聯就不會承認，承認對他不利用。公社成立了，還要不要黨呢？我看應當要，總要有個核心。……總之，還要有一個黨。我看名稱還是不變得好，還是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還是叫國務院。上海人民公社就改為上海革命委員會吧！……還叫上海人民公社，優點是保護上海人民的熱情，缺點是全國只你們一家，不是很孤立嗎？《人民日報》不能登，一登大家都叫人民公社了，就會發生一系列問題。

3月6日 章士釗分別致電毛澤東和劉少奇。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自信中國成立後，國家興旺發達，全都仰仗共產黨之英明領導，而毛、劉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的保證。假如劉少奇確實犯了錯誤，望毛、劉兩位領導赤誠相待，好好談談，劉可做檢討，但切不可打倒劉少奇。毛澤東收到信後，於3月10日復信章士釗：“行嚴先生，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個別人情況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敬問吉安！”之後，毛澤東把當時中央整理的尚未公佈的有關劉少奇的材料送給章士釗閱讀。

3月7日 毛澤東對《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材料作出批示：“此件可以轉發全國，參照執行。軍隊應分批分期對大學、

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且參與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先做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8日，中央轉發了毛澤東的批示和天津延安中學的材料。此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任務除支左、軍管外，又增加了軍訓。

3月12日 毛澤東會見新西蘭總書記威爾科克斯。參加會見的有周恩來、康生、劉寧一。毛澤東在談話中說：“革命派在開始時都是受壓迫的少數派。北大的聶元梓是這樣，北航紅旗也是這樣。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北航開始時多數派有幾千人，少數派紅旗只有兩百人。各個學校都是這樣。多數派是紙老虎。上海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工廠，開始時真正革命的都是少數。有人說中國已經搞了十幾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並不是那麼一回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從文化革命才開始的。……過去歷次整風都是在幹部中進行的，沒有發動群眾起來檢查幹部，這次是發動群眾起來檢查幹部。幹部大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壞的，可能辦錯事，整錯人……解放以後，學校還是國民黨的，教員大部分是國民黨留下來的，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都是如此。……共產黨自己沒有多少教師、演員和畫家，有經驗的辦報人也很少。解放以後搞這些的還是舊社會的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看來要一兩年，這是從全國範圍來說。”

3月30日 《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社論轉引了毛澤東的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

4月1日 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毛澤東在這個《決定》上批示：“許多外地學生幾次衝擊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請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是了。而各地把衝擊軍事機關一事都看得太嚴重了。”

4月6日 中共中央發佈關於保護群眾組織的十條命令。毛澤東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命令要求全軍：一、對群眾組織，無論是革命的，或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准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三、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四、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五、對待較大群眾組織採取什麼態度，應深入調查研究，進行階級分析；採取重大行動前，應向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請示報告。六、一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運動，也不要強迫群眾寫檢討。七、在軍隊中要深入進行兩條路綫鬥爭教育。八、對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幹部，要詳細交待政策。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學會做群眾工作，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十、對業已違反上述諸條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積極進行善後處理。

4月8日 陳伯達、康生在中央軍委召開的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對該書的批判：“這本書是唯心論，是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政權的鬥爭，只講個人的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

4月20日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毛澤東在接見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時說：“我祝賀你，祝賀大會成功。請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賀。”“青年人要參加你們的

工作，使前輩人不脫離群眾，使青年人得到鍛煉。青年人不能脫離生產，這樣不會造成脫離群眾，要半官半民。”

4月23日 毛澤東在《陝西駐軍負責同志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改進工作》的報告上作出批示：“軍隊這樣做是很正確的，希望全軍都採取此種做法。”同日，毛澤東又在成都軍區的一個報告上批示：“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人說，他們那裏軍隊做的事情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了臺，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住氣，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公開承認錯誤並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使他們走向正規。我看現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

4月24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見上海、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張春橋、姚文元、劉格平、張日清、李再含、潘復生、王效禹、謝富治。接見後，毛澤東等觀看了上海市舞蹈學校演出的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並同演員們一起照了像。

5月1日 毛澤東、林彪等和首都300萬群眾共慶“五一”國際勞動節。當晚，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以及上海市、山西省革委會代表團。

5月3日 周恩來在接見全國14個省、市夏季糧油徵購會議代表時說：毛主席說過，農民以多報少是藏富於民。糧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處，農民是不會亂吃掉的，藏在農民家裏比國家收購起來還好。你們不要產生錯覺，這不是提倡不老實，毛主席講這句話的意思是整官僚主義的。

官僚主義不下去，不調查，1961年以前實行高指標、高徵購，整了農民，現在他們就以多報少。

5月17日 按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18日，《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為此聯合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文章最後引用了毛澤東的指示：“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歷史時期才能解決。如果弄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5月19日 周恩來就所謂“伍豪事件”問題致信毛澤東。信中說：“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毛澤東看到周恩來送去的信和材料後批：“送林彪同志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1967年底，北京有一個學生寫信給毛澤東重提此事，毛澤東於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

6月6日 毛澤東會見錫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桑穆加塔桑。參加會見的有康生、劉寧一。在談到國內情況時毛澤東說：參加文化革命的不一定是無產階級，甚至混進來一些壞人。但是主要的群眾是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總而言之，過去的領導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義的，脫離群眾的。

6月9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參加亞非拉作家常設局舉行的“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週年討論會”的各國作家和朋友。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見，被接見的有來自32個國家和地區的80多

位作家。

6月16日 毛澤東、林彪觀看由上海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李先念、江青、謝富治等參加了觀看。

6月22日 毛澤東、林彪觀看由上海京劇院演出的現代京劇《海港》。觀看演出的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董必武、李先念、聶榮臻、江青等。

6月22日 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接見參加赴越南作戰部隊座談會代表。這次會議是為研究改進高炮裝備問題由總參謀部召開的。毛澤東提出：“要狠抓一下雷達、光學儀器、指揮儀，要減輕重量，提高質量，增加數量。”

7月5日 毛澤東要求制止各地建造毛澤東塑像的現象。毛澤東在致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信中說：“此類事勞民傷財，無益有害，如不制止，勢必會颳起一股浮誇風。請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討論一次，發出指示，加以禁止。”

7月14日 毛澤東、周恩來來到武漢。當日，謝富治、王力等在重慶促成兩派組織簽訂協議後，接到周總理的指示也到達武漢。

7月15日 上午，毛澤東聽取了王力、謝富治關於華北、中南、西南問題的彙報後，說要座鎮武漢，解決問題。晚上，謝富治、王力到“新華工”（華中工學院）看大字報，並跟學生以及外單位群眾座談，要求群眾離開據點回本單位，不許武鬥。同時，周總理主持召開武漢軍區黨委擴大會議，要求陳再道、鍾漢華不要把屁股坐在“百萬雄師”一邊。

7月16日 上午，周總理等人在東湖賓館向毛澤東彙

報，毛澤東指示：要給工人總部平反，釋放被捕頭頭；“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謝富治、王力要派專人做他們的工作。建議軍區負責人主動承認犯了方向路綫錯誤。

7月17日 凌晨一時，謝富治、王力前往位於武漢測繪學院的鋼二司總部，與學生座談，要求儘快達成停止武鬥的協議，如果不行，就單方面發表聲明，造成和平氣氛；要求學習中央文件和毛主席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指示，為解決問題創造條件。上午，毛澤東再次聽取彙報，研究武漢問題。當談到造反派要打倒陳再道時，毛主席說：“凡有錯誤，不管是大錯誤還是小錯誤，只要承認了錯誤，統統不打倒。我們是來給他保駕的。”毛主席還說：“工人總部要平反，抓的工總頭頭沒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處理”。

7月18至19日 周恩來在武漢軍區師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總結講話。指出：武漢軍區要主動承認在支左問題上犯了方向路綫的錯誤，尤其錯誤的是解散工人總部。軍區要做好農民的工作，不要進城來參加武鬥；軍區要承擔責任，要做好部隊教育工作，教育下屬支持造反派；所有群眾組織要進行整風，好好學習，改變對解放軍的看法。凌晨一點，周總理離開武漢回京。接著，王力、謝富治、余立金和武漢空軍司令員劉豐等人來到武漢水電學院體育館，在數千學生、工人的歡迎大會上表態支持造反派。19日，謝、王、劉的講話錄音在武漢三鎮反覆播放。19日下午至晚上，在軍區二級部長和師級以上幹部會議上，謝富治傳達周總理的講話精神，王力從文革發展的歷史說起，講述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對於謝富治、王力的講話，軍隊幹部抵觸情緒很大，8201部隊師長、政委相繼退出會場。軍區連夜

向在漢幹部戰士傳達精神，形勢立即失控，一觸即發。

7月20日 凌晨，武漢軍區獨立師出動4輛卡車，後跟“百萬雄師”的40多輛卡車，衝進軍區大院。另一部分人衝進東湖賓館，他們不知道毛澤東住在這裏。高喊要見王力、謝富治，要找王力算賬。接著，王力被圍攻、毆打，發生了著名的武漢“7·20事件”。

7月21日 “7·20事件”發生時，解放軍戰士和群眾並不知道毛澤東在武漢。21日，在周總理的安排下，毛澤東離開武漢，前往上海。

8月1日 《紅旗》雜誌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週年》。社論中提出“批判軍內走資派”問題。社論說：“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集中地表現為資產階級復辟和無產階級反復辟的鬥爭，資產階級搞復辟，一定要抓軍隊、抓槍杆子。無產階級要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也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牢牢掌握軍隊……。”“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社論是由王力、關鋒等起草的。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這篇社論，提出“還我長城”。

8月16日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給煤炭工業戰綫職工的信》，號召煤炭工業戰綫的革命派，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正在武鬥和停產的煤礦，應當立即停止武鬥。

8月25日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

8月30日 毛澤東批准周恩來的報告，對中央文革成員王力、關鋒實行隔離審查。

9月5日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佈《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即《九·五命令》。

9月16日 毛澤東南巡到杭州，瞭解浙江省文化大革命情況。陪同到杭州的有楊成武、張春橋等。毛澤東詳細詢問了舟山地區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對軍隊的問題瞭解得很詳細。當陳勵耘政委彙報“空五軍黨委已做出決定，向二十軍學習”時，毛澤東說：“你們空五軍支左很有成績嘛。”當南萍政委彙報二十軍進駐杭州後，黨委作出向空五軍學習的決定，毛主席說：“你們二十軍支左也不錯嘛，你們要互相學習。”

當南萍政委彙報到有些部門、有些單位鬥“走資派”還戴高帽、罰跪等時，毛主席說：“不能像對待地主那樣，對我們的幹部要一分為二，我是一貫反對這樣做的。我們有光榮傳統，可以通過‘團結—批評—團結’。”

毛澤東回京後，決定要浙江省軍區、人武部幹部到北京辦學習班，解決浙江問題。汪東興當面向南萍、陳勵耘交待，要他們把林崗（首都“三司”駐杭州聯絡站成員之一）抓起來。9月18日林崗被送到北京。

9月17日 毛澤東南巡到江西。當天上午在南昌接見了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程世清、楊棟樑、黃先、劉瑞森、郭光洲、陳昌奉，陪同接見的有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等。程世清等向毛主席彙報了江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毛主席邊聽彙報邊發表看法。

當彙報到收繳武器的情況，說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四萬多支槍時，主席說：“這些槍是誰發的？我看兩方面都發了，誰發的多？”答：“軍分區、人武部發給保守派的”。

當談到撫州問題時，毛主席說：“撫州的問題值得研究一下，爲什麼他們會這樣大膽？他們總要開會研究形勢，認爲江西、全國和世界形勢對他們有利才這樣幹。他們對形勢估計不正確，我看是。”當彙報到他們組織了一批人控制了九個縣時，毛主席親自指出了撫州九個縣的名字，說：“從這一點看他們是想擴大勢力，進攻南昌，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答：“根據中央指示精神，是軍事叛亂。”主席問：“你們定了沒有？”答：“定了，是周總理批的。”毛主席說：“實際上是叛亂，是典型之一。在贛州、吉安、宜春等地，還搞農管，一個生產隊抽一個人，一個大隊抽十幾個人，採取強迫的辦法，記工分，一天六角錢。（程世清插話：有的還一元），現在農村包圍城市，我不行。”

當彙報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經在江西廣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對江西形勢起了決定性作用時，主席說：“五月底，我寫了幾句話給林彪同志、總理，說江西軍區同群眾爲什麼這樣對立，值得研究。我沒有下結論。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當彙報到造反派對受蒙蔽的群眾有些報復情緒時，主席說：這就不好。你們要注意。你們（指黃、劉、郭）對造反派群眾要很好地說服，不打擊報復。你們是站在造反派一邊的，恐怕你們講話也不完全聽。殺人總不好，你殺他也不好，要說服教育。打擊報復，下跪、戴高帽、挂牌子，還有什麼噴氣式啦，這不好。

當彙報到前一個時期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壓制打擊，被迫跑到南昌來，群眾說，南昌是解放區，主席說：“出現這麼一件事，恐怕不只是江西。”主席問：“你們回來多久？”答：“一個多月了。”主席說：“現在北京還有十來個省在那裏，

中央一個一個地解決。現在中央不提什麼方案了，讓他們自己去吵，看吵出個什麼樣子來。現在那一派（聯絡總站）有在省裏參加工作的嗎？”（張春橋插話：保守派也要吸收他們工作，但數量不要多）答：“聯絡總站已經瓦解了。”

當彙報到聯絡總站一個負責人自己回來做了檢討，現在被造反派抓走了，主席說：“把他收回來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當彙報到支左部隊進駐撫州時，路上遇到保守組織的三道伏擊，打了四、五百人時，主席關切地問了傷亡情況。（犧牲 5 人，57 人受傷）

主席說：“我看《火綫戰報》，什麼南昌告急，南鋼、廬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農管，什麼農村包圍城市。六、七、八月間最緊張，緊張的時候我就看出問題揭開了，事情好解決了，不緊張怎麼解決呀！吉安造反派跑出去三千人，怎麼能夠消滅他們呢？總還有人留下吧！”答：“有些留下在地下活動。”

主席說：“江西軍區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戰士一起來，火就很大，浙江現在每天都鬥，一鬥就是戴高帽，掛黑牌，下跪，搞噴氣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據說，戴高帽是從我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裏學來的，那時是爲了號召農民起來鬥地主，現在不同了，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不能不教而誅，誅就是殺，不能不教育就處罰人。”

當彙報準備在十月間召開全省造反派政工會議時，主席說：“這個好，造反派也要訓，他們坐不下來，心野了。一批不行，可以訓練二批、三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訓練的辦法好，內蒙一個獨立營八百多人是支持保守派的，

反對中央對內蒙的決定，他們到了北京，氣可大了，大鬧，不聽總理的話，打破傢具，會開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條要求。以後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訓練了四十天，都轉了，回去支左不支右。獨立營、獨立師訓練一下就轉過來了，我對現在的右派，不那麼看死，一訓，就轉過來。有壞人是極少數。多數是認識問題。總而言之，打擊面要縮小，教育面要擴大，教育面包括左中右。左派不教育變成極‘左’，到處抓趙永夫、譚震林，哪有那麼多趙永夫、譚震林？”

9月18日 毛澤東南巡來到長沙，並於當天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左右接見了湖南省革籌小組黎原、華國鋒、章伯森。接見時在座的有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等。毛澤東聽取了湖南省革籌小組的彙報，對湖南省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當彙報到湘潭問題時，談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軍立足於政治共識；湘潭造反派在長沙集中學習後，回去按政策辦事。毛澤東說：“湘潭經驗很好。這樣多產業工人，不會一輩子保皇，要正確對待。至於他們的頭頭，靠下面自己起來造反。”

當談到常德和安江問題時，彙報了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動農民，進城攻打造反派，毛澤東說：“打打也好，受教育嘛，許多農民進城，現在是十五個工分，還有三十個工分，還有的是抽籤去打，有的是二元錢一天，有的是一元錢打一次。”

當談到泥木工人的鬥爭情況時，主席回憶過去搞泥木工會的情況說：泥木工人有一些行會思想，那時候入會每人要交六塊大洋。

談到搶槍時，主席說：“搶槍把你們嚇得不得了，名義

上是搶的，實際上是送的，政治幹校就是把槍發給造反派了。”

當談到解放軍下工廠，造反派對解放軍很好，給解放軍作報告，解放軍給造反派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與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時，主席說：“這是一條經驗。”

當談到極“左”思潮時，主席說：“有幾條標語，不要緊嘛，要他多出來一點嘛，群眾會起來批判，你們不要抓人。”

當談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眾集中學習時，主席說：“光他們學習不行，也叫造反派學習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談到“高司”問題時，主席說：“高司還給我發了不少電報，發到上海，由張春橋轉。”主席還問：“不是還有個姓萬的嗎？”有人彙報群眾不同意萬達到革籌小組時，主席說：“等一段嘛。”

當談到軍區開展四大，軍區招待所也開展四大，內部幾個組織意見分歧，大師傅不做飯了時，主席說：“大師傅也是不好惹的。”

談到火車不通時，主席說：“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會上和內部都有壓力。”

主席問到湘潭的王治國時，華國鋒說：“在長沙，被鬥的很厲害。主席問：“爲什麼鬥得那麼厲害？我知道他身體很不好嘛，有高血壓。”

當彙報到軍區犯了錯誤，影響軍分區，省人委、地專機關癱瘓了。”主席說：“中央農業部，農墾部不起作用了，氣象局還起點作用，宣傳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是工廠還在生產，農民還在種田嘛！”（張春橋站起來插話：過去搞精簡，搞了幾年都搞不動，現在證明以後可以大大

精簡)。

談到公檢法問題時，主席說：“過去好像沒有公檢法就不得了，我一聽說公檢法垮臺了，我就高興。”

談到幹部問題時，主席說：“清理幹部要搞群眾運動，這樣多的軍分區、武裝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動的，過去這些人是老革命、老資格，誰也搞不動他。過去地方的黨政機關沒有槍，就靠軍事機關。最後歸結起來，幹部大多數還是好的，我們要團結大多數，包括犯了錯誤向群眾做了檢討的。除了極少數壞人，打擊面太寬了不好。”

談到對犯錯誤的幹部進行訓練時，主席說：“不光是犯過錯誤的，還要搞些沒有犯錯誤的也參加，還要加上少數紅衛兵，要幫助他們學習。”

談到紅旗軍的問題時，主席說：“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說嘛，天下的事不要那麼怕，先恢復了再說嘛。”（張春橋插話：紅旗軍問題林彪同志去年十一月批過文件，指出榮復、轉退軍人不要單獨成立組織，應該說服他們，現在搞大聯合，與別的組織結合，或參加別的組織）主席點了點頭。

談到大聯合問題，左派內部加強團結問題時，主席說：“都要做自我批評，都要少講別人的缺點，不要把矛頭指向對方。過去我們有個經驗，軍隊和地方的關係，軍隊提出擁政愛民，地方提出擁軍優屬，軍隊帶頭做自我批評，兩方面的關係搞得很好。”（張春橋插話：主席語錄中有這一段）主席又說：“兩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的是上面有人蒙蔽他們。對受蒙蔽的群眾不能壓。越壓越反抗，我們也是蔣介石壓出來的。大革命後我們只幾萬人，蔣介石壓我們，一壓就壓出三十萬紅軍，三十萬黨員。後

來是自己犯了錯誤，才有兩萬五千里長征。”

談到搶槍時，主席說：“搶槍不要怕，民兵的槍就有三百萬條。”談到長沙的碉堡工事時，主席說：“不放心就保存一個時期嘛。”（楊成武插話：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個備戰）

9月20日 毛澤東南巡到達湖北省，在武漢共兩天三夜。毛主席乘坐吉普車看了武漢三鎮的市容和大字報專欄。軍區領導爲了主席的安全，希望主席晚上去看，毛主席堅持白天去看。毛主席認爲壞人總是極少數。主席還訪問了工人，進行調查研究。

毛澤東視察中還在武漢東湖邊照了像。

毛澤東在9月20日上午接見了武漢部隊和武漢警備司令部負責人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等。以下是毛主席在武漢視察的指示精神要點（根據曾思玉、劉豐傳達）：

一、湖北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是好的。出現了“七·二〇”事件，是壞事也是好事。問題就是不破不立。湖北亂透了，問題就好解決。湖北問題已基本解決了。湖北將是第二批建立革命委員會的省份。毛主席三番五次談到，你們可以三結合了吧，主席說：三結合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左派已定，軍隊支左，問題是地方幹部沒有把握。

二、要解放一大批幹部。主席從黨的歷史講起，從中央蘇區講到延安整風，到解放。主席說：“對犯錯誤的同志要允許人家改正，給以改正錯誤的機會。打擊面要縮小，教育面要擴大。”（插話：今年上天安門的名單是主席親自批的）主席說：“你們打倒你們的，我批我的。現在你們一提就打倒這個，打倒那個，怎麼成呢？現在軍隊支左很多都犯了錯誤，但是一旦打起仗來，只要下一道命令，他們

都能衝鋒陷陣的。”

主席問：“對百萬雄師怎麼樣？整得太厲害了，這樣不好。壞的只是一小撮頭頭，大多是都要讓他們自己教育自己。”

主席對劉豐說：“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嗎？”（劉說：打倒沒關係。今天有人寫信給我，要為百萬雄師翻案，不翻案就沒有好下場。署名狂人）主席說：“壞人總是極少數，好人總是大多數，廣大群眾是好的。”

三、要文鬥，不要搞武鬥。毛主席說：“體罰，我最反感。你們是不是把我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土豪的辦法拿到文化大革命來了，這怎麼行？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革命，那樣搞是會脫離群眾的。‘降落傘’是武漢的特產，‘燕飛’是王光美在桃園搞得那一套。”

四、堅持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的公式。毛主席說：“現在這個公式搞亂了，現在緊張嚴肅有餘，團結活潑不足。”

毛主席說：“工人階級分兩派，我就想不通，要破私立公。你們跟他們（指造反派）講一講，過去一個蘇區打內戰無非是馬列主義多一點，少一點的問題。告訴小將們，現在輪到他們犯錯誤了。”毛主席特別強調工人階級必須聯合起來。聯合不起來，主席早就在武漢發覺了，在七月十八日就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爲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聯合不起來有三個原因：一個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干擾和破壞；第二是地富反壞右不甘心滅亡；第三是小資產階級思潮的影響。

9月21日 下午，毛澤東乘專機到達河南省會鄭州。22日上午，毛主席在火車上接見了劉建勛、王新和紀登奎。以下是劉建勛傳達毛主席接見時的指示：

當毛主席見到紀登奎時說：“你是紀登奎？老朋友了”。

劉建勛說：“他被關了四個月，挨了四個月的鬥爭。”

毛主席笑著問紀登奎：“你說一點好處沒有嗎？”紀登奎說：“大有好處。”

毛主席說：“我上次路過鄭州時，看到一個大標語‘大局已定，二七必勝！’河南形勢很好嘛！”

當彙報到河南各級幹部情況時，毛主席說：“這是何運洪幹得好事。何運洪那麼厲害呀！”

當彙報到開封東郊的情況時，劉建勛說：“我們主張不打，加強政治攻勢。”

主席說：“不講俘虜政策不好，要給八·二四做工作。我贊成你們的意見”。

當彙報到少數人不大講政策，隨便打槍，有的地方打死人時，毛主席說：“群眾起來議論，不贊成他們，群眾起來都反對，就收場了。”主席又說：“抓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搞不久，現在已經不那麼響了。他們不擁軍，一擁軍就沒有對象了。”

9月25日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毛澤東視察各地的消息。報道說：“在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勢下，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最近一時期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現在毛主席已經回到北京。”

10月1日 首都5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8週年大會。毛澤東、林彪出席了大會。林

彪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講話，說：“毛澤東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普及到全中國。幾億人民發動起來了。”“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由無產階級自己發動的大革命。”“毛主席最近指示我們，要鬥私批修。……我們要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用鬥私批修這四個字為綱，加強對軍隊幹部、地方幹部和紅衛兵的思想教育。要開辦各種學習班，中央辦、地方辦、各個革命群眾組織也可以辦，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10月7日 中共中央轉發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指示。毛澤東指示的主要內容是：

“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形勢大好的重要標誌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的這麼廣泛，這麼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辯論”。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爲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爲了保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鬥群眾。

群眾組織裏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人當了保守派，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有人說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變的嘛。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運用‘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這個公式來解決我們內部的矛盾。在進行批判鬥爭時，要用文鬥，不要搞武鬥，也不要搞變相的武鬥。”“有些幹部爲什麼會受到群眾的批判鬥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爲了不起，就擺架子，有時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後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係問題，搞好幹部和群眾的關係。”

“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

10月12日 毛澤東會見由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參加會見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等人。毛澤東在談話中說：“我們要全面解決還得幾個月，我們準備3年，到今年6月1日算1年；大體上過一段時間，亂的最厲害的地方也好辦了。不疼不癢的地方不好辦。”毛澤東還說：“這種群眾運動打內戰，這麼一打，就分清了什

麼是左派，什麼是右派。右派搞‘農村包圍城市’”。他說：“現在我們有計劃地武裝工人，武裝革命左派，外國人講中國天下大亂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謠的；有些地方我們還嫌它亂得不够。爲什麼我們不怕亂呢？因爲你不讓他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武漢問題是我去鬧起來的，我就不相信武漢去不得。我7月14到武漢，一直到21日才離開。我說我捅了一個馬蜂窩，他不咬人嗎？他沒有下決心咬我，也沒有下決心咬總理。武漢問題很快就解決了。此外，還有公檢法，打得厲害，我是高興的。過去的公安、檢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壞人。這次暴露出來了。武漢公檢法不是分爲兩派嗎？那一派垮下去了。”

10月20日 毛里塔尼亞總統達達赫訪問中國。周恩來、李富春、謝富治等到機場歡迎。23日，毛澤東、林彪會見達達赫總統一行。25日，中國、毛里塔尼亞聯合公報發表。

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徵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通知》說：毛主席最近提出什麼時候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如何準備這次大會問題，並且指示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做些調查，現在把姚文元同志關於他們初步調查結果給主席的一封信發給你們參考，請你們也做好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和你們的意見報告中央。

11月5日 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關於“九大”和整黨問題。毛澤東說：“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當然，壞人還是搞不乾淨，一次搞乾淨是不可能的。整黨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統統整好，九大以後，根據新的黨綱、黨章，繼續重新整黨、建黨。過去，一是聽話，一是生產好，有這兩個條件就可以入黨。聽話要看聽什麼話，

做馴服工具不行。”“黨員要那些朝氣蓬勃的，死氣沉沉的、暮氣沉沉的，就不要加入這個黨。”“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我贊成康生的意見，一個是叛徒、特務，一個是文化革命中表現很壞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這就很寬了。我們黨要吸收新鮮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裏來。舊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有朝氣”。“恢復組織生活，不要恢復老樣子。有些黨員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積極，一聽要恢復組織生活，就神氣起來了。我看這些人要檢討。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不積極，什麼理由？無非要做馴服工具。”“黨綱要修改。”“組織紀律性還要有，但我們講的是自覺地紀律，盲目服從，做馴服工具不行。”“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給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63年搞了個十條，才隔三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後十條，也不徵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鄧小平要批，請軍委準備一篇文章。我的意見還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廢除級別問題，也要談一談。”

11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開闢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50週年》。文章由陳伯達等人起草，經毛澤東審閱。文章首次將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做了概括，有六個要點：一、

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爲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爲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四、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鬥私，批修”。

11月13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北京部隊和空軍召開的兩個會議的代表。

11月27日 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中央主席希爾。毛澤東在談話時說：“赫魯曉夫垮臺以後，劉少奇還說蘇聯修正主義黨的性質未定。去年春季蘇聯要開二十三大的時候，劉少奇、彭真還主張我們派人參加。後來我、康生，還有其他同志反對，才沒有去；和劉少奇的鬥爭歷史可長了。我記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還沒有開的時候，我就批評過他的唯心主義。那時只有少數同志知道這件事。劉少奇口口聲聲講馬列主義，可是馬列主義的書他又不看。”

12月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

小組發出《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說：毛主席最近對浙江如何正確對待紅暴派問題做了批示。毛主席說：“浙江的紅暴，與湖北的百萬雄師不同，是個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有許多群眾，似宜以幫助、批評、聯合為原則。”

12月12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永遠做群眾的小學生》。社論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軍隊辦學習班要有戰士參加。”

12月17日 毛澤東在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12月13日《關於慶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通車向中央的請示報告》上，就“絕對權威”的提法作出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於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於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二、大樹特樹的說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從鬥爭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三、黨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壽，應通知全國重申此種禁令。四、湖南的集會另擇日期。五、我們不要題字。六、會議名稱，可同意湖南建議，用第一方案。以上各點請在一次會議上討論通過為盼。”

一九六八年

1月1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正在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人民解放軍幹部、各地黨政幹部和群眾代表和出

席空軍直屬機關、部隊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會議代表2萬多人。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康生、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謝富治等人。

1月26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後勤部、空軍、二炮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2月19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北京衛戍區部隊和在北京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部隊代表，以及8341部隊的指戰員，共約2萬多人。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參加接見的有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

3月8日 毛澤東、林彪等接見出席解放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通訊兵、防化學兵、高等軍事院校、政治學院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專業會議的代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參加了接見。

3月29日 毛澤東在《發表“緬共武裝鬥爭20週年的聲明”的請示報告》上做了批示：“一般地來說，一切外國黨（馬列主義）的內政，我們不應干涉。他們怎樣宣傳，是他們的事。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失當，使人看起來有強加於人的形象。”

3月30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革命委員會好》。社論說：現在，全國已有18個省、市、自治區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還有一些地區正醞釀革命委員會的誕生。大量的基層單位，都已經建立起革命委員會。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員會的經驗有三條：一條是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一條是

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迭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領導班子。”

4月16日 毛澤東發表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4月4日，美國白人種族主義者槍殺了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美國黑人掀起全國性的抗暴鬥爭，美國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亂，美國當局出動軍隊進行鎮壓。毛澤東在聲明中說：“馬丁·路德·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但美帝國主義並沒有因此對他寬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對他進行血腥的鎮壓。”“美國黑人的鬥爭，不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而且是整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美國人民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殘暴統治的新號角。他對於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對於越南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個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的正義鬥爭表示堅決的支持。”

5月8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了在京參加毛澤東學習班的解放軍代表。陪同接見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等人。被接見的還有各地黨政幹部和群眾代表。

5月18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重要通知》。《通知》說：“最近毛主席批評了在一個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這種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這就是所謂以我為核心的錯誤思想’。毛主席的批評，引起各級黨、政、軍、群及駐外使館的注意。今後，不論在報刊上（包括各種小報），在內部文件中，在各種講話中，特別在接待外賓時，一律不再用‘世

界革命中心’這種說法。”

5月19日 毛澤東在《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上做了批示：“文元同志：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先印若干份，分發有關同志，然後在碰頭會上宣讀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語發出。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此廠情況，我已從個別同志那裏聽過兩次，你是否可以去那裏看一看，問一問？”這一材料是姚文元5月13日呈交給毛澤東的。姚文元在呈交報告中寫道：“此件總結了清理階級隊伍中的一些政策性問題。”5月25日，中央發出轉發毛主席這一批示的通知。

6月3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南京、瀋陽軍區、各總部、各軍兵種參加毛澤東學習班的軍隊成員2萬餘人。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等人。參加接見的還有李富春、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

6月30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解放軍濟南、廣州、蘭州部隊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成員2萬餘人。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張春橋等參加了接見。陪同接見的還有董必武、陳毅、劉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

7月28日 凌晨3時半到8時半，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接見了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5人，參加接見的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毛澤東說：“今天是找你們來商量制止大學武鬥的問題，怎麼辦？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

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興。有些學校搞了些鬥黑幫，但很不够，就是因為分了兩派，忙於武鬥。現在逍遙派那麼多。不搞鬥批改，而要鬥批走，鬥批散。我說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但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這是要文鬥，不要武鬥。現在提出四個辦法：一、實行軍管；二、一分為二（就是兩派分成兩個學校，住在兩個地方）；三、鬥批走；四、繼續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還是照樣轉動。這個問題也不必現在答復，回去你們商量商量，討論討論。希望你們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麼兩派。”

8月5日 毛澤東將外國朋友贈送的芒果轉送給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為此，北京和全國各地都舉行了慶祝活動。

8月11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福州、武漢、成都、昆明、新疆、西藏六地區陸海空部隊幹部學習班的軍隊人員。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謝富治、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人。參加接見的有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8月15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首都工人毛澤東宣傳隊代表和解放軍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和北京衛戍區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人員。參加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人。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也參加了接見。毛澤東在接見時對山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格平說：“你們有希望嗎？還在大打嗎？你們要組織大量宣傳隊，要宣傳嘛！”21日，太原市兩大派簽訂了《大

聯合協議》，聲明解散跨行業組織。

8月25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由毛澤東親自批示“照發”的《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通知》說：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國有七億人口，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要充分發揮工人階級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領導作用。工人也應當在鬥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鬥爭覺悟。”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對於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通知》還說：“中央認為：整頓教育，時機到了。各地應該按照北京的辦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學校逐步管起來。在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在工人中已經實現革命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已經有了顯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以優秀的產業工人為主體，配合人民解放軍戰士，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分批分期，進駐各學校。先搞試點，總結經驗，逐步普及。先進大學，後進中、小學。抽調工人的人數，大體上可佔當地產業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些，不會妨礙生產。……”

9月2日 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的《關於工人進軍事院校及尚未聯合起來的軍事院校實行軍管的通知》中，披露了毛澤東的有關批示：“如工人條件成熟，所有軍事院校應派工人隨同軍管人員進去。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

9月5日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關於選調和派遣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幾條規定》。《規定》的主要內容是：一、選調工人，必須從那些實現了革命大聯合，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工廠。二、選調工人，必須是從那些清理了階級隊伍，並取得了

顯著成效的工廠。三、工宣隊隊員，必須是優秀的產業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現好的。一般年齡在 25 歲至 60 歲左右。四、凡原來同所去的學校或其他單位的各派組織保持聯繫尚未脫鉤的，不能派到那個單位去，已派去的應加以調整。五、要以優秀的革命的產業工人負責領隊，並參加聯合指揮部的領導。六、派出宣傳隊的單位、隊員和領隊人，都要經過審查批准。

9月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批示轉發北京市《關於召開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會議情況報告》。毛澤東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現在需要規定一些具體政策，我看此件不錯。建議轉發各地參考。請酌定。”《情況報告》反映，會議著重解決以下幾個問題：一、工宣隊、軍宣隊要對學校實行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最重要的問題，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切實落實毛主席關於“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的最新指示。二、對學校的領導，首先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數群眾一定會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綫上來。要正確對待革命小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與過。三、關於革命大聯合問題，一定要通過革命大批判，對學生加強兩條路綫鬥爭的教育，提高階級覺悟，在做好群眾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礎上，按班系、按科室搞大聯合和三結合。四、加強調查研究，對學校的問題，不要急於表態，更不能輕易表態。五、對各派所抓的人，工宣隊可以接收過來。經過審查後，如確是壞人，又有證據，就不能放，要實行群眾專政，決不要放走壞人；對於沒有什麼根據的一般群眾，可先組織集訓班學習。

9月14日 《人民日報》轉載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

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並加了前言。《前言》說：“赤腳醫生是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切稱呼。”“他們大力進行醫療、預防、宣傳工作，為改變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作出了顯著的成績。”文章引用了毛澤東的一段最新指示：“這個從城裏下到農村的醫生證明，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相結合的，有些人並有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綫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9月18日 《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毛澤東1962年9月18日給日本工人訪華團的題詞。題詞的全文是：“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應日本工人學習積極分子訪華代表團之命，書贈日本朋友們。”《人民日報》為此發表社論：《各國革命人民勝利的航向》。毛澤東在社論的初稿上批示：“把離開主題的一些空話刪掉，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並且刪去了“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代的新發展”、“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等文字。

9月29日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央轉發上海市《關於在產業工人中有步驟地發展新黨員的請示報告》。毛澤東的批示是：“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請碰頭會議復。復文及本件，請考慮發各地參考，並酌情辦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說：“一、發展新黨員的工作，打算在具備條件的單位進行，即大聯合、三結合鞏固，清理階級隊伍工作做得好，整黨工作取得初步成果的單位。二、

關於發展新黨員的標準。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發展第一批黨員，一定要堅持高標準，必須是真正過得硬的，革命群眾信得過的，在文化革命中有貢獻的優秀的造反派。三、關於入黨介紹人和預備期。接受新黨員，必須本人申請，並有正式黨員兩人介紹。全市第一批發展的黨員，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不要預備期，以便即將行使正式黨員的權利，今後發展黨員還是應當有預備期。

10月1日 首都50萬人在天安門集會，慶祝建國19週年。毛澤東、林彪出席了大會。其他出席大會的領導人的排名順序是：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李富春、陳雲、董必武、陳毅、劉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林彪在大會上講了話。

10月5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各地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等。

同日，毛澤東會見由巴盧庫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毛澤東說，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所以我們不說最後的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不能喪失警惕，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大陸上有國民黨殘渣餘孽，有些人鑽到我們中央領導機關來了，或鑽到地方領導機關來了。這一次算是一個一個作了清理。在過去，一些工廠主要領導權掌握在這些壞人手裏。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等。

同日，在《人民日報》刊登的《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

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經驗》的報道中披露了毛主席最近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10月13日 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開幕。毛澤東主持了會議。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講了話，講話內容主要有：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文化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錯誤是主要的，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過去我們南征北戰，那種戰爭好打，因為敵人清楚。這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比那種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犯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還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決。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局勢；知識分子是粘土，板結了，不透空氣，不長莊稼，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辦。不能一講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知識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翹到天上去；這場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麼叫到底？估計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10月31日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毛澤東發表講話。對於“二月逆流”，他說：“他們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又再說明他們的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麼幾次反復嘛，大家就比較清楚了，每天都有簡報。”“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了。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也不是完全不公開的。”“我們這個黨，經過這一次，我看是比較純一些，……

但是，太純了，我看也不大好。你比如就講九大吧，九大代表，這個‘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呀，我看就是個缺點。所以有時候，我們還是推薦你們在各地方把他們選舉為代表。陳毅同志，我看了他講話，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就是那個右的那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我主要就是這麼幾點，就是一個講清理階級隊伍。清理階級隊伍，注意調查研究，注意一個‘准’字，對於黨內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還有三看嘛。”

11月12日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批准並轉發有關傳達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兩個報告。一份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報告，要求將原來確定的由縣區傳達到各基層單位，改為由市革命委員會召開1.7萬人大會直接傳達。另一份是張春橋的報告，提出四點意見：一、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講話，傳達不傳達？傳達主要的精神，十分必要，很有好處。二、要不要非黨員參加傳達會議？許多基層，掌權的是非黨造反派，不向他們傳達，他們領導討論和落實公報有困難。這對培養一批新幹部也是十分必要的。三、“二月逆流”的那幾個人，要不要點名？看來，點名很有必要。我們點了名，激起廣大群眾的義憤。至於選“九大”代表，群眾一方面認為陳毅不能當外交部長，不能當中央委員。另一方面也說只要毛主席指示，我們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參加九大。四、決心把十二中全會的傳達，當作一項政治思想工作抓到底。

11月25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認真學習兩條路綫鬥爭的歷史》。社論中傳達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綫，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覆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人民群眾都知道。”

11月25日 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毛澤東說，我們的國家，對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說來，對工人運動說來，對學生運動說來，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壯大發展說來，再有五年時間，就會比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現在已經23年了，再有5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嗎？其實，在二次大戰後，各種戰爭從未停止過。按照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就是戰爭，它就是離不開戰爭。參加會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人。

12月3日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央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轉發新華印刷廠在對敵鬥爭中堅決執行黨的“給出路”的政策的經驗報告》。毛澤東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議將此件轉發各地參考。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12月22日 《人民日報》發表《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裏吃閒飯》的報道。介紹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情況，在該報道的編者按語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來，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12月2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毛澤東在這一《通知》中加了幾段話：“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悔改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走資派，

就認為都是壞人。”“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子女，也不要稱她們為‘黑幫子女’，而要說他們是屬於多數或大多數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實踐結果，會有少數人堅持頑固態度，但多數是肯定可以爭取的。”

12月29日 周恩來在關於“徐向前最近表現情況”報告上批示：建議軍委辦事組派人找李廣橋支部同志談談，不要搞得過於緊張，防止意外。1969年1月3日，毛澤東在該報告上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

一九六九年

1月1日 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的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中，公佈了毛澤東最近的兩條指示：“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過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

1月8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於解決浙江問題的會議。1月8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等）開會，許世友、

杜平列席，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解決南京軍區支持的浙江省軍區阮賢榜、李國厚等人，與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駐浙部隊二十軍、空五軍南萍、陳勵耘、熊應堂等人的對立問題。毛澤東確定會議的方針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評，不要批評對方。並說：“地方問題在軍隊，軍隊問題在於做工作。爲了減少矛盾，二十軍、空五軍是否調調防，離開浙江。”毛澤東還說：“省軍區檢討我看過，二十軍、空五軍的檢討怎麼我沒有看到？”張春橋、姚文元進行了說明。29日會議結束，浙江省軍區阮賢榜、李國厚被留在北京做檢查，後被送到五七幹校勞動。南萍、陳勵耘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1月29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轉發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關於《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報告。毛澤東批示：“照發。”

3月2日 中蘇兩國邊防軍在珍寶島發生衝突。外交部照會蘇聯大使館，對蘇軍製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緊急的、強烈的抗議。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著重談了準備打仗問題。

3月9日 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集九大準備會議。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及各大軍區和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共128人參加了會議。毛澤東提出，九大的任務是總結經驗，落實政策，準備打仗，這三句話成爲九大的指導思想。

3月15日 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講話。毛澤東首先談了打仗問題。他說：一個縣成立一個團，全國都要搞。平時堅持地方，戰爭起來了就補充野戰軍。戰爭打起來，依靠一年一度的徵兵工作是不行的。東北、華北、西北要準備一下。準備好了，他不來也不要緊。大敵當前，動員、

準備一下有利。毛澤東說：抗議他不聽，雙方都在搶時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毛澤東說：“紅衛兵打仗勇敢，紅衛兵還是要稱讚一下，他們還很活躍。凡是過去武鬥比較厲害的學校，現在就轉得比較好。對這些武鬥的學生，軍隊不願意要，地方也不願意要。紅衛兵不聽話是個暫時現象，或者是有壞人指揮。紅衛兵前期、後期，甚至於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後期之間有一個時間不聽話，現在就好了。”

毛澤東還強調了政策落實問題。他說：“政策落實是個大問題，儘管有清華的經驗，有的就學，有的就不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有一個就傳達，有一個就不傳達，並且還關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無非是特務、叛徒、走資派嘛！死不悔改地走資派難道他一輩子就不改？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幾個反動標語算什麼？教授、講師不像軍隊，他們是手無寸鐵。教授、講師要放，當然不是一個不關。壞人是極少數，我們把這些人推向國民黨方面好嗎？不要在學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多數的教員、幹部中打主意。不讓人家講一點怪話，也不讓資產階級講一點自由主義行嗎？他們因為肚子裏有氣。有的今天講了，明天就不講了。……政策不落實，不解放知識分子不行。”

毛澤東在談到“二月逆流”時說：“我對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來。二月逆流不僅北京有，其他地區也有；二月逆流不僅衝擊了地方機關，也衝擊了軍隊機關。那個時候，一時打倒這個，一時打倒那個，可多了，無非是說錯了話嘛！報告上（指九大報告）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這次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他們一肚子氣，只講劉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毛澤東最後說：“有些犯錯誤的，過一兩年還是要解放他們，就是不讓他們掌大權。二中全會（七屆）就講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資產階級。劉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資產階級。給了宋斐卿很多錢，結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李德一個人有什麼用，還不是有那麼一些人捧他的場。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數人團結起來。二月逆流這些人選為九大代表，地球還不是照樣轉！‘天地悠長，不為堯存，也不為桀亡’。主要是落實政策的問題。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勝利的。”

同日《紅旗》雜誌第3、4期社論《關於總結經驗》中傳達了毛澤東最近的兩段指示：“要認真總結經驗。”“到一個單位去瞭解情況，要瞭解運動的全過程，開始怎樣，後來怎樣，現在怎樣，群眾是怎麼搞的，領導是怎麼搞的，發生過一些什麼矛盾和鬥爭，這些矛盾後來發生了什麼變化，人們的認識有什麼發展，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

3月31日 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建議徐海東參加九大主席團。九大召開前，根據毛澤東的臨時提議，增加徐海東為主席團成員。

4月1日至24日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希望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毛澤東回顧黨的歷次代表大會說：“第七次代表大會是在延安召開的，開了一個團結的大會。那個時候，也是黨內分歧，因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有人建議不要選王明路綫那些人到中央，我們不贊成，說服他們選舉，結果，就有幾個不好了，王明跑到國外反對我們，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張聞天、王稼祥犯了錯誤，就這麼幾個。……這些人，我們不知道他

們不好，他們的政治歷史我們不清楚，也選進來了，經過八大到現在，搞得比較清楚了。政治路綫上、組織路綫上、思想路綫上，都搞得比較清楚。”

大會選舉毛澤東爲主席團主席，林彪爲主席團副主席，周恩來爲大會秘書長。林彪作了政治報告，這個政治報告是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的。11日，毛澤東在大組召集人會議上講了話。他說：“當前主要問題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一方面把敵人揪出來了，另一方面掩蓋了打擊面寬和擴大化問題。”24日大會選舉出由170名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

4月28日 中央九屆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會議選舉了中央機構。毛澤東被選舉爲中央委員會主席，林彪爲副主席，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爲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毛澤東在會議上講了話，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裏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裏。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條路綫走，無非是搞什麼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麼獎金，等等。”

5月1日 毛澤東、林彪等在天安門與首都50萬軍民歡慶“五一”，參加慶祝“五一”活動的有出席九大的代表、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以及中央委員。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先後接見了阿爾巴尼亞等8國新任駐華大使，並同他們進行了親切的談話。

5月17日 毛澤東對新華社報道外電作出指示。指示說：“外國人、外國黨評論‘九大’，編者不要隨意加‘妄評’字樣，如實地向中央提供就可以了。”這一指示是針對新華社1969年4月10日《內部參考》增刊第1256期登載5條外電外報對我“九大”的反應，有三條的標題有“妄評”的字樣作出的。

7月1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中國共產黨萬歲——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48週年》。毛澤東審閱了社論文稿並批示：“可發。”《社論》公佈了毛主席關於整黨工作的指示：“每一個支部，都要重新在群眾裏頭進行整頓。要經過群眾，不僅是幾個黨員，要有黨外的群眾參加會議，參加評論。”毛澤東在審閱社論文稿時，將第二段中“把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一句，改為“建成一個有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並批示：“請注意：以後不要這種不合實際的自吹自擂。”

9月11日 周恩來總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機場會談。9月3日，越南勞動黨主席胡志明逝世，以柯西金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在參加了胡志明的葬禮後傳話說，希望途經北京同中國領導人見面。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後決定，同意柯西金前來中國會談。

9月17日 《人民日報》刊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十週年口號”。口號共29條，其中第22條是毛澤東增加的，內容是：“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

9月23日 毛澤東視察天津。他分別接見了天津市革委會主任解學恭、副主任鄭三生、警備區政委劉政和市革委會核心小組成員及駐天津陸、海、空三軍部隊負責人。

10月1日 首都隆重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週年集會和遊行。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參加慶祝大會，並檢閱群眾遊行。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還有來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工人、農民、解放軍、紅衛兵、幹部、知識分子代表995人。應邀參加大會的各國貴賓有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越南南方、柬埔寨、剛果（布）等國的代表團。林彪在慶祝大會上講了話。會後，首都40多萬軍民舉行了慶祝遊行。當晚，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又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晚會，觀看節日焰火。同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休息室會見了朝鮮崔庸健委員長，進行了友好交談。毛澤東在談到中朝友誼時說：“咱們關係不同，應該搞好關係嘛。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當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朝鮮同志長期和我們一起作戰；反美戰爭的時候，我們也同朝鮮同志一起作戰，將來這種可能性還是有的。”在談到反對修正主義時，毛澤東說：“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我們是一道走過來的嘛！對蘇修，我們不一定天天罵，有時可以停一下，天天罵不一定靈。”關於斯大林問題，毛澤東說：“我們是老朋友，我們反對反斯大林，這一點早就一致。斯大林有錯誤，我們不能說他沒有錯誤，但他基本上是好人。斯大林對蘇聯革命，對世界革命有貢獻。反斯大林，實際上反的是十月革命後繼續執行列寧主義路線。”關於中蘇兩國關係，毛澤

東說：“中蘇分裂，美國高興。中蘇邊界已有十幾天不打了，只有它不打，我們巴不得，我們是不希望打的。”會見結束後，毛澤東和崔庸健一起在觀禮臺觀看群眾慶祝國慶遊行。

10月11日 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國來京參加國慶觀禮的代表。參加接見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葉群、江青、李先念等。受到接見的有全國各地的工人、農民、解放軍、紅衛兵、幹部、知識分子及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門“五·七”幹校代表1萬人。

第一部分完 2003年10月 初稿

本文參考資料：

《共和國史記》第三卷（1966-1976）陳東林、杜蒲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天翻地覆慨而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3.12-1967.10.1）首都部分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河南二七公社洛陽拖技校八一兵團印

《潤之書屋》藏品：文革資料

後 記

《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和思考》一書終於出版了。

從 2006 年萌生出書的念頭，至今已經有四個年頭。原以為已經有了初稿，出書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殊不知選稿、修改、整理、校對、定稿、出版，是一個繁瑣、細緻、來不得半點馬虎的過程。其間，家事、疾病、老人、孩子等諸多瑣事，將歲月撕成碎片，修改書稿只能抽空進行。就這樣，斷斷續續，拖拖拉拉，修修補補，總是覺得不滿意。老伴是我最執著的支持者。我倆從同學、戰友，到夫妻、同志，幾十年來，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相濡以沫。幫助修改、校對，成了他義不容辭的責任。他總是認認真真，一絲不苟，任勞任怨，不厭其煩。其實，共同的志向早已將我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已經分不清彼此了。同志們的支持，也是我出書的動力。朱久如、張緯夫、楊止仁等老同志不僅對初稿提出過寶貴的意見，還經常給我鼓勵和幫助。在出版過程中，要感謝年輕網友玉嶺同志，在百忙中修改書稿，幫助聯繫有關出版事宜。要感謝的人很多，情長紙短，在此一並表示謝意！

文革已成爲歷史。親歷者大都年逾花甲。不少人帶著

想說又沒有說的遺憾離開人世。該書的出版，儘管仍有很多不足之處，但總算完成了心願。如果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使更多年輕人關注文革、討論文革，更多親歷者回顧文革，更多人拿起筆來，寫出有分量有價值的關於文革的文字，我就更感到欣慰了。

作者

2010年2月

文革回憶錄叢書

◎四十二年望中猶記

吳焱金 口述 / 鍾逸 整理

◎悲欣交集話文革

曹承義 初稿 / 鍾逸 整理

◎奉獻

——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楊道遠 著

◎不再沉默

——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

武彩霞 著

文革研究叢書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

——管理以及勞動分工的變革

[法] 夏爾·貝特蘭 著

中國工人研究網譯

注：原“文革造反派回憶錄叢書”
現更名為“文革回憶錄叢書”。

責任編輯：林 濤

封面設計：胡 冬

文革是我們這代人“激情燃燒的歲月”。當年的紅衛兵如今已兩鬢染霜，額頭上的條條皺紋記述了歷經的種種坎坷和磨難。然而，沒有後悔，沒有哀怨，血是熱的，心是紅的。

- ◎不再沉默
- ◎試析河南省文革的幾個特點
- ◎鄭州大學文革概述
- ◎四十周年話文革
- ◎關於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看法
- ◎文革事件鉤沉

ISBN 978-988-18428-2-4



9 789881 842824

ISBN 978-988-18428-2-4

定價：HK\$ 80 元